

贝科夫小说选



当代外国文学

贝科夫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贝科夫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2}$

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10208·2

定价 1.05 元

目 录

方尖碑.....	1
活到黎明	97
狼 群	283

方 尖 碑

吉林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室
文学翻译小组译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ОБЕЛИСК»

据《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73. № 24 译出

在整整的两年里，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到离城不很远的那所村学去一趟。多次想去，但每次都往后拖。冬天，想拖到寒潮稍退或在暴风雪停息以后；春天，又想等干燥暖和一些；到了夏天，路也干了，天也暖和了，又一心忙着去那拥挤、炎热、人口稠密的南方度个把月的假期。另外，也曾想过：还是等工作和各种家务闲一些再去。正象生活里常有的那样，我一拖再拖，以致来不及去做客，只有去参加葬礼了。

关于葬礼这件事我知道得也晚。我出外办事回来，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老同事，我们随便讲了几句话，开了几句玩笑，都要分手了，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又站住了。

“听说了吗？米克拉谢维奇死了，就是谢尔佐村的那位教师。”

“怎么——死了？”

“可不，就这么死了。前天死的，好象在今天安葬。”

这个同志说完就走了。米克拉谢维奇的死，他大概无所谓，可我心慌意乱地站在那里望着街。有那么一刹那，我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忘了自己所有急需办的事。一种

还没有意识到的内疚猛地一下把我击懵了，象把我钉在这块柏油马路上。当然我也知道，若论这位年青乡村教师的早死，我是毫无过错的，而且他既不是我的亲戚，甚至也不是我亲近的朋友。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心痛：一来出于对他的惋惜，二来这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一个无法弥补的过失：有一件事我过去没有做，现在是永远也无法去做了！我觉得不应该放过最后这一次求得自我原谅的机会，所以当机立断：现在马上到谢尔佐去。

从我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刹那起，就感到时间过得飞快，无法按常规去计算。更确切点说，已经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去的。我拚命忙合起来，虽说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回到家，家里人都不在，连一张告诉他们我外出的便条都没有写，就向汽车站跑去。又想起来了机关里的工作，想打个电话，但自动电话机仿佛故意跟我作对似的。它正常无误地吞着硬币，却象中了邪似的成了哑巴。我跑去找别的自动电话机；只是在新建大楼“食品商店”才找到，但已经有一队人耐心地排在那里。我等了好几分钟，听完打碎了玻璃的蓝色电话亭里那些冗长琐碎的通话；还和一个原先被我当成姑娘的小伙子吵了一架——他穿着喇叭裤，亚麻色的绉绉鬈发一直拖到绒布短上衣的领子上。等到我终于打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却错过了去谢尔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今天看来不会再有去这个方向的车了。我想在停车场强乘出租汽车，但白白浪费了半个来小时。开过来的每一辆车，都有一群比我动作灵、主要是比我脸皮厚的人冲上

去。最后，我只好想法来到城外的公路上，采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截车。果然，从城里开来的第七辆或许是第十辆满载一卷卷油毡纸的汽车在路边停住了，让我和一个小伙子上了车，他穿着胶底运动鞋，挎包里鼓鼓囊囊装满市里出的一个个大面包。

坐上车，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只是有时候觉得汽车走得太慢，甚至我发觉自己在心里骂司机；虽然冷静一点想，我们这趟车开得很正常，和别的车没有两样。铺着沥青的公路，平坦又几乎笔直，汽车只是在上下慢坡时轻轻摇晃。时近黄昏，晴朗的仲秋季节，远方宁静清爽，一片片幼林浅黄稀疏，空旷的田野辽阔无际。离公路不远，靠树林附近，集体农庄的牛群在那里放牧——几百头不满周岁的牛犊，一样的年龄和个头，一样的棕红毛色。在公路另一侧的宽阔田野里，集体农庄一台不知疲倦的拖拉机嘟嘟地在秋耕。几辆满载亚麻秆的汽车向我们迎面驶来。公路经过的布基洛维奇村庄，那住房前的晚季天竺牡丹红花似火，艳丽夺目，菜园里犁开的垅沟边，倒伏着干枯的茎叶，农妇们正在那里翻捡土豆。大自然充满宁静的秋光。庄稼已经成熟收割，大部分农活已经做完，只剩下粮食的加工和冬藏了。在这个时候，人类恬静的喜悦流露在古往今来、代代繁忙、节奏和谐的农活之中。明年春天再见吧，多辛多劳的田野！

但是大自然的柔情美意却怎么也没能给我安慰，而只是使我感到压抑和恼怒。我来晚了，确实晚了，我感到痛苦，悔恨自己懒惰成性和麻木不仁。以前的种种理由此刻

全都变得没有根据，其实我又何曾有过什么理由？要是这样懒散迟钝下去，就很容易虚度年华，了此一生，在这罪恶的人间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或可使你生命具有意义的事来。如果为了虚无飘渺贪得无厌的幸福象蝼蚁一样忙忙碌碌，而将重要得多的东西弃之不顾，那就让这种无聊的生活见鬼去吧！因为这会把你的生活阉割得毫无意义。你的生活只是你自己才认为是自立的、与别人生活隔绝的、按你纯个人的生活轨道安排的。事实上，如果人的生命还充满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这并非今天的发现），那么这首先就是人类的合乎理性的善良和对别人的关怀——关怀那些与你亲近甚至和你疏远但是需要你关怀的人们。

也许米克拉谢维奇比别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其实，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文化水平也不是出奇的高，也没有受过足以使他出类拔萃的高级教育。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也许既不高于也不低于成千上万的其他城乡教师。不错，我听说过，他在战争期间有过一段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死里逃生。还听说他身患重病。任何人第一次见了，就能发现，他是重病缠身。但我从未听见他抱怨过，或者让人知道他是多么的痛苦。记得我们在一次教师代表会休息时相识的情景。当时他正在市文化宫喧哗的前厅靠窗站着和一个人谈话。他骨瘦如柴，两肩高耸，背上的两个肩胛骨在西装上衣底下鼓出来，加上细长的脖子，他的身材从背面望去，显得特别脆弱，几乎象个孩子。突然他把那张苍老疲倦、皱纹密布的脸转向了我，我的印象

立即改变，感到这是个受够了生活折磨的小老头。其实呢，我准确知道，当时他才三十四岁。

“听说过您了，早就有件疑难事想求您，”米克拉谢维奇当时说话的声音有点喑哑。

他吸着烟，把烟灰弹落在手指捏着的空火柴盒里。记得，当我看到他那皱皱巴巴的焦黄的手指在神经质地颤抖，不禁吓了一跳。我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把视线很快移到他的脸上：脸有倦色，但惊人的安详和开朗。

“报刊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他半开玩笑、又若有所指地引用了这句话。从他脸上网一样的皱纹后面露出来一丝善意的微笑，伴着痛苦的哀愁。

我知道他在格罗德诺地区游击战争史里查找什么。他本人还在少年时就参加过游击队的活动。四二年，他的几个好同学被德国人杀害了。米克拉谢维奇张罗着给他们在谢尔佐立了一个不大的碑。原来他还有件什么事指望我帮忙。那还用说，我是愿意帮忙的。我答应上这儿来谈一谈，如果真是疑难的话，尽可能把它搞清楚。在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解决各种疑难复杂问题的兴趣。

可现在，我来晚了。

公路靠着小树林缓缓地拐了一个大弯，松树的华盖耸立在公路上空。拐过弯，谢尔佐终于出现在眼前。这里曾经是地主庄园，几十年的老榆树和老椴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楼房——现在的学校，隐匿其中。汽车不慌不忙地驶近通往庄园的路口。我就要到了！

随着汽车的驶近，我心潮翻滚，重又沉浸在悲哀和痛苦之中。顿时产生了何必来的念头。我何必来这里参加这令人伤心的葬礼？本应该在以前来啊！现在谁还用得着我呢？而且这里又有什么是我所需要的呢？但是现在这样考虑问题看来已经没有用了，汽车开始放慢了速度。我叫了一声同路的小伙子，要他敲敲驾驶室，从他安静的神情看得出，他还要坐车往前走。我踩着一卷卷粗糙的油毡纸挪到了车帮，准备往路边跳。

我就这样到了！汽车生气似地从排气管里喷出一股气，又继续往前开动了。我在公路边走了不多远，也顺便活动活动麻木的双腿。我在公共汽车的窗口不止一次看到过的这个熟悉的叉路口，以其抑郁的殡葬气氛迎接我。横跨沟渠的小桥旁边竖着一根柱子，挂一块公共汽车站牌，柱子后面可以看到熟悉的方尖碑，一块黑牌上刻着五个少年的名字。距公路百步远的地方，挨着大道有一条古老狭窄的林荫小道通往学校，两旁粗壮的榆树东倒西歪。在林荫道那一头的校园里停着一辆“嘎斯”车，还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一看便知是区委会的）在等候谁，但那里见不到一个人。我想，“人们现在也许上别处去了。”但我甚至连公墓的地点也弄不大清楚。要是真还有什么必要去，也不知往哪儿走。

就这样我犹犹豫豫地走进了树冠重叠浓荫蔽日的林荫道。大约五年前我就来过这里。那时这古老的地主大院，还有这林荫小道，并不显得这样死气沉沉。当时正是课间休息，校园里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现在，四周鸦雀

无声，被不祥的殡葬气氛所笼罩，甚至连老榆树稀稀落落的黄叶也不再发出簌簌的声响，蛰伏在傍晚的静谧之中。沿着这平坦的砾石小道，很快就来到了校园。面前耸立着一座宫殿，有上下两层，可见当年也曾富丽堂皇过一个时候，不过现在已经破旧凄凉了，正面的宫墙都有了道道裂缝。这老式宫殿的外廊有雕花栏杆，大门两侧立着白色圆柱，还有那威尼斯式的高大窗户。我需要打听一下米克拉谢维奇在什么地方安葬，但是又没有人可以问。我不知去哪里好，茫然若失地在汽车旁边徘徊了一阵，甚至都想进学校了，突然另外一辆满是灰尘的“嘎斯”车从林荫道里飞奔而出，差点没把我撞上。汽车猛地刹住了，从帆布车棚里钻出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绿色尼龙雨衣的人。这人我认识，是州管理局调来的畜牧专家，听说，现在在区里一个什么地方工作。我们大概有五年没见面了，尽管是只有点头之交，但他在此时此刻出现，我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好！朋友，”——畜牧专家向我打招呼，他洋洋自得容光焕发的脸是那样兴致勃勃，仿佛我们不是来这里参加葬礼，而是来参加婚礼的。

“你也来了，啊？”

“嗯！”我有所克制地答了一声，他立刻接过我这种克制的语调，把声音压低了说：

“他们在教师楼那里。喂，来帮个忙吧。”

他抓住一个角，从汽车里拖出一箱“莫斯科”牌白酒，一排排的酒瓶在那里发亮，看来他是去村供销社或市里买酒

回来。我接住箱子的另一头，两个人抬着绕过学校，穿过花园里的树丛，沿小道朝附近那所住有教师的厢房走去。

“他怎么就死了呢？”我问道，对于这个人的早死我还是觉得突然。

“就这么死了呗！什么事不都这样突如其来！人活着活着，一下子就死了。”

“他死前至少生过一点病什么的？”

“病！他生了一辈子病了，但这人是真干。结果干过头了。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就去喝上一通吧！”

开始显得稀疏的丁香丛中露出一簇簇鲜嫩多汁的山楂，红艳艳的。花丛后面是一所泥灰脱落的破旧厢房，听见里面有许多人在低声地谈话。据此可以推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仪式已经结束，葬礼后的筵席正在进行。厢房几个矮窗户敞开着，在向两侧拉开的窗帘中间，露出一个身穿白色尼龙衬衫的男人脊背，并排是高盘在一个女人头上的亚麻色浓发。两个没有刮脸的男子，身穿工作服，站在门廊旁边抽烟。他们三言两语地聊着天，然后默默地接过我们手里的箱子，抬进了屋。我们顺着狭窄的走廊，跟了进去。

一间不大的房子，能搬的东西现在全都搬出去了。几张桌子拼放在一起，上面摆着剩下的一点酒菜。席上的二十来个人已经在谈天和吸烟了，缕缕烟雾徐徐飘向窗外。从这种显然是不紧凑的场面可以看出，筵席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我的迟到还不如不到，很容易受到非议的，但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拿起帽子就走。

“请坐，这里有地方。”一个头裹黑色三角巾的上年纪的妇女语气悲痛地请我入了座，她并没有问我是谁和做什么来了。大概象我这样来晚了的情况，他们这里并不觉得特殊。

我顺从地坐在高桌子旁边显得矮了一点的凳子上坐下来，想尽量不引起这些人对我的注意。但身边一个人已经向我转过脸来——一张浮肿苍老的脸庞全是汗水。

“来晚了？”他说得很随便，“有什么办法呢？再也见不到我们亲爱的保尔了，永远也见不到了。喝一杯吧，同志！”

他把一杯显然是谁喝剩的伏特加塞到我手里，杯上还留着别人的指印；他自己从桌上拿起了另外一个杯子。

“来，老弟，愿他安息！”

“好吧，愿他永远安息！”

我们干了杯，我用谁的叉子从盘里叉了一小片黄瓜，我这位邻座用不听使唤的手指从揉皱的“冠军”牌香烟盒里夹出了可能是最后一支烟。这时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妇女又新摆上了几瓶“莫斯科”白酒，几个男子把酒分斟到杯子里。

“静一静！同志们，请静一静！有人要讲话了。”这话声音很大，带着醉意，从贵宾席方向传来，盖过了嘈杂的人声。

“克辛德佐夫，区教育局局长，”我的邻座喷了一口浓烟，附在我耳边大声说，“他能说什么？他知道什么？”

在桌子的那一头，只见一个年青人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显得有点呆板固执的脸上露出做领导人惯有的自负。他举

起了一杯伏特加酒。

“关于我们亲爱的保尔·伊万诺维奇，大家都已经谈了。他是一个好党员，先进教师，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总的来说……一句话，他不应该死。”

“要不是战争，他就不会死，”一个女人很快地插了一句，想必是坐在克辛德佐夫旁边的那个身穿淡咖啡色高级短上衣的女教师。

教育局长讷讷地说不出话来，象是被这个插话弄糊涂了。他整了整胸前的领带，完全看得出，他做这方面的讲话有困难，不习惯，他搜索枯肠，但看来肚里根本找不出适合这种场合的词句。

“对，要不是战争，”这个演说家终于表示了同意，“要不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的、给我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战争。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战争创伤已经医治，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苏联人民在各个经济部门，还有文化、科学、教育部门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

“这和成就有什么相干！”突然有人在我耳边大吼了一声，桌上一个空瓶子往上一跳，随后就在盘子中间滚开了。“这和成就有什么相干？我们是来送葬的！”

教育局长不怀好意地把话打住。席上的人都开始紧张地、几乎是惊恐地朝我的邻座看过来。他那涨红的脸冒着虚汗，一双已经开始衰老的眼睛明显地充满着愤慨，一只静脉曲张的大拳头咄咄逼人地压在桌布上。

教育局长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带有

几分尊严地说话了，好象是训斥一个犯了纪律的小学生：“特卡丘克同志，放规矩点！”

“安静点，别说了！您怎么了？”坐在我邻座旁边的那个女人侧着身子对他关心地说。

但特卡丘克看来不愿意安静，他慢慢地从桌旁站起来，挺了挺那笨重的开始衰老的身子。

“你自己倒应该放规矩点！你干吗在这里扯什么成绩？为什么你不提莫洛兹？”

眼看这场架就要吵起来。我感到挨着他坐不那么得劲。好在我是局外人，也并不认为自己有权过问这件事——安慰谁或者支持谁。但是应该说，教育局长还是表现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克制。

“莫洛兹和这毫不相干！”局长沉着而坚定地顶住了我邻座的进攻，“我们又不是为莫洛兹举行葬礼。”

“很相干！”特卡丘克几乎喊了起来，“有米克拉谢维奇这样的人，这要感谢莫洛兹！”

“米克拉谢维奇嘛，那又当别论了。”局长不再争辩了，他端起半杯酒，“干杯！同志们，为了悼念米克拉谢维奇！愿他的一生成为我们的榜样。”

席间开始了碰杯后常见的那种活跃空气。大家都干了杯，只有脸色阴沉的特卡丘克示威似地将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

“对不起，我来不及拿他当榜样了，可以告诉你们，他过去是拿我做榜样的。”他气势汹汹地说，说时没有对着谁，

谁也没有答理他。

局长尽量不再理会这个好抬杠的人，其他人也只顾吃东西。这时特卡丘克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谈谈莫洛兹，让他们知道知道……”

“哪个莫洛兹？”我莫名其妙。

“怎么？你也不知道莫洛兹？好家伙！我们坐在谢尔佐又吃又喝，竟没有一个人想起莫洛兹！他在这里应该是人人知道的……你们干吗这样看着我？”当他发现有谁用责备的眼光看他时，已经是大动肝火了。“我说的我清楚。莫洛兹才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过去就是米克拉谢维奇的榜样。”

席间安静了一会。眼前发生的这场风波，我不清楚，但其他人想必是十分清楚的。在片刻慌乱之后，还是那个教育局长打着官腔，用一种可亲可敬的坚定语气发话了：

“应当想想再说，特卡丘克同志！”

“我是想了才说的！”

“这就对了。”

“别说了！吉莫非·吉托维奇，您别说了。”他身旁那个年轻女人一个劲儿温和地劝他，“最好还是吃点香肠吧！这是家里做的，城里恐怕没有这样的。看你一点东西也不吃……”

显然，特卡丘克并不想吃，而是气得一个劲儿咬着牙，满布皱纹的面颊隆起了一条条肌肉。过了一阵，他抓起一杯没喝完的伏特加酒，一饮而尽。那双失神发红的眼睛在

眉毛下面痛苦地闭了一会儿。

席间变得安静了，大家默默地吃东西，有几个人在吸烟。我转向右边一个穿绿毛衣的小伙子——看样子，他不是教师就是农庄的一个专家，我用头点了一下特卡丘克，问：

“你知道他是谁？”

“吉莫非·吉托维奇，从前这里的教师。”

“现在呢？”

“现在退休了，在城里住。”

我又坐正了身子，仔细地端详着我身边的这位怒气冲冲的老人。不，在城里我好象没见过他。也许是从哪里搬去不久吧。看样子他已经对这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象个陌生人一样一言不发，忧郁的目光死盯着印有方格的台布花边上。

“从城里来吗？”他突然问道，大概已经发现我在注意他。

“从城里来。”

“搭什么车来的？”

“搭顺路的车。”

“你自己没有车？”

“暂时还没有。”

“你们喝吧！悼念吧！我走了。”

“您坐什么走？”

“什么都行，不是头一回了。”

“那我跟您一块走，”我突然决定。待在这里看来没啥意思了。

我至今也难以说清楚为啥要跟他走。好不容易到了谢尔佐这个庄园和学校，却为啥又愿意这么快地离开？当然首先是因为我来晚了，我为之来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而席间的这些人又引不起我多大兴趣。就连这个新伙伴，当时根本不使我感兴趣，他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不如说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喝得半醉而又爱吹毛求疵的退休老人。他把自己说得比故去的米克拉谢维奇高明的那些话，流露出老年人常有的矜持，听起来总叫人不太愉快。即使他说的都是实话。

然而我还是带着一种模糊的轻松感离开了席位，走出了门。特卡丘克个子大，身材结实，显得有点笨重，穿一双皮鞋和一件很旧的灰色上衣，胸前挂着两枚奖章。他象是喝多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他是参加葬礼出来，又在一场我还没有弄清原因的争吵中神经受了点刺激。但看他的那个样儿，显然是真生气了。现在他踏着小道，走在我前面，着意露出不愿跟任何人交往的神情。

我们这样默默地走过了庄园，进了林荫道。还没走到公路，一辆卡车开过去了，也许还是一辆往城里开的空车。本可以喊一声，跑几步，但我这位同伴并不加快脚步，我自己对此也不十分着急。挂着汽车站牌的柱子下面一个人也没有。公路两头空荡荡的，路面上白天看去发出耀眼的亮光。

我们走到路口就停下来。特卡丘克看了看公路的两

头，然后就在他站的地方坐下来，把双脚放在路边的沟渠里，沟渠不深，没有水。他不愿意同我交谈——这是很清楚的。为了不惹他烦恼，我走开了，眼睛一直盯着公路。从树林拐弯的地方出现一辆“莫斯科人”牌私用汽车，车顶鼓鼓囊囊堆着行李包。一股汽油味迎面扑来，汽车开过去了。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那个方向却空空荡荡。夕阳低挂在公路上空，躲藏在薄薄的乌云后面；落日的斜晖使人眼花缭乱。总盯着那个方向看来并没有多大意思——那里没开来汽车。我对公路渐渐失去兴趣，沿着沟渠边上的小路走到了纪念碑前。

这是一座低矮的水泥方尖碑，周围是板条做的栅栏，是本地的一些工匠砌的，普普通通，没有过多的装饰。即或不说它寒酸，那也显得过分简陋。现在即使是在乡下建纪念碑，也比这要讲究得多。方尖碑尽管没有巧妙的装饰，倒也看不出荒芜的痕迹。我记得，经常有人来细心照管，一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墓地上铺着新沙子，小花坛的四角用砖砌成，里面开着一些叫不出名的晚季花卉，彩色缤纷，鲜艳夺目。这座方尖碑，比一个人只高一点点，碑的颜色，十几年里我记得换过好几次。或者是在节前用石灰刷得洁白如雪；或者涂上军装一样的绿色；有一次，我途经此地，在公路上看见它银光闪闪，象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而现在，方尖碑成了灰色；在所有的颜色中，这种颜色对它的外观也许是最相称不过的了。

方尖碑的外貌虽几经变换，但唯独那块刻着五个学生

姓名的黑色的金属小牌依然如故。他们在战争年代立下的功勋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闻名的。我以往每次都不去细看，不看也知道。但这一次，我奇怪地发现上面有新的姓名——莫洛兹·阿·伊，是用白色油漆写在其他姓名的上方，写的不十分好。

公路上，从城里方向又开来一辆汽车。这是辆自卸车，沿着空荡的公路飞驰而过，扬起的灰尘迫使我的同伴从不太适于休息的那个地方站起来。他走到柏油公路上，担心地望了望。

“鬼等得起！走吧。有车来了再搭！”

我只好同意了。加上黄昏临近，天气变得更好了。既暖和，又没风，榆树上没有一片叶儿飘动，空荡的公路象一条闪光的长带诱你在上面漫步。我跳过沟渠，两人以久未有过的舒畅心情，踏着平坦的柏油路面大步走去，只是偶尔回头看一看。

“您早就了解米克拉谢维奇？”只是为了打破已经开始令人难受的长时间沉默，我问了一句。“了解，太了解了！看着他长大的。”

“可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我向他承认，“只见过几次面。听说他是个不错的教师，书教得好。”

“教书！别人教的也不比他差。他可是个真正的人。孩子们是成群地围在他跟前。”

“现在这样的事太稀罕了。”

“现在稀罕，以前可普通了。他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跟

着莫洛兹。”

“我说，这个莫洛兹是谁？真的，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他。”

“莫洛兹也是教师，以前我们一块儿在这里开展工作。我是三九年十一月来这儿。他是十月开办这所学校。总共四个年级。”

“他牺牲了？”

“是，牺牲了。”特卡丘克一面说，一面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走着。他西装上衣的扣子全都解开了，领带结儿胡乱地歪进衣领的一角。他那刮得不太干净的大脸庞掠过痛苦的阴影。

“莫洛兹曾经是我们俩的心病——我和米克拉谢维奇。我不值得一提，我退却了；他不这样，他到底胜利了，达到了目的。可惜他自己没有熬过来。”

现在我好象开始明白一点他所说的，估计是战争时候发生的一件什么事。但由于特卡丘克说的不连贯，又简单，所以许多东西还是没弄清楚。看来需要多问问，可是我又不愿意讨人厌，只是为了不使谈话中断，我才插进几句无关的话。

“事情就是这样，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付出代价，有时代价还很高。”

“是呀，代价太高了……主要是他继承得很好……现在，有多少人在议论继承父辈的传统啊……莫洛兹当然不是他父亲，但他继承了莫洛兹。简直太妙了！有不少回，我

看着看着，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象莫洛兹·阿列斯·伊万诺维奇的兄弟。样样都象——性格、善良、原则性都象。而现在……虽说不可能……但他身上总有什么会留下来的。不可能不留下！这样的东西是不会失传的。一定会发芽，一年、五年、十年之后，总有什么会破土而出的。你看着吧！”

“这是可能的。”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这些人的劳动不可能白费，尤其是因为他们死得不平常。老弟，死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有伟大的意义。死——这是绝对的证明，无法辩驳的论据。你可记得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为了爱情，去赴汤蹈火，光荣就义吧！你死得不会没有价值，用鲜血浇灌的事业是永存的。’说得多好！咱们这儿流了多少鲜血啊！鲜血不可能白流。莫洛兹也已经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了，你还不知道哩……”

“我确实不知道，”我老实地承认，“米克拉谢维奇也曾打算找我说说……”

“我知道。这事他对我讲过。他那时谁都找，也想找你。只是……没来得及。”

这些话引起了我的内疚。难怪我深深地觉得：我这里毕竟犯了一个自己并不愿意犯的错误。不过当时我怎么能知道呢！谁能料到，这一切竟会导致这样的结局！

“你是报社的编辑吧？”特卡丘克瞟了我一眼。“我知道你写小品文，还有别的……你是在为真理战斗啊！所以他当时就想找你参加这件事——为莫洛兹辩护。不！莫洛兹

没有罪，你别害怕。他哪里是什么德国人的走狗！不是这么回事情……”

特卡丘克停了一下，我说：“有意思，要是我早知道……”

“现在一切都妥了，辩护人该找的也找到了。如今也可以讲了，就是写书也可以。真应该写书呀。米克拉谢维奇赢得了真理。只是他自己……你有烟没有？”他拍着身上的空衣兜问道。

我给了他一支烟。我们俩点燃了烟，不约而同地往旁边一躲，让一辆闪着镍光的“伏尔加”牌黑色轿车从身旁飞驰而过。大概是往城里去的，但此时此刻，我们谁也无心去拦截。我等着特卡丘克继续讲故事，只见他茫然若失地目送着这辆轿车，全神贯注地陷入了沉思。

“这车本来应当把我们俩捎上，是吧？哎，去他的！他开他的车，我们慢慢走。你多大年纪了？你说，四十岁？还是年轻有为啊！以后还长着哩。虽然已过去一段了，但还剩下好大一段，当然要看你身体是不是健康。我的身体还不能说坏，有时还能喝上一盅，但是已经不如以前了。老弟，从前我在这儿很少等过公共汽车，再早干脆就没有公共汽车。你要进城去，拿根棍子就走。三个半小时走二十公里就到了城里。现在大概要费劲得多了，我也好久没走长路了。腿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神经不行了。我不能看电影，遇到叫人伤心、特别是描写战争的影片，一看到我们那个时代的痛苦，虽说是全都过去很久了，并且逐渐地在遗忘，可

是嗓子眼里就象堵住了什么东西。还有那音乐，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不是什么爵士乐，而是当时流行的歌曲。只要一听到，简直就象用锯锯我的神经。”

“应该治一治，现在治疗神经还不错。”

“不，我的神经是治不好了，六十二岁的人了，你还能怎么样！生活把我折腾苦了，真象把我的神经乱拽乱扯一样。学者们讲，神经细胞是不能恢复的……是啊！我也曾有过年轻时代，没有结婚，身体健康，就象条牛。三九年大合并之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我来西部地区筹建学校。建校，建集体农庄，忙得团团转，自己还在一些学校里干过。战后就在这个谢尔佐，我闹闹哄哄地干了七年……”

“光阴如流水。”

“不，光阴似火箭。从前总想先干它一两年，然后到明斯克去，想上师大学习。因为我战前只读完两年制的师资班。可是，事与愿违。战争开始了，结果什么师大也没有上成，一辈子被缠在这儿了。以前是区党委不肯放，学校啦，家啦。现在呢，你可以随便往哪儿滚了，可哪儿也没有心思去了。看来，我也得和莫洛兹一起埋在这块土地里，只是晚一点罢了。”

他不说了。我抽完一支烟，也没有说话。我们已经过了小树林，公路进入山沟，两旁耸立着沙土坡，长着松树。暮色一下子明显地变浓了，连罗汉松的顶盖也昏暗得看不清楚。只是那无云的高空还在闪烁着夕阳告别前的余晖。

“今天几号了？是十四号吧？正好这个时候我第一次

来谢尔佐。这一条条山村小道现在已经习惯了。可当时都显得那样新鲜、有趣。办学校的这座庄园并不象现在这样荒凉，那时候房子看管得很好，油漆得很鲜艳，象玩具一样。九月份波兰地主加布鲁斯逃之夭夭，扔下了所有的东西，据说是投奔罗马尼亚去了。于是莫洛兹办起了学校。校门前耸立着两棵干粗枝繁的大树，叶呈银白色。这不是一般的树，简直是美洲红杉之类的参天古木。这种树在一些旧时的庄园里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也都快完了。那时候这种树有的是。每个波兰地主那儿都有不少。

“头一年，我在区人民教育局当局长。学校几乎都是新办的，都不大，有的办在保卫团的岗楼里，有的干脆办在乡下的农舍里。教材、物品都缺，教员也十分紧。和莫洛兹一起在这个谢尔佐工作的是波德加斯卡娅，我们都叫她雅佳小姐，其实是个相当大岁数的中年妇女。这个贵小姐是个老处女，加布鲁斯在时就住在我们来的那间厢房里。她几乎不会俄语，白俄罗斯语也懂不多。但其他方面，那就了不得！受的教育是最高级的。

“一天傍晚。我坐在区人民教育局办公桌旁，埋头翻阅公文、报告、计划、表报，我下区里跑了一趟，一个星期没有回局，积压了一大堆，真够受了！听见有人用指头轻轻敲门，是过了一阵才听见的。进来的就是那个雅佳小姐，身材矮小，弱不禁风，脖子上却围着一条很讲究的狐皮，头上戴一顶阔气的洋女帽。‘请原谅，局长先生，我向先生请教一个教育问题。’‘那好，请坐，说吧！’

“她在安乐椅的边上坐下来，整理整理她那顶漂亮的帽子，就炒豆般地讲开了，差不多全用波兰话。我费了好大劲才听懂。她的一举一动真象文雅的小姐，但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一张狡猾的小脸布满了皱纹。她这次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她跟谢尔佐学校的上级、和同事莫洛兹有矛盾。原来，这个莫洛兹不维护纪律，跟学生讲平等，教学不严，不执行人民委员部的教学大纲。而最主要的是他不让学生去天主教堂，说这是老奶奶们干的。

“谈到天主教堂嘛，我自然不会太为这个担心了。心想，莫洛兹要是这样劝学生，那就做对了。至于有失教师身份，不讲纪律，无视人民委员部的教学大纲，——这才是我所担忧的。但到底这个莫洛兹是谁？我毫无印象，谢尔佐我还一次没有去过。当时我想，只要有可能，我就去一趟吧，看看他那里搞的什么名堂。

“但是过了好一段才找到这样的机会。两个星期以后，我到底抽出了身，向房东借了一辆自行车（这地方叫脚踏车），就在这条公路上踏开了。公路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样，铺的鹅卵石。在上面不管坐大车还是骑脚踏车，反正都得把你肠子颠出来。但我还是去了。我使劲地蹬着车子，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条榆树遮蔽下的林荫小道。我原来是想听课，但是没赶上，已经下课了。老远就看见院子里尽是孩子，心想他们在玩什么游戏，但并不，原来在干活。他们在准备柴禾。上面说的那棵外国树被大风刮倒在那儿，现在他们正在又锯又劈，往板棚里送。这可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当时缺柴禾，每天各学校总有人来要烧的。可是局里啥运输工具也没有，而且上哪儿去搞、上哪儿去运呢？喂！这些人真有办法！他们不是等着区里想出法子供应他们柴禾，而是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下了自行车，他们都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问：‘负责人在哪儿？’‘我就是。’答话的这个人，我没有马上发现，因为他站在一截很粗很粗的圆木头后面，正和一个大小子、大概是个超龄生、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好小伙拉锯。那人放下锯，向我走来。我马上发现，他是个瘸子。一条腿向一边撇，好象直不起来，因此他的这条腿跛得厉害，连个子都显得矮了。但人还不错，面部表情明朗，目光勇敢坚定。大概他猜到了自己面前站的是谁，但丝毫也没有慌乱。他自报了姓名：莫洛兹·阿列斯·伊万诺维奇。他一把握住我的手，我马上感到这个人很有劲。手掌粗糙结实，大概他不是头一回干这种活了。那个大男孩还站在原地方，试着一个人拉锯。可是锯条怎么也不动地方，碰到树节子了。这截大圆木有一米多粗。莫洛兹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又去锯木头了。我一看，就是他们俩也不那么容易对付得了，越往下锯，锯条卡得越紧。显然应该在底下垫个什么。要垫，先得抬起来一点。莫洛兹扔下锯，开始抬木头。但一个人哪能抬得动！这时大一点的孩子也都围上来抬，可是木头一动也不动。简短点说吧，我把脚踏车放倒在草地上，也抬起木头来了。我们用力抬啊，抬啊，似乎已经抬起来了，要再抬高一厘米，就可以插进棍子了。可最后的一厘米，象

通常一样，最困难。偏在这个节骨眼，不巧从角落里飘出来那位雅佳小姐。她看见了自行车，又看见我在圆木头旁干这个玩艺儿，就楞住了。

“后来我和她谈话，她表现得一窍不通，只是一个劲儿‘天呀’、‘妈呀’的。苏维埃国家的教师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还懂不懂一点点教师的规矩和长辈的威信？她对此迷惑莫解。我说：这不可怕，雅佳小姐，威信不会降低的，这样学校就有柴禾烧了，你们也能在温暖的环境中工作了。这番对话当然是在以后。可当时我们还是把那个又大又粗的鬼木头锯成了好几截。我甚至忘了自己干什么来了，脱去身上仅有的那件西装上衣，和莫洛兹对锯起来，以后又劈柴，直干得汗流浹背。孩子们把劈柴搬进板棚以后，莫洛兹就放他们回家了。

“我不得不就在学校那里过夜了。莫洛兹住在靠教室的一间房子里，睡的是波兰地主那张非常讲究的古式沙发床，四条狮子腿向外弯曲。他盖的是大衣，当然没有被子。那天晚上沙发床让给了我，我蒙头盖上自己那件西装上衣，睡了一夜。睡觉前，我们吃了点土豆。一位学生的母亲特意从村镇弄来了一截香肠和一壶酸牛奶。我们边吃边谈，互相认识，虽说在锯木头时我就觉得很了解他。他出生在莫吉辽夫一带，中师毕业后教了五年书。那条腿从小就这样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转到教学大纲、成绩纪律这些学校日常工作上。不料他就说出了一大套见解，对这一套起初我很不以为然。后来才开始承认它可能多少还有点儿道

理。到了现在，凭着我退休老人的阅历去看它，这一套就是绝对正确的了。

“的确他对，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宽，可能也看得远，不是用业务标准去限制自己的眼界。老弟，标准是好东西，如果没有僵化，如果不是陈规陋习，如果不是跟生活发生矛盾，总之，任何标准要善于根据情况灵活运用。而我们常常如何呢？现在每一门学科都配备了专家去讲授，每个教师又都力求精通自己的专业。因此，比如说在数学教师看来，牛顿二项式定理比普希金的诗学或比托尔斯泰的人学贵重一百倍。而对于语言教师，会不会把副动词短语用逗号隔开，是衡量学生全部优点的尺度。他宁可因为这些‘逗号’让孩子留级，不让升大学。数学老师也同样如此。谁也不去想想：这个二项式可能，而且一定在他的一生中根本就用不上，同样，没有逗号也能活一辈子。但是，没有托尔斯泰能活得下去吗？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读托尔斯泰，能成为有教养的人吗？甚至能成为一个人吗？

“是呀，现在人们对托尔斯泰和其他许多作品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新鲜了。可那时候，什么都显得新鲜，有意义。莫洛兹在这方面反应敏锐，比我强，尽管我比他大了四、五岁，又是党员，又领导整个区教育局。那天晚上，我们并排躺着——我在他的沙发上，他自己在桌子上。他对我讲了这样一番话：‘的确，学校在执行教学大纲方面是有点不正规，学习成绩也不突出。孩子们过去在波兰人办的学校学习，现在许多人，特别是天主教徒对白俄罗斯语的语法

掌握不好，他们文化基础差，跟不上我们大纲要求。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现在懂得：他们是人，不是牛马，不再象他们父辈那样被波兰老爷们看成傻瓜，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他们的老师、他们的父母、区里的所有领导——在自己的国家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对谁也用不着低三下四，只需要学习，努力掌握最主要的东西，有了它人们就能接触民族的和全人类的最高文化了。’莫洛兹把这看成是自己最崇高的职责。他不是培养学业上的优等生或听话的书呆子，而首先是培养人。这一套说来容易，弄明白就比较难了！做到就更加困难。教学大纲和教学法中，不大研究这些，也没有给它规定出学时。莫洛兹说，这只有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身体力行才能做到。

“也许我们还不大清楚，我们的教师在人民的历史中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得也少。对教徒大家就熟悉了，这方面还有多少可信的材料。牧师和天主教徒在每个历史阶段的作用都得到了研究。可是有谁研究过我们农村教师的作用呢？有谁研究过，农村教师在波兰沙皇时代、在卫国战争时期、在战争前后、对我们当时的黑暗偏僻的农村起了什么作用呢？你现在去问问任何一个毛孩子，他长大干什么？他会说，当医生，当飞行员、宇宙航员。是的，现在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而且往往变成现实，包括当宇宙航员在内。而从前呢？要是孩子长得乖，学习好，大人们怎样议论他呢？‘他长大后能当个教师。’——这在那时是最高的夸奖了。当然，并非所有够条件

的人都有幸从事教师的事业，但是人们对它无限向往。这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生活理想。这是正确的理想。并不是因为当教师光荣或者轻松。也不是因为工薪高——谁去稀罕教师的生活待遇！何况还是在旧时代的农村！贫穷、困苦、寄居在别人家、离乡背井、穷乡僻壤——结果因为肺病过早地进了坟墓……然而，你要知道，千万个默默无闻的教师是精神土壤上的播种者，那时候再也找不出什么能比他们天天从事的细小平凡的工作更重要、更有意义。我这样想：我们现在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作为公民而存在，主要应该归功于农村教师。就算我说的可能有错误，但我还是这样认为。

“在这方面，没有热心人往往也是不行的。莫洛兹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怕困难挫折，有时甘冒风险，为人们做了许多事。他遇到的挫折和各种矛盾可真够多啦！

“记得有一次，州里的督学去谢尔佐。第一天他回来时，带着满肚子的气。原来又发生过一场风波。督学同志还没走进加布鲁斯的庄园，在林荫道就遭到两条狗的袭击。一条黑狗，三只腿；另一条特别凶，又小又鬼（后来在战争期间警察把它们打死了）。等这位督学已经明白过来，他的一条裤腿已经被狗咬得稀烂。当然又该莫洛兹赔不是了。雅佳女士给补着裤子。督学先生这时只好光穿着自己那条似乎不那么干净的衬裤，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原来，狗是学校的。确实如此。不是村里的，不是从哪个庄子里跑来的，甚至也不是这位教师本人的，而是学校大家的。孩子们不知

从哪里搞来了这两个家伙。家长们吩咐把它们淹死，但孩子们没有听。这以前他们在课堂上读过屠格涅夫的《木木》。阿列斯·伊万诺维奇于是决定把这两条小狗崽留在学校里，由他们轮流看管。从此谢尔佐村就有了学校养的这两条狗。

“以后学校还养了一只椋鸟。这鸟在秋天离群失散，在草地上被孩子们抓住了，湿淋淋的象只落汤鸡，莫洛兹也把它养在学校里。起初让它在教室里飞，后来给做了个笼子，主要还是为了不让猫吃掉——学校真的还有一只可怜的瞎猫，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一个劲地咪咪叫——要东西吃。”

说话间，天色迅速黑下来。公路象一条灰色的彩带上下起伏，消失在远方的黄昏里。周围的地平线也沉没在昏暗之中。暮色笼罩着田野，远处的树林黑糊糊一片，静悄悄的。公路的上空全黑了。只有夕阳西下的天际在我们身后从远处闪烁着落日的余晖。汽车开着灯在公路上行驶，但不巧都是城里对着我们开来的，除了上面说的那辆镀了镍的“伏尔加”，再没有别的车从我们身后开来。我一边听着特卡丘克讲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到底发现了两个车灯的光点在老远的地方向我们迅速移动。我说：

“来了一辆不知什么车。”

特卡丘克把话打住，停了下来，也凝视着那个方向。他那阴沉厚实的侧影在映满晚霞的天空衬托下显得十分

清晰。

“公共汽车。”他满有把握地说。他大概是远视，这么远的距离我就分不清轿车卡车。他说对了，不一会儿，我也看见公路上有好大一辆灰色的公共汽车，在从我们后面急驶而来。瞧，它在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山谷里消失了，紧接着又从小山坡后面出来，显得更加清楚；车灯更加晃眼睛了，甚至连车身上的暗淡反光也看得见了。但汽车突然放慢了速度，一个车灯闪了一下，稍微向路边靠了靠，停住了。汽车这时离我们有三百来米远，我们突然感到有搭车的希望了，向它奔去。我开始就跑得有点急。特卡丘克也想跑，但只几步就落在后头了；我继续往前跑，心想，至少我得先上去，好叫车多停一会儿。

跑下坡并不费劲，只听见鞋底在柏油路上啪嗒啪嗒地响。总觉得汽车马上就要开，其实它还耐心地停在那里。甚至有个人从车里出来，大概是司机吧。他让车门开着，绕车转了一圈，用个什么东西敲了两下。我已经离得很近了，所以又加了一把劲，眼看就要跑到。偏偏在这个时候，门砰的一声关上，汽车开了。

我还没有失望，站在柏油路上拚命挥着手，心里在喊：不要开，捎上我们！我甚至觉得汽车已经放慢了速度，所以又立刻跑了过去，差一点没钻到车轱辘底下。但车没有停。驾驶楼的门开了；一个叫声，穿过汽车扬起的灰尘，飞了出来：

“不停车，不是停车站。往前溜达吧！”

我孤零零地被留在这光滑滑的柏油路中间。远处舒适的“依卡露斯”牌汽车的马达声在渐渐地消失，前面小山坡上竖着特卡丘克孤独的身影，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该死的混蛋！”我气得骂出了声，鬼料到会这样捉弄人！

我心里很憋气，虽然明明知道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这里的确不是车站。既然不是，这辆长途特快当然用不着去捎各种各样不三不四的夜行人，这种事有当地各路公共汽车去管。

虽说这样，当我一步步蹭到特卡丘克跟前时，我大概还是显得相当沮丧。他耐心地等我走到跟前以后，很平静地说：

“没有捎吧？那是肯定不会捎的。他们就是这号人。要在以前，什么人都给捎了，为的是搞点钱喝酒。可现在不行了，有检查，所以就一个劲儿往前开。存心跟别人也跟自己过不去。”

“说不是车站不停。”

“可刚才不是停了吗！本来可以停……算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宁可吱声，这样能好过些。”

也许他说得对。本来就不该抱希望，那么也就无所谓失望了。就是说，我们还得慢慢往前走。两条腿的确已经很累了，但既然我同伴能够不吱声，我也就应该表现忍耐点。

“对了，刚才不是谈莫洛兹吗，”特卡丘克又回到中断了的故事上来。“我第二次到谢尔佐是冬天。天冷得要命。你大概记得四〇年——四一年的冬天，园里的果树全都冻死了。我还算走运，搭上了一个大叔的雪橇，把脚插在干草里，但还是冻了，当时以为冻坏了。好不容易跑到学校，时间很晚了，虽然没有天黑，但小窗户里已经亮着灯，我敲了敲门，看见好象有个人透过结冰的玻璃往外瞧，但他不开门。我想，活见鬼！我这个阿列斯·伊万诺维奇，莫非在里边搞恋爱了。我说：‘开门，是我，特卡丘克，人民教育局的。’终于门开了，狗在什么地方叫，我走进屋。面前是个双手拿着灯的男孩儿。‘你在这里干啥？’——我问。他说：‘没干啥，我在练字。’‘为什么不回家？可能是阿列斯·伊万诺维奇课后把你留下了吧？’他没吱声。‘老师他上哪儿去了？’‘送小列娜·乌道多娃和奥利嘉去了？’‘往哪儿送？’‘往家送。’我感到莫名其妙，一个教师有什么必要把学生一个个送回家呢？‘是不是每一个都送？’——我问，心里已经为这次来得很不凑巧而恼火。他说，‘不是每个都送。’——他回答，‘因为这两个年纪小，又要过树林子。’

“我想，只好算了。我脱了衣服，烤起火来，心情开始好转。但一个小时过去，莫洛兹还没有回来。我问他：‘村子离这儿多远？’他说：‘大约三俄里。’好吧，有什么法呢？我们坐着等吧。男孩在本子上写字。‘你大概是被他留下来添炉子的吧？你住哪儿？’——我问他。他回答说：‘就住这儿。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收留了我，要不然常挨我爹打。’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可千万别惹出新的麻烦！我这儿先告诉你，事情果然不出所料。

“三个来小时以后，莫洛兹回来了。没有敲门声，没有脚步声，仿佛任何响声都没有听见。可小保尔……对，你猜对了。正是保尔·伊万诺维奇——后来的米克拉谢维奇同志……当时还是个黑眼珠、活泼乱跳的小孩儿。这时小保尔赶忙站起身，穿过教室，跑去开门。莫洛兹满脸是霜、浑身是雪，踉踉跄跄进来了，将一根把手象山羊头的拐杖放在墙犄角。我们彼此问了好，他解释，为什么回来晚了。原来，他把这两个小姑娘送到了家，正赶上那里一件麻烦事：母牛出了问题，难产，教师就这样留在那里帮孩子的母亲。至于送女孩嘛？事情很简单。严冬到了，母亲让她们休了学，说是鞋不好，道又远。这在那时是常事，但是这一对可爱的双生女，学习好，而且莫洛兹懂得这个守寡母亲的难处（她丈夫三九年在格登涅附近牺牲了）。他说服了这个女人，又给小姑娘每人买了双皮鞋，她们就又上学了。后来天黑得更早了，她俩害怕自个儿过树林，这才需要有人送。平常这是超龄生柯利亚·波罗奇契的事，就是那个和老师一块锯木头的小伙子。这一天波罗奇契不知为啥没来上学——家里需要他，所以由老师当护送人了。

“他讲完了，我没吱声，鬼知道对他说什么好。这合不合乎教育学？我们的一套教育学原理在这儿，全都给搅乱了。莫洛兹就是一个搅乱各种条条框框的能手，我也开始习惯他的这一特点了。关于他的小房客，我们当时没有太怎么

谈。他只是说，这孩子暂时在学校住，说是家里不和睦。我想，住就住吧，何况天气又这么冷。

“过了大约两星期，检察长传我去。我想，真讨厌！我烦这些法官们，他们那儿多咱也不会有好事。我来到法院，那里坐着一个穿皮袄的陌生人，区检察长西瓦克同志郑重其事地吩咐我去谢尔佐，从公民莫洛兹那里把这个米克拉谢维奇公民的儿子领回来。我本想提出异议，但知道这根本没有用。在这样的场合，检察长就是用一条压人：法律！我想，好吧，法律就法律吧。我跟派出所所长，还有米克拉谢维奇，坐上警察局的轿式雪车，向谢尔佐村驰去。

“我们到的时候，记得快下课了。我们把莫洛兹叫出来，告诉他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检察长的判决，法律在公民米克拉谢维奇一边，应把孩子归还他。莫洛兹一声不响地细听完以后，叫来了保尔，孩子一见父亲就吓得缩成一团，象个受惊的小动物，不肯走近。这时孩子们全都在门外，穿好了衣服，但都不回家，都想看看往后会怎么样。莫洛兹如此这般对保尔说了一通：‘你回家吧，应该这样。’孩子就是不动地方，说：‘我不回家，我愿意在您这儿住。’但莫洛兹勉强应付地进行说服，当然是言不由衷。大意是不能继续在他这儿住了，根据法律，儿子应该跟父亲住，也就是说，应该跟继母住（孩子母亲不久前去世了，父亲另娶了一个，孩子也就不好办了——这是明摆着的事）。他好不容易总算把孩子说通了。孩子当然哭了，但还是穿上了衣服，准备走。

“这情景，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虽然已经过去……你说多少年了？总有三十来年了吧。我们站在外廊上；孩子们聚集在院子里；老米克拉谢维奇穿一件红色的长皮袄，领着保尔往公路走。气氛很紧张，孩子们不看我们，民警一言不发，莫洛兹简直发呆了。父子俩在林荫道已经走得比较远了。突然不走了，父亲拽儿子的胳膊，儿子使劲往外挣。可那有什么用？你挣脱得了？后来父亲一只手从皮袄上取下皮带，开始打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干了。保尔一面挣扎着、哭着，院子里的孩子们闹着，有几个转过来用责备的眼光看我们，象是希望老师管一管，你猜后来怎么样了？突然，莫洛兹冲出外廊，一瘸一拐地穿过院子，向那儿奔去。‘住手，不许打人！’他喊道。

“米克拉谢维奇也真的住手不打了，气呼呼地看着教师。教师走过去，从父亲手里拽出了孩子的手，气得话都连不在一块了：‘你休想从我手里把他领走！懂吗？’

“米克拉谢维奇瞅着老师怒气冲冲。别看莫洛兹是个残废，他也挺起胸脯，准备应战。幸亏我们马上赶到，把他们拉开了，没让打起来。

“架是拉开了，下文怎么样呢？小保尔跑回学校，父亲在那儿骂街，我不做声，民警等着——他是执行人嘛！总算让双方安静下来。米克拉谢维奇往公路那边走了，我们三个人留在那里干什么？何况处事果断的莫洛兹当场就明确表示：决不能把孩子交给这样的父亲。

“我和民警回到区里，一无所获，没有完成检察长交给

的任务。案子转到了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专案组。孩子父亲当时向法院上诉。真够我们俩忙碌和苦恼的了。不光莫洛兹，还有我。莫洛兹到底打赢了。专门小组判决孩子交儿童院。不用说，莫洛兹并不急于去执行这个英明不过的决定，看来，他这么做还是对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学校都是新建，几乎什么都缺。每天各村总有教师来这里谈困难，要这要那。什么课桌、黑板、木柴、煤油、纸张——当然，还有教科书。教科书缺，其他图书也少，学生、教师、青年——大家都爱读书，他们想方设法到处搞书。莫洛兹每次到区上来，十有八九是为了要书。‘给我些书吧！’他一再地要求我，当然我给过他一些，但显然不多。此外，说实在的，我当时想：学校很小，搞那么多书干吗？于是，他就开始自己搞书了。

“你大概知道，离区中心约三公里的地方，有个‘公爵’村，其实村子普普通通，跟什么公爵毫不相干。但离村庄不远的地方曾经有个波兰地主的庄园德国人占领期间给烧了。波兰人占领时，那儿住过一个波兰富翁，他死后留下了各种各样东西，当然也有图书。我去那儿看过——似乎什么合适的东西也没有。书很多，新的、旧的，但本本都是波兰文和法文的。莫洛兹去那里为学校挑书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这一次他很走运，好象是在阁楼上的什么地方，翻出了一大箱俄语书。在各种不大有价值的书（有全年合订本的

《田野》、《神的世界》、《星火》等杂志)当中,发现一套托尔斯泰全集。这件事他一点也没有对我说,而是在头一个休息日,从谢尔佐弄了一辆马车,带了一个学生,也就是那个超龄生,直奔‘公爵’村。不巧赶上冬末春初的季节,道路已经开浆,桥被水冲垮了,真糟糕,马车怎么样也没法靠近庄园。于是他踩着结冰的河面来回地搬着书。事情一切顺利,但在快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一下子陷进河边的冰窟窿里。当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是两条腿湿透了,湿到了膝盖,受了凉,病倒了,病得还不轻,躺了一个月。肺炎。

“告诉我这件事的是从谢尔佐来的一位大叔。这一下我就发愁了:怎么办呢?教师病了,学校到了要关门的地步。记得雅佳小姐当时已经不在学校,上别的地方去了。找不到任何人来替他。孩子们放羊了。我知道实在应该去一趟,可是没有时间——我在区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又是办学校,又是建农庄。不过还是借一次路过的机会,拐进了那个林荫道。心想,去看望看望莫洛兹吧,他怎么样了,总还活着吧?

“一进走廊——衣架上挂满了衣服,心想,他一定已经好了,谢天谢地!大概在上课吧。我推开教室门,六七张课桌摆在那里,——但空空如也。心想,真怪!孩子们上哪儿了?侧耳细听,好象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声音是那样轻柔,那样流利,象是在念祷词。再仔细听;更怪,我听到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的那段独白。你还记得吗?‘高空啊!我以前从未知道,现在才亲眼见到的这高高的天空啊!你究竟

在哪里？……这种痛苦我以前也是不知道的……是呀，我以前一直是不知道的啊！我这是在哪儿？’

“我脑海里也浮现出这样的问句，‘我这是在哪儿？’——这样优美的独白有十来年没有听到过了。可从前，还是我当大学生的时候，文艺晚会上亲口朗通过这一段。

“我轻轻地推开门——莫洛兹的厢房里孩子们坐满了一屋，桌子上、板凳上、窗台上，哪儿都是。莫洛兹自己躺在沙发上，身上盖一件羊皮袄，正在朗读。他在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屋里那样安静，那样聚精会神，连苍蝇飞过都能听出声来。他们谁也没回头看我——根本就没有发现我。我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好。第一个念头是：就这样关了门走吧！

“但还是想起来自己是领导，是区教育局长，负责全区的教育工作。朗读托尔斯泰固然是好，可是教学大纲总该完成吧？既然你能给学生朗读《战争与和平》，想必也能上课吧？不然，学生又何必走好几公里来谢尔佐呢？

“我们把学生全都打发走了，只剩下我们俩，这时，我就把上面的想法大概地对莫洛兹说了。可他的回答是：他生病一个月耽误的全部课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托尔斯泰的两页书。对不起，我可不敢苟同呀！于是我们辩论了一阵。

“那年春天，莫洛兹下功夫钻研托尔斯泰，他自己通读了全集，给孩子们也读了许多东西。那是门大学问哩！现在无论你跟那个大学生或中学高年级生谈起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总要先给你议论一番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些天才伟大在什么地方？他答不上，需要一问再问；而他

们的缺点，谁都能一条一条数出来。未必有谁记得，在奥斯特利茨受伤的安德烈公爵躺在哪个山上？但对于不能以暴力反抗邪恶的错误观点，人人都能义正词严地批驳一通。但莫洛兹并不去挑剔托尔斯泰的错误，他光是读给孩子们听，自己把书中的一切全部加以吸收，是用心灵去吸收的。敏感的心灵啊！哪些好，哪些不怎么样？它自己能辨别得清清楚楚，好的会变成心灵的一部分，其余的很快就会被忘掉。就象风里扬场，糠灰扬掉了，谷粒留下来。这个道理现在我已经很懂了，可那时候，怎么说呢？……年轻，又是领导。

“一群孩子里面通常总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或者机灵一点的，因为自己的品性或者威信使别的孩子听他管。在谢尔佐那个学校，柯利亚·波罗奇契当了这样的孩儿王。这是米克拉谢维奇后来告诉我的。也许你还记得，纪念碑上他的名字原来是排在第一，现在是第二了，排在莫洛兹后面。这样对。桥上发生的那件事全是柯利亚带头干的。

“我见过他几次，他总和莫洛兹一起，小伙子宽肩膀，挺引人注目的，性格倔强，沉默寡言。他热爱自己的老师，对他简直是一片忠心。这到处有表现，虽然我并没听他说过一句话。他成天皱着眉头不说话，象是在生气。那时他十六岁。在波兰地主那里，当然没能上多少学。他在莫洛兹这儿读四年级。对了，还有一件事：四〇年他读完了四年级，本应该到六公里外的布基洛维奇村上初中。他竟没有去，请求在莫洛兹这儿再上一年四年级。只要不离开谢尔

佐就成！

“除了按大纲进行教学和在大纲以外组织阅读，莫洛兹还管课余的文艺活动。记得他们演出过《小孔雀》和一些短剧，有朗诵，有唱歌，象通常那样。当然罗，他们的节目里有些是反宗教的，关于牧师和教士的各种各样寓言。就是这些节目很快就被斯克雷列夫的一个天主教士听到了。做礼拜的时候，他把谢尔佐学校的这个教师很贬了一顿。后来知道，他在莫洛兹的瘸腿上借题发挥，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好象瘸腿成了他的罪过。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起初，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我讲的那个检察长西瓦克在食堂见到我，说：你去一趟检察院。我已经说过，我是多么讨厌去‘拜访’那种地方，但有什么法呢？不去不行，还得去。原来，斯克雷列夫那个天主教士向检察院告了一个恶徒，说他爬进了神圣的教堂，褻渎了祭坛（这玩意儿在教徒那里另有叫法），在上面写了些什么，但被管教堂的人抓住了。原来是谢尔佐的小学生柯利亚·波罗奇契。现在那个天主教士和几个做礼拜的教民要求政府惩办这个学生，连同他的老师。

“怎么办？又得去调查？过了一周，检察长、派出所长和格罗德诺的一个宗教方面的官来到了谢尔佐。波罗奇契并不抵赖。他说：我就是想报复那个教士，但替谁报复，报复什么——他却不谈。去的人开导他：不老实承认，就要判刑，人家才不看你岁数小。他说：‘判就判呗。’

“你猜结局怎么样？莫洛兹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向领导

检讨，仿佛这全都是他管教不严的结果。他费了不少劲，还进了一趟城，孩子总算平安无事了。不用说，打这以后不仅谢尔佐的学生，就连周围的老乡都把莫洛兹看成自己的保护人。谁有什么困难或者麻烦事，都去学校找他。他简直是办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万事咨询所。还不仅仅是解疑难、出主意，而且自己也忙得团团转。一有空，他不是跑区里，就是去格罗德诺。也是走的这条路，坐马车或顺便搭汽车，那时汽车偶尔才能碰到，有时干脆步行。这可是个拄着拐杖的瘸子啊！而且既不为钱，也不是有义务，什么都不图，只是尽乡村教师的天职罢了。”

看来，我们在公路上走了至少一个钟头。天已经黑了，夜幕笼罩大地，洼地雾气沉沉。公路附近针叶林也染成了黑色，在星星相继发亮的灰白色天际衬托下，犹如起伏不平的山峦。万籁俱寂，气候宜人，秋天的旷野天高气爽。空气里飘荡着新耕过的土地的清香，公路上散发着沥青和尘土的气味。我一边听特卡丘克讲，一边下意识地欣赏着壮丽肃穆的夜景。沉睡的大地上空，星星开始了自己神秘莫测的夜生活。公路一侧，大熊星座在闪闪发光。在它的上方，勺形的小熊星座和它尾部的北极星忽明忽灭。公路延伸的正前方，参宿七星纤细的光线隐约可见，好似一枚银制的图章，盖在猎人星那封情书的角上。我想，艳丽华美的古代神话，总不免矫揉造作、失其自然吧。就拿这个猎人星的神话来说，月亮女神阿尔达密丝出于嫉妒就杀死了曙光女神艾奥斯的情人——美丽的猎人奥利翁，似乎在他们的神话生

活里别无其他更可怕的灾难和更重要的的心事了。虽然如此，古人的这种美丽的虚构还是远比人类最感人的史实更富于魅力，更引人入胜。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也还有许多人情愿这样传奇式地死去，特别是情愿在死后与宇宙共存，化成繁星密布的夜空边际上的那片星云。但这是谁也无法做到的——这也许是憾事，也许还是幸福。神话里的悲剧是不会重演的，而人间却充满着在谢尔佐村曾经发生过的、触景伤情的特卡丘克现在正给我讲述的这一类悲剧。

“不管我们对战争作过多少准备，不管如何努力加强国防，也不管读过多少关于战争的书，想过多少关于战争的事，但战争还是来得那样突然，那样出人意料，犹如晴天霹雳。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刚好是星期三，这地方就已经来了德国人。那些本地人，也就是这儿的农民，对于自己一生中经历过多次事变已经习惯，不管怎样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是第三次更换政权了。他们习惯了，好象这是必然的事。可是我们是东边来的，感到这是多么的不幸！我们何曾料到第三天就处在德国人的铁蹄之下。我记得，下来了一道命令，要我们成立清剿队，去抓德国间谍和伞兵。我跑去找教师开会，骑车走了六个学校，中午来到了区委，但那儿空空的。听说区里的人刚刚装上自己的小卡车向明斯克跑了。还听说公路已经被德国人切断。起初我楞住了：这不可能！如果真是德国人，那一定会见到我们的人在撤退。但打战争开始，这儿谁也没见到过一个我们的兵；德国人会从天上掉下来！然而，说那些话的人没有骗我们。傍晚，六

辆左右履带式越野车闯进了镇子，里面满满登登，全是货真价实的德国鬼子。

“我和另外三个小伙子——两个教师和一个区委指导员，一溜烟似的，穿过菜园，钻进了庄稼地，从那里进了树林，然后向东走。走了三天——不是走大路，而是穿过涅曼河岸边的沼泽地，有几次遇到难以对付的处境，象是给敌人送货上门，惊险极了。心想：完了！那个名叫萨沙·克鲁佩尼亚的教师腹部受了伤。前线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大概是赶不上了。人们传说，连明斯克也已经落到德国人手里。显然，前线走不到了，准去送死。怎么办？留下，哪里好呢？留在陌生人那里不太方便，而且又怎么好求人家呢？所以决定回去，还是回自己区里好，至少人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村里镇上的各种各样人都混熟了。

“你可知道，这时才发现，我们对我们的人了解得毕竟还很差。多少次会面，谈话，有时在一起喝酒，感到都是好人，又善良又老实。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总算熬到了‘老庄院’——树林附近的一个村镇，不靠大路，那儿好象还没有德国人。

“心想，在这个最合适的地方呆它两个星期，等我们的人把德国人赶跑。谁还去想更长的时间呢？如果有人说，战争要拖四年，那就会被看成是内奸或胆小鬼。克鲁佩尼亚当时已经不行，不能再往前走了。这时，想起‘老庄院’，我有一个熟人，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很有点文化的人，叫乌索列茨·瓦西里。有一次，我开完会在他家过夜，两人谈得很

投机，这个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又聪明，又能干。他妻子也这样，显得特别年青，她热情好客，挺爱干净，别人比不了。她用咸蘑菇款待我们。满屋子的花——所有的窗台都给摆满了。就这样，我们深夜来拜访这个乌索列茨。‘应该帮个忙，有个伤员，’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可是，你猜，我们这位熟人会怎么样？他听完了，门也没让进，说：‘你们的政权完蛋了！’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震得屋檐下的土屑纷纷往下掉。

“倒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普通大嫂收留了我们。她带着三个小孩，大孩儿是个先天的哑巴，丈夫在部队里。她听说有伤员（在这之前，我们到过村头的另一家），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就把我们全都拽到了她家，她给可怜的克鲁佩尼亚洗净了伤口，给他喝了鸡汤，然后把他藏在草棚里的柴草里。我记得，她成天唉声叹气：‘也许，我那个可怜人也在什么地方受这种苦呢！’这说明她爱自己的丈夫，老弟，这总要说明一点问题吧。但是克鲁佩尼亚一个星期后死了，鸡汤也不中用，因为伤口感染了。夜间，在一个坟地旁边我们悄悄把他埋了。以后呢？我们在雅德维嘉大嫂那儿又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开始找游击队。我想，总有地方能找到我们的人，不会都往东边跑吧。我们每一次战争都少不了游击队——这写过多少书，拍过多少电影，对这一点是可以抱希望的。

“我到底碰到了三十来个突围出来的军人。领头的是少校谢列兹涅夫，骑兵团里的，一个果敢的硬汉子，库班人，骂

起人来可厉害了。连喊带骂。急眼了，可能给你一枪。但总的来说，为人公正。有意思的是：他对你的态度变化无常，事先根本无法预料。他刚才还因为你生锈的枪闩吓唬着要枪毙你，可是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因为你在行军途中第一个发现可以休息打尖的村落而向你公开表示感谢。枪闩的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始他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对他这个骑兵的脾气习惯了。四二年，在加特洛夫附近的一条小道上，谢列兹涅夫在前头走，后面跟着副官谢苗·查理戈夫和其他人。天没长眼呀！从桥那个方向，一个该死的伪警察惊慌失措，胡乱开了一枪，直射进队长的心口窝。这就是命运！多少次可怕的战斗他都参加过，都没有事。可这次，一颗子弹，通宵也只射出来这一颗子弹，却偏偏碰在队长身上！

“谢列兹涅夫这个人虽然性格特殊，暴躁，任性。但是，你要知道，他有头脑，不象一些人那样胡来。他偏激，但主要是嘴巴，其实很会动脑筋。头几个月，我们住在森林中的‘狼窝’里，被叫做‘狼窝’的这条天然边界当时归叶菲莫夫边防哨所管。以后，到了四三年，成了基洛夫旅的住地，我们迁进了密林。但最初我们是在这些‘狼窝’里安身。你可知道，这地方太好了！有沼地，有山丘，凹地连着陡坡，鬼来了也要摔断腿的。我们在洞里暖和了几天，多少习惯了森林里狼的生活。不知道是经谁提醒，还是少校自己明白的，战争不能只打几个月，也许时间还要长，没有本地人参加是不行的。所以他吸收了我另外四个人参加——普鲁日的公

安局长，一个大学生，村苏维埃主席和他的书记，让我们当了干部。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我们那个检察长西瓦克也来了。他也是没走到前线，半路上返回来的。他在这里先是普通队员，后来当了特务科长——但这是谢列兹涅夫死了以后的事。我们当时决定，趁现在平静，熟悉一下情况，并和各村建立起联系，同那些可靠的人恢复关系，在各村镇上摸一摸突围出来的人的情况；这些人脱离部队，跟村里一些年青的娘儿们一块儿住上了。第一步，少校把所有的本地人撒出去，这种人当时就有十二、三个，各去各的地方。我和检察长，自然是去我们原来那个区。这儿比别的地方当然更冒风险，因为许多人还记得我们的模样，可能认出来。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对这里了解得多一些，多少清楚谁可信，谁不可信。何况我们的样子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不是一下子认得出来的——满脸连鬓胡，穿得也很旧。检察长穿一件铁路人员的大衣，我穿着农民粗呢上衣和靴子。两个人都背着口袋，活象讨饭的。

“最初我们是决定去谢尔佐。

“当然不是去庄园，而是去村里。你也许知道，这要穿过学校旁边的牧场。检察长在村里有个熟人，曾经是农村积极分子，我们也就投奔他来了。但为了慎重，我们先来到了戈里涅夫斯基村的某一家，就是兰都里奇的那个商店经理在战后买下来的那间房子（他在村供销社附近盖起了新的）。女主人上波兰了，房子空了大约三年，商店经理就这么买了下来。可在战争的当时，这儿住着三个没出嫁的姑娘，

一个儿媳妇（儿子在波德战争中失踪，后来又在安德列斯出现了）。在我烘包脚布的时候，姑娘们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还讲了谢尔佐的各种新闻。这下我们才明白，幸好先来找这几个波兰姑娘，否则，免不了要遭殃。原来检察长的那个熟人，已经戴上白袖章，当上了伪警察。检察长听到这新闻哎哟了几声，老实说，我反而高兴。这不比马上落到警察手里好？但是很快就轮到我自己吃惊和为难了——我也打听到了莫洛兹的情况。儿媳妇对我说：‘莫洛兹还在学校里工作。’‘干什么呢？’她说，‘教孩子。’原来，他从各村把自己的那几个学生叫到一块儿，德国人允许他办学校，他就这样教书了。当然不再在加布鲁斯庄园，现在那里成了警察派出所，而是在谢尔佐的一间农舍里。

“好大的变化！别人嘛还可能，但莫洛兹能这样，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时检察长发表高见了：这个莫洛兹不是我们人，当时就该干掉。我一声没吭，想啊想，脑子里怎么也想不通莫洛兹会当德国教师。我们坐在炉子旁，瞅着炉火纳闷儿。这就叫建立了联系！一个是伪警察，一个是德国人的走狗。战前的两年，我们在区里培养出来一些好干部呀！”

“你知道我考虑了多久，我想啊想，最后还是决定夜里去一趟莫洛兹那儿。心想，难道他会出卖我？要真这样，我用手榴弹把他炸开花。身上没有带枪，但衣兜里有一个手榴弹。谢列兹涅夫不让带武器，但以防万一，我还是带上了这个手榴弹。

“检察长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但我不听。我从小就这样。

不同意的事，别人越劝，我就越要按自己的干。这性格在生活里是不会有太大好处的，但有什么法呢！其实，检察长根本没有啥，他只是怕我出事，怕我不能跟他一起回游击队。

“姑娘们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村里找莫洛兹。从水井数第三家，门廊前面有个院子，他就住在一个孤老太婆家里，学校现在就办在路对面的另一间小屋里。

“天黑我们就动身了。毛毛细雨，泥水泥浆，再加上风。十一月刚开头，可冷得要人的命。我和检察长商量好了，我一个人进去，他留在打谷场外一丛灌木里。要是等过一小时不见我回来，那就是说情况不妙，出了事。我想，一个小时总够了吧。一个小时以内我能够把这个莫洛兹的心思摸清楚。

“检察长留在草棚后面，我沿着小路，向房子走去。周围又黑又静。只听见雨下大了，打在房顶的麦秸上簌簌响。我摸到了院子的小门，门被铁丝拧得紧紧的，怎么也弄不开。得爬篱笆过去，可篱笆比较高，上面的横杆又湿又滑。我一只脚刚踩上去，靴子滑了一下，横杆咔嚓成了两截，我摔了个嘴啃泥。就在这时，狗也出场了。狗一个劲儿狂叫，我躺在泥里，一点也不敢动，甚至不知道是溜掉还是叫人出来帮忙好。

“这时听见有人从屋里走到门口，门吱扭一声开了，那人细心地听着，然后低声问：‘那是谁？’又对着狗：‘顾里卡，去！去！顾里卡！’很显然，这就是学校养的那只曾经咬过督学的、只有三条腿的黑毛狗。门口那个人就是莫洛兹，话

音很熟，但怎么回答呢？我躺着不吭声，狗又叫了起来。于是莫洛兹一瘸一瘸地下了台阶（我脸贴着泥浆，听见嗒拉嗒拉的脚步声），一步一步朝篱笆走来。

“我从地上爬起，开口就说：‘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是我，你从前的领导。’他没吭声。我也没再说话。现在怎么办？既然作了自我介绍，当然应该从泥里爬出来。我站起来，爬过了篱笆。莫洛兹轻轻地说：‘靠左边点，这里放着木槽。’他把狗哄住，领我进了屋，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窗户挂着窗帘，凳子上有一本书摊开在那里。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把凳子挪近火炉，说：‘请坐，把外衣脱下来，干一干。’我说：‘不用，我的外衣还是会干的。’‘想吃点东西吗？给你拿土豆来。’‘不饿，已经吃过了。’我回答得似乎还镇静，其实心里已经很紧张，天晓得这个人怎么样？而他却若无其事，十分镇静，好象我们只分别过一天，既无问题，又不惊慌。只是话音里带着一点多余的忧虑。目光也不象从前那样开朗。我看得出，他大概有五天没刮脸了，淡褐色的胡茬子都冒尖了。

“我没有脱那件粗呢短外衣，湿淋淋地坐着，最后他在靠墙的木炕上坐下来，把小油灯放在凳子上。我问他：‘生活过得怎样？’‘那还用问，当然不好。’‘怎么回事？’‘还不都是战争。’‘不过，听说战争对你没有多大影响，还教书吗？’他用半边脸苦笑了一下，目光直盯着下面的油灯，‘应该教嘛！’‘问题是按谁的教学大纲，苏联的还是德国的。’‘啊！原来你问的这个！’说着就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我暗暗注视着他。两人都没说话。后来他停下来，怒视了我一眼，说：‘我过去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也许过去是聪明的。’‘那就不要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他斩钉截铁地说完这几句，就不吭声了。你可知道，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觉得大概是自己错了，说了蠢话。的确，我怎么能够怀疑他呢？我知道他，他从前的为人和他在这儿的表现，怎么能设想他三个月内变坏了。你可知道，虽然他没有表白，没有保证，没有信誓旦旦，但我已经感觉到：他肯定是我们自己人，是正直的好人。

“但明明是他办了学校，而且得到了德国当局的允许……

“‘如果你指的是我现在当教员，那就收起你的怀疑吧。我不会教孩子坏的。学校是需要办的。我们不教育孩子，他们就愚弄孩子。我过去花了两年培养这些孩子的人性，决不是为了现在让别人把它糟蹋掉。我还将为孩子们战斗。当然要看我有多大能力了。’

“他这样说着，在房子里来回地走着，根本不看我。我坐着烤火，心想：要是他说的对呢？德国人不也是没有睡大觉，他们动用成千上万张传单和报纸在城乡散布毒素。有一些我亲眼看到过，也读过。写得头头是道，很能迷惑人。甚至称自己的党为民族社会主义工党。似乎这个党保卫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反对资本家、财阀、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们。青年毕竟是青年。老弟，青年就象得了白喉的婴儿，最容易沾染上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年岁大一些的人

已经明白这一套把戏，生活中他们什么没见过！白俄罗斯男子汉，用糠皮哪能骗得了！可年青人呢？

“‘现在大家都在抓武器，’莫洛兹说着话，一面在屋里来回地走。‘战争时期需要武器，总是甚于需要科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在打仗。但一种人需要枪是为了打德国人，而另一种人是为了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扬威，在自己人面前摆弄武器，这当然最无危险，而且丝毫不受制裁。所以有人去当警察。你以为人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远不是如此。人们不去考虑今后会怎样，往后怎样生活。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弄条枪。现在区里已经在招警察，谢尔佐有两个人进去了。可想而知，他们会变成什么人。’我想，这是真话。但说话的这个莫洛兹毕竟是自愿地在德国政权下工作的呀。此刻到底该怎么办？”

“‘那就这样吧，就让他工作吧！’突然之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念头似乎自然而然地在心里出现。重要的不是在哪儿工作，重要的是如何工作。即使在德国人的监督下，但肯定不是为德国人。他是在为我们工作。如果不是为我们的现在，那也是为我们的将来。我们总会有将来的呀！一定会有，否则，活着还有什么劲！一头扎进深水里算了。”

“事实上，这个莫洛兹不仅在为将来工作，他当时也在为现在做一些事情。”

“一小时肯定已经过了，我担心起检察长来，出外叫他。他起初不干，不愿去，但冻得够呛，所以跟着进了屋。他有所克制地同莫洛兹打了招呼，过了好一阵才参加谈话，不过

胆子还是一点点大了。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后来就干脆脱下湿衣服，烤起火来。莫洛兹的那个老太太往桌上摆了点吃的，甚至还找出了一小瓶酒，当然是浑浊的酒罗！

“那时，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开诚布公地畅谈了一阵。实在可以说，正是那时，我第一次发现，这个莫洛兹和我们不一样，比我和检察长高明。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在一块儿按同样的要求工作，看来聪明才智没有差别。现实生活把大家分散到四面八方，各奔前程，于是有谁突然意外地比别人高明了，我们就会惊奇地说，瞧，他过去不也和大家一样，看起来也并不比别人高明。怎么一下子就出人头地了呢？”

“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莫洛兹的聪明才智超过我们，比我们想得深，看得远。当我们在树林里转来转去，为日常的小事操心（搞东西吃，找地方隐蔽，搞武器，有时还用枪撂倒一两个德国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思考和研究这场战争。对于沦陷区，他好象是从内部去进行观察，并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東西。而主要的是，他从道德方面，可以说是从精神方面对沦陷区有切身的感受。就连我那个检察长也发觉了这一点。我们经过开怀畅谈以后，已经十分亲近了。这时我对莫洛兹说：‘你能不能扔掉这鬼差事，干脆跟我们进树林打游击！’我记得，莫洛兹面带愠色，皱起了眉头。检察长当时也说：‘不，不值得，而且他一个瘸腿，当什么游击队员！他在这里对我们更有用。’莫洛兹当然同意了，他说：‘大概，现在我在这里更合适。大家都了解我，帮助我。将来实

在不行了……’

“于是，我也同意了。真的，他何必进树林？而且还是这样一条腿。再说，谢尔佐里有个我们自己人，对我们也许会更有利。

“就这样，我们在他那里作完了客，带着平静的心情告辞了。告诉你吧，我们在乡下的所有帮手当中这个莫洛兹是最起作用的。主要是因为他搞到了一台收音机——这是后来知道的。当然不是他自己搞到的，是一些老乡交给他的。他们那样敬重他，甚至于还和从前那样，无论好事坏事都去找他，不去找神父和教士。所以当他们在一个什么地方弄到了这台收音机时，首先就是交给他们的老师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教师就在干燥棚里偷听起收音机来。晚间常把天线拉到梨树上收听，听后将听到的记下来。主要是苏维埃情报局的新闻简报。我们当时最需要它。我们游击队里啥也没有，而他这一下可阔了！谢列兹涅夫知道了以后，当然想拿来自己用，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要放在我们这里，那些新闻只有三十五个人听到，可现在是传遍周围的十乡八村。于是，我们决定这样办：莫洛兹一周里头给我们队里送两次新闻简报。森林看守室旁边一棵松树上挂一个蜂箱，孩子们把简报放进去，夜间我们取出来。记得那年冬天，我们象狼一样呆在自己的窝里。冰天雪地、寒冷、荒凉，吃的很困难，唯有莫洛兹的这些邮件还能叫人高兴，特别是在德国人被揍出了莫斯科那阵，每天都往蜂箱那儿跑……。喂，象是大车来了……”

在黑暗的夜色里，熟悉的马蹄声透过一阵阵清新的微风，由远而近。马笼头叮当响了一下。在这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路面被汽车掀起的旋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当然听不到车轱辘响。公路前方不远的地方，布基洛维奇村庄的灯光星星点点。汽车灯耀眼的光束从村庄的山坡后面射来，在夜空中移动。

我们停下来等了一会儿，黑暗里露出了一辆马车，马安静地走着，马蹄轻打着路面，车老板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懒洋洋地轻摇着缰绳。他看见我们站在路旁，就注意起来，但没有作声，显然打算就这样从我们身边过去。

“捎我们的人来了！”特卡丘克对他没打任何招呼开口就问：“大概是空车，是吧？”

“是空车。我送东西回来，”声音听起来有点喑哑，“你们路远吗？”

“对，进城去。不过能捎到布基洛维奇村也好。”

“这可以。正好我去布基洛维奇。你们可以到那儿搭公共汽车，九点钟有，去格罗德诺班车。现在几点啦？”

“差十分钟八点。”我好不容易看清了手表上的指针，告诉了他。

大车停下了。特卡丘克呼哧呼哧地爬上了车。我勉强在后面坐下来。光秃的车板上剩下一些垃圾废物，坐在上面不那么得劲。有点硌屁股，但是我已经不愿离开我这个

同伴了，只见他疲倦地舒了一口气，耷拉着双腿坐在那里。

“到底累得够呛！年龄不饶人。哎，年龄呀年龄……”

“你们走了很远了？”车老板问。

从他喑哑的说话声可以断定，他也很有年纪，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他象是想听我们说些什么。

“从谢尔佐来。”

“啊，那么是参加葬礼回来？”

“是这样，”特卡丘克简短地回答了一句。

车老板抖了一下缰绳，马加快了步子——公路下坡了。下面是黑糊糊一片，宽阔的洼地没有一点灯光，但汽车灯散开的光束还在洼地对面的夜空里移动。

“这个教师年纪还轻呢。我很了解他。前年我们一块儿住过院。”

“是同米克拉谢维奇？”

“是啊！同住一个病房。他还在那儿读一本厚厚的书呢。多半是默读，偶而也朗读。书的作者我不记得了……记得那里面讲，没有上帝，也就没有魔鬼，也就是说，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可以杀人，可以施善心。就是这样讲的。他也说了，这要看怎样理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卡丘克脱口冒出来一句，转身问车老板：“那么你说，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能说什么！我是个大老粗，只读了三年书。但我是这样理解的。人身上应该具备某种东西。制动器之类的东西。要没有制动器，事情可就糟了。比如城里有一次，三个

家伙向一个带着姑娘的小伙子动手，差点没出事。我们的维季卡——布基洛维奇村的一个小伙子上去打抱不平，结果自己住了院，现在是第三周了。”

“被打得很厉害吧？”

“也不能说是很厉害——被人用拳头(指节上套了个铁玩艺儿)在太阳穴上打了一下子。可这就够呛了。当然他也回敬了其中一个家伙。这家伙被抓住了，原来是一个有名的流氓。”

“这太好了！”特卡丘克精神起来，“看，一个对付三个，不害怕。这种事你们布基洛维奇村什么时候有过？”

“布基洛维奇村嘛，大概没有过……”

“没有过，就是没有过。我知道你们布基洛维奇村——一个又穷又小的村子。现在当然罗，现在不同了，人们住进了新式砖瓦房。可是曾几何时，茅屋檐上不是长满绿苔吗？这样的村子坐落在大道上，奇怪的是——当时连棵树都没有。象大沙漠那样。大地也真是一片黄沙。记得，有一次来这里，听到这么一件事。布基洛维奇村有个人在春天饿得吃荨麻，突然起了拦路打劫的心，想发笔横财。夜里，他守候到一个过路人，用斧背敲了他一下脑袋。现在村口那块大石头旁边不是还竖着一个十字架吗？原来死者是个要饭的，要饭袋里面空空的，凶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就再也没有回来。可现在，你看，布基洛维奇村却出了个英雄，一个打抱不平的勇士！”

“可不。”

“可他在哪儿上学呢？在谢尔佐？”

“在谢尔佐上到五年级。”

“你看！”特卡丘克由衷地高兴起来，“这就是说，他在米克拉谢维奇那儿上学。你不说我就猜到了。米克拉谢维奇很会教学生。根基还是那个，一眼就看得出来。”

几辆汽车迎面飞驰而来，闪亮的车灯还在远处就晃得我们睁不开眼。车老板小心地把车往路边赶，马也放慢了步子，汽车带着吼声从身旁驰过，碎石从车轮底下飞起，打在马车上。眼前变得一片漆黑，有半分钟光景，我们根本看不见道路，听任马往前走。汽车发动机强大的嘟嘟声在身后迅速远去，消失了。

“我说，你还没有讲完，莫洛兹后来结果怎么样了？”我提醒特卡丘克。

“当时哪能有结果？说来话长了。老大爷，你不知道莫洛兹吗？就是谢尔佐的教师。”特卡丘克转身问车老板。

“是战时牺牲的那个……？那还用问！我外甥和他一块牺牲的。”

“谁呀？”

“波罗奇契嘛。他是我外甥，亲姐姐的儿子。哪能不知道呢？我知道……”

“我正在给这个同志讲这事呢！这么说，你是知道的。如果你没有听过全部经过，倒可以把它听完。打游击时大概你没有去过树林吧？”

“怎么没去！我去过！”这人委屈地答道。“我在库鲁塔

同志那儿运送伤员，是卫生员。”

“库鲁塔？是库鲁塔旅长那儿？”

“是呀！从四三年春季的尼古拉节直到最后，直到我们的人来。算算看，有一年多呢。”

“库鲁塔可不属于我们游击区的。”

“这有什么要紧。管他是不是我们区的，反正我去过树林。我还有奖章和证件呢！”老人已经很不高兴了。

特卡丘克马上把谈话缓和下来：

“我没有别的意思，随便这样说说。有，那你就带着吧。我们现在是谈别的事……谈莫洛兹。”

“就这样，莫洛兹头一段时间总的说还很顺利。德寇和警察暂时还没去找他的麻烦，他们也许是在远处进行监视。只有一件事象石头压在他心头——两个女孩的命运，就是那次被他护送回家的那两个女孩。四一年夏，正好是战争爆发前几天，让她俩参加诺沃格鲁特卡市郊少先队夏令营。各区联合组织少先队夏令营，那还是第一次。母亲不让孩子去。一个农村妇女，除了鼻子底下那块地方哪儿也没去过，害怕是不用说了。莫洛兹说服了她，本心是为这两个小姑娘好。她们刚动身，战争就爆发了。过了好几个月，杳无音信。母亲当然心都要痛裂了，莫洛兹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他的过错吧。良心受到谴责。可有什么法呢？两个小姑娘就这样失踪了。

“现在该给你讲讲谢尔佐那两个伪警察了。一个你已经知道，这是检察长过去的朋友拉甫切尼亚·符拉季米尔。原来他不是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那种人。他也真是当了伪警察，自愿还是被迫——现在已经查不清了。但在四三年冬天，德国人在诺沃格鲁特卡市枪杀了他。总的说，还是个好人，给我们办了不少好事，在我们说的五个孩子事件中他起了相当好的作用。拉甫切尼亚虽然也当了警察，但他是好样的。那另外一个警察，真是坏透了的家伙。我记不清他的姓了，村里人叫他‘恶魔’。他确实是给人间带来无数灾难的恶魔。战前他与父亲住在农庄里。当时他年轻没结婚——普普通通的青年嘛。对他战前的表现，好象谁也说不出一句坏话。但德国人一来人就完全变了。这就叫做条件。大概在这些条件下表现出性格的这一面，在另一些条件下表现出性格的另一面。所以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英雄。这个恶魔也是这样，战前他身上就已隐藏着一种卑鄙无耻的东西，如果不是糟糕的战争，可能它也就不冒出来。可现在露骨地冒出来了。他效忠德国人，这就不用说了。他在这里亲手干了许多坏事。秋天他杀害了四个负伤的军官。他们从夏天就藏在树林里，本地人里头有知道的，但都没说。而这家伙跟踪盯梢，在云杉林里搜到了他们的洞，夜里带着同伙把伤员全部打死。我们联络员克里什托弗维奇的家是他烧的。克里什托弗维奇本人总算逃脱了，但其余一家人——年老的双亲、妻子和几个孩子，全被杀害了。他欺压镇上的犹太人，经常组织围捕。什么没干过！四四年夏天他不见

了。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吃了子弹，也可能今天还在西方哪个国家里过豪华的生活哩！这类坏蛋是火烧不死、水淹不没的。

“这个恶魔终于怀疑起莫洛兹的学校来了。正象麻袋里藏不住锥子，不管莫洛兹怎样小心谨慎，总要露出破绽。大概有些什么传到了伪警察耳朵里。

“冬末春初的一天（雪已经开始化了），这伙警察突然来到了学校。那里正好在上课，二十来个孩子坐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两条长桌子旁。恶魔突然闯了进来，一起进来的还有两个警察和一个德国警备司令部军官。他们进行了搜查，抖落了书包，检查了课本。当然什么也没有搜到。从小学生那儿能搜到什么呢？他们没有把谁带走。只是对教师进行了审问，逼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两个来小时。但都应付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莫洛兹这儿学习的几个孩子，还有那个超龄生波罗奇契，已经开始琢磨什么了。平时他们是不瞒老师的，可是这回，甚至对老师也保密了。不过有一次这个波罗奇契象是无意之中提到，要是能干掉恶魔就好了，还说这是可能的。但莫洛兹坚决制止这样做。他说，如果需要，会有人把他干掉的，用不着他们。战争期间不能任着性子来。波罗奇契没反驳，象是同意了。但这个小伙子已经养成这样的性格，他脑子里要是产生什么念头，就别想一下子给打消。而且他的念头总是一个比一个冒险。

“下面是米克拉谢维奇亲口对我说的，因此可以认为全

是真实情况。

“事情是这样。谢尔佐村在四二年开春的时候，以莫洛兹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但非常忠于他的少年小组，他们干什么老师一个心眼。现在这些孩子已经家喻户晓，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纪念碑上，当然没有米克拉谢维奇。那时小保尔·米克拉谢维奇十五岁，柯利亚·波罗奇契年岁最大，快十八岁了。还有柯仁兄弟俩——吉姆卡和奥斯塔普，两个同姓的孩子斯穆尔内依·尼古拉和斯穆尔内依·安德烈。这样一共六个。其中年龄最小的是斯穆尔内依·尼古拉，大约十三岁。他们干什么总在一块儿。现在，这几个孩子看到恶魔和德国人在一起搜查他们的学校和阿列斯·伊万诺维奇以后，就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莫洛兹的教育起作用了。但究竟是些孩子，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又没有武器，几乎是赤手空拳。他们的傻劲和勇敢要多少有多少，要问他们的聪明和才智，当然是不那么够用的。

“事情的结局如何，不说也清楚！”

“米克拉谢维奇告诉我，他们在莫洛兹禁止触动恶魔以后，稍微老实安静了几天，紧接着就背着老师偷偷地干起自己的事来。他们长时间的考虑、观察，最后制定了这样的计划。

“我好象已经说过，这个恶魔住在他父亲那个村庄，跟谢尔佐隔一片田野。几乎是一年到头习惯在镇上鬼混，有时也回家——少不了酗酒闹事，玩弄姑娘。一个人他很少回家，多数情况是带几个跟他一样的叛徒，有时甚至还有他的

德国主子。那时候这一带还安静。后来，从四二年夏季起，这地方闹腾开了，德国人也就不敢那样在村里露面了。可是头一个冬天，他们横行霸道，肆无忌惮。那时候，恶魔还常回家在庄上过夜，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赶回区里。或者骑马，或者驾雪橇，有时还坐汽车——如果他跟德国主子在一起。有一次，孩子们找到了好时机。

“一切都突如其来，组织得太不好了。到底是孩子！没有经验。又哪来的经验呢？只有强烈的复仇愿望。

“记得那是春天，田野里已经冰消雪化，只是森林里的沟沟洼洼还留着泥土斑斑的积雪。沟壑和耕地，潮湿而泥泞，奔流的溪水又粗又混，但道路已经比较干了，清晨有时还结点冰。我们这支队伍略有扩大，有五十来人了。军人和本地人各占一半。我当了政委。原先是普通战士，突然一下子当了首长，操心的事儿就增加了不老少。但毕竟是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肯使劲，一天只睡四个小时。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已经估计到，春天就要闹腾开。可现在武器少，不够所有的人分配。我们想方设法，到处搞武器。记得常常派人，甚至到一百公里外的国境线搞武器。有一次听人说：去年夏天，我们的人撤退时，在夏拉河渡口沉没了两辆载军火的卡车。谢列兹涅夫信以为真，一下子来劲了，决定去打捞。他组成十五人的小分队，配备了两套军用四轮大车，亲自担任指挥——他在营地呆厌了，把我留下主持工作。我是第一次当第一号首长，这一夜通宵没有睡，两次检查设在林间小路上和远处一个板桥附近的岗哨。早晨，刚在洞里打盹，

就有人叫了，我好不容易才从针叶树枝做的床铺上爬起来，看到维丘尼在讲什么——他是我们的游击队员，瘦长个儿，萨拉托夫地方人。我似醒非醒，怎么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终于明白了，哨兵扣留了一个外来人。我问：‘是什么人？’他回答说：‘鬼晓得！他打听您。一个瘸子。’

“一听到这，说实在的，我不安起来。我立刻感到：是莫洛兹，就是说，出了什么事。不知为什么首先想到谢列兹涅夫小分队，看来小分队的情况不妙，莫洛兹是为了这个跑来的。但为啥要自己来呢？为啥不派个孩子呢？当然这只是脑子不清醒时的想法，其实莫洛兹与谢列兹涅夫小分队怎么也不能扯在一块儿，小分队甚至没有去那个方向。

“我起来穿上靴子，说：‘带到这儿来。’一点不错，带进来的正是莫洛兹。他身穿一件羊皮袄，头上戴一顶暖和的棉帽，但几乎是光着脚，穿一双单鞋，而且裤腿湿到膝盖。我怎么也想不出发生了什么事，但事情肯定不妙，这是我已经清楚感觉到的，莫洛兹蓬头垢面的狼狈相，再加上他突然出现在他从未来过的这个营地，就是明证。在这样的路上（确切地说，根本没有什么路）蹊了十二公里，可不是闹着玩的！

“莫洛兹站了一会儿，在板铺上坐下来。他看了看维丘尼，意思是：他碍事吗？我打了个手势，小伙子带上门出去了。莫洛兹象死了亲娘似的悲伤地说：‘孩子们被抓走了。’我起先不明白：‘什么孩子？’他说：‘我那些孩子，今天夜里抓走的。我自己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一个警察事先告诉了我。’

“老实说，这比我估计的情况要好。我当时以为发生了比这可怕得多的事。原来只是几个孩子！他那些孩子能干出什么来！可能他们说了什么话，也可能骂了谁？给他们每人十棍也就放了。这种事过去常有。由于他这几个孩子的被捕而发生的一切，我当时并没有料到。

“莫洛兹略微平静了些，呼吸也稍缓和点了，他点燃了一支烟（过去好象不抽烟），一点一点说起来。

“事情一步步清楚了。

“波罗奇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想法：恶魔被孩子们暗中盯上了。几天前，这个警察领着德国司务长，一个德国兵和两名伪警察，坐一辆德国汽车，驶进父亲住的庄子，象往常那样，又在庄上过夜了。在这以前，他们还顺路去了一趟谢尔佐，抢走了费多尔·波罗夫斯基和聋子捷尼斯奇克的几头猪，挨门挨户地抢了十几只鸡，打算在第二天到区里去。孩子们把这一切都看到了，侦察到了。天一黑，他们穿过菜园，向大路奔去。这条路上，如果你记得，在它跟公路交叉处附近有一个小桥横跨沟壑。桥虽小，但高，距水面约两米，虽说水至多有膝盖深。过小桥前先要经过一个下坡，有点陡，然后是上坡，所以汽车和大车不得不快速往前冲，否则就上不去。这些顽皮的孩子把一切都算计好了。这可是他们的拿手，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密。

“就这样，天一黑，他们六个带着斧和锯——来到小桥。显然，他们费力地干了一阵，总算把桥柱锯断一半，没有全锯断，锯到只能过一个人或一匹马的程度，但汽车开不过

去。那辆汽车已经是不可能开过这座小桥了。一切干得很顺利，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他们高高兴兴离开了沟壑。德国人的汽车轮子就要往空中飞了，在这样的時候，怎么能通通回家睡觉呢？所以波罗奇契和尼古拉俩留下来守候这个美好的时刻。他们在灌木丛深处选了个地方埋伏下来。其余四个人给打发回家了。

“总之，事情按预先安排的发生，只出了一点小岔子。但显然正是这个小岔子毁了孩子们。首先，恶魔那一天回区晚了，醉后睡过了站。天亮了，村里人都起来忙日常的家務了。米克拉谢维奇后来告诉我，他们在家里一夜没合眼，越来越不安，为什么那两个了望哨还不回来呢？原来他们这时正在耐心等待那辆迟迟不来的汽车哩！清晨，突然一辆四轮马车（而不是汽车）在大道上出现了。叶甫明叔叔大放宽心地正赶着大车拉柴禾来了，波罗奇契只好从埋伏的地方爬出来，迎上去说：‘别过桥，桥下有地雷。’叶甫明吓了一跳，哪儿还顾得上什么地雷，从旁边绕道过去了。

“大概在十点钟时，大道上终于出现了汽车。但偏偏路不好走，坑坑洼洼，有的还是水坑，根本谈不上速度，汽车静静地在那儿爬行，左右颠簸。甚至过沟壑之前也没有加速，车缓慢地爬着下了坡。到了桥上，司机开始改变车速，这才压折了一根横木。汽车往下掉，侧身坠落到桥下。后来知道，车上的人连同猪和鸡，只是一般地掉进水里，接着一个个活蹦乱跳，从水里站起来，只有靠司机坐的那个德国鬼子不走运，正好掉在车帮下，被车身压上了。从车下拖出来

时，已经死了。

“那两个孩子看见事情成功了，欣喜若狂，顺着灌木丛一溜烟跑进了村。由于太高兴，他们误以为德国鬼子和伪警察全都完蛋了，汽车也完蛋了。他们万没料到，恶魔那一伙一下子从水里爬起来，开始抬车，同时有个家伙发现灌木丛中闪过一个人影，一个半大小子。再没有发现别的，可这一点也就够了。

“在村里，任何消息传得特别快。个把钟头以后，大家都知道沟壑的小桥那儿发生的事。恶魔跑回村里找马车拉德国人尸体。莫洛兹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到学校，派人去找波罗奇契，但他不在家。小保尔·米克拉谢维奇看到老师那样着急，忍不住把全部实情告诉了他。

“莫洛兹如坐针毡，但还是上了课，只是晚开始了一会儿。上学的孩子们一个个地都来了，只有波罗奇契没有到；虽然那时波罗奇契已经不参加学习，但还常来学校。莫洛兹总是一会儿就望一望窗外——据他后来说，那天的课都是站在窗户旁边上的，为的是街上出现外人时能看见。可什么人也未出现。下课后，老师第二次派人去找波罗奇契，自己等着。据他自己后来承认，他当时真可说是心乱如麻。显然，孩子们对于这次行动本身多少寻思过。但事情成功后怎么办？他们根本没有去想。而他这个老师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当然知道，德国人是不善罢甘休的，一定会大闹一场的。不仅孩子们，连他自己也可能被怀疑上。但村里有三十来个男人，心想，肇事人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假

使他事先就知道这些调皮蛋打算干什么，那一定已经想出点什么招儿了。可现在这一切突如其来，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连危险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再说谁第一个危险呢？首先应该见到波罗奇契，他终归大一些，聪明一些。还有，他是邻村的，也许可以把孩子们送到他那里躲避一个时候。或者相反，首先得让他自己在一个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当他那夜在老太太家等候派去的人和波罗奇契的时候，他做过各种各样的考虑，但一筹莫展。大约在半夜什么时候，他听见敲门声。但不是孩子敲的——这是他立刻听出来的。他开门一看，惊呆了。门口站的正是我上面说过的那个伪警察拉甫切尼亚。但不知为什么只他一个。莫洛兹还没来得及反应，警察冲向他开了腔：‘赶紧逃吧，老师，孩子们抓走了，现在正来抓你。’说完转身就走。莫洛兹说，开始他怀疑这里头有鬼。但又不象。拉甫切尼亚的神态和语气只能叫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于是莫洛兹抓起帽子和短皮袄，还有他那根拐杖，急步穿过菜园，进了牧场后面的小树林。他在一棵云杉树下熬过了一夜，但凌晨他挺不住了，去一个他相信的大叔家敲了门，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叔一见，吓得发颤，说：‘快逃吧！阿列斯·伊万诺维奇，他们把整个村子都翻了个个儿，正在抓你呢！’‘孩子们呢？’‘都给抓走了，关在村长的仓库里，只剩你了。’

“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已经一清二楚。原来，波罗奇契早就被这个恶魔怀疑上了，更何况有个伪警察在河沟里看

见了。虽然没有认出是谁，但的确看见一个少年跑了，——一个孩子，不是大人。大概他们在区里碰了一下头，想起了波罗奇契，便决定逮捕他。夜里他们乘车来到他家门口，这傻小子正在穿鞋要走。原来他在森林里转了一整天。天黑时又累又饿，所以也就回来了。在外头他先问过一个人，听那人说：一切平安，没有事。小伙子确实是聪明、果敢，就是太冒失。大概他以为，事情干得人不知鬼不觉，不会抓他。傍晚正好斯穆尔内依跑来了，说是阿列斯·伊万诺维奇叫他去，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这两个孩子刚刚要动身，一辆汽车到了。两人就这样被抓了。

“抓来了两个，就不难抓其他几个。人们有时只会这样去想：既然谁也没有看见过什么，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办案人又怎么能查出作案人呢？如果按什么法律条文办事，事情也许真不那么简单。只是德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管什么法律。恶魔和他同伙想问题的方法与我们不同。既然有地方发生了危害德国人的事，他们就根据可能性进行推断：谁可能这样干。结论是：某某或某某。于是就把这两个某某连同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块儿抓起来。硬说他们是一伙。你知道，这班坏蛋很少搞错。真是这样。即使错了，他们也不纠正，也不把人放回。不管有罪的无罪的——都受到迫害。

“至今还没有搞得十分清楚的是：拉甫切尼亚怎么能给莫洛兹报信。大概起先他们并没有打算逮捕老师，这是根据情况临时决定的。大概恶魔懂得：孩子们后面，一定有老

师在指使。就这样，我们曾经认为是坏蛋的拉甫切尼亚抓住时机，确切地说，抓住十来分钟，跑来报信，救了莫洛兹。

“事情就是这样。

“谢列兹涅夫第二天回到了驻营地，运来了两箱受潮的手榴弹。收获不大，队员们都累了，队长心情很坏。关于莫洛兹，我如此这般说了，问他怎么办？看来应该让这个教师加入游击队，总不能叫他完蛋吧！我这样说，可谢列兹涅夫不作声。当然，他当不了好队员，但有什么法！谢列兹涅夫少校想了一会儿，然后命令发给莫洛兹那根黑枪托、没有准星的枪（这支报废的枪谁都不想要），把他编进普罗柯偏柯排当战士。我们把这告诉了莫洛兹，他听了无动于衷，但接了枪。他垂头丧气，象是掉了魂似的。枪对他也丝毫没起作用。通常，给谁发武器，他会活蹦乱跳，高兴得几乎象小孩。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发武器就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节日。莫洛兹可完全不这样。枪跟他已经两天了，可是连背带都不系，总是两只手拿着。象根本棍。

“这样又过了两三天。记得小伙子们正在我们临时驻地边沿云杉林里挖第三个窑洞。春天以后人增多了，住两个窑洞有些挤。我坐在窑顶，跟人谈着话，担任营房值日兵的一个游击队员跑来，说：‘队长叫你。’‘什么事？’——我问，他说：‘乌利扬娜来了。’这个乌利扬娜是我们在林边哨所的联络员，是位好姑娘，勇敢，斗争性强，嘴巴别提有多厉害了，舌头象把锋利的刀。不论小伙子们怎样讨好她，她对谁也不客气。她这把刀谁都砍，真够你受的了。后来，四二年

夏天，她和玛利亚·卡祖赫娜炸镇上的警备大队部，可惜没成功，只差一点儿。炸药都放好了，但被一个混蛋发现告了密。敌人排除了炸药，骑马追上乌利扬娜，把她抓住枪毙了，而卡祖赫娜不知怎么脱了险，在敌人封锁的那段时候负过伤，在沼泽地里熬了很长时间。现在她在格罗德诺工作。不久前她给儿子办了婚事，娶了儿媳妇。我也应邀参加了，这当然……

“就这样，乌利扬娜跑来了。我听了后，立刻知道事情不妙。因为她是绝对不允许来这儿的。有什么事，得通过别的联络员转达，一周两三次。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时候，才允许她本人来。所以，大概到了十分紧急的时候，否则她是不会来的。

“我于是直奔队长的窑洞，下台阶时就听到里面谈话很紧张，确切地说，是在那里大吵大嚷。谢列兹涅夫破口大骂，乌利扬娜也不示弱：‘人家对我说了，我能不管？’‘你可以等星期二把情况转来嘛！’‘不到星期二他们的脑袋就都搬家了。’‘可我有什么法？我能把他们的脑袋再安上！’‘你不想想，你是队长！’‘我是队长，但不是上帝。可你把驻地给我暴露了。现在我不能放你回去。’‘不放就不放，活见鬼！我在这里更好。’

“我走进窑洞，他们俩都不作声了。他们坐着，谁也不看谁。我尽量把话问得温和些：‘出了什么事，乌利扬娜？’‘出了什么事？他们要求交出莫洛兹。他们说，要不就把孩子们绞死。他们就是要莫洛兹。’‘你们听见没有？’——队

长大声说：“她就为这个跑来的。莫洛兹才不会去哩！有这样的傻瓜吗？”乌利扬娜不吭声，她已经嚷嚷够了，大概不想再嚷了。她坐着，用手在下巴底下整理白头巾。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可怜的莫洛兹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确切些说，是六块石头。又将够他受的了。当然，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打发他回村的想法，我们哪能蠢到这个地步！显然，孩子不会放，莫洛兹自己也会被干掉。这一套花招我们领教过。谢天谢地，我们在德国人统治下好歹已经九个月了！见的多了。

“这时乌利扬娜却说：‘我的心又不是铁打的呀！塔吉亚娜大婶和格鲁莎大婶夜间跑来——她们心急火燎的，痛苦极了。这还用说，母亲的心啊！她们苦苦哀求：‘乌利扬娜，好闺女，帮帮忙吧！你有办法。’我对她们解释：‘我有什么办法！我找谁去？’可她们说：‘去一趟吧，你知道阿列斯·伊万诺维奇的地方，让他救救孩子吧。他办法多，又是孩子老师。’我还是反复说：‘我怎么知道那个阿列斯·伊万诺维奇在哪里。也许躲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上哪儿找他？’‘小宝贝，还是去吧，你和游击队有来往。要不明天他们就把孩子带到镇上去了，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你说，我不来，还有什么别的招？’

“是的，情况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直截了当地说，发展到了很坏的地步。谢列兹涅夫在发了一阵火、大嚷了一通之后不吭声了。我也不吭声。怎么办呢？孩子们看来已经弄不回来了。事实就是这样。可当母亲的该多难受！她们总还要活

下去啊！莫洛兹也这样。我和谢列兹涅夫象木头似的，一言不发。乌利扬娜站起来，说：‘随你们决定吧，我走了。谁送我一下。来时在板桥附近你们的一个宝贝差点没把我打死。’

“当然应该送啦。乌利扬娜往外走，我跟在后面。我刚钻出窑洞，和莫洛兹碰了个照面。他站在门口，拿着那支没有准星的步枪，脸色阴沉难看。我看了他一眼，立刻明白：他全听见了。我说：‘你去队长那儿，有事情。’莫洛兹进了窑洞，我领着乌利扬娜走开了。从我找了个人给她当向导、给向导交待好了任务到跟乌利扬娜告别，这中间最多有二十来分钟。我回到窑洞，看见队长象只老虎，从这角窜到那角。军衣敞开，眼睛冒火。他对着莫洛兹大喊大叫：‘你疯了！笨蛋，神经病，白痴！’而莫洛兹站在门口，丧魂落魄似地耷拉着脑袋。他甚至好象没有听见队长的喊叫。

“我坐在铺板上，等他们向我解释是怎么回事。可他们根本就不理睬我。谢列兹涅夫还一个劲儿发火，吓唬莫洛兹，说要枪毙他。我想，既然事情到了要枪毙人的地步，可见很严重了。

“事情也真的弄到僵局的地步。队长大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以后，对我说：‘你听到了吗？他想回村里去！’‘干什么？’‘这个你问他。’我看着莫洛兹，他只是唉声叹气。这时我也火了。只有十足的糊涂虫，才会相信德国人会把孩子放出来。所以，上那儿——就是糊里糊涂自杀。我这样想，也这样对莫洛兹说了。莫洛兹听完，突然很平静地回答说：‘你的话对。但我还是应该去。’

“这下我们俩都气坏了！这不是胡闹！队长说：‘你要这样，我就关你的禁闭，不许出窑洞。’我也说：‘你说话得动脑筋。’莫洛兹不吱声，低着头，坐着不动。看来，这事有必要我和队长俩一起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好。于是，谢列兹涅夫有气无力地说：‘好吧，去想想吧。一个小时后，我们继续谈。’

“莫洛兹也就站起身来，一颠一瘸地走出窑洞。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谢列兹涅夫坐在墙犄角生气，咬牙切齿地对着我，象是说：‘这就是你的干部！’干部的确是我的，不过我觉得事情跟我毫无关系。他莫洛兹有他自己一套原则。尽管我是政委，可是他并不比我蠢。我拿他有什么法呢！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谢列兹涅夫还是语气严厉地说话了，对他的这种严厉我还是没有完全习惯。他说：‘你和他谈谈，要他抛掉这个糊涂想法，否则我要把他撵到夏拉河，喝几口冰水，也许会变得聪明点。’我想，也好。应该和他谈一谈，尽力说服他放弃这个糊涂念头。当然，我明白：孩子们太可怜了，母亲们也太可怜了。但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啊！队伍的力量还不大，武器少，弹药的情况又糟糕，而周围各村又都驻有德国人和伪警察。怎么敢去乱闯呢！

“我真想跟他谈谈，说服他一定不要去谢尔佐‘投案’。但没有谈，我把这耽误了。也许是累，也许经过刚才的谈话之后根本就打不起精神去马上这样做。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也就顾不上莫洛兹了。

“我们坐在那里沉思着，突然听见离我们不远处，也

就是第一个窑洞附近人声嘈杂。一个人从我们窗户跟前跑过。我侧耳细听——是布罗涅维奇的声音。可他早晨才和彼库舍夫中士一块去某个村庄，执行同那里建立联系的任务。计划三天回来，怎么今晚就回来了。队长感觉事情不妙，第一个跨出窑洞，我跟了出去。眼前见到的场面太惨了！这个布罗涅维奇坐在窑前，他身边躺着彼库舍夫，一看就知道是死了。布罗涅维奇的衣服被撕得稀烂，全身是汗，齐腰以下湿淋淋的，一双手全被血染红了，他结结巴巴地对我们讲。原来，事情糟糕透了。在一个村庄附近突然出现了警察，他们扫射了一通，把彼库舍夫中士打死了。他是个好小伙，边防军来的。幸好布罗涅维奇脱了险，把尸体拖了回来。他自己肩头上，棉背心被打了个窟窿。

“我记得，这是我们队里第一次伤亡。大家别提有多难过了。简直被悲痛压倒了。不管是部队来的还是本地人都这样。确实是个好小伙儿：性情温和，勇敢，肯干。他常把母亲在战前来的信，拿出来一封一封地读着。他母亲住在莫斯科附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真不该这样死！

“有什么法呢？我们只好着手安排葬礼。离驻地不远，在一条山河旁突起的陡坡上头挖了一个坟坑——挖在松树下的沙地里；棺材当然没有，坑里铺一层软的松树枝。小伙子们在那儿干这些的时候，我在费力地写发言稿。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面前讲话啊！第二天我们六十二个人站好队，把彼库舍夫放在坟坑旁，给他穿上谁的一件新军衣，蓝裤子，甚至领章也缝上了三角星，一边三颗，一切都照部队的

规定办。然后，我、队长和他的一位边防军战友讲了话。有几个人还流了眼泪。总之，这是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动感情的葬礼。以后常常埋人，而且一次不只一个，有时是十个人埋在一个坑里。甚至不挖坑——盖上一层树叶或树藤了事。例如敌人封锁时期就这样，就连队长本人也安葬得很简单——仅仅只挖了一个齐膝盖深的坑，再没有别的。动感情的程度赶不上埋葬彼库舍夫那次的十分之一。都习惯了。

“就这样，我们安葬了彼库舍夫。我的这次讲话很成功，对这点我是满意的。我们并排走回窑洞的时候，甚至谢列兹涅夫也比较友好地跟我谈了一会儿话，一改他平时惯用的那种严厉劲。我们刚打算下窑洞，普罗柯偏柯急急忙忙跑来，说：莫洛兹没了。从夜里就没了。等等。‘怎么从夜里就没了？’谢列兹涅夫提高了嗓门：‘为什么不立刻报告！’普罗柯偏柯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我们以为他丢不了。以为他找政委去了。再不就是上河边去了。近来他总喜欢坐在河边，孤孤单单一个人。

“这下我们心里全都凉了。

“谢列兹涅夫冲着普罗柯偏柯，把他骂人的本事全使上了。骂人他是很有本事的。后来他又怒气冲冲地对着我。最难听的话都骂了。我没吭声。大概我罪有应得吧。我们进了窑洞。谢列兹涅夫命令把参谋长库兹涅佐夫中尉（这人性情温和、办事能干、是正规军人）和几个分队长叫来。大家到齐了，因为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静静地等着少校

说话。少校想了好一阵，才说：‘转移驻营地。他们一定会逼这个瘸腿傻瓜出卖我们大家，他本人尽管不想这样做。敌人会把我们象沙鸡一样杀掉的。’

“我看见小伙子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愿意转移——这儿太合适了：安静，不靠公路，还是个吉祥之地。整个冬天没发生一次意外。可现在只是由于一个瘸腿傻瓜就要……这个莫洛兹在他们眼里是什么人，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在发生这一切之后，当然只能是瘸腿的傻瓜了，绝不会是别的。但我比在场的所有人更了解这个瘸子。他会把自己害了，这是肯定的。但他不会出卖任何人，也不可能出卖驻营地。我不知道怎样证实这点，但坚信：他绝不会出卖。大家都已经要按少校的意见做了，这时我说：‘用不着转移。’谢列兹涅夫冲着我这个第二号傻瓜，声色俱厉地问：‘怎么用不着呢？你敢保证？’——我说：‘我敢保证，用不着转移。’

“开始一片沉静，大家都不说话，只有谢列兹涅夫喘着粗气，皱起他那对浓眉，不时地瞅着我。可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需要从头讲这个瘸腿老师的为人吗？我觉得，此时此刻我有许多话说不出来，甚至也不需要说许多话。我只是坚持：驻营地不应该转移。

“我不知道，谢列兹涅夫和其他人当时是怎样想的——是相信我的空口保证呢？还是实在舍不得突然离开这个住惯了的地方？谁知道要转到哪儿去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打算冒一下险，等一个星期再看。我们当然决定在村

庄的方向和峡谷的林间小道附近加派两个巡逻队。又派古萨克到谢尔佐去(那里住着他一个亲戚,可靠,是自己人),密切注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就是从这个古萨克以及镇上我们自己人那里,后来还从小保尔·米克拉谢维奇那里,我们了解到谢尔佐村的事态后来是怎样发展的。”

布基洛维奇村已经到了。村边上那间农舍的板墙里面挂着一盏电灯,灯光照着院子的小门和门口一条长凳,照着屋前花圃里一丛丛光秃秃的树枝。一排小木棚后边,黑暗中闪耀着一小点深红色的篝火,烟味随风飘来——大概在烧树叶。我们的车老板把车一拐,赶到路边,显然打算进院子了;马好象明白他的意思,自动停下来。特卡丘克的故事突然终止,他疑惑莫解地问:“怎么,已经到了?”

“对,到了。我就在这里卸套。你们还得走一会儿,车站在邮局跟前。”

“知道。我常来这儿。”特卡丘克说着,从车上爬下来。我也跳下来,正好跳在柏油路边的一个缺口上。“老大爷,谢谢您把我们送到这儿。”

“没什么。马是集体农庄的。所以说……”

大车拐进了院子,我们在坐了这一阵不舒服的车以后,又慢慢地拖着步子,在这条村镇的街道上走起来。这根电线杆上昏暗的路灯照不到下一根,街道亮一段,黑一片,亮

处和黑处交替出现。所以，我们一会儿走进光明，一会儿又堕入黑暗。我等着特卡丘克继续讲谢尔佐的故事，但他默默地踏着步子，显得一瘸一瘸的，我实在不忍心催他。在前边什么地方柴油机突突地响了，我们靠边给一辆急驶而过的胶轮拖拉机让了路，它仅有的一盏车灯，刚刚能照到路面。拖拉机过去以后，前面看见挂有农村茶馆招牌的白砖房，门廊亮堂堂的。从茶馆的玻璃门里不慌不忙地走出两个人，在紧靠路边停放的“吉耳”牌汽车旁边停下来点烟。特卡丘克若有所思地向那边看了一眼。

“或许，我们进去一下？”

“进就进吧。”我顺从地同意了。

我们绕过“吉耳”牌汽车，拐进了一个铺着砾石的小院子。

“从前这里是个肮脏的破酒馆，而今盖起了那么一座大楼房。这酒馆我一次没来过，我不骗你。”当我们大步走上水泥台阶的时候，他抱歉似地向我解释。

我没有答话——实在没有必要解释！这种不体面的事，我们谁没有干过？

茶厅不大，除了角落里有三个男人无拘无束地端坐在炉边的一张小桌旁，几乎是空空如也。其余六张小餐桌和转椅也都闲着。一个穿着蓝色尼龙短上衣的女人隔着柜台和女服务员小声交谈。

“你先坐，我就来，”特卡丘克边走边对我点了一下头。

“不，还是您坐。我比您年轻。”

他没有再谦让，就在就近的位置上坐下来，但提醒我说：“一人一百克就够了。要有啤酒，是不是也来点？”

遗憾，这里没有啤酒，也没有伏特加酒，只有“蜜沁液”，我买了一瓶。服务员建议我买点肉饼，做下酒的菜，说是刚运来的新鲜肉饼。

我也想到了，这样的请客未必能使特卡丘克高兴。果然，我还没来得及把所有这些端到桌上，他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没买到白酒？我受不了这种墨水。”

“有什么法呢？有什么就只好买什么了。”

“倒也是啊……”

我们默默地喝完了一杯“墨水”，瓶里还剩下一些，特卡丘克没有吃肉饼，而是抽我皱皱巴巴的烟盒里的烟。

“白酒当然醉人，但味道好。比如说，‘首都’牌就这样。家酿的粮食酒就更好了。特别是好手酿的。嘿！以前确实有人会酿这种酒。味道可香呢，不象现在这些化学玩艺儿。我可以告诉你，有劲，劲可大了！”

“你喜欢？”

“这是过去的事啦！”他抬起发红的眼睛看着我说：“在年岁比较轻的时候。”

我不忍心细问他“过去的事”，而是急不可待地等他继续讲述谢尔佐多年前发生的故事。可他对此好象已经失去任何兴趣，他吸着烟，透过烟雾向屋角方向瞟过去。那三个喝得够多了的男人在那里大吵大嚷，全茶馆都惊动了。他

们在吵架，其中那个穿棉袄的人使劲推了一下桌子，杯盘差一点没从桌子上飞掉。

“喝多了。那个秃顶的人，我多少了解一点。酒精厂会计，打游击时在布特立莫维奇那里当过排长，还是挺不错的排长。可现在，你瞧！”

“这不奇怪。”

“当然不奇怪罗。战争中他立了功，荣获三枚勋章，头脑也就发胀了。骄傲了！结果出了事，坐了三年牢，但还是不消停。另外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是靠立战功，而是靠耍滑头，蔫悄悄地、一步一步地上去了。他们蹦到前面去了。就是这么回事！怎么，要求把小伙子的事讲完？你怎么不说呢？……多好的小伙子啊！你知道，我愈是上了年纪，就愈是感到他们可爱。你知道这总是会有原因吧？”

他笨重地将胳膊肘支在我们那张摇晃的桌子上，深深地吸了口烟。忧郁的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情，眼光失神地凝视着。特卡丘克把话停住了，在默默沉思的此时此刻，他的心弦重又弹起今天一直回响在心里的忧伤的曲调。

“我们现在英雄有多少？你会说，我问得奇怪。对，是奇怪，谁去计算这个！可是你去看看报纸，报纸多么喜欢重复写那几个人！如果这个战斗英雄至今还处在显要地位，就更是这样了。要是牺牲了呢？既无传记，又无照片。材料也是象兔子尾巴——短得可怜，而且未经核实，甚或杂乱无章，自相矛盾。这可得谨慎小心了，离得远些，避免犯错误。你们当记者的不就是这样吗？……比方说，我就不明白：为

什么那些至今还活着的或者已经牺牲了的英雄人物要由少先队员去调查发现呢？要是由各方面的人去搞就好了——这里也包括少先队员，不过跟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这竟成了少先队分内的工作。难道因为孩子们比所有的人都更了解战争？或者因为他们比别人胆大些，因而比较敢敲这些显要的叔叔们的大门呢？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成年的叔叔不去想法把不知名的英雄找出来呢？为什么他们撒手不管这件事呢？军事委员部哪里去了？档案库又干什么了？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事交给娃娃们？……

“对了。谢尔佐村的情况恶化了。孩子们被关进博汗村长的仓库。当时是有这么个人，他小屋在一棵干枯的柳树旁，现在这个人没有了。我告诉你，这老头够鬼的，既给德国人干事，又跟我们的人来往。你也知道，这样干通常会有什么下场，德国人开始有所觉察，把他叫到区上，就再也没有放回来。据说，关进了集中营，在一个什么地方死了。就这样，小伙子们被关在仓库里，德国人天天把他们拖到一间小屋审问、拷打、折磨。同时，他们等莫洛兹来投案自首。他们在村里四处放风，说苏维埃当局就是这样：让别人替他们打仗，把孩子们当牺牲品。孩子们的母亲哭哭啼啼，闯进村长的院子，求爷爷告奶奶的。然而，警察撵她们。斯穆尔内依·尼古拉的母亲嗓门最大，因为气得朝德国人吐了口唾沫，也被抓了，其他母亲也受到被抓的威胁。不用说，孩子们表现刚强，坚持一种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干。但在这帮刽子手那里能坚持久吗？敌人动刑了。

波罗奇契第一个被拷打得顶不住了，说：‘是我锯的，为了消灭你们这帮坏蛋。现在枪毙我吧，我不怕你们。’

“他承担了全部责任，也许他以为，这样他们就会马上放过其他人。然而这帮狗奴才也并非十足的傻瓜，他们懂得：‘有人走，就有人跟。’硬说他们是一伙。于是又开始拷打，逼他们供出新材料和莫洛兹的情况。他们特别想问出莫洛兹的情况。可是关于莫洛兹，孩子们又能说出什么？”

“正在这时候，正在孩子们受严刑拷打的危急时刻，莫洛兹本人来投案自首了。”

“后来听人讲，事情发生在大清早。村里人还在睡觉，牧场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天不怎么冷，只是因为露水空气显得有点潮湿。阿列斯·伊万诺维奇来了，八成是穿过菜园，因为在街头最靠边的那间小屋旁埋伏有人，可他们没有发现莫洛兹，他一定是爬篱笆过来的，就这样他进了村长的院子。那里当然也设警戒，警察大喝一声：‘站住，不准往前！’说时端起了枪。但莫洛兹已经什么也不怕了，径直朝卫兵走去，只是有点颤。他十分平静地说：‘请你去报告长官，我就是莫洛兹。’

“一群德国警察马上跑过来，反绑莫洛兹的胳膊，扒下了他的羊皮袄，把他带进村长住的屋里，这时博汗抓了个机会对他说：‘老师，你不该来。’为了不让警察听见，老头儿说得很轻。可是莫洛兹只回答一个字：‘该！’就再也没说什么。

“一场‘无头公案’就这样发生了，它给我们讲的悲剧添上了一场十分糊涂的结局。我认为，正是由于它，莫洛兹被

冤枉了这么多年，米克拉谢维奇也才费了这么大力。事情是这样的：四四年德国鬼子终于被赶走了，区上和格罗德诺市留下了一些档案：警察局、纳粹德国秘警局、法西斯军事特务机关的公文材料。这些材料当然经过有关人员的研究和整理。就在各种各样的记录、指示当中发现了一页材料是关于阿列斯·伊万诺维奇的。我亲眼看见：那是从小学生方格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一页普通纸，写的白俄罗斯文。它是警察官哥古恩·费多尔，也就是那个恶魔给上级打的报告。上面写：四二年四月某日，一支警察分队由他带领，在执行剿匪任务时抓住了当地游击队的首领莫洛兹。这一切纯属捏造。但恶魔需要这样做，他的上级也需要这样做。报告还说：他们逮捕了孩子，过了三天又抓到了那个土匪头——这是警察局长吹牛的资本。谁还去怀疑报告的真实性！

“不管有多怪，我们无意之中成了恶魔的这个无耻谎言的证实人。四二年夏天，那时我们已经投入紧张的战斗，伤亡的人数不少，有一次上级要求向旅部报告春冬两季的减员情况。库兹涅佐夫编制了一张报表，送给我和谢列兹涅夫签字，问：‘莫洛兹怎么填？是不是干脆就不填了？他在游击队总共才呆了两天！’我当然不同意，说：‘怎么能不填呢？你能说他是躺在热被窝里死的！’我记得，谢列兹涅夫皱起了眉头，他不愿回忆莫洛兹出的这件事。他想了一下，对库兹涅佐夫说：‘何必废话！你就写他被俘，往后就不是咱们的事了。’就这样填上了。说实在的，我当时没有再吱声。事实上我又能说什么呢？能说是他自愿去敌人那里

的？这样说，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这样，除了德国人的那份材料外，又添了我们这份材料。以后有谁能推翻这两份材料呢？感谢这个米克拉谢维奇。他到底把事情真相搞清了。

“谢尔佐村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匪徒们’都抓全了，‘土匪头子’也已归案，可以送警察局了。傍晚，他们把这七个人拖出仓库，除波罗奇契以外，他们也都还勉强能走。波罗奇契被打得不省人事，由两个警察架着。其余的人两个一排，被押上公路。这场悲剧要结束了。下面的情节是米克拉谢维奇亲口对我讲的。

“小伙子们在仓库听见门外阿列斯·伊万诺维奇的声音时，心里就凉了。断定老师也被抓来了。顺便说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以为老师没有走脱才落到德国人手里。关于自己的情况，莫洛兹什么也没有向他们讲，只是给他们鼓劲打气。当然他自己也尽量显得精神点。他说：‘人生和永恒没法比。十五岁也好，六十岁也好，对永恒来说，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还说，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生、老、病、死在这个谢尔佐，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的生存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点印象。可是人们将记得我们，而光是这点就应该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奖赏——世上所有奖赏中最高的奖赏。’

“这些话大概并没有使孩子们感到太大的安慰，但是，有老师——他们终生的老师阿列斯·伊万诺维奇在一起——这多少减轻孩子们受到的痛苦。但为了救老师，他们当

然可以把一切豁出来。

“据说，当 they 被押到街上以后，全村人都跑来了。警察开始撵人群。柯仁家那对双胞胎的老大依万挤到前面，对一个德国人说：‘岂有此理！你们不是说，莫洛兹来就放孩子吗？现在该放了吧。’德国兵用手枪敲他嘴巴，依万用脚踢他肚子。德国兵开了枪，依万一下子倒在地上，缩成了一团。当时的场面啊！喊声、哭声、咒骂声，连成一片。可他们才不管这个哩！还是把孩子们带走了。

“他们正好走那条有小桥的公路，小桥还没太修好，步行还可以过，但马车就不行了。我上面说过，他们两个两个一排：前面是莫洛兹和小保尔，接着是双生子柯仁兄弟俩——奥斯塔普和吉姆卡，然后是两个同姓的孩子——斯穆尔内依·尼古拉和斯穆尔内依·安德烈。两个警察拖着波罗奇契在后面，警察据说是六、七个，四个德国人。

“他们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许说话。他们大概也不愿意说，他们知道自己被押往刑场——在镇上等待他们的，除了死亡还能有什么？七个人的手都反绑着。四周是童年时就熟悉的田野。大地回春，万树已经发芽。柳树挂满嫩黄的花絮。米克拉谢维奇说，他顿时感到万般哀愁，真想大喊大叫一番。这是很自然的。他们能多活一天也好啊！可现在才活到十四、十六岁，人间的沧海桑田他们究竟经历了多少！

“就这样，他们快到小桥附近的树林子了。莫洛兹原来一路上没有吱声，这时却悄悄地问小保尔：‘你能跑吗？’小保尔开始没明白，看了一眼老师，莫洛兹又说：‘你能跑吗？’

我一喊，你就往灌木丛跑。’小保尔这才明白。他本来是挺能跑的，但这是过去。现在呢，在仓库里三天没吃东西，又加上折磨和拷打，他的这种本事当然要差一点。但阿列斯·伊万诺维奇的话给他带来了希望。小保尔心情激动，据他说，连双腿都发颤了。他觉得莫洛兹好象知道些什么才这样说的。既然老师这样说了，大概可能有救。小保尔开始等待时机了。

“树林子就在面前。路那边就是小树丛和小松树。树林虽然不太密，但还是可以隐蔽的。小保尔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小路，每一个拐弯，每一个树墩。他心情激动极了。据他说，心都紧张得要炸开了。离最近的那些灌木只有二十步了，只有十步了，只有五步了。现在已经到树林子了——这里是一丛丛的赤杨树和云松树。右边是一片开阔的洼地，从这里跑好象要容易些。小保尔恍然大悟，老师指的也许就是这块洼地。这儿路很窄，至多能过一辆大车。两个警察在前面走，另外每边一个，过田野时他们距离稍微远一点，在路沟外面走；可现在就在眼前走，伸手可以够着。他们当然什么都能听见。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莫洛兹没有再说话。他默默地、默默地走着，突然大喊一声：‘就是他，就是他——你们看！’他自己向路左边看去，肩膀和头朝那边一扭，好象他看见了谁。他这一手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他做的那样自然，连小保尔都真朝那边望了一眼。然而也只是望了一眼，马上就象兔子一样，朝相反的右边跳了一步，进了灌木丛，朝洼地跑，他跨越一个个树墩，穿过密密的

丛林往树林深处跑。

“小保尔到底抓到了对自己有利的几秒钟。警察错过了这最最关键的几秒钟，让小保尔进了密林。但三秒钟后有人开了枪，接着又是一枪。两个警察在灌木丛里猛撵过来，枪声紧了。

“可怜的、不幸的小保尔啊！他没有立刻感觉出自己中了弹。他只是奇怪地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背部两肩胛骨之间猛击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在这个关键时候倒下了——这是最使他感到奇怪的。他想：可能是绊倒的。但是，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只好挺直地瘫卧在去年生长起来的马林果丛中的荆棘里。以后的情况虽也有传说，但想必是从警察那里听来的，因为他们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而那些亲眼见到的人根本不可能给我们讲。警察把小保尔拖到路上，他胸前衬衣全被血浸透了，脑袋耷拉着。小保尔没有动弹，看样子已经死了。他们把小保尔拖出来，扔到路上，就去对付莫洛兹。打得阿列斯·伊万诺维奇再也没有起来。但没敢打死，因为需要向上头交活的，所以两个警察把他往镇上拖。他们在路上重新整理好队伍以后，恶魔来到小保尔跟前，一脚把他踢了个脸朝天，一看的确死了。为了更放心些，又用枪托击了一下他的脑袋，这才推进了水沟。

“夜里有人把他收走了。听说是莫洛兹的那个房东老太太收走的，谁知道这个老太太上那儿干什么？黑暗中，她找到了这孩子，把他拖到干地方。她以为已经死了，甚至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划上了十字，一切都按基督教的要求。但突

然听见心脏好象在跳。很轻，只听见一点点，老太太便去村里找邻居独眼龙安东。那人二话没说，就套上马车，把小保尔往他父亲那儿送。这儿我要告诉你，父亲原来还是好样的，别看他曾经用皮带打过儿子。父亲从城里请来医生，又是治疗，又是掩护，千难万难，到底把儿子养好了。把孩子从死亡里救了出来——这是没说的。

“这六个人被带到镇上，在那儿又押了五天。一个个被打得都认不出来了。在星期天，正好是复活节的第一天，被他们绞死了。在邮局旁的电线杆上固定一根横梁——一个很粗的方木，弄成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一头吊三个。开头吊莫洛兹和波罗奇契，然后吊其他人。吊了这头，又吊那头。为了保持平衡。就这样，象根扁担在那里挂了好几天。他们被取下来以后，埋在砖厂后边一块露天的采石场里。到后来，恐怕是在战争结束的四六年，我们的人才把他们迁葬到谢尔佐附近。

“七个人当中只有米克拉谢维奇幸存下来。但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年轻时病，年纪大一些还是病。不仅胸部被子弹穿透，而且还在雪水里躺了好长时间。他得了结核病。几乎每年都到医院治疗，跑遍了各地的疗养院。但疗养院管什么用！既然失去了健康，那么谁也无法让它恢复。最近他好一些，看样子他自己感觉还不错。可突然给擦倒了，这是他没想到的。心脏病！他还在治疗肺病的时候，心脏就不行了。不管他怎样注意，这该死的病在二十年后还是夺去了我们保尔·伊万诺维奇的生命。

“老弟，故事就是这样。”

“是啊，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我说。

“伤心什么！是个英雄的故事！我这样认为。”

“也许是。”

“不是也许，而是一定。难道你不同意？”特卡丘克眼睛死盯着我。

他大声说起话来，涨红的脸，怒气冲冲，就象在谢尔佐筵席上那样。女服务员惊疑的目光，越过手里拿着带烟盒的半导体收音机的两个少年的头顶，望着我们，两个少年也回过头来。特卡丘克发现有人注意自己，便皱起了眉头。

“算了，咱们走吧。”我们走出门口，夜显得更黑，也许是从亮处出来的缘故。耷拉着耳朵的小黄狗用好奇的目光扫射我们的面孔，同时小心翼翼地嗅特卡丘克的半高腰皮鞋。特卡丘克停住脚步，同狗说起话来。声音里带着一种出人意外的善良。

“怎么，你想吃吗？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老弟，还是到别处找吧！”

我同伴一摇一摆、又笨又重地走下台阶，从这种走路的姿势我感到他也许喝过了自己的酒量。我们是不应该进这个茶馆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已经九点半了，公共汽车大概早就过去了。还不知该搭什么车回城呢？但这种担心在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全部思绪重又回到战前的谢尔佐

——我今天偶然接触到的这个村子。

我同伴看样子又生我的气了，走路又不愿跟人一起了，象在谢尔佐林荫道走时那样，他在前面，我默默地跟在后面。我们经过茶馆旁一块有亮的地方，顺着漆黑的、平坦的柏油马路走去。我不知道跟前哪儿有公共汽车站，也不知还有没有希望搭上车。不过现在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有运气就坐车，不然就这样走到城里。已经没有多远了。

但是，我们大概还没有走完街道的一半，后面就开来了一辆汽车。黑暗中特卡丘克宽阔的脊背被远处的车灯照亮了。我俩的影子拖着细长的双腿，映在照亮的柏油马路上，向远处飞跑。汽车迅速驶近，影子又被射向一边，映在篱笆上、路沟里、墙壁上、盖着石板瓦的铁皮房顶上，显出奇怪的曲线。“我们拦车吧？”我向他建议，同时却往街道一边靠。

特卡丘克回过头来，我看见了 he 那张生气的，几乎是伤心的面孔，在电灯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泪花。当然只是一会儿，他就醒悟过来，觉得这样不好，用手揩了一下眼睛。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是我今晚第一次对他产生的感情啊。我这个傻瓜呀，竟误认为事情只在于他多喝了几杯色酒哩！

有那么一瞬间我茫然若失，根本就忘了摆手，汽车一阵风从身边飞驰而过，我们重又坠入黑暗之中。在汽车前灯的光束照射下看得清楚：这是辆“嘎斯”。汽车突然放慢了速度，开到路边停下了。我模糊地感觉到：这是为我们停的。

果然，前面有人唤特卡丘克：“吉莫非·吉托维奇！”

特卡丘克只是嘀咕了几句，并未加快脚步。我却怕错过这个意外的乘车机会，拔腿就跑。从驾驶室里下来一个人，把着敞开的车门说：

“进里边，里边有地方。”

但我没有急于上车，站着等那个从容不迫、大摇大摆向汽车走来的特卡丘克。

“怎么这么晚您还在这里？”车主人对他说。这时我才认出是区教育局长克辛德佐夫。“我还以为您早就到城里了。”“到城里来得及，”特卡丘克嘟囔了一句。

“上来吧，我送你们去。公共汽车已经过了，今天不会再有了。”

我钻进“嘎斯”车，里面黑糊糊的，嗅到一股汽油味。我摸到靠边的一条长凳坐下来，面对着司机那张冷淡无情、一动不动的脊背。看来特卡丘克没有立刻决定跟我上车，但最后还是用双手抓住坐椅的靠背笨重地挤了进来。区教育局长啪地一声关上了车门。

“开车！”

从司机的一个肩头去看空荡荡的、飘带似的公路，很方便，也很舒服。公路两边的篱笆、树木、农舍、电线杆迎面飞过。一对青年男女靠边给我们让路，姑娘用一只手掌遮住眼睛，小伙子却满不在乎地望着汽车耀眼的灯光。村庄过去了。公路进入田野，黑夜中辽阔的田野也变得只有窄窄的一条公路宽，在两条灰白色的路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区教育局长半转过身子对特卡丘克说：

“您在酒席筵上，不该提那个莫洛兹，欠考虑。”

“什么欠考虑？”特卡丘克在座位上马上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可是我觉得，再开始那种对双方都可能不太轻松愉快的谈话，实在不值得了。

但是，克辛德佐夫身子转的度数更大，看来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您不要误解我。我根本就没有反对莫洛兹的意思。特别是现在，可以说，经过审查他已经恢复了名誉……”

“他也没有受过审查。人们根本就把他忘了。”

“就算是这样，那也是因为有别的事。主要是有比他重要的人物，他们才是英雄。说实在的，”克辛德佐夫精神起来，“他究竟有什么功？他打死过一个德国人？”

“一个也没有。”

“你看，还有他那种解救孩子的举动，并不合适。甚至我想说，是不理智的……”

“不是不理智！”特卡丘克断然打住了他的话。他激怒得话不成声，我更加感到，他们现在是不应该谈话的。

看来，克辛德佐夫今晚也憋了一肚子气，因此现在，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是十分不理智。他真救出了谁？我们不谈米克拉谢维奇，他是侥幸活下来的。他不算数。我曾经亲自处理过这个案件，因此可以告诉您，我看不出这个莫洛兹有什么特殊的功勋。”

“看不出，只能表示遗憾！”特卡丘克用反常的生硬刺耳

的语调斩钉截铁地说，“那是因为你近视，对吧！思想上近视！”

“哼……那好，就算是近视吧！”区教育局长宽宏大量地表示了同意，“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还有别人……”

“是些瞎子吧？那还用说！他们还是聋子。管他什么职务级别！都是些天生的瞎子。就是这样！但你要知道……，你说，你多大年纪了？”

“就说是三十八吧，又怎么样？”

“就说是吧。这就是说，你是从报刊和电影上了解战争的。是吗？我呢，我是亲身打过仗的。米克拉谢维奇在战争中受过害，到底还是免不了一死。那么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们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算得上战争的专家哩！现在到处都讲专业化，那么，我们就是战争的工程师。关于莫洛兹也应该首先问问我们嘛……”

“有什么可问的？您自己在那份材料上就签过字，关于莫洛兹被俘的那份材料上。”克辛德佐夫也来劲了。

“我是签过字。因为我当时是糊涂虫。”特卡丘克脱口说了出来。

“您看！”区教育局长高兴了。路上的一切他已经完全不感兴趣，干脆把脸转过来，争论的劲头越来越大。“您看，您自己也签了字，而且您签得对，因为……那么现在您说说：要是每个游击队战士都象莫洛兹那样，那又会怎么样呢？”

“都象莫洛兹哪样？”

“自己去当俘虏。”

“笨蛋！”特卡丘克恶狠狠地把话一口气倒了出来。“没有头脑的笨蛋！你听他说的什么话！”他大声对司机说：“停车！我不愿和他一块坐车。”

“我是能够停的，”车主人寓意深长地表态了，“要是你不能停止人身攻击的话。”

司机好象真的刹了刹车。特卡丘克抓住靠背，想站起来。我很怕我同伴这样做，就紧紧地捏住了他的胳膊。

“等等，吉莫非·吉托维奇。何必这样呢……”

“确实，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我们找别的场合再谈吧。”克辛德佐夫说完就扭过头去。

“什么别的场合！我不愿同你谈这个！你听见了吗？永远不谈！你是聋子！他才是人呢，他明白。”特卡丘克朝我点了点头，“因为他善于听别人的，愿意把情况弄清楚。而你，一切都是事先就清楚了。而且永远一成不变。这怎么行呢？生活包括千百万种情况，千百万种性格，千百万种命运。而你想把这一切硬塞到两三个常用的公式里，为了图简单！也为了省麻烦。你问他打死过德国人没有？……他做的胜过他打死一百个德国人，他献出了生命，是自愿献出的。你懂吗？这是何等有力的论据！证明你对，还是证明我对？”

特卡丘克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上言不接下语，急得象时间不够用似的。尽力想把积郁多年、当然也是他此刻认为最主要的话全盘托出来。

“莫洛兹不在了。最了解他的米克拉谢维奇也死了。不过还有我嘛！你以为我会沉默吗？那是做梦！只要我活着，我就要继续去说明莫洛兹的为人，让最聋的耳朵也听得进去。等着瞧吧！他就会帮我，其他人也会帮我……世上总还有人，还有真正的人啊！我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你以为我老糊涂了！不！你错了……”

他说了一大堆不十分合理，看来也并非无懈可击的话。这是感情不受控制的爆发，也许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但是这一次他没有遭到反驳，反而很快就泄了气，坐在车后面的角落里哑口无言了。克辛德佐夫大概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场面，也闭起了嘴，两眼呆呆地看着公路。我也没有说话。马达发出均匀有力的响声；汽车在夜间空荡无人的公路上大大加快了速度。柏油路面飞快地冲到车轮底下，又带着旋风和沙沙声，发疯似地冲到后面去了。明亮轻快的车灯划破黑暗。那被灯光照得发白的电线杆、那路标、那一棵棵刷有白灰的柳树……在公路两旁闪过。

我们的车就要进城了。

活 到 黎 明

吉林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室
文学翻译小组译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ДОЖИТЬ ДО РАССВЕТА》

据《РОМАН-ГАЗЕТА》1973.No 24 译出

第一章

“行啦，我们不要争论了。把人集合起来！”伊万诺夫斯基突然打断了谈话，从木房的犄角后面转了出来。

邱宾准尉的话只说了半截，便咽下去了。他的两腿细长、身躯干瘦，长得又不匀称，披一件白色的伪装服。夜幕迅速降临，在雪天的黄昏里可以看到他那张被风雪严寒熬黑的、过早地布满皱纹的脸不满意地抽搐了一下。准尉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不同意中尉的意见，然后甩开了大步，顺着雪地里隐约显出来的小路，向木房的门口走去——这间干燥室的门掩得严严实实。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关了，邱宾把门使劲推到一边，门摇摇晃晃地斜挂在一个合页上。

“起来！出去集合！”

伊万诺夫斯基停下来侧耳细听。干燥室里的轻言细语立刻听不见了，里面鸦雀无声，这个口令所必将引起的一切象是把大家弄呆了。这本来是部队里一个普通口令，可是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它包含的意义就太多了……然而紧接着里面的人都轻手轻脚地一齐行动起来，说话声也听见了。一会儿就有人第一个跨出了黑糊糊的门洞，走到洁白的雪

地上。“彼沃瓦罗夫”——伊万诺夫斯基在看到一個披着新的伪装衣、静候在木房的黑墙跟前的白色身影时，心不在焉地想到是他。但由于聚精会神地在考虑事情，同时听准尉在干燥房里大声吩咐，伊万诺夫斯基立刻又把这个人忘掉了。

“快出去！什么也别拉下，我们不回来了！”从干燥房的木头墙里面传来邱宾的关切而又严厉的声音，听来有些喑哑。

准尉心里有气，看来他到底也没有同意中尉的意见，尽管表面上几乎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过邱宾自己生多大的气都可以，这是他个人的事。但只要这里是中尉伊万诺夫斯基指挥，决定权就属于他，而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一个最后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必须而且马上从这里穿过去。因为绝不能再漫无止境地拖延了！他已经等了将近六昼夜。离目的地原以为很近，只有三十来公里，刚才一量地图，才知道是六十公里；实际情况自然还要远些。十一月末虽然夜长，但是这一夜里他们要做的事情毕竟太多，因此不能浪费掉现在对他们来说十分宝贵的时间。

中尉断然拿起靠墙放在最边上的自己那副滑雪板，从小路往雪地里走了三步，站在快要排成一行横队的战士们面前。战士们忙着拿滑雪板，戴风帽；风从墙犄角呜呜地吹来，抖动着薄棉布伪装衣，系衣襟的长带头抽打着前胸。尽管伊万诺夫斯基尽力减轻负担，但带的东西还是过多。你看，他的十个战士穿着厚厚的棉背心，伪装衣下面背囊、手

榴弹袋、枪支、弹药盒和子弹带挂满了一身，一个个显得臃肿难看。除此之外，每个人还有一副滑雪板，眼前这只能说是很大的累赘了。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滑雪板看来最没有用，但是到德国人的后方就大有用场了。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滑雪板上。小分队使用滑雪板的主意正是他在军部提出来的，立即得到大家的赞许——从不动感情的侦察处长到吹毛求疵的、被工作和部下弄得焦躁不安的参谋长。

问题是怎样去实现这个主张呢？

在中尉沉默不语，内心焦急地等待战士们站队的此时此刻，这个问题是他考虑最多的。战士们在雪天的黄昏里取滑雪板，发出轻微的碰击声，在狭窄的小路上臃肿笨拙的身体你撞我碰的。他们的滑雪技术会怎样？一直也没有时间好好看看他们大家的滑雪情况；天黑以前他们一直向前沿阵地运动，弯着腰在灌木丛中穿行。从早晨他就呆在这儿的步兵营营长的观察所里察看敌情。整个一天里阴沉的天空飘下来一点点稀疏的雪花，傍晚雪开始大了，中尉高兴起来。他已经选择好了穿过去的整个路线，记住了路上的每一个土包，现在天又下起了大雪，这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天刚黑，风变了方向，雪开始小起来，眼看就要完全停了，只有零星几片雪花在寒冷的空气中飞舞，纷乱地落在木房的圆木墙上。准尉建议：再等两个小时，也许那时风雪还会大。在风雪里一切就好对付多了……

“如果风雪不大呢？”伊万诺夫斯基严厉地反问他。“那

时怎么办？你想白白地断送半个夜晚，是不是？”

浪费掉半个夜晚是不行的，他们的全部路程才计划用一个整夜的时间。然而也得承认准尉的头脑还好使。如果穿过去的行动失败，即使一夜再完整、再长，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小路右侧排头是鲁卡绍夫中士。他是从正规部队来的，身体结实，是个不爱说话的大个，又是个真能吃苦耐劳的步兵。他的职务是副排长，是特地从军部警卫营调来执行这项任务的。他那从容不迫、一丝不苟的动作给人以坚定有力和稳妥可靠的感觉。站在他旁边的战士哈基莫夫也是从步兵里调来的。虽然现在还没有下达任何口令，但是他那张黝黑的面孔已经浓眉紧锁，全神贯注地看着指挥员，他按“枪放下”的要求，一手扶着枪，一手扶着滑雪板。下一个是战士苏德尼克，正在挪动整理肩上的背带，他背一个比较重的炸药包。从外表看，这个爆破手倒还年轻机灵、够结实的了。他是在他的同伴谢卢佳克被编到小分队后自动要求来小分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谢卢佳克也是个工兵，他俩一起参加修建军部指挥所这项工程。伊万诺夫斯基不知道这个谢卢佳克爆破的水平如何，但他的滑雪技术肯定不怎么好，这是最初就感觉到的。这个四十来岁的大叔，你看他那慌慌忙忙、笨手笨脚的样子，还没有入列，就把捆在一起的滑雪板和滑雪杖弄松散了，横一根竖一根的立在那儿。他刚想起来弯腰去收拾整齐，又把枪掉在雪地上。

“你不能捆好吗？嗯？”邱宾向他走近了一步。“拿过

来。”

伊万诺夫斯基感到不妙，问道：“您的滑雪本领怎么样？”

“我？就那样……以前滑过。”

“以前！”中尉气愤地想。真见鬼，看来收罗来了一些宝贝！——瞧着吧，以后倒霉事少不了！不过这也很好理解，他本该亲自仔细问问所有的人，分别和每个人谈谈，看看他们的滑雪情况。但是他自己没有时间，他去司令部去侦察处长那儿、然后去炮兵司令那儿、去政治部和特工处，奔忙了两天。小分队是别人组编的，他没有在场。

天黑得很快，寒冷的冬夜已经降临，雪完全停了，中尉着急起来。他觉得，邱宾替这个谢卢佳克捆滑雪板也磨蹭得太久了。战士们站在队伍里，风帽下一张张灰暗的脸庞显出耐心等待的神情。谢卢佳克下面是端庄美貌的克拉斯诺库茨基和沉默寡言的扎雅茨。克拉斯诺库茨基戴一顶邱宾那样的布琼尼式尖顶帽，站在那里来回地替换着脚。队伍最后是彼沃瓦罗夫，他是中尉的老乡，也是一个炮兵，在这里大概是最年轻的。的确，他们——这些看来即将同他共享荣誉或者一起牺牲的人们，中尉是了解不够的，但当时又没有挑选的余地。自然罗，最好是同那些他所熟悉的、经过战斗考验的人一起去执行这种任务。可是上哪儿去找这些他所熟悉的、经过考验的人们呢？现在他甚至想不起所有那些村庄、教堂、树林和山岗——他的炮兵战友们永远安息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合埋或独葬在坟墓里，有的干脆

找不到下落。经过这五个月的战争，保全下来的人不多了。一个星期以前和他一起从德国人的后方突围出来的只有四个。而且有两个冻坏了，一个在通过阿列克塞耶夫这个地方时负了伤，最后只剩下计算员沃伦科夫下士和他。这个沃伦科夫现在可太有用了，但是伊万诺夫斯基已经无法把他找到。计算员被派到前线的步兵营，遗憾的是，人们从那里活着回来，是不大容易了。

“好了……站齐！立正！报告中尉……”

“稍息。”中尉说完，问：“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哪儿去吗？”

“知道，”鲁卡绍夫的嗓音很低，其余的人都默默地表示同意。

“到德国人那儿去串门。为什么去，去干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有病号吗？一个也没有？就是说大家都健康？有没有不会滑雪的？”

短短的队列警觉地一动不动了，棉布风帽下一张张灰暗的、等得疲倦的脸严肃而顺从地望着自己的指挥员，这些战士的命运现在由他一手安排了。大家静了下来，默默地站着，大概他们对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并不太清楚，只好完全依赖他这个指挥员和那个照管他们才一天多的细高个准尉了。

伊万诺夫斯基把手伸进伪装裤的开口，从兜里掏出一块沉甸甸的小方表。这是他以前从一辆被击毁的德国坦克弄下来的。表在他的手掌中欢快地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表盘上的磷光闪闪：时间是差十分七点。

“现在我们只有十二个小时了，当然还要用一、两小时过敌人的防线，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得走六十公里。清楚吗？有谁觉得自己不行？”

他用等待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队伍：队伍中没有一点儿响动，静得能听见风吹落房盖上的积雪所发出的沙沙声。但仍然没有人回答他这个在此时此刻远非无足轻重的问题。

“那就这样啦。准尉殿后，小分队跟我出发！”

这里没有人给他们送行。过火线的各种准备早已做完。一个钟头以前他们在步兵营指挥所商量好：步兵营要保持沉默，不去惊动德国人，而他们则尽量在夜幕刚一降临时偷越过去。事实上，即使需要支援，步兵营又能支援什么呢？它名义上是营，其实最多是一个步兵连，而且指挥它的上尉连长不久前还是一个机枪手。他答应在万不得已时给予火力掩护，这还是由于当时在场的军部侦察处那个大尉的要求才勉强答应的。但大尉在这里待不多会儿就要走的，而步兵营往下还得打仗，加之营里的弹药不足，上级也一定会要求他们节约，以应付更紧要的情况。

诚然，大尉根本没有坚持要他们非在今天从这里穿插过去不可。雪快停了；他们面前是一大片十分空旷荒芜的河滩地；一条灌木丛蜿蜒其中。这位司令部的代表一见这种情形，踌躇起来。

“是呀，真象在一个空盘子里。中尉，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你更清楚。”

“现在就走。”伊万诺夫斯基很朴实地说了一句。

“那就随你吧。也许情况会变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

“鬼知道是不是出其不意，你问谁去！”中尉心里担心。可是他不能再拖延了——对他们现在所执行的任务来说，拖延的确就等于死亡。事实上他拖延得已经过分了，当然这也是出于万不得已。

战士们踏着齐踝骨的积雪，有的地方齐膝盖，鱼贯地登上了山岗。伊万诺夫斯基回头一看，头一次感到满意了——他短小的分队顺从地跟上来了，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耽搁时间；他停下来，其余的人几乎也同时停下来。往下应该等一等，也许还应该歇一歇，应该卧倒——从山顶上德国人已经可以发现他们。河滩地周围的坡地上埋伏着步兵营，静悄悄的，只是从右侧树林后面很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地传来战斗的余音，还是那地方有什么东西在黑云低垂的昏暗天空里发出暗淡的反光。河滩地斜着伸向黑暗，灌木丛涂上了一笔笔昏暗的颜色，小河边落满积雪的芦苇丛露出点点黑影，一撮撮杂草破雪而出。到小河至少还有半公里，必须跪着爬行才能过去，后面还有相当一段需要匍匐前进，再往后情况就很难估计了，只是希望能快点到达那片安全的树林，它在河滩地那一边，从这里是完全看不见的。

“卧倒！跟我前进！”中尉低声地下达了命令，同时自己趴下来，把双肘撑在雪地里。

厚厚的积雪象棉絮一样松软，寒冷刺骨。雪无情地钻

进伪装衣的每一条缝隙，钻进手套，钻进袖子，钻进怀里和靴筒，在里面慢慢地融化，令人讨厌的雪水在身上散开，与汗水混在一起，使人一会儿打寒战，一会儿又热气腾腾透不过气来，心里闷得难受。伊万诺夫斯基用牙咬下了戴在手上的一个三指手套，用潮湿的手指扯了一下风帽带，脸部顿时觉得凉爽轻快一些，主要是耳朵不堵了，他听到了风吹杂草的沙沙声和身后杂乱不清的音响。他们爬了大约半公里，身后，那长着松林的小山岗，嵌在夜色朦胧的天际，只隐隐约约露出灰色的暗影，苍茫暮色里昏天与雪地几乎连成一片。幸好，他们十个人的身体爬过后留下来的一条雪沟，连同他们的身影，就是在近处也看不出来。这当然是黑暗里的情况，伊万诺夫斯基知道，照明弹一飞上天空，那时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全部痕迹，连同他们自身，就会暴露无遗。

目前四周还是漆黑一片，鸦雀无声。从树林后面依旧隐约传来沉闷的隆隆声，还是那个地方，远处排炮轰击的反光，从傍晚起一直在天边大片大片地闪现。冰冻的大地在他的胳膊肘下面微微颤抖，发出深沉的响声。还是树林后面的那个地方，间或有几颗信号弹的黄色火星升起，又随即在半明半暗的空中消失。

他们应该尽快通过这片河滩地，可是前沿还没有过去，小河边那段最危险的路还在前边。偏偏大家又有点累了，队伍开始明显地拉开了距离。伊万诺夫斯基忽然发觉：一直紧跟在后的鲁卡绍夫，他的喘息听不见了。中尉回头看

了一下，等了一会儿，自己喘了喘气，尽管他知道在这里即使拖延一会儿也是不容许的。显然，他们已经累得有些顾不到小心谨慎了，在稍后一点的地方不知什么东西轻轻响了一下——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大概是步枪撞在滑雪板上，中尉顿时神经紧张起来，他那怒气冲冲的目光盯着后面昏暗的雪地。马大哈！真是马大哈！他现在恨不能痛骂他们一顿！也真是！不管多少遍向他们交代，应该左手拿滑雪板，右手拿枪。但是，大概，还是有人非得把它们抓在一起，结果总是碰得叮当响……

后面，裹着伪装衣，拱成一团的灰色东西在黑暗中蠕动起来，他喘着粗气，爬到中尉的脚跟前不动了。他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爬，再往后，由于夜色和雪光就看不清了。伊万诺夫斯基用疲乏的哑嗓子轻声问道：

“爬来了吗？”

“爬来了，指挥员。”中士也以同样嗓音低声地回答。

“往后传，加快速度！”

洼地里的积雪更厚，连肩膀都给盖上了，湿透的膝盖能感觉出冰冻的荆棘，可能到了沼泽地了。伊万诺夫斯基象往常一样，没有看指南针，而是根据地形的特殊变化推测方向，他已经从地图上熟悉这儿的地形了。这里他们应当一直顺着低洼地，爬到河岸上的灌木丛跟前，在灌木丛的遮掩下继续往前爬。前面还要爬很长一段路，这自然会把他们拖得精疲力尽。但只要不碰上德国人或某一个夜间潜伏哨就行。否则就偷越不过去，一切都可能一开始就完蛋。

然而，伊万诺夫斯基赶走了这类念头，两眼盯住前方，夜色已经变得十分浓了。黑影绰绰的灌木丛好象就在跟前，它后面是被雪覆盖的小河。根据地图，他记得这地方正好位于中间地带，顺河边的小山岗往前，是一个被炮火摧毁殆尽的村子，德国人就据守在那里。不过敌人最前沿的一个战壕离得更近，离河的那边只有一百来米；到河那边后，小分队必须挨着河床拐个弯，并设法在这个战壕和旁边另一个战壕中间的灌木丛里穿过去，后一个战壕位于小山岗的突出部分，带尖鼻子的小山岗象个倒扣着的大勺子。

他们爬着。雪不仅更厚，而且变得十分松软，积雪覆盖的、夏天没有割过的冻草在手下沙沙作响。这已经是沼泽地了。伊万诺夫斯基偶尔不注意，他的膝盖压破了表皮冻得还不结实的青苔，只听见扑通一声，水从青苔下面挤到雪地上。他停下来一会儿，想仔细听一听这一不慎的动作是否暴露了自己。好在这儿灌木丛已经开始了，伸手就够得着赤杨树，红枝条密密麻麻，好象雪地里升起一堵墙，无法过去。伊万诺夫斯基顺灌木丛又爬了几步，好让还是拉长了距离的队伍都爬到灌木丛的安全掩护之下。朝村庄那一面，他们有灌木丛的可靠掩护，连照明弹也不可怕了。虽然在另一面，那没有遮挡的小山岗仍然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但它毕竟离得比较远，即使在照明弹的亮光下从那里也发现不了他们。

中尉总是忍不住想站起来看一看后面，队伍末尾的几个人是否落后太远。现在要紧的是统一指挥，把大家都掌

握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就意味着灾难。不错，如果发生什么情况，那里会有人对付的，邱宾就在最后面。这个人一般说来并不笨，年龄比中尉本人还大十来岁。但邱宾是预备役军人，虽说他个性还满可以，可他真正的实战经验能够用吗？伊万诺夫斯基本人是正规军军官，从六月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到现在，什么样的灾难他没经历过？他是不怎么相信预备兵的。为了更稳妥，更有把握，他往往总要尽量多分担一部分这些人的工作。今天他和建议晚一些穿过去的准尉之间发生的那场简短的争论，给双方留下了不愉快的感觉。中尉本来就不允许任何人来分散自己的权力，何况还是在一种他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机智果断的事情上。眼前，总的来说，一切都对付过来了，要是走运——以后也都能对付过去，那时候有机会他将对邱宾提提这件事……

后面，鲁卡绍夫在积雪松软的雪坑里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地问：

“中尉同志，现在往哪儿去？”

“轻点！后面怎么样？”

“爬来了。只是谢卢佳克落在后面……”

又是谢卢佳克！还在营里时这个谢卢佳克的笨手笨脚就已引起中尉的不满，但在匆忙准备出发的情况下，伊万诺夫斯基干脆就没太注意他，他只是想到：这人身体好，能坚持住，而且小分队需要个工兵。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随手收下了这位上年纪的、笨手笨脚的大叔。战争已经不知多少次证明，一个战士光有一般的体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受

过训练，具备一定的技能。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时间根本不允许这样做。侦察处长和特工处长花了一整天时间去审查和研究名单，挑选人员，直到最终组成小分队，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训练呢？

伊万诺夫斯基就地放下滑雪板，绕过鲁卡绍夫，顺着他的足迹向后爬去。果然谢卢佳克跟中士拉开了距离，此刻又笨又吃力地在雪里爬，把别人挡在他的后头。中尉冲着他狠狠地轻声问：

“怎么搞的？”

“弄得他妈的，出了一身汗！还要多久才能用滑雪板？”

“动作快点！快！”他用严厉的耳语催促这个战士。

谢卢佳克左右晃动着拱起的臀部，驮着装有炸药的沉甸甸的背囊，外披伪装衣，爬着向中士撵来，其余的人也跟着蠕动起来，中尉让哈基莫夫、扎雅茨、苏德尼克、还有个谁（因为风帽拉得太低，脸没有看清楚）从身边过去，最后等到了准尉邱宾。

“出什么事了？”邱宾问了一声，在伊万诺夫斯基身边稍停了一会儿。中尉没有回答。这还用得着回答？难道准尉自己没有看到小分队拉开了距离，没有保持必要的紧凑。作为殿后，准尉对此是有一定责任的。

“谁在后面叮当响？”

“叮当响吗？没听见。”

他自然没听见罗！伊万诺夫斯基没有再说，他屏息凝神地听着四周。附近却是鸦雀无声；我们的人埋伏在小山

岗的松林里不声不响，德国人在前面也毫无动静。九个鼓鼓囊囊的身躯披着沾满雪花的白色伪装衣，齐整地俯卧在他们扒好的一条雪沟里。

“应该注意听，”伊万诺夫斯基低声说了几句。“现在要穿过火线了。不许给我弄出一点声音。”

准尉没吱声，中尉迅速地跪着向前爬去。他经过战士的身边时，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脸，但是仿佛切身地感觉到了从风帽下射出来的警惕的目光，里面充满着期待与不安。大家都默不作声。伊万诺夫斯基攀到谢卢佳克身边时，见他不好意思地喘着粗气，四肢摊开在雪沟里，便严厉地命令道：

“使劲！谢卢佳克，使劲！懂吗？”

中尉爬到了他这支现在已经收拢的队伍前头，重又在灌木丛边缘积雪最深的地方向前爬去。他一只手在雪地上拖着滑雪板，另一只手拖着冲锋枪，装着冲锋枪弹盘的弹药带从胯股滑到腹部，中尉一再地把它甩到背上。在雪地里他撞上了一堆枯树枝，在寂静的夜里劈劈啪啪地响开了；伪装衣被什么东西挂破了；滑雪板卡在雪地里。中尉一面心里骂，一面往旁边爬，费了一会儿工夫才爬出这个鬼地方，接着他稍稍避开灌木丛继续爬去。离这里不远应该遇到一条小溪，它流入小河；从小溪开始就是德国人防线缺口中最危险的一段路了。

然而在他爬到小溪以前，前面不远处的上空“啪”地响了一声，接着滋滋地直冒火星，一道耀眼的火光划破天际。

正在跟积雪激烈搏斗的伊万诺夫斯基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这是照明弹。照明弹还没有飞到他们头顶就在空中散开了，变成一束光焰耀眼的礼花；被这种强光照得明晃晃的茫茫雪原，连同上面的灌木丛，突然隐蔽不动，缩成一团了。然后，一个什么东西摇晃了一下，向一边飞去，一团乱影在河滩地上一闪而过。照明弹落到了灌木丛后面的雪地上，它残余的寒光还明亮地闪了几秒钟。

伊万诺夫斯基原地趴着不动了，几乎没有喘气，胸部憋得难受。雪尘在他脸前随风飞舞。中尉估计马上会有枪声、喊声和其他照明弹，但是沉沉黑夜里仍然是一片叫人紧张可怕的寂静。为了能尽快恢复视力，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又注视着前方。这照明弹究竟是从哪里发射的？他疑惑莫解。按理说，在照明弹升起的那个方向，不应该有德国人——那里是沼泽、小河和灌木丛。他们原来正是要往那儿爬的，可是现在看来，此路已经不通了。

鲁卡绍夫在后面捅了一下他的靴子，但是中尉没有回头，甚至没有吭声。敌人发现了没有？这是现在他唯一担心的问题。如果发现了，那么他们今天这次尝试也许就此完蛋；如果没有发现，那就应该尽快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又一分钟过去了，既没有枪声，也没有再出现照明弹，伊万诺夫斯基这时心想，看来敌人在那里布置了值夜的照明弹手，还是避开他为好。中尉赶忙转身进了灌木丛，爬到了低矮的河岸上，有几棵又粗又黑的赤杨树俯视小河。他果敢地从岸上翻身滚到了平坦的河面，结冰的河面上铺着一

层薄雪。他们过了河，发现这边的灌木丛稀疏了一些，沿着河岸延伸，形成了一条狭窄的林带，再往前是那个小山岗，上面有一座村庄，德国人的那个战壕就挖在村外一间歪斜的木房脚下。

鲁卡绍夫中士紧跟在后，一步也没有落下，正在中尉停下来踌躇不前的时候，他爬过来对着中尉低声说：

“咱们走小河吧……”

“嘘……”

情况变得复杂了。这个地方离敌人太近了，只有紧挨河岸，才有可能从敌人旁边过去。多么想到冰冻平坦的河面上去啊！可是这儿河道弯弯曲曲，象根被鬼弄得七扭八歪的绳子。“要用多少时间才能爬过这九曲十八弯啊！”伊万诺夫斯基沮丧地想。“还有，要是遇到没有冻结实的地方呢？”

他现在觉得，时间过的太多了，他不该在这灌木丛里磨蹭这么久，而且一开始就耽误了时间。中尉焦急不安地打了个寒颤。他刚回头去看，后面的人这时都已经过了河，正等着往前爬哩！在灰蒙蒙的夜色里，跟前几个人的脸模模糊糊露出一一点黑影，其他人的脸完全看不见了。于是他以更大的决心继续在雪地上爬起来。

这一回，他爬了不大一会儿，还是从原来那个地方腾空升起又一颗照明弹，伴随着一声枪响。中尉把身子紧缩进雪里，使劲盯着雪地上那堆树枝，它在照得通明的皑皑白雪的衬托下黑一块白一块，混沌一片。不对，照明弹还是象原

来一样，朝他们爬去的方向即河滩地的对面飞去了。这说明，他们还是没有被发现。等照明弹熄灭以后，他如释重负，猛拉了一下滑雪板，借着胳膊和膝盖的力量迅速地向前冲了一步。当四周又漆黑下来以后，有好几秒钟他看不见眼前的一切，只是一个劲儿扒着雪和拖着滑雪板。忽然一道强光又刺得他眼花目眩，从空中直射河滩地，把雪地照得明晃晃的；灌木丛的黑影犹如半个大圆圈，飞快地倒映在河滩地的白雪上，显得十分清晰。树影不动了。伊万诺夫斯基也趴着不动，感到这一大片明亮地方随时都会被哒哒的机枪打成百孔千疮。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他跟往常一样，思想反应特别灵敏，他意识到：这可怕的情景眼看就要发生。照明弹在高空都烧没了，但夜还是原先那样安静，他重又紧闭了一下双眼，让视力恢复过来。如果被发现了，那就应该后退，回到河那一边，借河岸作掩护。如果没有……那么就应当赶快往前爬，尽量离这个该死的地方远一些，在这里敌人可以大施淫威，从两个方面照射你。

还是没有枪声，就是说，还没有被发现。他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冒冒风险，争取成功，于是带着铤而走险的心情向前冲去。快！快！他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有力而敏捷地沿着河岸爬去，他的整个身体都埋在雪里，雪无情地打在脸上，钻进嘴里，使人喘不过气，看不见东西。当视力恢复到能在黑暗中辨别东西以后，他突然发现村子的左方有一个齐膝高的小土坡在掩护他——大概是田地和草场的界埂。这使他高兴极了！现在他已经不害怕照明弹了，他的

全部意志集中在一点——前进！

他爬得很快，也爬了好久，胸部和背部内衣被汗水和雪水湿透了，他没有回头看自己的战士，这样做有什么用？现在还能再催促他们？他现在只有靠表率的威力，靠“照指挥员去做”这样一条军人守则起作用了。

当空中又亮起照明弹的时候，他才停下来，一只手伸在前面。头稍稍从雪地上抬起向后看去。果然，战士们的距离又拉开了，中士身后又出现了一个约二十来步的间隔，偏偏这时候界埂到了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隐蔽和躲避德国人那个前沿战壕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小山岗上的木房已经过了，照明弹也是朝身后的方向飞。前面又出现一片宽阔的平地，一排排稀疏的灌木长在它的一个边沿上。

照明弹熄灭了，他的心也随之放下了，最困难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一想到这，别提有多高兴了，虽说这是短暂的、有所克制的高兴。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向前挪动一下滑雪板，身后突然“啪”地响了一枪。伊万诺夫斯基猛地一惊，转过头来，一只手习惯地放在缠着绷带的冲锋枪的扳机上。但后面和两边都没有发现什么，四周死一般的寂静，除了这一声枪响，没听到任何声音，附近也不见任何人影。但只过了几秒钟，灌木丛上空有两处同时亮起来。中尉的目光越过肩头注视着照明弹的飞行——这两颗也和先前几颗一样，落到后面去了。就在这时另外两颗腾空而起，飞到小河的两边。在照明弹的亮光下，木房那边密集刺耳的机

枪声响开了。机枪连射的火光下雨般抽打在小河边的灌木丛上，有几颗子弹打在刚才他们隐蔽的小土坡上又反弹了回来，绿色的火花四处飞溅。借着照明弹的亮光机枪盲目地、但有把握地在搜索他们，在这样近距离的火力搜索下，只有这个界埂才救了他们的命。伊万诺夫斯基趴在那儿，他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本来都很顺利，没料到全部被这毫无道理的一枪搅乱了……

他们这样大概过了很久。中尉开始打寒颤了，湿了的内衣象冰做的铠甲贴在身上。空中燃烧了大约十来颗照明弹，机枪声似乎也平息下来。这时，后面的鲁卡绍夫碰了两下他的靴子。

“库德尔雅维茨负伤了。”

“重吗？”

中士没有回答，只耸了耸肩，也转过头去，象是希望从后边得出答案来。

遇到这种情况，真想咒骂几句。但伊万诺夫斯基只是气得双手使劲地攥着两把雪。不用说，开头就不利，紧接着还会更糟——在这原野上太容易被发现了。然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弄明情况或再爬回去看看，黑暗中他认出了中士后面的第一个人，于是对他命令：

“谢卢佳克，带着伤员回去。”

工兵的脸上掠过一丝疑惑莫解的表情，但还是转身推开积雪，消失在黑暗中。伊万诺夫斯基马上又想起，送伤员这件事最好不派他去，应该派个在这方面比较有能耐的人，

但他已不想把谢卢佳克叫回来。“让他活下去吧！”他这样想，心里突然涌出一种慷慨大方的感情。并非人人都有这种运气，但这老头也许比别人更有活下去的权利，他毕竟有家，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而这也不是小事呀。

木房跟前的德国人大概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所以毫无动静。四周静极了，只是树林远处咕咚咕咚的炮声时紧时松，时断时续，响个不停。伊万诺夫斯基又开始为无情的时间着急了；时间不等人，时间象飞一样过去。最后他会错过时机的。想到这中尉甚至害怕起来。说实在的，他没有预料到一开始就碰到这么多的意外。谁知道往后还会怎样呢？

带着这种担忧的心情，伊万诺夫斯基猛力向前爬去，但还没有爬出十步远，又被朝他飞速射来的阵阵弹雨挡住不动了。中尉全身紧贴雪地，注视着远处木房那个方向，木房的黑影隐隐约约象个小土包。他迅速地后退到原来那条连近处都看不清楚的小土埂后面隐蔽起来。也许，他们还是被发现了。照明弹劈劈啪啪地在空中烧，机枪连射的火光穿过黑暗正好打在他们前进的雪地上，弹雨如注，密如穿梭，雪花飞溅。无论如何得摆脱这个危险地方，但要在被照得通亮的原野上爬过去，那是不可想象的。看来他们卡在这儿动不了，要卡很久。好在左边碰上这条象是上帝为拯救他们而设下的土埂，只有它挡住来自小山岗那边的机枪火力，但不能总在这里隐蔽啊！这时，大家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沉默不语，等待指挥员的决定和行动。于是他决定拔掉这挺机枪——这是现在唯一可行的。看来，最好是从侧翼，

从小河边爬到机枪跟前。不言而喻，只有他自己才最有把握做好这件事。要是一个人、最多两个人去冒险，也许还可能悄悄地爬到机枪跟前。

“往后传，叫准尉来！”

战士按顺序把命令迅速传到后面，邱宾爬了过来，默默地趴在他跟前。

“我说，得拔掉机枪。”伊万诺夫斯基说。见对方没有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否则，出不去。如果发生意外，你带上地图，指挥小分队。”

“这样不合适，”邱宾沉默了片刻说，“还是换个别人吧。”

“换谁？”中尉问。“我自己去。”

他趴着解开了棉背心，从怀里掏出一张叠成好几折的皱巴巴的地图，把自己的滑雪板往准尉跟前推了推。机枪不响了，德国人平射过来的照明弹在雪地上快要熄灭了，四周变得又黑又静。但是他知道，只要从土埂上一露身，德国人的机枪又该闹开了。大概他们在这里看出点什么了。

“鲁卡绍夫，跟我来！”中尉低声地命令，没有回头看，他知道，鲁卡绍夫不会落下。这时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中尉一手握着冲锋枪，裤兜里装着三颗手榴弹，挨着土埂向前爬去。应该抓紧时间，不然他们的袭击行动会全部落空。当然，这一招儿并非上策，甚至是下策，但是他没有别的脱险办法。要说有，那就是返回去。其实，返回去现在也不那么容易。他一面在雪里爬，心里恶狠狠地连骂带说：

“打吧，混蛋！越响越好……”

他这时就需要机枪射击。机枪射击时，机枪手变得耳聋眼瞎，那时中尉总会有办法爬到他跟前。果然，照明弹刚亮，机枪就响起来。但奇怪的是：在最初的一刹那他怎么一点也没看到机枪的火光。但中尉的这种疑惑很快就消失了，机枪正向他们的后方，正向河滩地和小河那个方向，正向他们刚才在灌木丛中匍匐穿过的地方扫射。这一回德国人真的闹腾开了，并且闹了很久。河滩地上空被照明弹照得一片通红，四周亮如白昼，密集的弹雨形成几面扇子，时而交叉，时而分开，从小山岗飞射草地。几挺机枪从不同的地方疯狂地扫射灌木丛。起初，伊万诺夫斯基本能地把身子埋进雪里，从雪沟里看不见太多的东西，他只是紧张的听密集的弹雨带着火光在头上呼啸而过。但不看也很快能明白：这不是平白无故，这都是冲着谢卢佳克去的。就是说，还是被发现了、被照见了，现在正受到敌人扫射。

但是，当伊万诺夫斯基明白了以后，他欣喜若狂，为之一怔：火力被谢卢佳克吸引去了，应当立即利用这个时机！中尉在雪里把身一转，飞快地爬到静卧在土埂下面的队伍前头，从地上抓起滑雪板。

“跟我来！”他几乎喊出了声，在机枪的轰鸣中，已经不再担心被德国人听见了。

第二章

树林前最后几米，他们已经不是爬而是跑了。他们弯着腰，疲倦地跑着，一直跑进了稀疏矮小的灌木丛才相继卧倒。他们软瘫瘫地趴在雪地上，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傻呆呆地有好一会儿说不出来半句话，此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随着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算是顺利过来了，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山坡上的德国人好象给他们混过来了。德国人只顾朝草地扫射，照明弹的强光把他们弄得眼花缭乱，所以，在没有结果河边的谢卢佳克以前，他们大概一直没有太往别的地方看。“谢谢你们，亲爱的战士！”伊万诺夫斯基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以感激的心情想起了自己的战友。为了他的成功，第一笔代价就这样付出去了，可是最终会怎么样呢？但不管会怎样，战士谢卢佳克将永垂不朽！他明明是送死，但伊万诺夫斯基在派他的当时却带着暗自羡慕的心情认为：他得了活路……。

中尉还没等缓过气，就欠身在雪地上坐起。枪声已经落在身后很远了。星星点点的机枪火光象萤火虫穿行在雪天的夜色里。从河滩地后边的松林中对射过来另外一些子弹——这是我们的步兵营投入战斗了。而灌木丛附近这块

地方倒是安全的，他们面前是个光秃秃的坡地，积雪不多，田埂上冒出一丛丛的野草，伊万诺夫斯基掏出表看：已经九点半了。

“是谁开的枪？”中尉想起了惹了大祸的那一枪，尽量压住现在才发作的怒火。

不远处，在身穿白色伪装服、瘫在那里不动的人们当中有一个翻身坐起。根据风帽下露出的帽尖，中尉认出是邱宾准尉——他戴的是布琼尼式军帽。

“苏德尼克开的。”

“是我开的。”一个伤了风的哑嗓子，带着认错的语调低声说，只见苏德尼克疲乏无力地站了起来。

“为什么开枪？”

战士动了动脚旁的步枪。

“它走火了。”

伊万诺夫斯基死盯住那件缠着绷带的武器，气得都发抖了，因为这是托卡洛夫型十发自动步枪，外表看挺不错，但构造复杂，不那么好用。简直太糟了！出发之前他怎么没看出来呢？难道可以带着这样的武器到敌人后方去？

“你真该死！”中尉到底没有压住心头的怒火，恶狠狠地低声说，“你那是什么武器？”

“步枪。”

“什么步枪？”

“托卡洛夫型自动步枪 HM624 号。”

“HM！你不能找根更坏的！”

显然，战士这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惭愧地低下了头。中尉几乎用仇恨的目光看着他那狼狈相：身子被沉甸甸的背囊都压矮了，湿淋淋的伪装衣耷拉在双膝上。但从战士身上只能看到他认罪和顺从的心情。他的这种顺从，加上时间的紧迫，很快就把中尉的怒火浇灭了。伊万诺夫斯基认识到：向一个战士追究他本人都莫名其妙的责任，是没有益处的。然而他又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事实：整个小分队险些被这个苏德尼克给断送了。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

“他知道个屁！”鲁卡绍夫突然坐起来说，“他是个马大哈。干吗带这种宝贝来？”

苏德尼克仍然站在那里低头不语。

“为这事，他妈的我可以要你的脑袋！”中尉低声地威胁他，“懂吗？”

苏德尼克的头耷拉得更低了，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为自己辩护，好象已经准备接受一切。

“算啦！以后我跟他谈谈。”——大概邱宾听出来指挥员的迟疑犹豫的心情，出来调解。

“我还要跟你算账的！”伊万诺夫斯基说完，下令：

“上滑雪板！”

大家一齐动作起来，打开滑雪板，扣在靴子上，这里不允许耽搁。中尉握住滑雪杖的上端，回过头来等分队准备好。

“要是我，非教训他一顿不可！毛孩子！他没有碰到我

手里！”鲁卡绍夫一面戴手套一面在旁边嘀咕着。

“算了，不说了！”伊万诺夫斯基用比较重的耳语打断了他的话。“准备好了吗？苏德尼克，跟我来！出发！”

中尉猛地一撑，向林间空地冲去。但是在松软的雪地里，滑雪板不好使，陷在两条深沟里，只露出翘起的前端。树枝挂着伪装服，掀着头上的风帽，大约花了一刻来钟，中尉才穿出了灌木丛，来到了原野。这里风大，但感到宽阔多了。伊万诺夫斯基的滑雪板在雪里探到了比较硬实的地方，就撑了一下滑雪杖，向前滑去。中尉一直注视着前方，没有回头，听得见身后滑雪板的沙沙声和战士们均匀的、他熟悉的呼吸声。他对苏德尼克的气已经消了些，最大的困难已经过去了，伊万诺夫斯基也开始习惯只剩下八个人的这种现状。当然，对这点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他明天是十分需要人的，苏德尼克理应受到极严厉的处分。但怎么处分呢？这里又不能实行禁闭，一切都得等回去再说。而且总的来说，他们还算走运。细究起来，假使苏德尼克没有放那一枪，假使库德尔雅维茨没有受伤而伊万诺夫斯基不派谢卢佳克送他，假使谢卢佳克不把德国人的火力引开，那就说不定事情会弄成什么个结局呢！完全可能，天亮以前他们冲不出那条土埂，大白天就更容易遭到迫击炮的轰击了。十个人能经得起几下子！可现在到底冲出来了，只要夜里不碰上敌人的后方部队就好。

不久，雪地上露出一个不大的斜坡，滑雪板走得轻快一些，双手也比较自由了。中尉回头一看，苏德尼克努力地

跟在后头，昏暗中只见鲁卡绍夫跟在苏德尼克后面，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其余的人好象都走齐了。寒冷的夜风中只听见雪地在滑雪板下沙沙作响。中尉更加快了速度。路很远，一夜之间要走完，就显得更远了。所以非加快速度不可。他还记得出发前夕在地图上研究好的这一段路线，知道很快又要到原来那条小河的浅滩了。往后就要一直沿着河滩滑行。

过了灌木丛，战士们的滑雪动作有了节奏，小分队在灰暗的夜色中顺利地前进。没有星光的夜空象帐幕覆盖着冬天的旷野、灌木丛、树木、杂草，还有许许多多看不清猜不透的东西现出它模糊的暗影。前线的照明弹已经落在身后很远了，这里只能看见它在斜坡后面时隐时现的反光。

伊万诺夫斯基渐渐平静下来，尽管并不十分顺利，但开始这一段总算过去了；他们闯过来了。不过，谢卢佳克一直还留在脑海里。本来是可怜他，却造成这样的下场！要是他在，明天还真能用得着，他毕竟是个工兵嘛，又上了年纪，不是个傻小子，象苏德尼克那样。是呀，他本来最需要的正是工兵，可偏偏在工兵方面他不走运。但这有什么办法呢？小分队趴在照明弹下面的当时，他甚至想打发一半人回去，只求一半人闯过来就行。

中尉已经很懂得，生活里并不是万事如意，何况还是在战场上。为了不吃亏，有时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去达到预定的目的，尽一切可能去跟险恶的客观环境作斗争。不然，你会把事情弄垮，自己也要完蛋。一般说来，战争对任

何人都是无情的，但战场上最先死的是胆小鬼，就是那些比谁都更贪生怕死的人。话又说回来，勇敢的人死得也不少。战争对人们是绝对地一视同仁，决不是根据功劳来安排你的生死。人的命运在战时如此变幻无常，这是任何地方的和平生活所无法比拟的。为了生存，你任何时候也要紧紧抓住驾驭客观环境的缰绳，在任何甚至最坏的条件下努力把客观环境驾驭好。

这第一次相当荒唐的损失使伊万诺夫斯基痛苦不已。中尉虽然多次因为一心一意考虑夜间行动而忘记了其它一切，但没隔多久，他又重新陷入揪心般的痛苦之中，这痛苦在战争中是太常见了。不管他在五个月里多少次尝过这种叫人肝肠寸断的痛苦，也不管这痛苦有时显得多么平常，但要完全习惯它，是不可能的。在战争的这五个月里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多少战友，对这种损失早该习惯了吧，对它的不可避免也早该认可了吧。但不管你怎样去习惯它，有时还是免不了心痛欲裂，甚至想：与其把你亲近的人送进坟墓，倒不如让自己脑袋去顶子弹，尽管脑袋是多么宝贵。

就连自己的好友——侦察员瓦洛赫大尉的尸体，他都没有能够埋掉。仅仅因为他们没有锹，而且连十几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德国人已经坐着摩托车从公路驶来。他和波格列布尼亚克一边回射，一边用斗篷把大尉的尸体裹好，撒上一层带雪的树叶草草了事。他们的指挥员就这样留在那遥远的斯摩棱斯克边界的森林边缘了。下一个是中士鲁卡维僧，甚至没有能够把他从中弹的那个小山坡抬走，是德

国人十分钟以后收走的。

一般说，在战争期间伊万诺夫斯基有人缘：碰到一些好人，最幸运的当然是碰到大尉沃洛赫。他俩相逢在波罗夫斯克森林里一条晨雾笼罩的小道上，中尉一见到他，不知怎么就立刻有了这种感觉。大尉双膝跪在地上，从口袋里往扔在青苔上的军帽里抖落什么，他身旁摊着一张地图，周围是侦察员，坐着躺着的都有。大家穿着绿色伪装服，只戴着船形帽，风帽耷拉在背上。只有大尉戴一顶大盖帽，中尉凭这个认准他是指挥员，所以走到跟前行了个军礼。

“指挥员同志，请允许报告。”

“请吧，”大尉微微一笑，那样随便，毫没有一点指挥员的架子，“如果你有什么，那就报告吧。可我们这儿只有烟末报答呀！”

看来，大尉还愿意开开玩笑，也许还想请他抽抽马合烟哩，但遗憾的是他俩的马合烟都抽完了。其实，中尉这时并没有心思抽烟。要能有点面包干或一块面包他会更高兴，因为他已经有两天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了。克鲁普茨一次夜战失败后，他与团失掉联系，陷入敌人的包围。突围后他带着十二个战士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寻找自己部队。但无论什么地方，他连团甚至师的残余人员也没有碰上。有时遇到些他不知道的部队的战士，但谁也说不出口午卯酉。前线一切都乱了套，我们和敌人搅混在一起。又过了一天，周围就只有德国人了，到处他都碰到德国人，或者看到德国人刚刚经过这里的痕迹；就这样在森林边的小树林

子来回穿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什么出路。他没有地图，情况一点不清楚。路上遇到的那些红军战士提供的消息又十分矛盾。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军已经撤得很远，德军迅速指向莫斯科。在几次偶然的遭遇战中，他又损失了三个人，夜间丢了两个——也许是在黑暗中掉了队，跟上别的小分队走了，也可能情况更糟。他身边只剩下四个人了，只好钻进树林深处，来到这个既无德国人、又无自己人的荒凉地方。突然在林间小道上碰上这个侦察小分队！

大尉还是从两个口袋里抖落出来一点儿东西，卷了一根又细又短的烟。其他人默默地、中尉觉得是含情脉脉、忧心忡忡地望着队长。

“打火机怎么样？没有坏吗？”大尉一面问，一面把翻出来的口袋塞回到蓝色裤子里。

“什么打火机？”——伊万诺夫斯基有点觉得奇怪。但立刻恍然大悟。

真有这么回事！一个月以前，他们参加卡沙契夫保卫战。一天拂晓，团侦察处长带着一个陌生的指挥员来到炮兵观察所，他头戴大盖帽，华达呢军衣上佩着“红旗”勋章。天刚亮，他俩就端起炮镜观察德军的一个什么目标，同时在地图上作着标记，然后在一起吃了早饭。大尉还请伊万诺夫斯基抽了“卡兹别直”牌香烟，点烟时，大尉注意看他的战利品——一个佛像打火机。打火机确实很有趣。轻轻一按弹簧，佛像的头顶弹开了，火苗也就出来了。

这个黑色佛像打火机没有坏，所以伊万诺夫斯基立刻

掏出来，用大拇指按了一下弹簧，但这一次没有冒出火来，大概是汽油用没了。

“真有趣，真有趣。”大尉说，“可惜没有烟抽了。”

“我们也是，连烟末都没有了。”伊万诺夫斯基说。

他们的脸色又严肃起来，大尉穿上他那件破烂的短上衣。战争的严酷现实重又笼罩人们心头。

“倒霉多久了？”大尉问。

“从十七号那天我们在卡沙契夫挨挨以后就这样了。”

“明白了。那就一起走吧。我这张地图上标了个缺口，看看能否从这里钻出去。”

他们又走了四昼夜，在德军战线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缺口，甚至连战线本身也没有发现。那时是深秋季节，树叶都掉光了，寒冷的霪雨过后，已经初寒料峭。大路上到处是德军的进攻部队和后防部队的军车、汽车和越野车。战士们由于连日来穿森林走野地，加上饥饿，已经累得精疲力尽。有几个人开始受感冒和咳嗽的折磨。满身的疖子把中尉也折磨得不能消停。后来，一个侦察兵的腿受了伤，自己不能走，他们只好用木杆和雨衣做成担架轮流抬着他。他们因此走不快，但队长又不愿意扔下这个侦察员。这是一个确实很有用的侦察员，姓费赫，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是个碧眼淡发的大力士。他的负伤很偶然。他们大白天闯进了村子，打算问路和搞些吃的东西，在街口就碰上了德国兵。从院子出来的德国兵被大尉一刀扎进脖子，倒下了。一看是个军官，沃洛赫按侦察员的老习惯首先抓他的行军袋，但军

官后面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放了一枪，手枪的子弹正好打在费赫的大腿上。幸好巴连巴科一梭子把这个德国人撂倒了。他们架起受伤的费赫逃了出来。费赫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下地走过一步，大概他的什么重要神经被德国人子弹打坏了，一条腿软绵绵地耷拉在那里。后来又出现并发症，发高烧。长途转移给这个伤员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绷带经常挪动了位置，伤口流血不止，费赫咬着牙，忍着剧痛，脸色越来越阴沉，心情越来越孤独了。

有一次，他们在长满小橡树的山坡上停下来休息。森林里各种阔叶树全都光秃秃了，只有粗糙矮小的橡树还随风摆动着那已经明显发干、但还象夏天一样浓密的叶子，簌簌作响。这里比较安静，橡树林子成了他们可靠的掩护。他们刚停下，侦察员们就倒下来休息；费赫躺在担架上一声不吭，疲惫消瘦的脸上表现出与世隔绝的神情。沃洛赫坐在他身旁，若有所思地用草根剔着牙。没有东西吃，也没有烟抽。有两个侦察员为了给伤员搞点面包，找住户人家去了。

“喂，费赫，”大尉突然对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你扔下，我们一定抬你出去，一切都会好的，主要的是不要丧失信心。”

“还我手枪，”费赫的声音很弱，说得很慢。

两天来，费赫一直不停地要自己的手枪，沃洛赫怀疑会出事，所以把它从费赫的枪套里抽走了。现在无论跟他谈什么，开头和结尾都离不开还枪这件事。

“看，你又来了！我会还你手枪的。但先得把你送回

去。”

“还我手枪！为什么拿走？这种关心有什么用？为了你良心好受点？拉倒吧，大尉……”

大尉知道，要把他说服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不特别劝他。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幻想，而且他们也不需要任何幻想。病情已无希望——这是费赫本人和全队八个人都清楚的。他的老朋友鲁卡维僧中士一路上尽力照顾他。但糟糕的是鲁卡维僧的能力太有限了，眼巴巴地看着费赫快要完了，但实际上一点也帮不上忙。他痛苦地坐在朋友的身边，用脏手巾拭病人苍白额头上的冷汗。

“真难呀！我们拿你怎么办？”

大尉的这个问题近乎反诘句的修辞性质，是谁也不能回答，也是谁也不想回答的。其实大尉也不要求回答，他只是在沉思中自言自语罢了。然而这一次他的沉思没有能继续多久，那两个侦察员就已经回来报告了：附近没有村庄，虽说发现个窝棚，也是空的，里面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捞着。不过，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德国人满载货物的汽车一辆一辆沿着公路向邻近的小树林子开。汽车在那里迅速卸完货，又轻快地从原路开回来。根据种种迹象，德国人一大批库存物资正向小树林转移。

他们当然知道，库存物资可以多种多样：饲料、弹药、燃料、被服、工程用品，甚至化学器材。但也可能是粮食。在饥饿难忍的战士看来，最大的可能是粮食，大尉忽地一下站起来。

“在什么地方？远吗？”

“离这儿也就两公里吧。”

他们从这里出发，很快就过了橡树林子，然后挨着树林绕过了一个山沟，穿过一片湿草地，重又进入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他们走出灌木丛时，沃洛赫命令大家立即停下。透过赤杨林只见一辆辆“比尤辛”牌七吨级载重汽车慢腾腾地在被破坏了的坎坷不平的大道上向稀疏的松树林子开，在那儿一个什么地方卸了车，又从山坡上开回来，大概是拉另外一批物资。

大尉原地坐下来，从怀里掏出望远镜。侦察员们把抬着费赫的担架放在地上。

“呵哟，那儿堆着那么多东西！好家伙！”大尉惊讶起来。“还在围铁丝网哩！原来这样。总的说来，还是好接近的。等天黑，要能……你考虑考虑！”说完把望远镜递给伊万诺夫斯基。中尉在光秃秃的树枝丛中找到一处空隙，将望远镜对准小树林。他清楚地看见汽车正在那里卸东西，卸车的好象是战俘。离他们稍远的地方，一些身穿军大衣、手持步枪的黑色人影竖立在那里。山岗上绿色和黄色的大箱子在稀稀落落的高大松树下面堆了长长的几排。先垛好的几堆盖着帆布。“有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大尉琢磨着。“管它什么呢！我们可以放它一阵焰火，让斯摩棱斯克一带都看见。鲁卡维僧，你的反坦克手榴弹都还在吗？那好。波格列布尼亚克，炸药你没有扔掉吧？照明弹也应当准备好。会用得着的。”

大尉在赤杨树林里大致讲了一下自己关于袭击这个仓库的想法，给面前这几个又累又饿的战士分配了任务。起先他安排两个人，后来只安排鲁卡维僧一个人照看伤员。他让伊万诺夫斯基做自己的副手。他们决定天一黑就行动。

“今晚该有热闹看了！”大尉高兴地说，一面搓着冻木了的双手。“现在能抽口烟就太美了，可惜没有抽的。”

第三章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爆破。从铁丝网下面钻过去，把带引线的炸药包放在垛堆下。再把哨兵引开。怎么引开呢？——伊万诺夫斯基是知道的，沃洛赫大尉生前曾经教过他。办法有好几种。当然最好是干脆把哨兵干掉，但要是这个仓库大，哨兵就会有好几个。都干掉就做不到。

伊万诺夫斯基一面回忆和思索一面踩着滑雪板，慢慢地从夜间看不出坡度的小山岗往下滑。在昏暗的雪夜，哪儿是山岗，哪儿是峡谷，凭眼睛是看不出来的，这只能凭脚下滑雪板的轻重去感觉。滑雪板时而沉重，因此需要滑雪杖帮助；时而轻快地在雪上飞跑。伊万诺夫斯基直往南滑，不时地用指南针校对方向。右边，朦胧夜色中出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岸一会儿离他近，一会儿离他远，这是

根据河岸上蜿蜒曲折的灌木丛判断出来的，左边是一群低矮的山岗，一直蔓延到河岸，滑雪健儿们得一个个地翻过去。

伊万诺夫斯基滑过一道平缓的斜坡之后停了下来。滑雪板碰到干树枝，劈劈啪啪地响开了。中尉向旁边瞧了瞧，想绕过干树枝。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滑到跟前停住了。

“怎么样？”中尉大声问。看来在这里已经再没有谁能听见他们说话了。

“身子热和了，中尉，”鲁卡绍夫正喘着粗气滑过来，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直冒热气。苏德尼克抓了一把雪，靠在一根滑雪板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哈基莫夫和克拉斯诺库茨基也来了。还有个人正在下斜坡，不知是谁。

“邱宾！”中尉喊了一声。

“大概是来了。”过了一会才听见黑暗中有人回答。中尉心想，既然殿后的也来了，就是说人都到齐，可以继续前进了。

“最好休息一会儿吧，中尉同志。”克拉斯诺库茨基象是在哀求。

伊万诺夫斯基掏出表来。长针接近十二，短针已经指着一点。

“不休息了，我们已经晚了。”中尉说。

“两腿都打哆嗦了。”

“习惯了就好了！就不会这样难受了。跟我继续前进！”

他担心休息会使战士的情绪冷下来，根据亲身经验：中途休息之后要费很大劲儿才能恢复原来的速度。重要的是通宵保持预定的速度，必要时甚至还要加快速度。中尉知道，所谓“第一次疲劳点”很快就会过去，那时大家一定不会这样难受的……

但疲倦这玩艺儿是不留情的，中尉越来越频繁地发现自己的眼睛总是斜斜地望着脚前的雪地，滑雪板前端总是那样单调地在眼前晃。有一次，他努力把视线从地面离开，抬起头来，发现前面有一片灰黑色东西，象是一座树林。果然，松树林象一堵高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风吹林涛，令人心寒。伊万诺夫斯基感到有些奇怪，地图上这地方并没有什么树林，更不用说松树林了；他想，可能是走错了方向，急忙拿指南针校对。但一点也没有错，他仍旧是按预定方向走的——正好是二百一十度，可哪儿来的树林呢？怎么办？是照原定方向穿过去，还是从旁边绕过去？又从哪一边绕呢？

“中尉，是休息吗？”后面的鲁卡绍夫问。不知为什么他比苏德尼克先到了。而苏德尼克落了很远，夜色中只是模模糊糊露出他的身影。这样一来，中尉规定的队列被打乱了，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一句：

“你怎么跑到前头了？”

“工兵在那儿……烦透了他，老碰他的脚跟。”

队伍好象又拉长了。这样是绝对不行的，中尉认为，按现成的雪辙滑，队伍本不该这样。他把指南针塞进袖筒，一

面紧张地考虑怎样对付这片树林，一面等其他人上来。

过了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哈基莫夫和克拉斯诺库茨基上来了，其他人还没有到。他很不耐烦地又等了一会儿。这几个人累得几乎没有站稳，就把滑雪杖在雪地里一插，胸口压在上头：就这样休息了。他们个个上气不接下气，都用手抓雪吃。

“快到了吗？中尉同志，劲儿已经那个啦……”克拉斯诺库茨基有气无力地问。

“其他人呢？”中尉不但没有回答反而不安地问。

“都来了。大概扎雅茨落下了，准尉在那儿侍候他呢。”

“彼沃瓦罗夫呢？”

“瞧，那边有个人来了。”

一个白色身影，顶着越来越大的风雪，从黑暗中滑了出来。

“其他人呢？”中尉问。

“不知道。后面好象没有人了，”这个战士爽朗地回答，“我在那儿系了一阵子滑雪板……”

“好了。出发吧！”

中尉不能再等了，准尉在这方面不是新手，他不应该落后，加上滑雪板留下的痕迹在雪地上清清楚楚，让他去撵吧。于是中尉往右一拐，靠着松树林的边绕过去了。他不敢直穿树林子，怕在什么地方碰上个沟或者一棵刮倒的树，或者干脆卡在密林里。夜间在树林里用滑雪板，总归是不行的。

但他还是不知道怎样才能绕过树林，只是沿着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树林边缘试探地缓缓滑行，滑雪板的辙迹照着这林边路上的奇怪曲线向前延伸。他们在这儿走，比在田野上要小心多了，大树下的幼林中总觉得有东西在闪动，象是些黑色的人影。但滑到跟前，每次都发现是小松林。

这时风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总是迎面吹来。薄棉布的伪装服在背上象鼓起了风帆一样，有时啪啪作响，中尉觉得，自己的手脚显然没有原来那样麻利，对方向是否准确的判断也不象原来那样有把握了。此外他没有什么别的疑虑。他时而猛冲，时而突然转为中速，过分小心地打量着四周。他不时地听听后面的声音，想知道扎雅茨和邱宾到底撵上来了没有。

但是邱宾还没有撵上来，而面前的树林却突然中断，他们终于到了树林的西头。再往下，松树林的边缘向南拐，然后成弧形转向东南。这正是伊万诺夫斯基所希望的。他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并且停下来，把滑雪杖插进雪地里。现在该用地图核对一下方向了。

“谁那儿有……彼沃瓦罗夫，斗篷在那儿吗？”

“在，中尉同志。”

“拿给我。”

伊万诺夫斯基滑雪板也不脱就坐在雪地上。彼沃瓦罗夫仔细地把雨衣罩在他身上——微弱的雪光消失了，雨布里变得特别黑，也特别静。中尉打开手电筒，微弱的光圈在皱巴巴的地图上移动。一切都已清楚。

小河在这里向一旁拐了个大弯，所以黑暗中他把这条河走丢了，碰上了树林。不过也未必那么需要顺着河岸绕那么一个大弯，现在就往南直穿过去、少绕这道大弯，也许更有道理。当然，离开这条河，夜间就比较难辨方向了，何况地图上可能画得不准确。他们绕过来的松树林在上面根本就没有标出来，绘图员们只是画了些表示灌木丛的小圆圈。可能过去这儿确实是一个灌木丛，现在长成了那么一片大树林，绵延了足足两公里长，使他差点儿迷了路。

中尉弄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之后，就掀开了身上的雨布。

“准尉没到吗？”

“还没到。或许我们等一等吧？”鲁卡绍夫问道。

伊万诺夫斯基带着一线希望，聚精会神地看看和听听后面，可是黑夜里还是没有人影。准尉的迟迟不到，真叫他不安起来，心里考虑了各种各样坏的可能。但是他尽力想打消这些念头，坚持一个信念：邱宾一定能撵上来。现在的问题是要继续前进，需要有个人殿后。除了指挥员，中士鲁卡绍夫的军衔在分队里是最高的，于是中尉决定：

“鲁卡绍夫，你殿后，不许有一个掉队的！明白吗？”

“明白。”中士坚定地回答，他跨出雪辙，让其余的人从身边过去。

“前进！再加两把劲，我们就到目的地了。”

那一次他们也是几乎到了目的地。天还没有黑，潮湿

的雪花就开始落到湿润的地面上，万籁俱寂。起初只是几片绒毛细的雪花——美丽透明的六角结晶体在空中飞舞，冉冉飘到地面。后来雪开始下大。傍晚，湿淋淋的雪花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挂满了树枝，厚厚地粘在战士们的头上、肩上和袖臂上。侦察员们耐心地坐在灌木丛里等着，由于几个小时不活动，战士们一个个直打哆嗦。受伤的费赫盖着一块雨布，在昏迷中轻声呻吟。接近天黑的时候，沃洛赫和另一个侦察员——中士巴拉英科观察仓库去了，从灌木丛向外看，已经看不清什么了。

过了一刻钟，巴拉英科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大尉命令把费赫和另一个侦察员留在橡树丛里，其余的人到林边去。大家一跃而起，很快就来到大尉跟前。仓库虽然很近，但是鹅毛大雪和苍茫暮色把他们掩护得很不错。全神贯注的大尉坚决宣布：不等天黑，趁白天忙了一天的敌人哨兵现在还不消停、还没有提高警惕性的现在，就开始行动。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指挥员，侦察员们专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默默地、准确地执行他的命令。这次袭击的行动对伊万诺夫斯基来说，既新奇，又特殊，他也完全信赖大尉，而且尽可能准确地去执行他的一切命令。

“雪下得正好。”中尉靠近沃洛赫身旁说。沃洛赫掉过头来，脸上显出不满和担心的神情。

“不见得正好吧。他们看不见我们，可我们也是啥也看不见。”

很难估计是好还是不好，但雪还是不停地下，大尉还是

决定干。他把四个人和一挺缴获来的“姆格”式机枪留在林边，交伊万诺夫斯基指挥，任务是掩护失败情况下的撤退。大尉自己和两个侦察员带上手榴弹向小树林走去。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伊万诺夫斯基只是较久地目送着他们三人，直到他们一个个地消失在晃晃悠悠的苍茫暮色里。他悄悄地给机枪压上子弹，守候在树林边。

有一段时间，前面又黑又静。在焦急紧张的等待之中每一分钟都过得特别慢。伊万诺夫斯基的思绪一直跟随着大尉，生动地想象他是怎样通过原野中的开阔地段，怎样走近树林。然后，他可能停下来观看四周。但出事了，什么事呢……

突然，这风雪交加的黑夜里传来一声奇怪的喊叫，接着又是一声。伊万诺夫斯基还没来得及想出个什么答案，近处啪地一声枪响，各种疑虑被一扫而光。紧接着，一颗照明弹从树梢腾空而起，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在白茫茫的地面上轻洒上一层淡淡的亮光，但伊万诺夫斯基已经明白：大尉的计划失败了。

这时大概应该掩护撤退，或者把火力引到自己这儿来，但他不知道：大尉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他不对敌人的哨兵还一枪呢？可是，当机枪连射的火光从树林边那条大道哒哒地飞来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端起“姆格”式机枪朝发射一道道火光的地方试探性地还击了一下。他焦急地在等沃洛赫，向德国机枪手只打了一梭子。他们子弹不多，总共只有一子弹带，得节省着用。他盼着那三个熟悉的身影

马上从黑暗中跳出来，那时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个鬼仓库。但是，几分钟过去了，黑暗里却没有跳出什么人来，中尉只好等下去。雪地上，他的战士托尔卡切夫趴在他跟前；伊万诺夫斯基叫了他一声，并向小树林的方向挥了挥手，这个战士按照他的命令爬起来就往田野跑。

照明弹不停地在小树林子上空照射，两侧的机枪在向某个固定的地方射去，大概德国机枪手现在不是在瞎打，伊万诺夫斯基跪着又试探地打了一梭子，附近这个小树林子就噼噼啪啪响开了——看来守卫的敌人已经行动，在认真地对付我们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毫无迟疑地立即撤退。但是大尉还是没有回来。不祥的预感憋得伊万诺夫斯基透不过气！

他一下子发觉：田野里出现了人，那摇晃的身影，在照明弹忽明忽暗的光亮下，透过纷飞的雪花，在前面闪了一下；当另一个黑影倒下的时候，这个黑影刹那间就变得特别大，占了整个田野。机枪从两个方向朝林边射过来，弹雨在这个黑影身旁飞过。但这人还是几步跳到了林边；就在这时，伊万诺夫斯基听见有人在喧闹的枪声中大喊：

“大尉被打死了！”

“站住！”伊万诺夫斯基大喊了一声，他自己也一跃而起，“站住！”

这是战士法尔杜其内，一般说，还是个不错的侦察兵，甚至是沃洛赫大尉最喜欢的一个。可是现在，只见他从炮火下拚命往外跑。他表现的恐惧叫人不好理解。他告诉的

这个不幸消息，中尉还是受得住的，中尉本来就不指望有什么好结果；但要说沃洛赫大尉牺牲，他简直是不敢设想。

“站住！回去！”

中尉自己端起机枪，连同沉重的一直拖到雪地上的子弹带向田野跑去。他在高低不平的雪地上朝法尔杜其内出现的方向跑了一会儿，脚底直打滑。他没有回头看，他知道法尔杜其内一定会回来跟在他后面跑的，不会有别的可能。照明弹象是四方八面都有，伊万诺夫斯基已经不去躲避了。他跪着朝小树林的边缘打了一梭子，想吓唬吓唬德国人，迫使他们卧倒。就在这时，法尔杜其内机灵地跑到他前面去了，转眼就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

打完枪，伊万诺夫斯基也一跃而起，想跟着战士跑去，但一颗照明弹在田野上空亮了，他看到近处有几个人影，弯着身子从大路顺着仓库的铁丝网跑来。伊万诺夫斯基害怕他们把法尔杜其内截住，连忙向他们射出了一梭子弹，在金属子弹带的最后一个弹壳蹦到雪地上以后，他便扔掉了现在对他已毫无用处的机枪，从枪套里抽出来 TT 型手枪。但是，这时他看见了自己人——两个战士弯着腰，费劲地拖着另外一个。中尉跑过去问：

“活着吗？”

“哪能活呢！死了！”法尔杜其内喊道，“那个该死的哨兵！真该……”

他们一面还击，一面掉转了方向。在灌木丛里跑了很久，一直跑了约莫有三公里，才在一个小树林歇了一会儿。

大尉肯定是打死了，带走他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他们匆匆忙忙用刀扒开一块盖着落叶的湿地，挖了个小坑，把指挥员草草掩埋了事。跟沃洛赫一起去的另一个侦察员也没了，不知也被打死在哪里，还是撤到别处去了。但是他们不能等了，敌人随时都可能从后面追上来；带着受伤的费赫躲开敌人的追击，那是不容易的。

伊万诺夫斯基一路上咒骂着那该死的仓库和他们今天的倒霉。他带着这支小队伍往北撤——撤出这个倒霉的、夜间被照明弹照得通明的小树林。照明弹的反光长时间的映在他们身上。中尉心情很坏，一阵阵感到恼怒和焦急。不，他并不是责怪大尉，假如他自己处在大尉的位置，大概也会这样做的，但叫人十分憋屈的是：一种十分偶然的情况帮了德国人这么大的忙。如果不是沃洛赫在大雪中碰上了一个哨兵，也许结果会完全两样。

就是说，应该更加小心。行动要百倍的慎重，特别是他伊万诺夫斯基，他现在不仅仅要对自己一个人负责了……

第 四 章

过了树林，中尉又把小分队带到了平坦的河滩上，战士们径直滑行了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拐弯。这里既没有上坡，

也没有下坡，滑雪留下来的辙迹平平地在深雪中向前伸展。伊万诺夫斯基一直在吃力地撑滑雪杖。滑雪板在松软的雪里陷得过深，不适合快滑，滑行的情况不怎么妙。一路上，他这个指挥员挑起了在前头开路这副最重的担子，因此到了半夜，开始感到吃不消了。他身上的衣服湿透了，内衣也是汗渍渍的，胸口闷热，开始渴得难受。但他不愿意吃雪，知道雪水会变成更多的汗，这只能减少身体的耐力，而且怎么也不会增加体力，往后他还需要多少体力啊！

时间过得很快，但还是不见邱宾赶上队伍，中尉真摸不着头脑了：他出了什么事？但看来不应当再去想他了。既然在这以前他没有赶上来，现在他们至少已经走了一半路程，他就更赶不上来了。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有四人减员，中尉想到这里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是，他现在不应该，而且简直没有权力为找人或等人而浪费时间。

伊万诺夫斯基有意地少去看表，他现在害怕知道时间无情地飞逝，只是一个劲儿向前滑，尽量不去考虑别的事。大概由于这个缘故，他没有立即觉察到：风刮得厉害多了，地上被刮起的雪尘在脚边打转，开始下雪了。几阵狂风，卷着细雪扑打在脸上，呛得中尉喘不过气来。四周更黑更静了，本来就不宽阔的夜空和大地变得更加窄小，全都融化在灰蒙蒙、阴沉沉的夜色之中。两边的黑色树影明显减少了，又加上狂风裹着大雪迎面扑来。很象是起暴风雪了。“真不是时候，”中尉忐忑不安了，双手加大了滑雪杖的力

量。他的滑雪板已经完全埋在雪里，只剩翘起的前端露出雪面。伊万诺夫斯基尽力把握好方向，几乎不看跟前的雪地，黑夜里应该尽量往前看远些，这是引路人的一种责任。其余的人应该观察两边，殿后的鲁卡绍夫负责后面的警戒。当然，在这样的黑夜里很容易碰上德国人，但是他更害怕的是误了时间。管它什么刮风下雪还是风和日丽，他们都应当在清晨前、在天还没亮的时候赶到目的地。白天到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小河看来又往旁边拐走了。前面出现了很大一片灰蒙蒙的东西，黑暗中象是一座起伏不平的、轮廓模糊的山包。暴风雪席卷田野，根本无法看清前面究竟是什么。然而那东西正好是在小分队要去的路上——这是伊万诺夫斯基一下子就意识到的。他现在比原先更多地靠着指南针来校对行军的路线。苏德尼克一步不拉地跟在后面，其他战士距离也很近。

老远就引起他们注意的那个东西，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些建筑物——村边上的庄园或者什么农庄之类。真想顺便进去，哪怕解解渴也好！但伊万诺夫斯基意识到眼前的处境以后，立即往旁边一拐，绕道过去。一切影响他们执行目前的主要任务或耽误时间的事儿，他都忌讳去做。

在风雪交加、天昏地暗中，很难确定这个农庄离他们到底有多远。农庄的黑影在路旁刚刚显现并且马上就要消失的时刻，暴风雪里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喊声，中尉没有立即听出这是什么人在喊，甚至没有听清是哪国话。但接着，建筑

物那边听见狗叫。伊万诺夫斯基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事，于是把滑雪杖用力一撑，向旁边猛冲。就在这个时候，在暴风雪中显得低沉的机枪声打破了夜的沉静。子弹的曳光穿过灰暗的夜幕从头上飞过，唰地擦了一下雪地，过去了。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中尉吃了一惊，他连忙弯下腰，用尽全身力气朝前面黑暗的地方冲去。突然从侧面的某个地方透过暴风雪射过来一道亮光，那不大明亮的光束把纷纷扬扬的雪花照得发白；但这不是照明弹，是从什么地方射过来的车灯。空中又飞过来一道道火光——机枪打了长长一梭子，密集的子弹在田野上宽幅度地扫射了一阵。中尉回头看了看正在滑雪的战士们：苏德尼克还是原来那样，紧紧跟随，他后面的其他人也在迅速地俯身往前滑。远处暗淡的车灯还是照到了田野，在昏暗中搜索到了白色的人影，大概从农庄那里是能够发现他们的。当机枪的火光离他们很近时，他大声喊道：“卧倒！”同时自己也侧身躺下来；不知为什么他最担心的是苏德尼克背上的东西。但是他动作晚了。他躺在雪地上，感到自己已经受伤，大腿膝盖往上有块地方象烫了一下，热血在裤子里湮开了。但这时并没有感到特别痛，他咬着牙，动了动这只腿——看来还能挺得住。旁边是苏德尼克，他气喘吁吁地将全身紧贴在雪里。

“燃烧瓶！注意燃烧瓶！”他附在这个战士的耳边说得很重，他又一次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打在燃烧瓶上，他们就得全部报销。苏德尼克趴在地上从背上取下背囊，按进雪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这个威胁着大家生命的东西。

机枪的火光刚灭，中尉就试图站起来，他高兴地发觉这条腿还管用。他弯着腰，踏着滑雪板，又向黑夜冲去——想尽力躲开机枪的扫射和耀眼的灯光。他们幸亏还有风雪作掩护，即使在这块被远处灯光照着的地方。他又很快滑了百米左右。农庄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车灯在远处眨巴了几下，变得更加暗淡了，但仍然朝他们这个方向照射。另一梭子子弹在身后的黑暗中飞来，但远远地落到旁边去了。

他们好象脱离了最危险的地带。中尉忽然想起自己把战士拉得太远了，回过头来。后面有个个人在昏暗中动弹，象是拿不定主意，但就是不向这边靠近——看来，他们走岔了他滑的雪辙。于是他停住滑雪板，坐了一会儿，轻轻招呼了一声那个战士，然后放慢了速度向黑暗处滑去，离开这个该死的农庄。

不一会他碰上了一个树林或者灌木丛的边缘，停了下来。应当把战士归拢来了。那条腿虽然越来越痛，但暂时还能忍受，看来子弹没有伤着骨头。农庄那边鸦雀无声。眼前就是暗得发黑的灌木丛，光秃秃的枝桠上铺着白雪，一棵棵幼小的云杉树在那里显出黑色的影子，一旦有情况，那里面是可以隐蔽的。

德国人的警觉性一直叫伊万诺夫斯基感到吃惊，虽说出卖他们的好象是狗。几条蠢狗难道会知道自己是冲什么人叫？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是及时绕开这个农庄，那就更糟了。他们绕的圈子不大，终究是把它绕过去了，看来，只是后来被他们发现了。而现在该怎么办？他感到伤痛在迅

速加剧，裤筒已经被血湿透，连靴子里的包脚布也都湿了。伤口需要包扎。但他默默地站着不动，等其余的人上来。

没想到苏德尼克第一个从黑暗中滑出来，接着出现了彼沃瓦罗夫的细瘦的身影；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个人弯着身子，甩开双臂撑着滑雪杖，从暴风雪里飞驰而来。大家在指挥员身旁停住了，不时地回过头来警惕着身后。阵阵狂风裹着稀疏的细雪，撒在滑雪板、伪装服和战士们的脸上。

“还缺谁？”中尉小声问道。

“缺哈基莫夫。”鲁卡绍夫回答，没有把脸转过来。大家目不转睛地朝那个可恨的农庄的方向望去。

“这帮混蛋！他们是怎么嗅到的？我们似乎走得很轻呀。”克拉斯诺库茨基骂了一声。

“还有那些该死的狗，如果是德国人的，倒也罢了，但说不定还是我们俄罗斯的。”

“什么狗到了德国人手里，就是德国狗了，那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啦。”

中尉尽量不让受伤的腿使劲，十分费劲地站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他脸色越来越阴沉，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为哈基莫夫长时间没有赶上来感到焦急。十分清楚，这样耽搁下去，他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他也不能把这个战士丢下不管。等了一会儿，中尉问鲁卡绍夫：

“他什么时候不见了？是在大家卧倒的时候不见了，还是他在后来倒下的？”

“卧倒时他还在，后来我就没注意到了。”

“你去把他找到，我们在这里等。”

鲁卡绍夫默默地消失在风雪之中。伊万诺夫斯基站了一会儿，然后拐弯滑到树林边，来到挂满雪花的几棵小云杉后面。这里的风象在风力试验筒里一样旋转：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密密层层的大雪在黑暗中象旋风似地飞舞。中尉迅速解开伪装衣的钮带，接着又把裤腰打开，冰冷的手一下子摸到了淤血，他簌簌两下就撕开了急救包，把大腿从膝盖往上一点的地方紧紧地包扎好。痛得要命，但他还是忍受住了，他憋了一口气，很快把裤子和伪装衣穿好。他用雪把双手擦净——不应该让任何人发觉他负伤，目前这毫无好处，何况总的来说是轻伤，还是默默地挺一挺为好。

真见鬼，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离奇，简直是糟糕透了！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民间的迷信说法：遇事开头不利，结局一定更糟。他开头是如此不顺利。那么结局就更不用说了。

战士们贴着雪地，双手紧握缠着绷带的枪筒，耐心地等待着。他也等了一会儿，然后拿出表来。管你发生天大的事，表还是正常地走着，表针准确地指着两点半。大半夜过去了。他们也走了不少路，但还剩下二十来公里，只要他们没有偏离过方向的话。在枪林弹雨下左躲右闪，他当然顾不得什么方向了。现在应该把这种情况改过来。

他用指南针定好了方向。停在二百一十度上的照准器，正指着灌木丛。在暴风雪的黑夜里，前面一团漆黑，所以他断定，看来只有穿过这个灌木丛了。否则难免要迷路。说不定还会落到德国人手里。

“嘘！”

从黑暗中传来一个人的微弱的、听不大清的喊声，克拉斯诺库茨基站起来，登起滑雪板，弯着身子向一个地方滑去了。大约有五分钟，那里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接着黑暗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象是白色的人影在那里折腾开了——不用说，那是两个人，身子弯得很低，拖着哈基莫夫往这边来。

大家一下子站了起来，抓住滑雪杖。但是现在已经用不着帮助了。鲁卡绍夫和克拉斯诺库茨基已经把哈基莫夫拖到，鲁卡绍夫双膝跪倒在雪地上，累得直喘气，说：

“瞧，好不容易找到的。雪地上插着一根滑雪杖。是他的。我一看，孤零零地竖在那儿。他自己却在十步远的地方。已经开始被雪盖上了。”

“怎么样，还活着吗？”中尉问。

“活着，但是不行了。他背上挨了一枪，好象还有腹部。”

真是越来越糟！又是一个……不幸的哈基莫夫，一个多么勤快利索而又细心的小伙子。初次见面就被指挥员喜欢上了。话不多，却很机灵。但现在对他怎么办呢？

“好啦……马上包扎！”

“我给他包了包。连绒衣一块包的。他不省人事……”

当两个战士在雪地里忙着给伤员包扎的时候，伊万诺夫斯基拖着那条被子弹打穿的腿，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向黑暗望去。哈基莫夫当然应该随身带走。但怎么带法？带

到什么时候为止？明天对他又怎么办呢？困难重重，情况不明，糟糕透了。但是中尉尽量不流露这种心情。在他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应该显得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并且在其他人眼里他应当成为信心的化身。

“是呀。包扎好了吗？把两个滑雪板绑在一起。什么，不知道怎么绑吗？彼沃瓦罗夫，把斗篷拿来！”中尉强打精神地命令道。

“难道这样就能拖走？”克拉斯诺库茨基表示了怀疑。

“能拖走。把枪上的皮带取下来。你们谁把自己的裤带拿出来，把哈基莫夫身上所有的皮带解下来。子弹也拿走，统统拿走。手榴弹也拿走。苏德尼克，你带上手榴弹。现在由两个人拉，一个人拽皮带，就这样拽。彼沃瓦罗夫，你在后边扶着。使劲，使劲，不要怕。”

他们总算把伤员搬到了绑好的滑雪板上，就往树林边拖去。结果并不怎么样——既笨重，又不稳当，两个滑雪板在雪地上各走各的，伤员的身子总是往一侧倒。在地面上犁开了一道深深的雪沟。谁也不知道这样能拖多远。

但是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这儿送又送不回去，留又没有地方。所以暂时只好这样费劲了，现在他们未必能在天亮以前赶到……

他们这样犹豫地进了灌木丛。一再停下来整理滑雪板，勉强地将躺在上面的哈基莫夫按扶住。克拉斯诺库茨基拉着，彼沃瓦罗夫弯着身子推推扶扶。鲁卡绍夫走在后面，有时帮帮他们，轻轻地催促他们几声。

幸而他们没有沿着灌木丛走进树林——这是伊万诺夫斯基所担心的。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又来到了田野。这儿风更大了，从地上刮起了雪尘。他们浑身是雪，来到一个风雪刮不到的地方，停下来缓口气。

“这怎么办呢，中尉？”后面的鲁卡绍夫直起身来担心地问：“我们就这么拖着他走呀？”

“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中尉显然是有点急躁地反问。

“或者把他留在什么地方吧？比如留在一个村里？或者一个棚子里？”

“不，不能把他留下。”伊万诺夫斯基坚定地说。“连想都不应该这样想。”

“那怎么办，不留下就不留下吧。”鲁卡绍夫突然同意了。“只是这样能走远吗？”

“应当快点。”中尉振作了一下精神。“要尽力做到快点儿！明白吗？”

他头也不回，明显地瘸着右腿，向黑暗滑去。其余的人也跟着出发了。

大家心情沮丧，精力疲倦，谁也没有说话。

第五章

现在再也不能恢复原来那种风驰电掣般的急行军速度了，他们象懒洋洋的苍蝇在风雪中缓慢地爬了不知几个小时，而中尉也只求不迷失方向就行。他不得不一再停下来，用指南针核对方向，同时也为了等一等载着哈基莫夫的拖板。克拉斯诺库茨基和彼沃瓦罗夫已精疲力尽。中尉自己也累得晃晃悠悠，头被风吹得象喝醉酒似的发晕，武器在肩上压得沉甸甸的，那条腿也越发疼起来。但他仍旧走在前面，苏德尼克居然一直没有被他拉下，这个战士背的东西太重，除了他自己的燃烧瓶外，还有哈基莫夫的三个一公斤重的手榴弹、他那支战士们爱不释手的步枪、以及他的背囊。

黑暗中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小垛盖满雪的干草，中尉见到这垛干草后，就朝它拐去，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肩膀就无力地靠在干草垛上，那上面堆满了积雪，但干草还散发着夏天的芳香和太阳的温暖。他踩在滑雪板上的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向旁边一滑溜，整个身子就软绵绵地滑倒在铺了一层干草的雪堆里。他甜滋滋地静躺了一会儿，紧闭两眼，觉得大地在他下面转动，令人昏昏欲睡。他害怕一下子睡过

去，便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站起来。还好，看样子谁也没有发觉他这一瞬间的软弱，而这是他当时最感到羞耻的。这时苏德尼克滑到了草垛跟前，载着哈基莫夫的斗篷拖板也拖到了。

鲁卡绍夫也是有气无力地最后一个从黑暗里出来了。大家一个个默默地倒在草垛里。

“还远吗？”殿后的中士吃力地逼出来一句话。

“不远，不远啦。”中尉强打精神地说。“但要加快速度。那儿有条公路，我们务必赶在黎明前穿过去，白天绝对过不去。”

“好，都清楚了。”鲁卡绍夫说，“那就走吧。”

“是的，该走了。”中尉肯定了一句，但他自己舍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软绵绵的草垛。

“喂，拉住小雪橇。一、二，拉呀！”这是鲁卡绍夫在下命令。中尉已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中士在小分队里越来越敢指挥了。路上他也不断地吆喝、催促和指挥别人。伊万诺夫斯基在前头忙于确定路线和观察地形，这以前一直没有考虑过中士这样做是否好。不过，中士作为殿后兵，他还是很满意的。一个很好的殿后兵，有这样的人殿后，肯定谁也掉不了队。

“注意，起立！起立！”鲁卡绍夫以他惯有的坚决态度小声催促他们，他自己早已站在滑雪板上准备出发了。克拉斯诺库茨基显然费了很大的劲才站起来，把滑雪板的皮带搭到肩上。只有彼沃瓦罗夫一个人还坐在那里不动，侧身

靠在草垛上。

“喂，你怎么啦？等着专门请你呀？彼沃瓦罗夫！”

彼沃瓦罗夫软弱无力地动了一下，并没有站起来。

“你这是怎么啦？”中尉问道。

“我站不起来了。”战士坦率得叫人无法生气。

“什么叫站不起来了？”

“真的站不起来了，把我留下吧！”

“这就怪了！”伊万诺夫斯基感到莫名其妙，“你怎么啦，是开玩笑？”

“他是胡闹，不是开玩笑。”鲁卡绍夫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并大喝了一声：“给我站起来！”

看来，瘦弱的彼沃瓦罗夫没有估计到路程这么艰难，本来就不太强的体力都已经消耗完了，还能从他身上挤出多少劲儿呢？但是，把他留在这草垛里，也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给我站起来！”伊万诺夫斯基严厉地命令。“鲁卡绍夫中士，把这个战士扶起来！”

他除了最严厉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以外，毫无别的办法，只有这种权力在这里还能起作用。当然，中尉知道这种远非同志式的要求太冷酷无情了，也知道对这个平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战士态度应该好些。但是在这次行动中，伊万诺夫斯基抛掉一切朋友之间的热情，只留下上级应有的严格要求。

鲁卡绍夫走到这个战士面前，从雪地里拔出来一根雪杖。

“听见没有？站起来！”

彼沃瓦罗夫有气无力地动了一下，仿佛在犹豫不决地，勉强挣扎着开始爬起来。鲁卡绍夫一下子火了：“别装蒜啦！起来！”

中士一把抓住战士的衣领，想把他拽起来，但结果呢，彼沃瓦罗夫一只脚连同滑雪板向上一翘仰面朝天倒下了。鲁卡绍夫又拽了一下，战士的身子在他扬起的飞雪里软弱无力地缩成了一团。

中尉克制不住一种奇怪的、与自己意志相抵触的、突如其来的感情，他把那条好腿猛然一抬，想转过身来。

“放开他！鲁卡绍夫，住手！”

“为什么住手！哄着他干吗……”

“别说了！他不是装的。彼沃瓦罗夫，喂……喝两口……”

伊万诺夫斯基从皮带上解下军用壶，这是他一路上保存下来准备以后，也就是准备明天用的；明天，看样子他们得一动不动地卧在雪地里卧一天，而且还不能动。这壶酒还得供回来的路上使用，回来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更坏，甚至可以肯定会更坏。至少现在没有人跟踪，这只不过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夜色和暴风雪完全遮盖了他们的足迹。可明天会怎么样呢？很可能，明天他们将深情地想起这个使他们疲于奔命的夜晚。但不管今天怎样，如果他们不能按时赶到——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明天了。

彼沃瓦罗夫对着小壶喝了几口，若有所思地坐了一会

儿，然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这就好啦！把枪递给我。递过来！递过来！背囊给鲁卡绍夫。中士，你拿着他的背囊。已经不远了，只是一点点。黎明以前我们在小杉树林里躲一躲，侦察好，看清楚，晚上去闹他个天翻地覆，让整个斯摩棱斯克地区都知道！只是要把哈基莫夫拖到那儿才好。他怎么样，还有气吗？”

“还有气，中尉同志。”拉着皮带索的克拉斯诺库茨基站着说。“要不把他留下吧？中尉同志！就埋藏在草垛里吧……”

“不！”伊万诺夫斯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万一德国人来了怎么办？我们活，他去死？那时将军会怎么说我们呢？要记住他嘱咐过的话：在那里只能靠你们自己互相照顾，此外你们没有别的依靠。”

“话是这么说，”克拉斯诺库茨基叹了口气：“只要不是白拖就好……”

伊万诺夫斯基转念一想，这话也对，完全有可能是白费劲。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结局：战士已经很长时间昏迷不醒了，加上颠簸、寒冷，一冻僵，也就完了；而拖他的这些战士在这以前就可能精疲力尽了，到那时大家都不好办了。伊万诺夫斯基，虽然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但已经开始模模糊糊地感到：哈基莫夫由于在战场上的这种遭遇，正从一个好战士和好同志慢慢地、但又是无疑地在变成一个至少是无意识地折磨他们的人，也许变得更坏。

然而这是他们的同志啊，也象谢卢佳克或库德尔雅维

茨那样，他仅仅是由于十分偶然的因素而成了牺牲品。但哈基莫夫和那两个战士有差别：那两个人的牺牲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感激和悲痛之情；而哈基莫夫，他越来越使人产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情。同时十分清楚，他的全部过失仅仅在于他的机体能够比较顽强地抵抗着死亡。亲身领略过痛苦教训的中尉十分清楚，一个分队有这么个伤员——这是多么大的灾难！现在他们肯定要迟到了，不能在天亮以前穿过公路了，会卡在容易被德国人发现的、没有树林的雪地里。无论伊万诺夫斯基是怎么为如此不愉快的前景感到难过，但要把伤员留下——这在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指挥员和人的天职告诫他：只要这个不幸的人还活着，他的命运就不应该同他们的共同命运分离。他们应该千方百计去救他，象救自己那样心甘情愿。这成了沃洛赫的侦察员们的一条定律，这也应该成为伊万诺夫斯基的小分队里的一条定律。

小分队的这个指挥员象全队人员一样，经过这艰苦的一夜，也实在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忍住虽不剧烈、却一分一秒也未停止过的疼痛，勉强地活动着受伤的腿。由于他没有让别人知道自己受了伤，在战士们眼里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和大家一样。这就不折不扣地要求他承担和别人相同的义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感到自己有些难为情，因为他硬让别人负担特别重，自己却一身轻，只是额外背了彼沃瓦罗夫的步枪。同志的天职要求他同大家老实地分摊全部重担。

他们绕过针叶林的边沿，又在河滩地里行进了，伊万诺夫斯基认为这是途中比较安全的地带。地图上这里只标着草地、灌木丛或沼泽地，附近没有村庄，所以遇见德国人的可能性最小。他们顺利地穿过了两条积雪覆盖的道路，现在剩下最后一条路了——这是条大路，当然也是一条前线公路，什么时候都是人来车往的，只有在夜间才有可能穿过去。不过离这条公路还有五公里左右，这时中尉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在黑暗中等了等克拉斯诺库茨基。

“怎么样了？”

“真要累垮了。怎么样，能给口酒喝吗？”

中尉给了他军用壶，他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

“怎么样，好些了吗？”

“好象是。快到头了吧？”

“快了！快了！我来帮你，咱俩拖。”

“得啦，两个人怎么拖！那只能互相碍事，我凑合着来吧……大风雪好象要停了。”

中尉向四面看去，没想到大风雪果真几乎要完全停了。黑色的天空升高了，已经脱离了地面，下面是宁静的白茫茫的原野，奇怪地增添了好厚一层酥松的雪花，在黎明前的夜色里泛起了一片白光。两旁重又露出灌木丛，宛如钩织的花边，里面夹杂着墨点似的小杉树。看来，快到清晨了。伊万诺夫斯基用浮肿了的手从兜里掏出表——时间是六点一刻。

“哎呀！再加一把劲就到了，那就可以一直休息到天黑

啦。”

新的担心反倒暂时给中尉增添了些力量，他又起劲地向前滑了。他们顺着矮小的、在雪地上显得黑压压的柳树林滑行。现在最需要暴风雪，可暴风雪停得真不是时候，懊恼的情绪一直在心里翻腾。没有暴风雪，他们要越过公路就更困难，如果晚到，就更是这样了。根据种种情况估计，他们要晚到个把小时，而黑夜的这一个小时可能决定一切。出发前将军在简短的临别赠言里再三嘱咐他们充分利用黑夜——只有黑夜才能使他们有某些成功的希望；白天，如果德国人发现他们，肯定要想方设法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消灭掉。而夜间，他们还可能把敌人甩掉。这个道理不用证明，中尉本来就已经清清楚楚。但他还是感谢将军的关怀和忠告，这其中包含着将军对小分队和中尉本人慈父般的感情，完全超出将军与下级的一般关系。当然，他们同样也懂得自己正接受一件什么样的任务。从这个夜晚起他们的命运完全由自己来掌握了，因为在艰难的时刻，任何人——无论是将军，还是上帝，都帮不了他们的忙。在雪地里辗转折腾了一夜的中尉，一路上心中始终燃烧着永不熄灭的感激的火花，感谢将军他那种出于人性的同情。这颗火花温暖着他，指引着他，使他感到自己有成功的希望……

三天以前，伊万诺夫斯基刚从德寇后方出来在司令部里闲逛的时候，他最怕碰见这个爱挑剔的、严厉的、具有无大权在握的将军——参谋长。不仅中尉，司令部所在的一个寂静的林区小村庄里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他们从将军的那

所带有花纹门窗的高房子旁边走过时，都有些提心吊胆。将军对部下都非常严厉，不用说，这里所有的人，司令员也许除外，都是他的直属部下。只有上帝才晓得，他随时都可以因为什么事找你的岔子：将军看不惯游手好闲的、不按规定穿戴军装和伪装服的、那些没有按他的愿望迅速执行或传达命令的人——这个严厉的军首长可以指责部下的事还能少吗！伊万诺夫斯基有一次无意地看到了这种场面：将军因为左翼地段缺少某些情报，严厉批评一个上校，上校挨了批评之后，也同样把侦察连连长大骂了一通，理由是他的两个侦察班已经超过了期限，却还没有从敌人那边返回来。

伊万诺夫斯基是偶然来到这里的外来人。他在部队里服役的时间不太长，并没有到过任何比师部更高的单位，所以现在他饶有兴趣地观察这个后方机关，一般说来还算平静的和相当太平的生活。不过这个村子大约有两次发生过一些骚动——飞来了“容克式”敌机；投下的炸弹并没有造成特别的损失，只炸毁了一座空木棚，炸死了路上一匹备了马鞍的乘马。这里一直平安无事，除了有时候参谋长要来巡视各处，这时所有的上校、大尉和他们那些细心的文书便处于暂时的紧张和忙乱状态。将军斥责了某些人，又冲着某些人大喊大叫了一通之后，就匆匆地离开了，于是一切又重新恢复正常。

中尉是和其他两个活下来的侦察员穿过了前线来到这里的。因为他认为：沃洛赫牺牲后，自己有责任汇报他们在德寇后方辗转两周的一切经过。但是司令部的军官们因

忙于自己的公事而没有太重视他，这使他很受刺激。他对许多同志的伤亡、沃洛赫的牺牲，至今还感到十分痛苦，他们在德寇后方所经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考验——至今记忆犹新，因此，他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受得了这些一头钻进文件堆里的军官们的冷遇！他来到了侦察科的小木房，还没走到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上校跟前就报告起正事来了，而上校却心不在焉地久久望着他，显然在想别的事。随后上校不客气地打断了中尉的话，命令他把事情全都写成书面材料。上校顺便问中尉是否在朵尔采沃受过军审查站的专门审查，这是为审查从敌后突围出来的人员设立的。

伊万诺夫斯基感到受了委屈，他告诉淡黄发的上校，朵尔采沃跑不了，而德国人的弹药库却可能跑掉，那时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牺牲、包括优秀的侦察员沃洛赫大尉的牺牲，都将是白费了。

“怎么白费了呢？”上校似乎头一次对什么事感到惊讶，他正在纸上用心地绘制一份复杂的、多栏的表格，这时抬起手中的铅笔。

“问题很简单，”中尉说，“死得毫无结果。白白地牺牲了。”

“原来如此！”上校说完了，站了起来，拉平了军便服，挺了挺被军便服罩住的肌肉十分发达的胸脯。“你刚才说，你是哪个师的？”

伊万诺夫斯基说出了师和团的番号。上校露出来厌恶的表情。

“这是哪个军的？这甚至不是我们这条战线的。这不行。你写份说明材料吧。”

最后他只好写说明材料。他绞尽脑汁地写了两天两夜，躲着那位爱挑剔的将军。这时将军恰好从前沿阵地回来，正按照惯例，在短期外出归来之后整顿司令部。伊万诺夫斯基暂时在司令部后勤处住下来，他和这里的文书在前一天喝了一军用水壶的白酒，在一座半毁坏的空屋里，文书宽宏大量地让这一位“无主的”中尉共睡在自己的床上。中尉当然也要把缴获的带镜子的罗盘连同水壶送给了好客的文书，连那个精巧的佛像打火机也割爱相送了。但在两天里他写了有两本学生方格簿那么厚的冗长的汇报。当然，如果他不是在前一天被迫抽出半天去拜访这个司令部的稽查处，那么报告早就写完了。

当他送上来自己这份著作时，看样子，淡黄发的上校情绪很不好。上校拿起这两本笔记本，没有看一眼就大手一挥，准确地扔到了邻近的桌子上，一个秃脑袋浓眉毛的少校，正坐在那里看文件。

“卡瓦列夫，你处理吧，我没有时间。”

但是，卡瓦列夫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立刻看完这份报告，于是中尉只有离开这里，回自己的破屋里去等候了。他已经把一只手举向船形帽，请求离开这里的时候，房门大开，一个人低着头从门楣下跨进了门坎，这正是他在这里最怕遇到的那个人。军官们马上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伊万诺夫斯基只是把身体转过来，便再也不动了，举起的那只手

仍旧紧靠船形帽。

伊万诺夫斯基穿着文书的棉背心，上面没有级别标记，头上戴了一顶油污的呢绒帽，而司令部的军官们都戴着羊剪绒的高级皮帽——看来，他衣着普通、穿戴与别人不同的外表，将军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尉身上：显得很特殊。

“这个人是谁？”他问上校，从语调里听得出来，不会有什么好事了。

“中尉伊万诺夫斯基，某师某团的排长，”中尉硬着头皮大声报告，但马上就降低了嗓门。

“哪个，哪个师的？”

伊万诺夫斯基把自己师的番号明确地又说一遍。

“我不知道这个师。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突围出来的，”上校站在将军面前说道，他整个魁梧的身体表现得那样毕恭毕敬，同时又显得有点随便。伊万诺夫斯基却象块石头似地硬梆梆地站在那里发呆，和这样高级的首长谈话，他一生中还是头一回。

“突围出来的？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去朵尔采沃？”

又提起可恨的朵尔采沃来了，这使中尉又受到一次刺激，但这一次刺激反而帮助他很快摆脱了自己的拘束。

“我是为德国人的弹药基地的事情来这里的，将军同志。”

“新鲜事！”将军说道，他没有向桌子跟前走去，半个身子朝中尉站着。他那挑剔的目光一直打量着伊万诺夫斯基

挺直的身躯。

“是个什么样的基地？在什么地方？你从哪儿知道的？你们都了解清楚了吗，上校？”

“我正在了解，将军同志。”上校用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道。一个人没有全讲真话时用的这种语气迫得中尉再一次对他表示了不客气。

“上校不想了解，将军同志。”伊万诺夫斯基放了一炮。将军先是朝中尉、接着朝上校投射出锐利的、询问的目光。中尉感到，有一件什么事情现在就要最后决定了，便补充说：“炮兵基地离这里六十公里，有几列车弹药，几乎没有防卫，周围只有一道铁丝网。能够消灭掉。”

“原来这样！你们已经侦察好了？”将军说着，便把整个身子转向着他。将军身上的短皮袄敞开着，勋章的珐琅在白衣襟下面闪了一下。他说话的语气也软了，中尉高兴地发觉这点，于是决定毫无顾虑地把一切统统说出来。

“很容易炸掉，或者烧掉。这样，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就没有弹药了。”

中尉立即对自己的冒失感到后悔，显然，将军对他猛然发生的浓厚兴趣立刻被他这种冒失浇冷了，他只是低头对着自己短皮袄衣领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坐在桌子旁边的板凳上，其余的人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你说很容易？一炸——德军就没有弹药了？是这样吗？”

“不全是这样，将军同志，”伊万诺夫斯基想纠正自己的

过失，“我们已经试过了，但是……”

“已经试过啦？真试过了？那么结果怎样呢？”

“损失了两个人，其中有沃洛赫大尉。”

“这就是了，中尉……你叫什么？伊万诺夫斯基。轻率是不成的，要动点脑筋。但他是好样的。”将军转过来对上校说：“既然这样，那就派他带个小分队去，给他十来个人。你们办好这件事，不要拖延。”

“他没受过审查，将军同志，”上校小声地插了一句话。将军不满意地皱了下眉头。

“乱弹琴！他已经受过审查了。是德国人审查的。而这将是第二次审查。我去告诉克留金。”接着把头转向眉开眼笑的中尉，兴奋地提高了嗓门鼓励他说：“你就准备小分队吧，中尉。和他一起。后天报告完成的情况。明白了吗？”

“是！”这一声伊万诺夫斯基是象小孩儿一样高兴地喊出来的，他精神抖擞地敬了个礼，就出去了，随手关上了门。

第二天他就不那么走运了。早晨他又一次去找上校，上校打发他去找一个什么卡拉米茨少校，中尉等了半天，最后总算等到了，他向这个卡拉米茨转达了上校的命令，但是这人开头第一句话就轻言细语给了他当头一棒。

“我上哪儿找人去？我这里再没有人了，只剩下一个赶车的。”

伊万诺夫斯基觉得一切又要落空，不想再问，重新鼓足勇气，快步朝那座门窗美观的高房子走去。当然，人家没放他进去。他和门口那个沉着镇静的哨兵愚蠢地、毫无成效

地争吵了一场，当他简直到了绝望的时候，房门突然大开，将军本人在门口出现。他没有立即认出来昨天见过面的中尉，中尉只得再一次说了自己的姓名，用发颤的声音报告说：组织小分队的事情毫无结果。将军的眼睛闪着忿怒，仿佛这次没有成功的过错在伊万诺夫斯基自己身上。

“怎么能毫无结果呢？”

“没有人，将军同志。上校派……”

“叫齐米柯夫到我这里来！”他冲着站在身后的一个人说了一声，那人很快地便在门斗里不见了，将军再没说话，也回那里去了。门口的台阶上只剩下伊万诺夫斯基和哨兵个对个地站在那儿，哨兵厚着脸皮，幸灾乐祸地默默瞥了他几眼，脸上的表情好象在说：反正你进不去！而中尉现在倒不急于进这所宽敞的房子了，他老老实实地等了二十来分钟，这时，台阶上出现了身穿新短皮袄、肩挎毛瑟枪的大尉。

“到齐米柯夫大尉那里去领人。明天十三点整将军等着听取关于小分队准备就绪的汇报。”

“是！”伊万诺夫斯基说道。他甚至没有问齐米柯夫是谁、上哪儿去找他，只好到外面向军马饲养员们打听。果然，傍晚他手里已经有了一个包括八名战士和一名准尉的名单，名单上排在第十名的是他自己。

于是中尉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除了人员，还应该领弹药、燃烧瓶、炸药和两米缓燃导火线。九个人中有四个人没有棉坎肩，穿的是破烂的军大

衣，需要重新配给他们服装。有个人长时间不想发伪装服，取货单上没有一号首长签字；滑雪板还得到十五公里远的一个后方村子里去取。出发前的最后一夜，他凑合着睡了两个小时，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坚持听完了三次技术指导。但到了十三点三十分，他还是把小分队带到了那所门窗美观的高房子跟前。这回他是通行无阻地进去了，他激动而自豪地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下达战斗命令。

将军打完电话，放下话筒。他没有脱掉套在军便服上的皮坎肩，默默地来到院子里。以邱宾为排头兵的几名战士听到“立正”口令，整队站在那里等候。将军默不作声在队列前走过，检查了每一个人，在他这张刻有道道皱纹，双颊深陷的老年人的脸上，首长的威严一点儿也没有了，伊万诺夫斯基来司令部以后整个这段时间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现在 he 只是一个面容疲倦、操劳过度、睡眠不足的老人。“孩子们！”中尉被将军这种意外的称呼感动了。“你们都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这可有困难啊，你们知道吗？但应该去。你们看，多大的风雪，”他指了指阴云低垂、雪花飘落的天空，“飞机不能起飞。全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他还嘱咐大家在敌后遇到困难时应该怎么样；他说，在那里，除了同志，谁也帮不了忙。他本可以不讲这些的，因为中尉有在敌后作战的足够经验，这是在斯摩棱斯克森林里迷路两周时积累起来的。然而，他那种完全没有官架子的、几乎是朋友式的口气，那种对他们吉凶莫测的命运所表示的同情，头几句就使中尉大为感动。从这时起他就准

备赴汤蹈火，决不辜负将军亲切的关怀。此时甚至连死他也不觉得可怕了——他准备牺牲性命，只要祖国需要，只要将军赞许。

大概，不仅他一个人，院子里这支小队伍里的其他人都有这种感情，大家全神贯注，决心十足。当伊万诺夫斯基行过军礼，领着队伍向外走的时候，他心里奏起庄严的进行曲。他知道，他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不应该完不成，因而也不可能完不成……

第 六 章

在最后几公里的路上，无论中尉怎么样催促战士，黎明时他们还是只赶到了公路的附近，落在刮了一夜暴风雪的白皑皑的旷野上。

趁黎明前的黑暗，伊万诺夫斯基又走了一公里。他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接近土坡上依稀可见的那条公路，这时他突然看到路上有几辆汽车从山岗上下下来，中尉气得差点儿喊出声——只差那么十五分钟就能跑到公路那边了！开始他安慰自己：汽车很快就会过去。汽车的确很快地在远处消失了，但紧接着又出现了一队马车，随后从山岗那边又跑出来两辆黑色小轿车，撵到前头去了。事情明摆着：白天

已经开始，车辆越来越多了；要想带着他们这个自制的雪板拖车越过公路而不被发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于是，伊万诺夫斯基虽不向公路靠近，但也不离开它，他猛然向旁边一拐，向离这里不远的光秃秃的山岗滑去，那里稀稀拉拉有些灌木丛。总的看来，隐蔽在那里并不理想。但呆在公路眼皮底下这个凹地里，那也绝对不行；天已经亮了，德国人随时都能发现他们。

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滑雪登上了小山岗，伤员差点儿从雪板拖车里被甩出来；中尉忍住已经习惯了的疼痛，疲倦地向离得不远的灌木丛滑去。但半路上，雪地里突然出现了一道相当高的土墙，正好横截山岗，向公路延伸。中尉感到莫名其妙，停了下来，但很快就弄明白了，他高兴地向慢步跟在身后的同志们招了一下手——快！

这是有一半被雪盖上了的反坦克壕，是战争开始后遍布俄罗斯大地的长达许多公里的野战工事之一。为了修建这些工事，曾经花过多少人的劳动！但是在中尉的记忆里，这样的战壕一次也没有使希特勒坦克部队前进得慢一些。大概只有在步兵和炮兵的火力严密掩护下，这些庞大的工事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否则它的阻挡坦克的作用比普通的路沟大不了多少。

现在他们在这个空旷的山岗上遇到这个战壕，倒正是时候。中尉毫不迟疑，顺着斜坡滑进了积雪成堆的宽阔沟底。这儿还相当深，风比较小；沟的一边上沿，雪被风刮成了优美别致的屋檐，因此沟上面有了一些遮挡。也许可以在

这儿呆些时候了。

他们一个个进了这个掩体，倒在沟底拐弯处松软的雪堆上。他也倒了，屁股象焊在被暴风雪吹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他喘着热气，心不在焉地久久望着雪尘在对面屋檐脊顶上随风飞转。他不知道往后怎么办，从哪里和怎样越过那条该死的公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伤员好。他只是感到，从昨夜起，事情远不象原先估计的那样，一切都比估计的要坏，而且很可能结局十分糟糕。但是，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一切却归于失败——这是他不能答应的。他觉得，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对付环境，象对付德寇那样。他的决心倒是足够的，但就怕体力不争气。

他们在战壕里躺了二十分钟左右，没有说一句话，他自己连开口说话和指定一名监视哨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只是心里嘀咕：马上，应该马上叫一个人去。虽然他们都精疲力尽到了极点，但需要有个人牺牲休息，爬上去，顶风冒寒，以免敌人袭击时大家措手不及。

“要一名哨兵，”昏昏欲睡的伊万诺夫斯基终于说出来这句话，他等了一阵，但战士们一片沉默，“苏德尼克，你去。”

苏德尼克背靠雪墙，膝盖上扶着装满锯末的背囊，里面放着脆而易碎的东西。他好象是睡着了，戴着湿风帽的头向后仰，眼睛半闭着。

“苏德尼克！”中尉的声音大了一些。

“马上，马上去……”

还是停了一会儿，这个战士才把身子猛力一挺，坐直了腰，然后双手一撑，站了起来，他身子猛然摇晃了一下，险些跌倒。

“轻些，注意燃烧瓶！”中尉吃了一惊，一下子从困顿迷糊的状态中惊醒过来。

苏德尼克把滑雪板留在下面，在离战士们稍远的地方爬上了高陡的胸墙，他穿着白色伪装衣的身子紧贴在胸墙后面洁白的雪地上。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在走？”伊万诺夫斯基问道。

“还在走。没完没了的。”

当然罗，他们是要走的，他们不会停下来等待着他顺利越过公路去消灭他们的基地。他们有他们的目的和任务，只不过和他的任务正好相反罢了。他想：幸好附近没有他们的停车场和后方部队，否则，他在这个掩体里停留的时间就长不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中尉冷得都发抖了——走时发热的身体开始感到寒冷刺骨。除了胸墙上的苏德尼克，大家都疲惫不堪地躺着不动。中尉想到这样太容易被冻坏，便喊了一声：

“不要睡！大家都坐起来！”

一个人翻动起身子，这是鲁卡绍夫，他坐起来，用疲劳无神的目光环顾积雪的掩体。彼沃瓦罗夫在舒适的雪地上没有动——他睡着了。中尉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让他们

打几分钟盹吧，否则就别想叫动他们一下。三、四十分钟之内他们或许冻不坏吧。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已经没有权利睡了。

伊万诺夫斯基意识到了面临的危险，费了不少劲赶走了令人头昏脑胀的瞌睡，振作了一下，站了起来。中尉早就担心哈基莫夫，但只是现在才有机会看他，于是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伤员跟前。正象他担心的那样，战士的情况不好。大概他还没有恢复知觉，一动不动地躺在滑雪板上，满是积雪的斗篷把他包得紧紧的，从斗篷的小口看到了他那苍白而又发青的脸。急促而困难的呼吸使斗篷的边缘结上了一层厚霜，雪花从斗篷的边缘掉在他湿淋淋的面颊上，立刻就化了——他在发烧。中尉弯下腰轻轻地叫唤他，但他怎么也没有反应，只是继续紧张急促地喘着气。

伊万诺夫斯基在伤员跟前坐了一会儿，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发生了怀疑。哈基莫夫因为这个决定才受了这一路的罪。如果当时把他留在一个干草垛里等小分队回去，也许真的会比现在好。但是那样作，还得留一个人照看伤员，这是中尉所不能同意的——本来十个人已经只剩五个人了。而且这五个人面临的主要战斗任务越来越复杂，正是因为这个任务他们才上这儿来，虽然来的晚了。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穿过公路，但是又怎么能在这么多的德国人眼皮底下穿过去呢？中尉实在想不出办法。

现在他脑子里一直想这个问题，他很快站了起来。他反正帮不了哈基莫夫什么忙，而任务却是他一刻也不能不

想的。他把滑雪板插到雪堆里，摇摇晃晃地踩着雪，爬到了胸墙那里的苏德尼克跟前。这儿有风，比沟底冷，但是能看到一大片原野和公路的两头，公路的中部被小山顶遮住了。战壕就通往那里。在公路的那一边，小树林和灌木丛零零落落，长了一大片，有的离公路很近。在河滩旁边那熟悉的小松树林遥遥在望，上次他们是在那儿遭到不幸的。

中尉从怀里掏出了地图，对了对位置。他的地图里有意地没有标出基地位置，但是不标他也牢牢记得基地位于河边小树林北侧突起的那一部分。现在，中尉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小山岗，看出他们离那儿最多还有两公里。离得这样近，可就是去不了——这又使他感到十分难过。由于这条该死的公路，他们得耽搁一整天——在吉凶莫测的情况下受折磨和挨冻一整天。

伊万诺夫斯基开始和苏德尼克一起观察公路，公路上交通频繁，中间短时间地出现过没有车的情况。那儿走的基本上是卡车——各种各样牌号带篷和敞篷的卡车，显然是从欧洲各国搜罗来的。它们大多数是向东，向莫斯科开去。中尉突然想到，如果不是全体出动，不带伤员，而是带上哪怕一两个战士，那么，是可以去冒冒险的，可以利用战壕，穿到公路那边去。这一天他在那里至少还可以看到、侦察到许多东西，制定出一个行动计划，天黑时把全分队带过去。

这种想法使他一下子来了劲，新的目标使他增添了行动的力量。他爬下胸墙，对滑雪战士们低声却有力地说了

一句：“起来！都跳一跳暖和暖和！喂！”

克拉斯诺库茨基、鲁卡绍夫立刻站起来了，用手套拍打着身子。鲁卡绍夫推醒了睡得糊糊涂涂的彼沃瓦罗夫。

“暖和暖和吧！打起点精神！”中尉一个劲儿催促，这时他想起了一个叫人起来的最好口令：“开早饭吧！鲁卡绍夫，拿出罐头来，每人两块面包干。”

鲁卡绍夫带着睡意，打着寒颤，从皮包里拿出来几块黑麦面包干和一盒鱼罐头。中尉用刀吱扭吱扭地把铁皮底割开了，于是大家使用刀子和匙子刮那里面冻得硬梆梆的东西。

“喂，怎么样，小彼沃瓦罗夫，你睡了一会儿吧？”由于寒冷中尉故意振作了一下精神，问道。

“是的，睡了一会儿。”

“你支持不住了？啊？”

“太累了，中尉同志。”战士直率地回答。

“我还以为，你是个棒小伙子呢，”伊万诺夫斯基轻松地开着玩笑说，“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我不行了。”

他不分辩，不叫苦。现在，经过一段休息之后，他露出了羞愧的表情，黑黑的面颊在刚刚睡醒之后泛起了几乎是孩子般的红晕。

“不行了！”鲁卡绍夫带着指责的语气摹仿他说，“又不是在妈妈跟前。现在可是……掉队的比打死的更糟。”

“被打死算啥，打死了也就不需要用力气了。可你看这

儿——两只手被绳子磨出来血泡。”克拉斯诺库茨基伸出自己红肿的手掌，昨夜，他显然吃了苦头。但是谁没有吃苦头呢？而且谁晓得马上还要吃多大苦头呢！

“可是也有聪明人，”鲁卡绍夫用方才那种气愤的口吻继续说，“不知是溜掉了，还是迷了路。结果我们在这儿替他们吃苦。”

他指的是邱宾和扎雅茨，中尉同样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被打死的那两个，不说也清楚：哈基莫夫，虽不好说，但也还比较清楚；而准尉和扎雅茨呢？昨夜在路上突然不见了，好象钻进地里一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叫人莫名其妙。

“如果这么简单，那就好了。但假如不是这样呢？”鲁卡绍夫严肃而忧虑地看了看战壕说。中尉这才明白中士的意思。但是中士说的那种事是不会发生的。确切些说，伊万诺夫斯基不愿意设想、甚至不愿意别人暗示邱宾准尉会叛变。然而他内心却充满着犹豫和怀疑——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小分队的人本来就很少！

“还会顺着我们的足迹把德国人引过来，”克拉斯诺库茨基天真地附和说，“事情很简单：雪地上有滑雪板的痕迹，只要追——总能追上的。”

“一切都可能。”鲁卡绍夫脸色阴沉地表示了同意。

“不，不能这样说，”伊万诺夫斯基搭腔了，“准尉不会这样，他不是那种人。”

鲁卡绍夫咀嚼着面包干，疲倦地望着战壕的尽头。

“可能不是那种人，但一切都可能发生。比方我们那个第一〇九队，也有过那么一个相貌堂堂的大尉，一个劲儿修防御工事。等修好了，却修的不是地方。德国人一来，他第一个举起了双手。”

“喂，你不要这么说了。”伊万诺夫斯基坚决打断了他的话。“邱宾不是那个大尉，这是肯定的。鲁卡绍夫，以后你要多相信人，人家不也相信你嘛。”

“那是我呀……”

“你为什么认为邱宾不如你？”

“我还在这儿，可是他却不见了。”

是的，他的逻辑几乎是无懈可击，反驳他是困难的。事实上，他就是没有掉队过，虽然他还是个殿后兵，而且他也没有让此时坐在旁边迅速舔着勺子的彼沃瓦罗夫掉队。总之，鲁卡绍夫是对的，但是伊万诺夫斯基不愿意过早地给邱宾下结论。准尉身上毕竟有某些好东西，尽管他的固执使中尉生气。

他们坐在雪堆上，很快就吃完了罐头，嚼完了面包干。伊万诺夫斯基把勺子放回口袋里。

“鲁卡绍夫中士，”中尉换了一种语气说，“留在这儿代替我。我需要去侦察一下。大家都留在这里。可以休息。注意观察周围。我很快就回来。有不明白的吗？”

“明白了。”鲁卡绍夫带着乐意的心情回答。

“一切都按规定办。要照顾哈基莫夫。”

“一切照办，中尉。我们会照顾好的。”

“好了。小彼沃瓦罗夫，跟我来！”

“我？”彼沃瓦罗夫觉得奇怪，但只是迟疑了一下，顺从地站了起来。

“带上滑雪板和其它东西。我们走吧。鲁卡绍夫，把苏德尼克替下去，他恐怕冻僵了吧。”

伊万诺夫斯基踩着有的地方齐腰深的积雪，顺着战壕向公路走去。滑雪板他们拿在手里。战壕有时出现小弯，拐弯时，中尉警惕地向四周张望。但战壕里和附近似乎没有人；壕沟底部有棱有角的雪堆没有人动过。他们终于听到了柴油机沉闷的嗡嗡声，闻到了在严寒里难以闻到的合成汽油烧着的烟味——快到公路了。伊万诺夫斯基从一个转弯处突出来的粘土坎后面探出身子，又立即缩了回来。跟前，就在战壕宽阔的出口处，一辆汽车闪过，上面盖着被风吹得鼓起来的帆布；接着，过了一辆又一辆。这是汽车队，一些敞篷车上驾驶室旁边能看到身穿绿色军大衣的、缩着脖子的德国人。看来，俄罗斯的严寒把他们冻得够呛，车上的人对周围也就不大注意了。中尉向心情紧张、浑身发冷的彼沃瓦罗夫打了个手势，并沿着雪堆的一边爬上了斜坡。

当然，他对马上成功、对找到穿过公路的好时机远不抱多少希望，但老是这样的不走运——却是他未曾料到的。他在凛冽的寒风中都快冻僵了，好不容易才等完轰轰隆隆的汽车都过去了，附近好象再没有什么人了。但是他刚从胸墙的冻土块后面探出身子，立刻又看到了不远处有德国人。

一共三个，是通信兵。一个爬上了柱子，在那里搞他的电线，另外两个拿着电话机，坐在公路边——看来是在接线路。他们的背后露出来步枪的枪筒，地上放着几捆电线和某些工具。正在忙事的德国人固然没有四面张望，但如果两个俄国人想从他们鼻子底下越过公路，他们自然还是能发现的。

这就是说，又需要等待了。

于是中尉沮丧地躺在被雪覆盖的冻土块上，眼睛盯着公路。身子冷得够呛，脚冻木了，受伤的大腿疼得更厉害了，伤痛越来越使他分心。

路上的交通，时而车水马龙，时而略微安静，并且出现一公里，或许更长距离的中断。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次了。出现过一两次可能跑过去的比较有利的时机，但那几个德国人还在那儿维修线路。中尉三次掏出坦克上用的那个沉甸甸的小表，最后一次的时间是十点半。通信兵还是没有走开。过了半个小时，坐在柱子上的那个，终于下来了，中尉想，也许现在他们该走了……但这个德国人走到下一根电线柱子跟前，又把自己的抓钩挂在脚上，向电线柱子上爬去。他们三个人在那里小声地谈论着什么，但风把他们的话音往别的方向吹，所以中尉什么也没能听出来。

这样没完没了地继续了很长时间。伊万诺夫斯基已经开始观察四周了，打算在离这些通信兵远一些的地方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这时他发现路边上那两个德国人身旁又出现了一个。完全不知道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他大概原先就在中尉看不到的山岗后面，守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中

尉感到后怕，如果刚才冒险跑过去——那就准保碰上这个看不见的德国人。只见他蹲在电话机旁，和其余两个谈了几句，并向柱子上那个人挥了一下手，那个人开始往下爬。在他下来的时候，这三个人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拿起自己的挎包和箱子，顺着公路走去。

这一次他们停下来，离战壕比较远了，他们已经谁也不上柱子了。中尉看了一下公路的另一头——现在看来应当下决心了。但首先必须尽量靠近公路。

他从斜坡慢慢地下到了壕底，受伤的大腿被弄得挺痛。在雪地上坐了很久的彼沃瓦罗夫一跃而起，伊万诺夫斯基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于是他们紧靠着壕底陡峭的一侧迅速往下走。这时，从公路上很容易发现他们，所以走了不远中尉就卧倒在横堆着的雪包后边，身子紧贴雪地，彼沃瓦罗夫敏捷地在他旁边卧倒，把身子藏进了雪里。他那张孩子般的脸庞，由于寒冷，加上睡眠不足，显得浮肿，精神高度集中地对着中尉，中尉的眼睛不时碰到他焦急询问的目光。彼沃瓦罗夫趴在战壕底，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得靠近指挥员，指挥员现在要作出对他们俩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决定了。

但是在这里就连中尉自己也是什么都看不到，他不得不依靠听觉，敏锐地捕捉从公路上传来的各种零乱的声音。当然，在偷越公路的各种可能的办法中这一招并不是最可靠的，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等公路上柴油机的轰鸣略有减弱、附近再没有听出什么新的声音时，伊万诺夫斯基暗自

说了一句：“走！”就一跃而起。

在深雪中他几步就跳到了公路旁的战壕终点，从这里向外一看——眼前这段公路确实是空荡荡的，虽然他根本就来不及望一眼远处那个小山岗。他弯下身子，拼死劲地跳到轧平了的公路上，又使劲跳进了公路那一边战壕的雪堆上。跑时他满意地听到身后彼沃瓦罗夫的喘气声，因此更是用尽全身力气沿着壕底向已经不远的转弯处飞跑。但跑了几步之后，他又开始听到发动机急促的轰隆声，他心里一紧，感到十分不安，估计会出现喊声，也可能是枪声。但他毕竟还是跑到转弯处后面隐蔽了。彼沃瓦罗夫虽然没有同时赶到，但是，中尉回头发现，战士卧倒了一会儿以后汽车才出现。汽车没有减速，很快地就开过去了，这天早晨他第一次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一口痛苦的，叫人肝肠寸断的闷气！

“咳，真见鬼！……”

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停了一会儿，然后伊万诺夫斯基跪起来看了一下四周。不远的地方似乎有灌木丛，从高高的胸墙那边，有的地方已经露出来稀稀拉拉的树梢，中尉和战士有气无力地沿战壕走去。他们离开公路有好一段距离，打算爬出战壕，到原野里去。奇怪的是：彼沃瓦罗夫竟比他先爬出去了。中尉第一次试着往上爬，但刚爬到一半，就从陡坡上滑回到了雪堆。大腿又疼得厉害了。这一次他没能或者不愿压住自己的哼声，彼沃瓦罗夫在胸墙上转过身来，用害怕的、询问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

“没什么，一切都很好。”

伊万诺夫斯基打起精神，忍住了疼痛，战士把滑雪杖递给了指挥员，指挥员靠滑雪杖的帮助最后翻过了胸墙。

“好了。现在用滑雪板！”

这儿，大概已经可以沿着战壕走了，因为在公路的那一面有胸墙的掩护，有些地方，灌木丛把他们掩护得也不错。在右边，远处露出了小松林灰色的树梢，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他们的命运——成功，或者是不幸，是光荣，或者可能是死亡。

第七章

在滑雪穿过灌木丛的时候，伊万诺夫斯基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这感觉越来越强烈，几乎无法克服，使人难受。

真叫人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感觉竟出在这个时候，并且怎么也摆脱不了呢？看来，一切终归算是比较顺利地过来了；他们穿过了公路，敌人也好象没有发现他们，经过一夜艰难的长途行军，他们现在已经接近了目的地。虽然也遇到重重障碍，但结局即将分晓，他们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吧。固然，他们的力量已经分散，一部分在过火线时损失了，两

人在夜里失踪，四人被留在公路那边，因此这里仅仅剩下两个人。两个人当然比不了十个人，然而他目前这种莫名其妙和无法摆脱的不安心情未必是由此引起的。

小树林已经遥遥在望，中尉越接近它，心里就越是忐忑不安。他焦急得顾不上停下来理一理大腿上的绷带——伤口好象又在流血了。其实，他早就尽量想忘掉伤痛，这一夜他已经习惯了。现在他甚至不大往两边看——而是一个劲儿拚命向小树林滑去，好象他将在那里得到一生中最大的奖赏，但也许还会是最大的灾难呢。彼沃瓦罗夫努力在后面紧跟，他满身是汗，已经顾不得用伪装衣的袖子去揩了。他俩气喘吁吁地沿着灌木丛的边沿迅速往上滑。天已大亮，寒风习习，浓云密布的天空低垂在灰蒙蒙的、荒凉的、雾气腾腾的大地之上。

登上小山岗后，伊万诺夫斯基透过赤杨树丛光秃的枝条朝下看。前面是一个小山谷，灌木丛象舌头似地一直延伸到谷底。从灌木丛里中尉好不容易认出那片赤杨树林子，自己和沃洛赫上次就是在那里等候天黑的。当时那是一片掩护了七个人的小密林，现在只剩下光秃的树干和冻冰的枝条，它们的黑影孤零零地露在雪地上。里面恐怕连鸟也藏不住，人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山谷那边的小山岗上，德国人用稀疏的栅栏围着小针叶林却依然如故、郁郁葱葱。他们上一回是在那个栅栏附近倒的霉。不过这一回他们一定不会倒霉了，而且不可能再倒霉了！

中尉看到这些熟悉的栅栏，心里稍稍松快了一些——

最主要的是：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的一切就全看他的本领和机智，以及他们两人的勇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出现各种意外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借着灌木丛的掩护，伊万诺夫斯基站着歇了一、两分钟，同时也为了摆脱掉那一直纠缠他的焦急心情，他尽量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对付过去的。当然，他自己并不能完全相信这点，还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他昨夜本来一直就烦躁不安的心情又被搅乱了。彼沃瓦罗夫什么也没有问，显然他不问也能明白这时的处境，他是在等继续往下走。但伊万诺夫斯基的目光总也不肯离开远处那片针叶林的边缘，似乎希望在那里看出点名堂来。那儿离这里起码有一公里远，雪地上除了稀稀拉拉的松树和几棵当栅栏用的木桩外，几乎看不出别的东西。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德国人可能已经把基地伪装好了。要知道，他们也会搞伪装的——，那里可以架起各种各样的网，栽上绿色的树，再盖上雪。只有一点叫人奇怪：上次沃洛赫的侦察员们发现的那条大道哪儿去了呢？这条大道明明是沿着山坡直通小树林，德国人卡车当时在上面转运弹药；现在那儿却是一片白雪，连路的影子也没有了。“大概是夜里被风雪埋了吧？”中尉心里想。但即使被风雪埋上，也该留下一点痕迹呀。但也许他们另外铺了一条路，从这里看不见，其实他现在并不需要找到路，以后走它的可能性也不大。现在重要的是发现一条能潜入小树林的通道，以便趁黑夜神不知鬼不觉地尽量爬到栅栏跟前。从开阔的田野这一边显然是不大可能办得到，应当

从南边去找到这样的通道。

“彼沃瓦罗夫，走！但要轻点……”

他们躲开那些时时挂着风帽的冻树枝，顺着灌木丛往下滑去，想绕过这片开阔的田野。伊万诺夫斯基保持高度的警觉，全身都紧张了，昨天一整夜，虽然那样忙乱，但也从未这样紧张过。好在周围一片寂静，他心里这才踏实了些，中尉已经多少次考虑过：怎样才能更好地进到栅栏那边。——现在这恐怕是他这次任务中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一部分了。要是弹药垛离铁丝网近，那当然可以朝那儿扔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那些弹药垛未必处在投掷距离之内。那就得先钻到栅栏里面去。看来这最好由一个人去做，万一被敌人发现，其余人负责火力掩护，并保证安全撤退。甚至跟哨兵进行短时间的战斗也不怕，因为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估计他们一两分钟就能全部解决问题。要是没有狗，那就难办多了。

即使有狗，也只能让一两个人钻过铁丝网，——其他人应该负责把狗和哨兵的火力引开——此外别无办法。关键是要在有数的几分钟里将尽可能多的弹药垛烧着和炸掉。只要弹药连续爆炸，把基地烧光，就大功告成了。

他们沿矮树林穿过谷地，紧靠着树林旁边，通过了田野那段开阔地带。附近一带不见有人，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现在他们已经走得很慢，小心翼翼。中尉有时停下来侧耳细听：冬天的野林，除了寒风习习，四周万籁俱寂。有一次风把远处的马达声带进了山谷，但伊万诺夫斯基听出这是从公路上传来的。而远处小树林那边却是鸦雀无声，死气

沉沉，静得出奇。

半个小时后，在他们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沟壑。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不毛之地，两面斜坡上盖满了雪，一眼就能看到头。过了一会儿中尉认出来，沃洛赫上次正是从这条沟冒着大雪向栅栏走去的。这就是说，现在他们应当再往前走，绕基地在灌木丛里继续走进一公里。到了那里，一定能更加接近栅栏并看出个究竟来。

中尉回头瞧了瞧彼沃瓦罗夫小伙子，那通红的脸被耷拉着的湿风帽遮了一半，他拚命地撑着滑雪杖，两只滑雪板还是深陷在松软的雪地里。伊万诺夫斯基知道快到目的地了，心里越来越紧张。他勉强克制住自己，默默地示意彼沃瓦罗夫等一等，他自己则绕过沟壑，一直滑到一大片枝条茂密的榛树后面才停下来。

削掉了树枝、去掉了树皮的栅栏桩子已经很近了。这些木桩至少有一人高，在落有白雪绿装素裹的松树苗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奇怪的是，木桩里面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尽管他怎样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但还是根本找不到那一垛垛熟悉的灰色和黄色弹药箱。从上次他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些箱子时起，它们一直十分清楚地留在他脑子里。那些帆布同样也看不到。这情况使中尉预感到情况不妙，心里不安起来。于是他向彼沃瓦罗夫挥了挥手，要他“坐下不动”。彼沃瓦罗夫明白他的意思，在滑雪板上坐下来，而中尉犹疑片刻后，滑出了灌木丛。

他这样做恐怕是不够理智，小分队的指挥员本来不应

该亲自去这样冒险，但是伊万诺夫斯基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那种不祥的预感现在已经完全支配了他，喉咙里象是被一团东西堵住了，憋屈得要命，他强咽下这口闷气，两眼一直盯着已经不远的林边，迳直往前奔去。

现在中尉离树林边缘只不过三百来米，而且他在走头几步的时候就发现那木桩上的铁丝网没了。过去围在基地外边的铁丝网，现在已经拆掉了。这使中尉十分不安，甚至惶恐起来。如今他什么也不提防，也不担心在开阔地里容易被发现，他几个箭步就冲到小树林边几棵松树苗跟前，呆住了，眼前的场面使他心里全凉了。

基地没了。

小山岗的这个松树林里，哨兵，狗，一垛垛的黄绿色木箱全没了——脚下是平平坦坦没人踩过的雪地，只有顺着树林边缘立着的一排白色的木桩还能使人想起这里曾经是个基地，此外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木桩上的铁丝网拆得很干净，看来是运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了。

中尉先是感到困惑莫解，现在已经是心慌意乱，几乎不知所措。他在一夜大雪过后的干净清新的雪地上站了一会，然后向对面、曾经是车辆进出口的方向滑了一段。但那里同样也是空空如也，只是在茂密的小松林的雪地里可以猜出有几个拆空了的掩体坑，在树林边的木桩旁边还有一堆落满雪的杆子，大概是当垛垫用的，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开阔地上那条大道（它的消失曾经使中尉感到奇怪），原来埋在雪里，象一条白色的带子，空荡荡的——上面

早就没有车走过了。

伊万诺夫斯基突然感到浑身无力，把肩头靠在一棵粗糙的松树干上；面对着这片空空如也、荒凉无人、现在谁也不再感兴趣的小树林，心都要碎了。基地换了地方。这是明摆着的，但他就是无法相信。他心乱如麻，但思想上总是坚决反对这个结论，总是愿意相信这是错觉，是荒诞有害的误会，而且只要稍加思索，事情就会清楚。他觉得只能这样，因为他实在无法容忍自己再一次不成功，小分队决不应该白白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决不应该无谓地冒出生入死的危险，白白损失了人，费尽了力。他们来晚了，他一时不肯相信这会是真的。但当他在松树下喘息了一会之后还是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迷魂阵，这是残酷无情的现实，是他在战争中碰到的又一个、而且是更大的倒霉和不幸。

他勉强地将肩膀从树干挪开，在滑雪板上站稳，双手无力地用滑雪杖往地上一撑。滑雪板在沙沙响的雪地上向前滑了一下又停住了。他不知道往下该去哪里，头一回感到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去了，于是他倚着滑雪杖站着。有一只喜鹊在附近松树的枝头上跳来跳去，生气地朝他噉噉喳喳叫个不停，一只小山雀在他头顶上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吱”地一声消失在密林中。伊万诺夫斯基什么也没有注意，他那虚弱无力的肌肉好象发僵了。他什么也不想，瞧着那空荡的小树林出神，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似乎再也支持不住了。

他就这样地消磨了不少时间，但小树林还是那样空空

如也和多余无用，中尉最后只好振作起来——毕竟还有几个战士在等着他呢！首先是彼沃瓦罗夫。伊万诺夫斯基回头一看，彼沃瓦罗夫正耐心地坐在沟壑那边，即原先中尉叫他留下的地方。中尉向他招了招手，意思是“过来吧”。

当彼沃瓦罗夫沿着中尉的雪辙滑来的时候，伊万诺夫斯基解开了脚上的滑雪板，一步踩进了雪里。这里大概可以不用担心害怕了，空空荡荡的松树林里没有什么人。他在一个落满积雪的矮树墩上坐下来，伸开那条受伤的腿。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了。主要是考虑好怎样向战士们解释这次不成功的原因。他老感到有某种内疚，仿佛自己捏造了一个关于基地的故事来骗谁似的。其实，如果把真相弄清，那头一个上当受骗的还是他自己。确切地说，大家都是被德国人骗的。然而德国人居然能骗了俄国人——这在伊万诺夫斯基看来简直是千古奇闻！在所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里，俄国人在聪明才智方面永远胜过德国人。这一回怎么又不是了呢？

话又说回来，这也谈不到什么欺骗。这是战争。里面虚虚实实，千变万化；各种因素，变幻莫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时间。这一次，时间帮了德国人的忙，伊万诺夫斯基和战士们这才输得这么惨。

彼沃瓦罗夫顺着他的雪辙悄悄地滑过来，默默地停在他的对面。他疑惑不解地看了看周围的小树林，偶尔向中尉投以疑问的目光。终于他猜到几分了。

“怎么……它原来就设在这儿？”

“是呀，原来是在这儿。”

“该死的家伙！他们给搬走了，是吗？”

“当然是搬走了！”伊万诺夫斯基从树墩上很快地站起来，“我们赶来喝西北风了！”

中尉没想到彼沃瓦罗夫对他激忿而又充满痛苦的话竟能表现得那样心平气和。

“看来，我们来晚了……”

“那还用说。过了两个星期了。时间呀，时间！”

“现在怎么办？得去找吗？”

“找什么？”

“基地呗，上级有命令嘛！”

对，基地虽然不见了，但是破坏这个基地的命令并没有失效。曾几何时，还不是中尉自己跑到司令部去请求命令的！这命令也终于被他领到自己不走运的头上。伊万诺夫斯基中尉，现在你就执行命令吧，寻找基地吧！中尉心里这样怨自己。但彼沃瓦罗夫刚才提命令这件事时的口气，还是中尉所欣赏的，他甚至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旦有事，看来不用对战士们多作解释——既然彼沃瓦罗夫能明白，那么，其他人看来也是会明白的。

中尉起初几乎受不了这次挫折的打击，现在已稍微好些了。他当然懂得，要克服当前的困难也并不那么容易。

从一切迹象来看，基地是向东、向着前线、向着莫斯科的方向转移了，——要找就得到那里去。如果沿公路走，一个个小树林都摸遍，也许真能碰上。但这时他想起了路那边

还有几个战士，想起了负伤的哈基莫夫，又觉得不应该去找基地。也许这需要很长时间、非常多的体力和远比他们现在随身所带的要多得多的食物；再说，带着哈基莫夫能走远吗？这样漫无目标地在密林里去找一个伪装好了的、防守严密的目标，对他们说来真象在干草堆里寻找一枚绣花针那样困难。其实也完全有这种可能，基地根本就没了一——全部弹药早已分发给各个部队，并且在战场上打光了，消耗得连一颗炮弹也不剩了。

那怎么办？就这样连一颗手榴弹都没有扔、背着原封不动的炸药包回去？又得背着这几个鬼燃烧瓶、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走。要是有一个德国鬼子稀里糊涂打一梭子，却无意中打到燃烧瓶上。何况小分队已经损失一半人了。还有个重伤员在拖架上。到头来，就带着这副丢盔弃甲的狼狈相去见那位派你出来的将军，那时中尉该对他说些什么好呢？

“是啊，情况不大妙……”

伊万诺夫斯基抓起一把雪，放在嘴里嚼了一下，又吐了出来。象往常一样，由于一夜不睡觉，嘴里老有一股难闻的金属味。不知怎么的，还感到有些恶心。甚至好象在发冷。不过，发冷看来是劳累过度和失血太多引起的吧。

“你有绷带吗？”中尉问道。彼沃瓦罗夫摘下手套，伸手摸裤兜。这时中尉从树墩上站起来。

“来，帮帮忙！”他说着并解开了裤子。他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多大必要隐瞒自己的伤——一次荒唐的重伤。

“怎么，您受伤了？”

“夜里挂了点彩。真见鬼，一直在出血……”

难怪彼沃瓦罗夫见到吓了一跳，——中尉的白衬裤和棉裤全被浓血湿透，血迹斑斑。一股暗褐色的脓血从不大的切线伤里冒出来，顺着大腿的外侧急急地流向膝盖。

“来，缠吧。要缠得紧点。”

“有个大夫才好。”

“还要什么大夫，你就是大夫嘛！”

看来指挥员的受伤比基地的消失更使彼沃瓦罗夫不安。他蹲下来，不大熟练地用绷带把小腿缠好，并牢牢地打了个难看的结。

“不要让绷带掉下来。”

“行，暂时能对付一阵子了。”

伊万诺夫斯基把沾满血污的旧绷带扔在雪地上，提上裤子，系好搞得很脏的伪装裤裤带，彼沃瓦罗夫帮他系上滑雪板。从战士的镇定自若的样子看来，这次炸基地扑了空，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中尉打心眼里赞佩这位战士的耐心沉着。话又得说回来，对一个战士来说，扑空算什么！又不会要求战士负多大责任。

“现在怎么对小伙子们说呢？”指挥员忧心忡忡地问道。他想和彼沃瓦罗夫商量一下，这样多少能减轻点自己的心理负担。

“就照实说呗。这有什么！”彼沃瓦罗夫回答得很干脆。

“说我们上德国人当了？”

“那还用说！上当就是上当了嘛。”

“对，看出来你是对的。”中尉想了想又说，“应该照实说。不过，现在该往哪儿走呢？”

“那您就瞧瞧地图吧。”战士心地朴实地建议道。

天真得可爱啊！彼沃瓦罗夫显然以为军事地图上什么东西都标着呢。那些农村大婶常常也是这么想的，当指挥员打开地图，向她们打听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或离城多远时，她们甚至感到奇怪呢。彼沃瓦罗夫大概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中尉已经是焦躁难忍，看来已经感到很恼火了，刚包扎过的伤口还在痛，心情坏透了。现在怎么办？他仍旧没有明确的想法。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白茫茫的坡地和远处的灌木丛；直到他重新想起路那边的战士们时，他才提醒自己，赶快采取行动。

于是他双手用滑雪杖一撑，沿着来时的雪辙向坡下飞快滑去。

第八章

他俩沿着熟路在灌木丛里滑行。伊万诺夫斯基这时与其说是已经镇静下来，还不如说对自己的失败正在习惯，他

打算好好地地理一理自己的思绪，决定今后的行动。当然，基地的消失使他的偷袭计划全部报废；想到他们前功尽弃，真气得要哭！他为牺牲的同志、为奄奄一息的哈基莫夫难过，但现在越来越使他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向司令部解释这次失败的原因。在那座窗户高大的房屋的院子里，那全非军人式的送行、将军那言简意赅的嘱咐……都深深地铭刻在中尉的记忆里。这就是将军亲切称呼的孩子们啊！一帮不成器的东西，笨手笨脚的家伙，马大哈！当你们夜间在瞎串时，当你们还在壕沟里睡大觉时，那个基地早已无影无踪了。

情况挺讨厌，没啥可说的。伊万诺夫斯基愁眉苦脸地想。他径直向前走去——他已经顾不上躲开带刺的灌木枝了，只是略微弯曲着身体。他想：倒不如当初将军没有仔细研究他那倒霉的报告，而是把他训斥一顿并送到朵尔采沃去受审查。而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如果将军是严厉地命令他去执行摧毁基地的任务，或者甚至警告他如不完成任务，将以军法论处，那也比这样的话要好受些：“孩子们，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啦！”现在他该怎么对待这个“希望”呢？他带着“希望”干吗去？这个令人扫兴的念头在他心中翻腾，使他不甘心失败，驱使他采取某种行动。可是，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穿越公路的困难又来了——老远就看见公路被部队挤得水泄不通——也许是某个步兵部队在行进吧。那疲乏不堪的队伍，那四轮马车和板车，偶尔也出现骑马的；汽车和拖大炮的牵引车也跟在队伍后面徐徐地开过去。这股密集

的人群川流不息地向东方，向莫斯科开去，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中尉心里发紧——怎么又这样了！大概敌人又在进攻了，我们的防线可能被突破……可怜的首都啊，她要抵挡得住这么大的势力该多不容易！不过，她也会找到力量的，是应该找得到力量的，否则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为她抛头颅、洒热血、遭受如此惨绝人寰的苦难和折磨？——这里总有某种意义，应当有的。

不过他自己这次执行任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尽管他在这含辛茹苦之夜，一口气赶了六十公里的路，可是基地并不因此就比昨天出发时近了，反而可能更远了，因为昨天他还有一支精力充沛的小分队和一颗锋芒初试的决心，而今天他还剩有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战斗力减弱了，就连他本人也是如此。但这还是其次，主要是随着基地的消失，他们已经失去明确的前进目标了——现在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该上哪儿才对啊。

最好还是先赶回去再说。

他和彼沃瓦罗夫手拿滑雪板顺着斜坡又滑到那段反坦克壕里面，再往前向公路靠近就有危险了。他们在就近的反坦克壕的转弯地方埋伏下来，偶尔伸出头来瞅一眼那段公路，用不着老去看，——公路上的队伍长极了，无穷无尽——这时从公路上穿插过去连想都不能想。这就是说，又得等啦，于是中尉只好在距离德国人半公里远的地方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几乎是无可奈何地在严寒中挨过这段时间。刚才那股急躁情绪忽然消失了，他打定主意在这里坐到天

黑，反正白天哪儿也出不去；况且他没有想好做出什么决定，也不清楚往哪儿去——继续向前去呢，还是该越过火线回到自己人那儿去？他几乎不跟彼沃瓦罗夫说话，说起话来就听不清壕沟外的动静，而在这个被雪覆盖着的漫长的反坦克壕里，他们唯一的自卫手段全凭听觉。伊万诺夫斯基偶尔从口袋里掏出表来看看，这块表现在只能表明时间是过得多么缓慢。寒冷的冬夜终于姗姗来临了。

困极了，大概直到此刻中尉才感到这一夜的奔袭是多么累人，连日来一直紧张的心情渐渐地消失，他背靠寒气袭人的雪坡，甚至不知不觉地打了个盹。突然，彼沃瓦罗夫轻轻的说话声使他清醒过来。

“……喂，中尉同志！看样子，他们快过完了。”

“是吗？过去了？”

彼沃瓦罗夫趴在斜坡上，从壕沟伸出头去监视前面的公路，他说话的口气是鼓舞人的，中尉连忙也爬到斜坡上去看。公路上的队伍真的都过去了，末尾几辆马车也已慢慢地向东远去，看来他们两人应该现在就向那个小山丘奔去。

他们拿起滑雪板，踩着自己走过的、还没有被雪盖上的深深的脚印，在沟底一歪一扭地跑着。这次他们又算是运气不错，及时地爬到被压得平实的空无一人的公路上，跑过公路，随后又跳进了壕沟。他们跑得太热了，伊万诺夫斯基汗流浹背；彼沃瓦罗夫还是那样地满头大汗——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从额角顺着两颊滚下来。他在中尉后面大口地喘

气，用伪装衣的袖子使劲地擦着脸，但他还是紧紧跟上，寸步不离。伊万诺夫斯基见了这种情景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个战士体质孱弱，却表现了非凡的热忱，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公正的。

过了壕沟的第一个拐弯，后面就是那座小山丘。这时伊万诺夫斯基才放慢脚步，如释重负似地深深呼了几口热气，这么说这一次又算是过来了。远处有个地方有发动机的响声，中尉对此并不在意，他的心早已飞到前面，那里有四位等他回去的战士。最使他担忧的是哈基莫夫在那里怎么样了？当然，要指望他苏醒过来自己走路，那是妄想，但是毕竟……万一他死了呢？中尉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感到自己连应有的怜惜都没有，甚至反而是希望他死去。要是哈基莫夫死了，那事情就简单得多，他们能省掉许多麻烦，但这显然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事。

他那几个战士就在附近的壕沟里，于是中尉留神静听。他隐隐约约地觉察到有人在低声说话，好象是克拉斯诺库茨基的声音。中尉刚从壕沟的一个拐弯处转出来，就出乎意料地和邱宾打了个照面。看来准尉是听到有人走来时才转过身的。他瞥了一下中尉的眼睛，那张铜褐色的脸上流露出极度的关切。鲁卡绍夫、克拉斯诺库茨基、苏德尼克都坐在离壕坡不远的雪地上，扎雅茨却独自一个人留在沟底里、悲伤地躬着背、一动不动地站在哈基莫夫躺着的拖架旁边。

大家转过脸来看他们，但是谁也没吭声；中尉同样也默

默地谁也不瞧地向拖架走去。

“哈基莫夫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说胡话。”鲁卡绍夫说。

“给他喝水了吗？”

“什么，还喝水？子弹正好打在腹部呢。”

是啊，看来是腹部中弹了，要是这样，那就连水也不能喝，那还能做些什么？就这样眼巴巴地看他干挺着，大伙儿也陪他遭罪吗？

中尉仔细地看了看哈基莫夫，伤员脸无血色，焦裂的嘴唇微微张开，两个嘴角痛苦地下垂——他紧闭两眼，发出微弱的呻吟，看不出他还懂不懂人事。

“应该给他盖上个短皮袄，”邱宾在那边说。

鲁卡绍夫气愤地顶了他一句：

“你到哪里去弄短皮袄？”

“那会冻死的。”

“你早到了吗？”伊万诺夫斯基问邱宾，可是他的脸依旧朝着哈基莫夫。

“来了有一个钟头。”邱宾说，并朝扎雅茨摆了摆下巴，“由于他，他把滑雪板搞断了。”

“怎么会搞断的呢？”

“我绕过树林的时候，碰上一个土墩，‘拍’一下就折了。不能怪我……”扎雅茨说。

在别的场合真该把这个扎雅茨狠狠地批评一通，他已经两次给小分队闯了祸，但是此刻伊万诺夫斯基却无心说

他。邱宾的来到使他稍感欣慰，尽管这种高兴的心情被他们这次所遭受的总的失败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尉有意地尽量少说话，避免提起话头来；他实际上是害怕大家知道这次疯狂的夜行军竟一无所获。可是，他总不能一直不说，即使他拉着脸装出不愿说话的样子。大家见了虽然不敢动问，但是心里显然也是象他那样记挂着这个基地的问题呀。年轻憨厚的彼沃瓦罗夫在壕沟里一旁坐下休息了，于是大家的目光就集中到他的身上。鲁卡绍夫憋不住开了头一炮。

“那里怎么样？德国人多吗？”他在中尉背后悄悄地问道。

“也没有什么德国人，仓库也没有，”彼沃瓦罗夫随口答道。

“怎么会没有？”

中尉心里紧张起来，眉头蹙得更紧了。他没有回过头去，可是浑身都感到身后这些滑雪战士被惊呆了，于是他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

“中尉，怎么？难道——这是真的？”鲁卡绍夫问道，同时也站起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几乎是惶恐地瞧着指挥员。

“对，基地是不见了。大概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大家突然静了下来，谁也不吭声，只有克拉斯诺库茨基懊恼地朝雪地喷了一口唾沫，扎雅茨还是疑惑不解地盯着伊万诺夫斯基的脸。

“真叫多此一举，乱弹琴！”鲁卡绍夫气不过骂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克拉斯诺库茨基叹了口气说，“打仗嘛，

什么事都会摊上的。”

“会不会那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基地？它可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鲁卡绍夫还是刚才那样当着中尉的面，不怀好意地胡猜起来。

“基地本来是在那里的，”彼沃瓦罗夫简单地回答道，“栅栏杆子还竖在那儿，就是铁丝网被拆掉了。”

中尉从拖架旁走开，顺便看了一眼苏德尼克。这个战士趴在胸墙上，紧张地俯视着沟底。指挥员尽可能地不去看鲁卡绍夫，但是已经感到这个冤气冲天的上士眼看就要发作了。

“怎么，有没有往哪儿转移的痕迹？”邱宾心平气和地认真地问道。

“没有发现什么。”伊万诺夫斯基说。

“这事怎么算？……怎么搞成这样？”鲁卡绍夫喋喋不休地嚷道，“这就是说有人搞错了嘛！”

中尉猛地转身对着他问道：

“错在哪儿？”

“错就错在白费了这么多劲！还死了几个人……”

“那你说说看，现在你有什么高见？”中尉这个厉声的质问一下子就把对方将住了。

他不能跟鲁卡绍夫争吵，中尉知道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很容易吵开来，而且他内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上士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倒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何必老去追究这件事呢？现在就是不提这事，大家已经够难受的了，哪个人不分

尝了这次失败的滋味呢？还有，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内部是不允许发牢骚和耍态度的，违者要受到极其严厉的纪律制裁。

鲁卡绍夫发火了，眼里闪着怒火，满是胡须显得有些浮肿的脸上露出一副凶相。

“我又有什么高见？我是说……”

“你还是不说为妙！”

上士不再吭声，走到一边去了，中尉又在雪地上坐下来。这次口角虽然不愉快，但是他感到从早晨起就吊在心上的一块石头一下子就落到了地上：一切似乎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尽管可能解决得并不很圆满。大家不再问他，也许是看他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多的缘故。战士们坐在那里静待新的命令或下一步的决定。中尉意识到这点，便从怀里取出地图。他有意要在这张图上找出点线索，然后独自决定怎么进行，还想知道该死的基地搬到哪里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尽管他怎样仔细查找，地图上却找不到任何一个答案。标志公路的红线在地图的角落里只画了很短的一段，而邻接的地图他没有带来。也许就在这里，或是再过去点的地方就有许多适合当仓库的场所：比如树林、小树林地带或者小山谷，这样的地方很多，到哪里去找它呢？

就这样，他对着摊在膝盖上的地图静静地坐了很久，一时只听见被风刮过来的雪粒打在纸上的沙沙声。其实他现在已经不是在看地图了，他低着头只不过是省得同战士们再谈那些无济于事的话和避开他们那种询问的目光而已。

他感到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天一黑就得离开这里，可是，上哪儿去呢？

“把苏德尼克换下来！他在刺骨的寒风中大概冻僵了吧。”中尉对谁也不瞧地说起话来，他感到这种令人难受的沉闷在小分队里持续得太久了。接着他又喊道：“扎雅茨！”

扎雅茨立即站起来，费劲地爬上胸墙，而苏德尼克扑腾着积雪回到沟底。他所扬起的雪尘溅在邱宾身上，邱宾就抖落了一阵，站起来问道：

“往下怎么办，指挥员？”

“你是指什么说的？”伊万诺夫斯基明知对方想的是什么，却装作不懂似地问。

“我是说，咱们还往哪里去？”

“你回去。”指挥员干脆地决定了。

“怎么？就我一个人？”

“你和其他人都回去。要想方设法把哈基莫夫救出去。”

“那你呢？”

“我？我再去找找基地看。”

“就你一个人去？”

伊万诺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准尉的问题，他没有考虑好是自己一个人去还是带个伴儿去；但是，必须继续寻找基地，这个思想这时在他心中忽然变得极为明确，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就目前这样回去他是根本做不到的。

“不，不是我一个人，还要带一个去。”

“是呀，那个人大概是我吧，中尉？”邱宾一边说一边好

象也是在估量自己的决心似的，可是中尉没有回答他。

伊万诺夫斯基这时在反复地考虑这个事前没有考虑成熟的问题，当然，就他自己来说，只能这样决定。他不能拿大家的生命当儿戏，他的战士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目的没有达到不能怪他们。接着他开始专门考虑自己尽指挥员的职责问题，他几乎要单枪匹马跟德国人斗智了，这个几乎属于他个人的问题跟战士们没有关系，况且现在很难说成功的希望有多大。从现在开始他准备独自一人去担当一切风险，其他人应当回到火线那边去。

中尉放下地图，抬头向邱宾端详了一会。准尉那过早地添上皱纹的、冻得发黑的脸容是安详的，从布琼尼式的红星帽的小帽沿下露出一对静待的听凭吩咐的目光，他仿佛在说：带我去固然好，要不我也不强求。中尉几乎想要带准尉去，比他更合适的同伴恐怕再也挑不出来了。但这样一来，中尉就得任命鲁卡绍夫担任带小分队回去途中的负责人，而中尉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安排。在这一路上，他对鲁卡绍夫已有所了解，在他这个指挥员的心目中对此人已形成了固定的成见。

既然如此，邱宾就应当在小分队。

他们回去的人不多，伤势沉重的哈基莫夫还要照顾，而且返回的路上未必比来时好走。中尉是多么渴望他们能较顺利地回到自己人那儿去啊！从这方面看，将小分队托付给经验丰富、沉着稳重的邱宾准尉是最妥当的。

“不行啊，准尉，”中尉沉默了好久才开口说，“你领其余

人回去。让……彼沃瓦罗夫跟我去。”

大家都不无惊奇地朝彼沃瓦罗夫看去，他正侧身躺着休息，当听到中尉这话时，象是不好意思似地立即端端正正地坐了起来。

“彼沃瓦罗夫，行吗？”

“嗯，”他红着脸，眨了眨淡白色的睫毛，就这么应了一声。

“那就妥啦。”中尉说，他为一切能如此迅速地安排好而感到满意。

事后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人选、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出乎意料地、几乎是下意识地落在这个青年战士的身上？为什么不挑选工兵苏德尼克或魁梧强壮的克拉斯诺库茨基作自己的助手？他这样决定，难道仅仅是看中了这个瘦弱的小伙子身上那种唯命是从、任劳任怨的性格？或者是今天他们两人一起穿越公路、一起最先尝到这个使大家扫兴的失败滋味，他才有这个决定的。

人选既然定下来了，这时彼沃瓦罗夫一下子变得认真起来，脸上露出一一种不知是阴郁还是严肃的表情，并悄悄地坐在被人踩过的雪堆上。

“好吧，那就听你的，”邱宾说，“到了那边，向司令部怎样报告呢？”

“我马上写张条子。”伊万诺夫斯基想了想答道。

但是他只有支缴获的自动铅笔，没有带纸，准尉只好从自己那本皱折油污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给他。中尉想了一

会就动笔写道：

“目标已不在原地。小分队有所损失，我已令其返回。我同一名战士正在继续寻找，预计两昼夜后返回。伊万诺夫斯基。41年11月29日。”

“给你，转交参谋长。”

“那个……你带不带手榴弹？”

“带，一颗手榴弹和两个燃烧瓶。彼沃瓦罗夫，你把苏德尼克的燃烧瓶拿去，手榴弹给我。”

准尉从腰带上解下一颗反坦克手榴弹，中尉接过来马上用带子把它系在皮带上。

“还得带些干粮吧？”

“也要带的，给点面包干，两盒罐头。你们会在后勤部吃早饭啦。”

“愿上帝保佑。”克拉斯诺库茨基叹了口气说。

“通过封锁线时多加小心，可别撞上敌人，不要只顾肚子——脑袋要紧。”

“这我明白。”邱宾低声地答应。

“好吧，好象黑天了，你们现在可以出发了。我们在这里还要待一会。扎雅茨！公路上有什么情况吗？”

“有辆开着灯的汽车在跑。后面还有没有——就看不清了。”

准尉系上背囊，彼沃瓦罗夫往自己的背囊里装些面包干和两个用包脚布裹着的大燃烧瓶。鲁卡绍夫和克拉斯诺库茨基没等命令下来，就走到浑身是雪的哈基莫夫跟前。

“关照点哈基莫夫，”中尉对邱宾说，“说不定他还能活到明天早晨。”

“那当然！……”

“那好，走吧！”

“中尉，那就祝你顺利。”邱宾转过身去，立即向战士下命令，“喂，抬起来，抬滑雪板，抬滑雪板。把它抬起来，高点，再抬高些，好，就这样……”

他们抬起哈基莫夫，吃力地走出壕沟，邱宾站在胸墙上又回顾了一下——这次告别真是太仓猝匆忙了，于是伊万诺夫斯基挥了挥手说：

“一路平安。”

直到他们在那边隐没不见，最后那准尉的尖顶风帽也在胸墙后面消失之后，伊万诺夫斯基才在雪地上坐下。他特别满意的是邱宾赶回了小分队，到底没有失踪。现在他是那些一起返回的人中的精明和善的指挥员，他会把他们带到自己人那里，而他和彼沃瓦罗夫两人在这里也能对付过去。彼沃瓦罗夫还站在沟里，从高高的胸墙上向外张望。中尉为了打破大家走后的冷清气氛，装出很健谈的样子问：

“坐下，小彼沃瓦罗夫，我们歇一会，马上还要赶路呢。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

“这么说，是彼季卡^①罗。而我名叫伊戈里。说不定咱

① 彼季卡是熟人之间的称呼。

们还能交上好运呢，你说呢？”

“也许能走运，”彼沃瓦罗夫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声，同时擦着枪托，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趁这时还有时间，咱们来啃干粮，这样可以减轻点负担。”伊万诺夫斯基说。于是彼沃瓦罗夫蹲下来，动手解自己的背囊。

第九章

半小时以后，当天色已经十分昏暗的时候，他们才从战壕这个由雪堆成的掩体里爬出来。两人都在打冷战，脚冻得难受，恨不得立刻滑起雪来暖和身体。但首先得看一看周围的情况。入夜以后，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减少了，只有零星的车辆通过，有时还亮着微弱的小车灯。四野寂静无人，远处暮色苍茫，白雪皑皑，层林叠嶂。在这白茫茫的旷野上空，不见星星，浓云密布，一片昏惨景色。伊万诺夫斯基决定顺着这条公路向东走，不离公路太远，这样可以随时留神路上来往的车辆。他认为正象秋天那次一样，汽车会暴露基地的。

他们很快地下了小山丘，穿过了积雪松软的谷地。滑行才二十来分钟，已经使得他们暖和过来，甚至感到有点累。

了。不管怎么说，昨夜他们毕竟真是太劳累了；而且与昨夜相比还有所不同，伊万诺夫斯基走起路来立即就感到那条受伤的腿疼得厉害了，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把全身的重心移在左腿上。事实上，他还是在咬牙忍着疼痛，心想将就一下就能对付过去，腿也许会缓过来，不会误事的。但是当他又爬上另一个山丘时，中尉感到又得休息了。他把身体侧向左边站着，轻轻地放松一下受伤的右腿。为了不引起走过来的彼沃瓦罗夫怀疑，他还伪装在向四处张望，明知这样张望完全没有必要，旁边就是那条光秃秃的公路，前头看不见有多少东西，只有东风在一股劲地吹，吹得他两眼流泪。

“喂，小彼沃瓦罗夫，受得了么？”中尉故意打趣地问。

“没有什么。”

“暖和起来了吧？”

“噢，都出汗了。”

“那就再往前赶吧。”

他们又滑行了个把钟头，不时地左顾右盼，绕过了小树林、小松林和路旁的房屋。自从昨天遭到那个村子里敌人的射击后，伊万诺夫斯基极力避开有人住的地方。这条公路几乎始终都是直的，不拐弯，因此辨别方向很方便，中尉只是偶尔瞧瞧指南针，校正一下方向。

甚至他的心情也仿佛好了一些，跟在后头的彼沃瓦罗夫一步也没有拉下，一次中尉在停下来时，颇有几分兴趣地问他：

“小彼沃瓦罗夫，你这辈子见过什么世面？”

“我？”

“对呀，说你呀。我是说，你一辈子里见过什么世面？”

彼沃瓦罗夫耸耸肩膀。

“什么世面都没有见过。”

“总该看过一些书吧？”

“书是看过一些，”战士过了一会才象是想起来似地说：“儒勒·凡尔纳、柯南·道尔、瓦尔特·司各德、马克·吐温等人写的书我都看过。”

“那么盖达尔写的呢？”

“盖达尔写的书也看过，还有仲马的作品，能弄到手的书都看了。”

“好家伙！”中尉惊奇地甚至带几分敬意地看了看彼沃瓦罗夫，“这么多书你是什么时候看的？”

“我在六年级时生了一场病，半年没有上学，就是那时看的。凡是图书馆里有的书都给我看遍了，是别人从图书馆替我借来的。”

是呀，病上那么半年，把图书馆里的藏书都看遍，这大概也是一件乐事。伊万诺夫斯基在童年以至读中学时，总巴望着生它一场大病，可是每回生病都不出三天就痊愈了。他的身体老是那么好，所以书读得不多，虽然好书也总使他心情非常激动。甚至比盖达尔的作品更好的书都没有读过。而且这还是童年时代的事，以后就顾不上文学了——他看的是关于另外方面的书籍。

这一带还是那样寂静，一般说来，只有离前线相当远的地方才会出现这种气氛。伊万诺夫斯基现在早已不象昨天那样急着往前滑了，他感到两腿以至全身都是沉甸甸的，每挪动一下身子，伤口就疼痛不已，当然他暂时还是能挺得住的。中尉有意地想一些别的事情，免得老是想着伤口的疼痛。有时他想到那些战士们，他们在邱宾的带领下正在返回的路上，现在大概沿着那条小河走到河滩地了，要是雪辙没有被埋没就好办了，它便于确定方向；不过这也不要紧，即使雪辙不见了，邱宾大概也能找到回去的路的。如果发生什么意外，还有地图帮忙；地图倒是战时的宝贝，可惜这些地图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够用的。他一直挂念着哈基莫夫，现在不知他怎样了？当然，为了他，大家肯定要吃些苦头的，尤其是通过火线的时候。现在，带着哈基莫夫，你不能蹬着滑雪板跳跃和奔驰，只能一直爬着匍匐前进。只要能过去就行，至少邱宾可能过去，他应当过去。邱宾就会向参谋长解释他们这次扑空的原因，也会替小分队及其指挥员做些辩解的。可是这和指挥员有什么关系？谁能料到仅仅十天工夫，一切会起这样大的变化，德国人会把基地也搬走了呢？

伊万诺夫斯基认为自己毫无过错，似乎已尽到最大努力了。然而总有一种内疚的心理象一条该死的蛆虫在心中不停地蠕动。似乎在某些方面，中尉还是没有观察周全，因而辜负了上级的信任；正是这种辜负了人家的信任的心情使他感到热辣辣地过意不去。现在只要想起自己出的这个鬼主意一下子全部落空时，他简直要缩成一团、无地自容

了。

伊万诺夫斯基很明白这个道理：一旦轻易地糟蹋了人家对自己的好印象后，那将意味着什么！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由于辜负了别人的信任，他就再也无法挽回他所敬爱的人对自己的好感，事后不管他怎样悔恨都无济于事。

这件事发生在伊戈里快满十四周岁的时候，那时他在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叫库勃利奇的幽静的小地方住了已有四年多了，他父亲在边防司令部当兽医。这个地方可以玩耍的东西很少，伊戈里每天上学，在学校里交结了一些小伙伴，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却消磨在司令部的马厩里。马成了他多年的，可以说是最眷恋的伴侣和少年时代热衷的嗜好。他有多少次把这些马一匹匹地刷得干干净净，并给他们洗澡啊。他骑过多少匹马——备鞍的和没有备鞍的，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连续三年，他对周围别的事情都不关心，心目中只有自己这些马。每天放学后，他就溜进马厩，直到傍晚要睡觉时才肯离开，而次日清早值班员还没有来到之前，他又到那里去了一趟。那些边防战士有时开玩笑说，伊戈里是马厩的常任值班员。如果不是要上课，我真乐意担任这个职务哩！

马厩这个小天地里有趣的事多着呢：从喂马、饮马、用刮板和刷子洗马、以至牵马出去操练队形的隆重仪式；红军战士们的奔忙操劳；大首长们拿手帕揩着马的两肋、检查是否清洁的挑剔劲儿，等等，都使伊戈里觉得有趣。至于驯马、练骑术、在马背上搞特技训练，那更是趣味无穷。当然，最使

他倾心的节目要数在马厩后面的操练场上砍树条靶子：骑手们全速驰过一排排插着树条的桩子时，举起刀来左右挥臂，马刀起处，枝头落地。在赫赫有名的哈卡索夫中尉的支队里，最剽悍的骑手那套特等骑术真是了不起呀！

可是他那时由于年龄小，对于驯马、砍树条靶子和特等骑术等只能旁观，没有参加过，——人家不让他入列，甚至一次也没有允许他带刀骑马。给马洗澡又是另一件事：在石砌湖岸附近的沙滩上竖立着一个陈旧的被啃过了的拴马桩。几乎每天中午烈日当空时，总有人把累得满身汗水、急欲下水的马群赶到这里来洗澡。洗澡一开始，伊戈里·伊万诺夫斯基立即下水，放大胆子在水里噼里啪啦地玩个痛快，直到所有的马上岸才罢休。

平时他爱骑米尔卡，这是一匹年青的棕黄色母马，它还带着一匹细腿好玩的小马驹。米尔卡是班长米佳耶夫使用的，伊戈里和米佳耶夫结成了某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忘年之交。这个米佳耶夫虽然也是在服现役，但是和其他二十来岁的边防战士相比之下，他在伊戈里看来简直是个老头儿：一脸皱纹，步履沉重，做事慢条斯理，象个上了岁数的乡下大叔。米佳耶夫是西伯利亚人，家里有几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假如不是在证件上出点什么差错，硬说他只有二十二岁的话，那他早该应征入伍并期满退役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米佳耶夫自己也说不清，他只是一股劲地骂：当初不知那个教堂小执事醉酒后作的好事，弄得他米佳耶夫只好跟那些可以当自己的女婿的一辈人去服役啦。

米佳耶夫并不稀罕这些马，一辈子见过的马多着呢，所以也乐意把自己的米尔卡交给兽医的机灵儿子去侍弄。伊戈里给米尔卡喂料、刷洗、牵出去溜达，米佳耶夫常常从旁指点并加以赞扬；有时他干脆一个人呆在吸烟室里悠然自得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有时父亲因儿子长期逃学、学业荒废而训斥他的时候，米佳耶夫就出来在他父亲面前替自己的助手说情。一般说来，伊戈里和米佳耶夫之间的关系是再好不过的了。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西伯利亚人快要代替他这个父亲了。伊戈里听了并不反驳，还认为米佳耶夫就是比父亲强，因为父亲早和母亲分居，只会喝酒，一点也不疼儿子，任他自生自长。

有一次，往常在湖边洗马的喧闹被一件小事打断了——湖滨浴场运来了一只小船，这是准尉别卢什用双套马车运来的。他在水上试过船后宣布：此船是警卫司令扎鲁宾私人所有的，不准任何人碰它一下。别卢什不放心，还在船上安上链条，将船锁在拴马桩上。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条小船在岸边几乎搁了整整一个夏天，扎鲁宾根本没有来启用过，而当地那些孩子不消说看着这条船就眼红得很，总想坐上小船到湖中游它一圈。

一天傍晚，值班员们给马洗完澡并把它们拴好后，就回警卫司令部吃饭去了。伊戈里从家里拿来几根鱼竿，到湖汉子去钓鲈鱼。可是鱼儿不爱咬钩，他正想换个地方钓，这时从赤杨树丛里钻出来两个孩子：他的同学科利卡·鲍罗夫斯基和雅沙·芬克利。他们谈了不大一会，伊戈里从他俩

那里明白了：警卫司令的船是可以“偷”出来并将它划到湖对岸去的。那边有一大片苍翠欲滴的针叶林，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去过呢。伊戈里一听这个主意就动心了，其实当地哪个孩子何尝不向往到对岸去呢，只是到那边去不容易，进湖汊口时，得通过一片泥泞的沼泽，其中有不少陷坑，据说还有水怪。要是能把船搞出来当然再好不过了，可是米佳耶夫还在拴马桩跟前值班，他得替扎鲁宾大尉负责保管这条船。伊戈里讲了这个情况，伙伴们就挤眉弄眼地笑了。原来他们早就侦察好了，米佳耶夫正在灌木丛中躺在马披上睡大觉呢；至于锁呢，科利卡马上向伊戈里亮出一把大钥匙，这是用来开他父亲的柴禾棚的钥匙，它的锁正好和扎鲁宾船上的锁一模一样。伊戈里再不说别的，拿起这把钥匙一下子就捅开了小船上的锁。

他们悄悄地把船推到水浅的地方，跳了上去，没有桨就用一根长长的松木杆来代替。开始他们用杆子撑，然后用手划水，好容易把船划到了湖中，这时才发现小船由于在岸边停放过久而干裂了，湖水就透过船舷的裂缝象泉水似地涌进来，他们一时又没有掏水的工具，就用双手一捧捧地往船外泼水，可是船尾还是渐渐地往下沉了，过了一会，孩子们不得不慌里慌张地跳进水里，他们每人都灌了一肚子暖烘烘的湖水，总算上了岸，而那条小船则慢慢地沉没了。

米佳耶夫在拴马桩旁睡得很死，一点点动静都没有听到；三个孩子就在一个僻静地方晾干衣服，直到天快黑时才各自回家。到了第二天，当然要寻找这条小船了。有人在湖

滨浴场附近曾经看到过本地好打闹的捷姆金，于是立刻将他记录在案。本来还要审讯伊戈里，因为那天一早他就待在拴马桩旁，但值班的米佳耶夫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宠儿会当小偷，所以为他打了保票。一天过去了，伊戈里还是硬着头皮向米佳耶夫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开始米佳耶夫还不相信有这回事哩。肇事者把船沉的地点指出之后，就开始打捞，小船在湖底的淤泥里陷得不深，很快就被捞出来拖到岸边。米佳耶夫看到小船时只往沙滩上吐了口唾沫就走开了，对自己平日钟爱的助手现在是不屑一瞧！就这样，他们两年的友谊完结了。米佳耶夫直到要复员时也没有再跟他答话，好象根本没有看见他似的，对伊戈里的问候是听而不闻；迎面相见，擦肩而过，也不加理睬。伊戈里并不觉得委屈，他明白人家对自己的鄙视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他们走了不大一会就进入一片栽得稀疏的松树苗圃。当他们迅速地穿过一行行整齐的树苗，正要走出苗圃时，两人突然都呆住不动了。紧挨林边显然有一条路，有几辆汽车在黑暗中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摇摇晃晃地缓慢地往旁边什么地方驶去。伊万诺夫斯基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迷失了方向竟走到公路上来了，但是不久他就明白，眼前决不是公路，大概是从公路上下来的一条岔道，可是为什么这条岔道上会有汽车呢？

他站在林边隐蔽了一会，汽车就在跟前过去，头一辆车开着灯，带篷的高大的车身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摆动。后

面那三辆汽车的车身也很大，也有篷。它们里面装的是什
么？无法知道。但是这些汽车离开公路干线向旁边开去这
件事在中尉的心里产生了一些希望。于是他没有再向岔路
走去，而是转过身来，沿着林边在汽车后面跟踪。

现在，他滑得慢极了，不时地停下来侧耳细听。开始时
还能时而听见远处发动机的突突声，后来被一阵风压低了，
最后不知怎地一点响声也没有了。伊万诺夫斯基整了整老
往下滑的、系着沉重的手榴弹的腰带，回头看了一眼彼沃瓦
罗夫。在他身旁的彼沃瓦罗夫预感到面临着一场危险，默
不作声，吃力地屏住自己的喘息。

“哎，我去看看那边。你慢点滑，在我后头，多加小
心……”

彼沃瓦罗夫点点头，同时理了理背上的枪，枪带斜挂
在他那穿着白色伪装服的窄小的胸脯上。当然，他的助手的体
质是单薄一些，但是现在即使是强壮的人也未必能吃得消。
伊万诺夫斯基沿着林边向前追去，滑雪板在雪地上沙沙作
响。

他很快就到了小树林的尽头，面前横着一条小溪或是
小河，两岸灌木丛生。伊万诺夫斯基这时已很疲乏，但还是
十分勉强地滑过了小河，穿过一段开阔地。这时他意外地发
现有一条路——雪地上有两道被一对汽车轮胎压得很深的
车辙。伊万诺夫斯基不越过这条路，并且为了能够看见它，
他就转身往回走，在开阔地里与这条路保持一定的距离滑
行。

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看见前面的村庄——村里鸦雀无声，漆黑一团。但是在黑暗中他突然发现附近就有一座木房的房顶，后面还有另一座房子的屋顶也露出来了。中尉马上后悔自己的莽撞，应该避开村子远些才是。他正要转身离开，忽然瞅见一个象履带式越野汽车的东西从木房后面拐了出来。这里仿佛还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黑暗中看不清有多大，在它上面还插着一根柔軟的细杆子。中尉仔细看才看清那是天线。当然，村里是不可能有什么基地的，但是德国人的后方支队或是行进支队完全有可能在这里宿营。

“看到了吗？”伊万诺夫斯基悄悄地对同伴说。

“嗯。”

“你说，这是什么？”

彼沃瓦罗夫只耸了耸肩，和中尉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现在中尉象和同样级别的人那样对待彼沃瓦罗夫了，假如有五个或十个战士在场的话，伊万诺夫斯基是决不允许自己这样随便，几乎不讲究级别和礼节；可是现在这个彼沃瓦罗夫对他来说比一名战士要重要得多。彼沃瓦罗夫是他的一号助手、他的副手，更是他的主要参谋——在这里除了他外，就没有别的参谋了。

伊万诺夫斯基将滑雪板往旁一蹬，就在雪地上转过身来，彼沃瓦罗夫也转了个弯，他们迅速地绕离村子。但是中尉刚在雪地上滑了一分钟就停住了，他想：如果这是德军的一个什么重要的司令部呢？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比那个该死的基地要有用得得多，而且那个基地在这三更半夜还不知到

哪里去找呢。

他迎风站着考虑片刻，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彼沃瓦罗夫在旁边等候，显然他也明白，指挥员在为他们两个决定什么重大的事情，所以正在以士兵的耐心等待着上级的抉择。而伊万诺夫斯基这时却在想：躲开这个匪巢固然是明智的，但不妨先偷偷地摸到跟前侦察一下——说不定能顺手捞到点什么。

当他们正在犹豫时，村子里有个地方微微地亮了一下，象是有个东西在雪地上闪了一下，立即又熄灭了。这偶然的闪光好象并不说明什么，但是它却在黑暗中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和某个地点。显然，那里有一条街道。中尉想搞清那里的情况，临时决定向那条街道摸去。

“这样吧，小彼沃瓦罗夫，拉开点距离，悄悄地跟在我后头。”

彼沃瓦罗夫点头表示同意。伊万诺夫斯基举起两根滑雪杖使劲一撑，便向村子奔去。

进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残破的篱笆，中尉从它的缺口进去，里面是个菜园。在夜色中他看到一行灌木丛，上面长着几棵小树，看来这是两块菜园的分界。他转身向小树滑去，借着树身的掩护，踩着不太深的积雪，不声不响地向隐约可见的几所房子走去。周围还是一片寂静，略有寒意，斜风吹来，雪花飘零。伊万诺夫斯基分辨不出来传到耳际的声音，但还是根据某些难以言喻的迹象，猜到这个村子里住有外来人，在现在这个时候的外来人只能是德国人。这

时他觉得似乎马上会发现点什么，于是小心翼翼地朝那几座房子走去。

眼前耸立着一座白雪覆盖的木房，旁边有个歪斜的草垛，由几条杆子支着。园子分界上的小树到此中断了，树趟的末尾长着一棵枝杈修长的梨树，它那较为粗大的树干在细小的樱桃树中间是显眼的。伊万诺夫斯基老远就注意到它，认为显然应该在这棵梨树下蹲一会再说。可是还没有等他走到那棵梨树跟前，天知道从哪里来的，在草垛旁边突然冒出来一个披着长衫的人。中尉吓了一跳，他明白了：德国人！与此同时那个德国人也吓懵了，两眼死死盯着中尉，但马上就镇静下来，老远就哇啦哇啦地嚷起来：

“Es schien Russe……”①

伊万诺夫斯基一点也听不懂，他猛地端起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大概是使劲过大，枪闩在寂静中“咔嚓”地响了一下。德国人明白自己判断错了，立刻吓得号叫了一声，同时拼命地在雪地上跑，从草垛斜穿过菜园，直向相邻的那座房子奔去。伊万诺夫斯基一时不知咋办才好，就俯身蹲了下来。看来这样做很及时：房子那边立即响起了零落的枪声，子弹嗖嗖地打在灌木丛的冻枝上。但是这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半跪着端起枪朝篱笆后面的昏暗墙角打了几枪，接着又打了个连射——这一次打得低些，是瞄准那个正在逃走的德国人打的，这家伙眼看就要消失在房子的阴影里了。但

① 德文：“可能是俄国人……”

是他最后那几枪是多余的——那个德国人当场就一头栽在雪地上不动了。伊万诺夫斯基马上用左脚在滑雪板上一蹬，来了个急转弯，匆忙中抓住一根滑雪杖，另一根掉在雪地上。他刚要弯腰去捡，这时从漆黑的院子里又射出了一道红色的闪光，他感到背上被深深地刺了一下，不由得“啊”了一声。中尉立刻明白自己负伤了，于是急忙蹬着滑雪板发疯似地冲出菜园，向彼沃瓦罗夫等他的地方逃去。

看来，德国人慢了一步，使中尉赢得了十几秒宝贵的时间。当他已经滑到把菜园隔开的树趟的一半时，德国人才纷纷从各个院子里向菜园跑来。那边有个人在厉声地下命令，于是立刻就有四、五个人飞快地追将出来。伊万诺夫斯基回过头来就清楚地瞧见他们，他迟疑了一下：是停下来用冲锋枪的火力顶一下敌人的追击呢，还是赶紧溜到黑暗里去？但是他再也不能快了，伤痛使得他浑身发软，他只能勉强地踩着滑雪板离开。

他听到背后响了几下密集的不太响的枪声，好象是由几支手枪发出的。可是他还是甩开了他们，现在要打中是不太容易了。不过还是有一颗子弹正好落在他脚下的土地里，他也不回头，只是将身子弯得更低些，拼着最后那点快要耗尽的力气，尽快地冲出菜园。但是就在这时，又有一颗子弹带着尖叫声就在他的头顶上飞来，他举起冲锋枪正要给他们一梭子，忽然从前面某个地方传来“砰！砰！”两下响亮有力的枪声，中尉高兴得象是见了救星似地，他知道这是彼沃瓦罗夫打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分辨得出自己人

的三英分口径步枪的射击声。从前面的黑暗中，还是正对他去的方向，接二连三地发出密集的火光，子弹在他旁边飞过，但他相信自己人的子弹是不会误伤他的。

“快，中尉同志！”

伊万诺夫斯基在离篱笆不远的地方跌倒了，这不是因为他受不了胸部负伤所引起的扩及半个身子的酸疼，而是由于一时透不过气来。他急促地喘息着，心里明白彼沃瓦罗夫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他不会丢下自己不管的。

中尉把堵在嘴里的雪吐掉，想站起来，但是感到两只腿不知为什么很沉重，而且摔倒时交错一起的滑雪板也妨碍着他。一支滑雪板已经完全从脚上脱落了，他就狠狠地拽了一下另一只脚，使那只滑雪板也和带子分开了。后面又“啪啪”地响了几枪，不过好象敌人不是在追击他。彼沃瓦罗夫截住了敌人，从黑暗中向中尉跑来。

“中尉同志！……”

“轻点！扶我一把。”

“我在那边打死了一个，这会儿看他们敢来……”

彼沃瓦罗夫迅速地把她扶起来，他看到中尉负伤似乎并不感到意外，显然这个战士这时心里在想别的事，这点甚至从他的表情也可以看出来。看样子他根本没有想到，此时此地敌人把他们两人都打死是多么容易。

中尉起来想去拣滑雪板，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于是整个身子就歪倒在松软冰冷的雪地上。彼沃瓦罗夫大概到了这时才明白指挥员的伤势不轻，慌忙将自己的滑雪板摔

下，跑过来搀扶中尉。

“怎么，您的伤不轻，啊？中尉同志！”

“不要紧，没什么，”伊万诺夫斯基好不容易地说了一句，“扶我起……”

德国人随时都会追来，得尽快离开这里，彼沃瓦罗夫顿时一声不响地扶起中尉那变得笨重的身体，领他离开村子，在一片漆黑的田野上朝某个方向走去。伊万诺夫斯基顺从地趑趄趑趄地一步步挪动着身体，他象喝醉了似地感到头昏、恶心，朝雪地上吐了两大口暗黑色的东西，却没有立刻就想到这是血。

他们顾不得回头，但就这样也能听到后面还有惊慌的嘈杂声和喊叫声。是的，枪声是听不见了，但是听到那受惊的人声比枪声更叫人焦急。看来德国人已经涌向村边，或者可能在他们后面追踪。伊万诺夫斯基全身上下全被汗水和鲜血浸湿了，厚棉布做的伪装服在腋下的地方有一大块暗色的血斑，他艰难地被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时往雪地上吐血块。有几次他们一起绊倒了，彼沃瓦罗夫立即爬起来，搀起中尉，于是他们两人又摇晃着身子，跌跌撞撞地在寒冷的茫茫黑夜中艰难地移动着，在冬天狂风飞舞的旷野上绕弯子。

他们再也走不动了，中尉吐了一口血沫，哼了一声“站住”就歪倒在雪地上，彼沃瓦罗夫也倒在他身旁。现在四周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连那个村庄在什么方向也忘记了。他们好象走到了天涯海角，那里既没有自己人，也没有

德国人。彼沃瓦罗夫等喘过气来后，就在雪地上坐起来。

“现在我给您包扎，”他说着就把手伸进口袋里去寻找绷带，“您的伤在哪里？”

“在胸部，就在这只胳膊下边……”

“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就包扎。刚才我给了那个家伙一枪，他当场就……另一个看来是溜掉了……整夹子弹全被我报销了。”

伊万诺夫斯基仰天卧倒，解开腰带和棉衣，彼沃瓦罗夫伸出冰凉的双手在他身上寻摸着伤口。大量的血水浸透了衣服，现在开始冷却，在严寒中象冰一般刺人难受，不过也许是遍地积雪的寒气逼人，中尉不时地打着寒战，但还是默默地忍耐住了。战士用了两、三卷绷带把他的胸部紧紧缠住，最后将绷带的两头牢牢地系在一起。

“很疼吧？”

“是啊，疼极了，”伊万诺夫斯基不耐烦地答道，“行啦，把腰带系上吧。”

彼沃瓦罗夫帮助中尉整理好，将棉衣上的腰带系好，把伪装衣拉平。中尉这时尽管还在微微地发抖，但是感到身上逐渐暖和起来了。

“不该到那里去。”战士沾满血迹的双手在裤子上一边擦着一边说道。

“什么？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我也不知道呀。”彼沃瓦罗夫的一个肩膀耸了耸。

“那我就知道啦？”中尉愤愤地说。他知道自己变得蛮不

讲理了，在这件事上彼沃瓦罗夫是毫无责任的，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是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就更加恼恨自己。的确，现在他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这不仅坑害自己，而且也害了这个战士；把寻找基地的任务搞黄了，也没有在那个村子里捞到什么。然而，他不能不这么办，不能采取另一种做法——从基地、司令部以及这个村子旁边绕过去，这样来替自己留条活路。在这样的战争中，如果这样做，那就是犯罪。

“把这盘子弹给我，还有冲锋枪，都让我来拿吧。”彼沃瓦罗夫轻声地说。伊万诺夫斯基默默地同意，当然他现在是拿不动太多的东西了。他使出全身仅有的一点力气，也只能翻过身子在雪地上坐起来。

“好啦，该走了。”

“嗯，我们就往那边去吧，照刚才的方向走，”彼沃瓦罗夫又显得活跃起来了，“我保证这里附近准有村子。”

“村子？”

“对，应该进村，得找个村子，只要那里没有德国人。”

看来，彼沃瓦罗夫的意见是对的，伊万诺夫斯基也认为目前他们只能在某个村庄里躲避一下，寻找自己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他简直想不到这次受伤竟会把自己的全盘计划统统打乱，看来现在只求做到一点：不要落到德国人的手里，至于基地他是看不到了……

第 十 章

他们不用滑雪板，一直在没膝深的雪里走，两人互相紧紧地拽着，向前挪动着疲倦的双脚，累得几乎要倒在雪里。彼沃瓦罗夫已经精疲力尽了，但还是继续照管着中尉，他右手扶着中尉，左手拎着冲锋枪和步枪，肩上的背囊总往下掉。伊万诺夫斯基已经完全受不了这些痛苦，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做出最后的努力，走啊，走啊，一心想远点离开这个倒霉的村子。

这时夜空中下起了大雪，周围白蒙蒙的，天昏地暗连成一片，雪花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寒光闪闪，使他们抬不起头来。但风比昨天小一些，而且似乎是顺风。他们盲目地在旷野上一步一步走着，不时地停下来喘喘气。伊万诺夫斯基吐着血，他忧心忡忡地感到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但仍然顽强地走着，指望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免得死在这个旷野里。他是不愿意死的；只要还活着，他就要战斗，哪怕是一夜，加上白天，哪怕是一辈子，只要能不死，能活着回到自己人那儿去。

大概，彼沃瓦罗夫也是同样的心情，但他什么也没有对中尉说，只是尽自己可能搀扶着中尉。远非大力士的他，使

出了剩下的那点力气，换一种情况中尉也许会感到奇怪，在这个外表虚弱，疲惫不堪的小伙子身上怎么还有这些力气，但是自己现在比他还虚弱，也只好完全依靠他这点虽然不大的力气了。中尉知道，如果他们一旦倒下而又站不起来，那么就得爬着往前走了，因为不管怎么样，前进才会得救，而后退只有死亡。

在一个积雪相当深的洼地里，他们犹豫地停下来一、两次。彼沃瓦罗夫搀扶着中尉，尽量想看清前面一个什么东西，这东西中尉却没有马上发现。过了一会儿，中尉透过被风雪弥漫得更浓的夜色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也开始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黑点。它有多大，离他们有多远，确定不下来。这黑点可能是附近的灌木丛，也可能是远处的什么建筑物，还可能是林边的一棵云杉树。不管怎样，这黑点引起了他俩的警觉，于是彼沃瓦罗夫想了一下，把伊万诺夫斯基侧身放倒。

“我去看看……”

中尉没有回答，他现在说话十分困难，他呼噜呼噜喘着气，经常把嘴里的东西吐在雪地上。他用伪装衣的袖子擦干了湿糊糊的嘴唇，潮湿的白布上留下了一块暗色的血迹。

大概，就这样完了……

既然嘴里已经吐血，那么看来是活不长了，他躺在雪地上，闷闷不乐。他的头耷拉到地面，两眼直冒金星。但神智还是清楚的，这就迫使他为自己、也为这个战士——他眼前的救命恩人继续战斗。这个救命恩人也快倒下了，但是

到目前为止，中尉找不到什么可以指责他的，因为无论在村子里，还是在旷野上他都表现得非常好。彼沃瓦罗夫现在觉得自己胜过了指挥员，不禁精神起来，自信心更足了，动作更麻利了，中尉深信：这个助手没有选错。

中尉耐心地等了几分钟，发愁地听着自己被打穿的胸膛里那奇怪的噉噜声。他身旁放着彼沃瓦罗夫的背囊，他想，看来他们应该减轻点负担，扔掉一部分东西。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带许多东西了，只有个人的武器、子弹、手榴弹还有用。燃烧瓶看来已经没有用了。可是，他精疲力尽，连背囊也解不开了，只好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彼沃瓦罗夫的白色身影在昏暗的雪色中静悄悄地出现了，战士边走边兴奋地说：

“中尉同志，澡堂！那里有个小澡堂，懂吗？一个人也没有。”

有个澡堂，这当然好，伊万诺夫斯基想到这，默默地、费力地站起来，彼沃瓦罗夫拿起背囊、冲锋枪，又过来扶起了中尉，于是他俩重又拖着沉重的双腿朝附近那个影影绰绰的澡堂走去。

这的确是一个农村小澡堂，用云杉的树梢部分搭成，里面能闻到一股烟味。彼沃瓦罗夫一脚踢开顶门棍，低矮的小门自动开了。伊万诺夫斯基低下头，双手抓住墙壁，钻进了被烟熏得黑糊糊的门洞里，他双手往四面摸去，摸到了一个平滑的小炉台，墙上的笤帚被碰得“簌簌”作响。这时，彼沃瓦罗夫又打开了另一道门，澡堂的更衣室里散发着浓

烈的烟灰味和桦木的霉味。他走了进去，在黑暗中摸了一阵后，招呼中尉：

“到这儿来。这里有几条长凳……现在给它拼在一起……”

伊万诺夫斯基紧紧抓住门框，跨过了门坎，他摸到长凳后，呼噜呼噜地喘着气，直挺挺地躺在上面，靴子挨到了墙。

“关上门。”

“好，马上去。这里还有点干草，您枕上吧……”

他默默地把头抬起，让战士把一抱干草放在下面，就无力地合上了双眼。一会儿他就分不清自己是在入睡还是正在失去知觉，眼睛里直冒金星，头晕得厉害，一阵阵恶心。他想向一侧翻身，但自己沉重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昏过去了，看来，确实是失去了知觉……

他经过好长一段痛苦的过程才清醒过来，他感到浑身发冷，口特别渴，可是好长时间也没能张开干裂的嘴唇去要水喝。当他感觉到身边有动静时，才用力睁开眼睛——从更衣室里出现了彼沃瓦罗夫的白色身影，他风帽拉到了脑后，双手握着冲锋枪。澡堂里灰蒙蒙的，但墙上的小窗已经发白，更衣室里每一道墙缝都透过了明亮的光线，中尉知道，清晨已经来临。但是彼沃瓦罗夫被外面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弯下腰，俯在小窗上，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观察。

伊万诺夫斯基又试着向一侧翻身，他的胸腔里发出了冗长嘶哑的哨声，接着他大咳不止。彼沃瓦罗夫赶忙离开窗口，转过身来看受伤的中尉。

“您怎么了？中尉同志！……”

“没什么，没什么……”

他觉得彼沃瓦罗夫还有什么要问，但战士并没有再问什么事，不知他为什么突然不作声了，仍旧俯在那个窗户上，压低嗓子轻轻说：

“村子那里有德国人。”

“哪个村子？”

“就这个。村边柳树后那间小屋……，德国人在走动。”

“远吗？”

“可能有二百步远。”

是的，如果在二百步的距离内有德国人竟没有发现他们，那么可以说，他们碰上这个澡堂，还算走运。不过，以前那是黑夜，可现在白天已经开始，谁知道他们还能在这里隐藏多久？

“没事。只要不露面。”

“门我已关好。”彼沃瓦罗夫的头朝门口点了一下，“用铁锹顶上了。”

“很好。有水吗？”

“有，”彼沃瓦罗夫高兴地回答，“这木桶里有水，我已经喝过，只是结了冰。”

“快给我。”

彼沃瓦罗夫手脚不那么灵便地用一个铁罐子给中尉喂了水，水里有一股笤帚味，泡发了的桦树叶沾在他的嘴唇上。总之，水很难喝，就象是从水洼里弄来的；中尉的身体也

很难受，胸部发胀，吸口气都困难，咳嗽就根本不行了。

伊万诺夫斯基喝了点水后，觉得松快了一些，神智也好象清醒了。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澡堂很小，低矮的顶棚熏得漆黑，四壁也满是漆黑的烟灰。靠门边的一个角落里，黑呼呼一堆石头放在炉子上，炉子旁边立着一个盛有水的木桶。他头上低低地吊着一根细竿子，上面搭着些被遗弃了的破衣。当然，随时都会有人到这里来取各种东西，来了就会发现他们。澡堂子可能离村子太远，这个村子同样可能有德国人——他怎么原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

“那儿能看到什么？”他轻声地问更衣室门缝旁边一动不动的彼沃瓦罗夫。

“有人从院子里出来了……两个，抽着烟……正往什么地方去……”

“德国人？”

“嗯。”

“不要紧，注意点就是了。我们不会轻易让他们抓到。”

当然，他明知道，自己空口说空话：这些安慰的话有多大价值，但他还能怎样呢？他只知道，如果德国人突然来了，那就得打，打到没有子弹再说……要是德国人不来，甚至干脆撤出村子呢？真怪，此时在中尉的感觉中出现了一些几乎连他自己也不熟悉的新东西，一种在离德国人这么近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镇静，几天来一直缠绕着他的焦急和烦恼，好象一扫而光，现在好象随同他的体力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失去了体力，也就失去了干劲和热情。现在，他努力

把一切都考虑和分析得准确些，使行动不出差错，因为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他现在首先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做等待的准备。白天，在这雪原上，在村子边上，什么事也不能干，只好耐心等到天黑，好借着黑夜设法脱险。

但等待也需要体力，也需要设法维持自己那半昏迷的知觉，用顽强的意志坚持等下去。就是对彼沃瓦罗夫这样健康人，这也是不容易的。掉在德国人眼皮下这个陷阱里要控制住神经，并不那么简单。中尉一边想，一边注视战士在澡堂里来回窜——只见他一会儿走向墙上的窗口，一会儿走进四壁漏缝的更衣室。他神色惊慌，伊万诺夫斯基每一次看他，都以为：德国人来了！然而，大概是为了安慰指挥员，也安慰他自己，彼沃瓦罗夫不时地说出声来：

“有人来到小路上……象是往井那儿走。对。象是个大婶儿提着水桶……”

过了一会儿，又说：

“噢呀！他们出来了。不，停下了。站在那儿……往一个什么地方走了。”

“往哪儿走？”

“鬼知道，一间木房挡住了。”

“没有事，别紧张。他们不会到这儿来的。”

他没有去向战士要自己的冲锋枪，他想，万一有事，战士使用它更便当，何况他自己还剩下一颗手榴弹。现在，他不能没有手榴弹。他从腰带上解下来，放在长凳旁。头旁边，一支步枪紧靠墙放着。一切就绪，剩下的只是耐心等待成

功了。

“他们进来，就要呆在这儿。”彼沃瓦罗夫说着，向窗口走去。“当然，我们也……”

中尉知道彼沃瓦罗夫没有说完的意思，突然问道：

“你想活吗？”

“活？”战士几乎吃惊地说，并舒了口气，“那当然不坏罗，但是……”

正是这个“但是”，它象该死的魔鬼横挡在他们年青的生命面前，怎么也甩不掉。从那个难忘的星期天的早晨起，世界被无情的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生，充满着天真幼稚的、但正是人们特别重要的欢乐；另一半是过早的可恶而又可恨的死。一切都从这个“但是”开始，不管往后在任何糟糕的情况下发生什么事，始终都要碰上这个可怕的“但是”。要想避开它，瞒过它，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战胜它并延长生命，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就要劳累和痛苦……毫无疑问，为了活下来，就应当胜利，但只有活下来，胜利才有可能，——战争使人们面临这该死的因果循环的命运。为了保卫生命，保卫祖国，就要消灭敌人，不是消灭一个，而是消灭很多，消灭得越多，个人和全体活的希望就越大。只有通过消灭敌人来求得生存——在战争中别的办法显然是没有的。

要是象现在这样他是否已经不可能再消灭敌人了呢？他只有消灭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他已经是不称职的战士了。无论他怎样安慰自己和彼沃瓦罗夫，也无论他怎样顽强努

力，他不能不意识到：胸膛被打穿的人是不能上战场了。

“那么怎么办？难道就在这个澡堂里默默死去吗？”

不！就是不能这样！这样对自己、对这个他认为也同样非死不可的战士、对所有的自己人，都是可怕的、难受的、甚至是可耻的。只要活着，他就决不容许自己这样做。

他甚至被自己这种想法吓了一跳，他从短暂的昏迷与沉思中醒来。应当采取某种行动，可能的话，应当立即行动，宝贵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因为再等就可能晚了……

他翻来覆去地乱想，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各种可能的脱险办法，然而毫无结果。接踵而来的又是心灰意冷，孤独绝望，一筹莫展，他只有服服帖帖地耐心等待天黑了。

该死的村子！——他多少次这样自言自语，是这个村子害了他。天老爷不长眼，偏偏碰上那个狂喊乱叫的德国鬼子，于是对射起来，结果胸部中了弹……但那儿总会有点什么。那样寂静，那样隐蔽，无疑是人为的，靠严密纪律维持；要没有高级长官的权威是无法做到的。还有那天线……种种迹象表明，那里是个很大的司令部，甚至是集团军的军部，小司令部不会在大后方。要能打它一下该多好！……但怎么样打呢？飞机现在不能飞；等天气好了，司令部那还有个找？不正象我们找这个该死的弹药基地一样！

有什么说的，一开始就不走运，结果更不妙。要不是这伤把他的身体实际上给毁了，也许他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可以设下埋伏，抓个舌头……可现在你怎么抓呢？现在倒

是他自己可能被抓去当舌头，只不过从他那儿是得不到多少好处的。话又说回来，只要他活着，而且他还有这一颗手榴弹（这手榴弹对他俩和这澡堂完全够了），德国人就抓不了他。看来，现在全部希望都在这颗手榴弹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来惊动他们，他们平安地呆在村边这个烟味呛人、又窄又黑的隐蔽所里。现在彼沃瓦罗夫更多的时间是站在两窗之间，偶尔说几句从缝隙里看到的情况。可他现在不吭声了，看来，那边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中尉突然轻轻地问道：

“你有母亲吗？”

大概，在他们现在的情况下，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彼沃瓦罗夫没有听明白：

“什么？您说啥？”

“有母亲吗？”

“当然有啦。”

“父亲呢？”

“父亲没有了。”

“怎么，去世了？”

“倒也不是，”彼沃瓦罗夫含糊地停了一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要是她知道我们现在这样，说不定有多害怕！”

“妈妈好吗？”

“当然罗，”战士这样肯定了一句。“她就我一个。总是啥都为我。”

“你出生在哪儿？”

“我？就在普斯科夫附近。有那么个小城镇，叫波尔霍夫，您听说过吧？我们就住在那儿。妈妈在学校当教师。”

“你说，她很溺爱你？”

“那还用说！简直令人发笑。你要跟孩子们在一块淘气，那还了得！早饭不吃完，那也不得了；要是生了病，就更是大灾大难了！她会惊动全城的医生，给你喂上一个星期的药。当时觉得可笑……可现在，不觉得可笑了。”

“现在是不觉得可笑了，”中尉叹了一口气。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她只有我一个，我也只有她一个。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亲戚。妈妈自己生在列宁格勒。革命前，她就在彼得堡住。她给我讲过多少彼得堡的事啊！……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总想去。现在，也许只有在战争以后。”

“当然只有在战争以后了。”

“您知道，我没啥，我并不那么害怕，打死了也没有什么！只是可怜妈妈。”

当然应该可怜妈妈罗！伊万诺夫斯基默默表示同意，其实，同样也要可怜爸爸，甚至象他爸爸——兽医伊万诺夫斯基那样的人，也是值得可怜的，他不很和善，也不见得十分聪明，喜欢和农民们闲聊，逢年过节适当地喝它几杯。有时，他很象是一个被生活折腾得够呛、非常不幸、没交上好运的人。的确，别人家都有自己的妻子，她们照管饭食、生活和家务，尽管程度不一，但都总是心疼自己的丈夫——当家的；而他和他父亲——伊戈里记得，却总是住一些简陋的小屋、

半间小房、私人住宅；吃饭时，只是一小块猪油，一碗白菜，过夜的罐头，两人共用一个铝勺。对自己的母亲，伊戈里几乎没有印象，他也几乎从未问过父亲。他知道，只要一提起母亲，父亲就忍不住掉泪。在他的印象里，母亲跟伊万诺夫斯基一家的某种悲剧联系在一起，所以儿子甚至不知道，母亲是活着还是早已去世了。其实，后来他了解，父亲对母亲的下落也未必比他知道得多。

关于父亲，熟人的评价不一样，伊万诺夫斯基对父亲的看法也经常有变化，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他按自己的方式爱自己仅有的这个儿子，总希望他有出息，为他军人的前途高兴。高兴来高兴去，结果呢？六月初，伊万诺夫斯基在军校毕业前夕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父亲在别洛斯托克地区，还是在那个边防队，而伊戈里被分到格罗德诺，由集团军干部处调用。他想，他们很快就要见面了。他甚至没有给父亲回信，后来想回信也不知往哪儿寄了。父亲在哪儿，是否活着？谁也不能给他回答清楚，而且找谁问去！看来伊万诺夫斯基同父亲的联系永远完了，任何相见的希望都没有了……

他同雅妮卡也是这样……

说也奇怪，同姑娘那次可怕的离别，竟远比同父亲的很可能是终生不再相见的离别，更令人难过，不易忘怀。的确，在以后的战斗中，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他常常忘记了她，但突然在宿营的什么地方，在吉凶莫测的战斗打响以前的宁静时刻，完全意外地想起了她，就心痛欲裂，他

没跟任何人讲过自己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那短暂的爱情，他知道，而且感觉到，别人的痛苦也不比他轻。在战争中谁没尝过与爱人、母亲、妻子或者儿女离别的痛苦……离别令人痛苦万分，如箭穿心，而这种痛苦是谁也无法减轻的。

……似乎，他又陷入昏迷与沉思之中，也许是睡着了，——也许是到了将死未死的痛苦时刻。当他醒来时，澡堂几乎已经沉没在苍茫暮色之中。他不再看表了。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变得更坏。他呼吸急促、微弱，清晨的冷战现在已被发烧出汗所代替。醒来后，他用目光扫了一下澡堂，看到彼沃瓦罗夫坐在窗子旁一个倒放的小桶上嚼面包干，窗户上布满了他的哈气，他一再用手套擦着玻璃。

“那边有什么情况？”中尉睁开的眼睛慢慢又闭上了。

“还是那样。这帮家伙还没走。”

他们还没走，就是说，村子闯不进去了。可是除了村子，现在他们还能往哪儿闯呢？在旷野上更不如在这个小澡堂里，在旷野他们会给冻死。但是在这个小澡堂里，他们也未必能等到好的结果。

真见鬼，现在正需要滑雪板了，可他们却白白地把它扔在那个村子里了。话又说回来，那时，处于敌人的火力下，哪还顾得上滑雪板——逃命要紧。可现在，没有滑雪板他们干脆就无法离开澡堂到别处去。

当然，他无所谓，滑雪板对他反正没有用了，但对彼沃瓦罗夫，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滑雪板小伙子无论如何到

不了前线，走不出一公里就会被德国人抓住。

“小彼沃瓦罗夫，你说，离那个村子有多远？”

“哪个村子？”

“就是昨天那个。”

“有两公里吧。”

原来这么近，可是昨天夜里他觉得，他们从那个村子走出了至少五公里。但是，衡量距离和时间的尺度在他那里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路上的每一公尺，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象被他的伤痛拉长了，伤痛造成了对它们的错觉。看来，他现在更要依靠彼沃瓦罗夫了。

“中尉同志，该怎么办？”彼沃瓦罗夫问。

“去找滑雪板。夜里，可能还没有被德国人捡走。”

彼沃瓦罗夫沉默了一会，暗自思量了一下，叹了一口气，答道：

“好吧，我去一趟。只是等天黑一点。”

“行。你知道应当……”

“嗯。那您……您留在这里怎么办？”

“会有办法的。我等你。”

天还没有全黑下来，彼沃瓦罗夫就站起来，赶忙准备上路。他先脱下一只厚油布靴子，缠上裹脚布，然后从背囊里拿出来两块面包干，放在口袋里；他把背囊移到伊万诺夫斯基跟前。

“那……我带上这支冲锋枪，行吗？”

“带上吧。”

“您知道，带上冲锋枪……心里踏实些。”

中尉看出，彼沃瓦罗夫得到了前线的战士人人都渴望得到的这么一件武器，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心情。冲锋枪在当时是新鲜玩艺，步兵几乎全部用步枪。伊万诺夫斯基本人也是在出发前一天才得到的：将军发了善心，命令自己的马兵把冲锋枪让给了中尉。当然，他们处在现在这种情况，武器即使不能决定一切，那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他们那一点点微薄的能力只能靠武器永恒不变的威力起作用了。

“那么步枪就放在这儿吧。”

中尉没有表示反对，彼沃瓦罗夫解下腰带上的两个帆布子弹带，叮当一下，他把弹夹放在长凳旁的地板上。

“这是一支好步枪，打得很准，准尉使过。”

伊万诺夫斯基不在意地听着战士说话，他想，一支步枪，几夹子弹，一颗反坦克手榴弹，两个燃烧瓶——大概这些就够用了。如果走运，他能等到彼沃瓦罗夫带着滑雪板回来，也许，他们还能做点什么。要是不走运，那就坚持自卫到底。

彼沃瓦罗夫缠好了另一块裹脚布，紧了紧腰带，喜形于色地把冲锋枪挎在肩上，看来，他已准备好出发，路虽不远，可谁知道是否安全。

“您的表几点了？五点了？我一小时内回来，离这儿不远。”

一小时内他就能回来，他们又将在一起。在这新的别离时刻，伊万诺夫斯基感到：同这个温顺听话的小伙子在一

起，总的说来心里挺舒服，可现在他要一个人孤独地度过这一小时，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分散能大大削弱他们的力量。一种违背数学的奇怪逻辑在起作用：一分成两半后小于一；同样，在另外情况下，一加一大于二。大概，这很难同正常的逻辑一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成立。但事实还真是这样——这种奇怪的逻辑，中尉根据亲身经验知道得一清二楚。

战士已经准备好了，但不知为什么还不走，也许在这离别前还想说点什么。伊万诺夫斯基知道，战士想说的是什
么，他犹豫起来。又有最后一次机会去侦察那可恶的村子，并再一次试图了解到一些司令部的情况。哪怕了解得很一般，但也算是没有空手回去见派他们出来的那位将军，总算多少弥补了他们没能炸毁弹药基地的过失。但是，他也不能不意识到，彼沃瓦罗夫稍一疏忽大意，就会立即带来三倍的不幸，就永远断送了完成任务回到自己人那儿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来就是十分微小的。

“中尉同志，那么我走了。”彼沃瓦罗夫下了决心，转身向门口走去，这时中尉说：

“等一等。你知道……我不坚持，你自己看着办。但是……也许，你会尽可能……村子那里是什么呢？好象是司令部……”

他不作声了，彼沃瓦罗夫十分留神地等中尉说下去，可中尉没有再说什么，于是他简单说了一句：

“好，我试试。”

在伊万诺夫斯基那被打穿的胸膛里象有什么东西发出

了抗议的声音。“我试试”——这是什么话！试试是没有多大好处的，这里需要超人的机智、顽强和坚毅。就是这样，也还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道理他不能向战士解释，好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向战士讲些不吉利的、虽然在战争中是很平常的话，何况他现在正十分勉强地忍着身上的疼痛和虚弱。他只是叹了口气说：

“一定要小心啊！……”

“好的！您别担心。我悄悄地……”

“对。而且还要快……”

“好。给您的水在这儿。”战士从木桶里舀出一铁盒水，放在他头旁边，“要是您想喝……”

费劲的谈话使伊万诺夫斯基疲劳极了，他闭上了眼睛，听见彼沃瓦罗夫出了更衣室，停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打开那里的门，又从外面把门紧紧地关上。开头一会儿，伊万诺夫斯基还能听到彼沃瓦罗夫离开澡堂的脚步声，但脚步声很快就消失了，他那模模糊糊的希望也象是随着脚步声远去了。他们好象有什么东西正在完结，一去不复返了，再也不会产生新的东西了。他等着，痛苦地、顽强地等着，细听着房顶上每一丝风声，他全神贯注，思想高度集中：万籁俱寂，只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心惊肉跳。这声音有时被他的咳嗽和低哑的胸鸣所吞没。

然而，他的听觉也被累得迟钝了，四周还是静悄悄的。此时，他的脑海里塞满了种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稀奇古怪地拼凑在一起的思绪。他好象开始打瞌睡了，他胡思乱想，昏

迷不清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幕虽苦犹甜、动人心弦的往事……

第十一章

只剩几分钟就要开车了，她却站在月台上哭。看来，这里既没有送她的人，也没有接她的人。总的来说，这一天早晨站台上的人就不多，伊万诺夫斯基下了一级车梯，开玩笑地向姑娘喊：

“哭什么？另给你找一个嘛。”

这是出于年轻人的顽皮，是那些在旅途中偶然相遇又马上分离、而且估计不再相逢的人们之间随便打趣的话。但是姑娘用系在脖子上的花头巾的一角揩了一下眼泪，用考验的目光瞟了他一眼。柯利亚·戈莫尔科把着车门的扶手斜身倚在他背后，他俩心情轻松愉快，似乎能把世上的任何痛苦都变成玩笑。

“要不就跟我们来吧！坐到别洛斯托克去！”

姑娘下意识地理了理细脖子上的头巾，又瞟了一下这两个满身新军装的青年军人的脸庞，她的嘴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可我要去格罗德诺。”

“多巧啊！”伊万诺夫斯基开着玩笑，假装惊奇地说，“我们也是。一起走吧！”

她没用多劝，就拎起脚边的小提箱，灵巧地抓住已经开动的火车扶手，伊万诺夫斯基扶住了她，戈莫尔科往旁边一让。被这种巧事弄得又高兴又有点儿发窘的新旅客上了车。

“车票，车票，女公民！”手里拿着小旗急急忙忙向门口跑来的乘务员大叔立即向她要票。

“有票！没问题！”伊万诺夫斯基用不容丝毫怀疑的声调说，一面往车厢里挤。

他领着姑娘往第三或第四包厢走去，那儿是他和戈莫尔科的铺位。他提着姑娘的箱子，感到轻得出奇，很象是空的。柯利亚跟在后面，姑娘默默地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向两边发窘地看看。

“就在这儿，请吧！可以占我的铺位，我到上铺去。”伊万诺夫斯基热情愉快地给姑娘让着下铺，并把她的提箱放在上面。她顺从地坐到车窗旁，克制着明显的窘态，过了一会儿，小声地说：

“我没有票。”

“怎么？钱不够了吗？”

“我被盗了。”

“怎么回事？”

“夜里，从明斯克开出的火车上。”

这就有点不好办了。看来，他们承担了这份力所不及

的责任，这也就违反了严格的铁路规章制度。但现在退缩也不行了。伊戈里看了尼古拉^①一眼，从他那张显得有点粗糙、总是皱着眉头的脸上知道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自己也就下了决心。的确，怎么能让一个这样真心实意信任他们的人难受呢？

“没有什么！我们去和列车员商量一下……”

这件事，不仅要找列车员，而且还得找查票员和列车长商量，结果是：列车到了下一个大站，伊万诺夫斯基跑到车站售票口，强赶上替姑娘补了一张票。票买到格罗德诺，姑娘终于熬过了这一段遭遇，很快就平静下来，甚至露出了微笑。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姑娘显得很会交际，总的说来，是个惹人喜欢的小姑娘；过了一会儿，她就略带幽默地谈起了自己旅途中的遭遇。原来，她住在格罗德诺，到明斯克去看望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回来时车厢里就出了这样倒霉的事。她提箱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此外还拿走了外套，短外衣，当然还有钱。但现在他们救了她，因此她非常感激他俩慷慨大方的关心和帮助。

“哪儿的话！”伊万诺夫斯基一摆手，转了话题。“你很早就住在格罗德诺吗？”

“我就生在那儿。”

“那么说，是当地人了吗？”

“当然啦。”

① 尼古拉是柯利亚的大名。

“俄语怎么说得这样好？”

“我们家里经常讲俄语，我父亲是俄罗斯人，姑姑也是。只有妈妈是波兰人。”

“你在哪儿上的学？”

“在波兰中学。那里没有俄罗斯学校。”

“你叫什么名字呢？”伊戈里越来越感兴趣了。

“雅妮卡。你呢？假如不是什么军事秘密的话。”她朝伊戈里调皮地笑了一下。

“我叫伊戈里，他叫尼古拉。”

“明斯克我有个叔叔，也叫伊戈里，伊戈里·彼得罗维奇。你们是上我们那儿服役的吗？”

他们这时彼此递了一个眼色，这确实有点属于军事秘密了，然而被女旅伴毫不费劲地猜出来了。但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呢！的确，——目前他们军校毕业，接到了去集团军报到的命令，军部就设在她这个格罗德诺。

“好象是这样。”伊万诺夫斯基回答得含糊其辞，“这个格罗德诺怎么样？小城市不错吧？”

“是个非常好的城市。你们不会后悔的。”

“你以为我们会留在格罗德诺吗？”——对一切都不相信的戈莫尔科·尼古拉又实行他的怀疑主义了，“准保把我们塞到什么地方森林警备队。”

“到森林里多好啊！我们这里的森林呀！……美极了！”雅妮卡赞叹地说。

伊万诺夫斯基没有作声。他对森林、甚至最美的森林，

也很少象姑娘这样欣喜若狂。还是在军校时，好几个月的夏季野营，森林呀，原野呀，离固定营房总是很远，固定营房里虽说生活不怎么样，但毕竟有条不紊，所以，秋天还没到，这种偏僻的生活就过腻味了，即使绚丽多彩的大自然也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想回城里去。有个人说得对：军人不注意大自然，天气对军人更重要。

然而，雅妮卡的赞美是那样天真、诚恳，伊万诺夫斯基不由得笑了，也就愿意考虑到格罗德诺的任何一个森林里去。而且，不知为什么，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一绺绺鬈发俏皮地落在前额上、长得相当可爱的、敏捷的姑娘了。现在再想起他们在巴兰诺维奇车站上那次轻薄的玩笑和那种缠人劲儿，他心里就不好意思了，也许只有他们后来同情她、帮助她的行为才多多少少弥补了这种过失。火车除了在一个个小站上稍事停留以外，一直向西开去。窗外，六月的绿色田野、小树林、蔚为壮观的大松林、村子和农庄飞驰而过，农庄到处都有。伊万诺夫斯基从未来过白俄罗斯的这个地方，现在他对这里的一切，他感到陌生而女旅伴大概已经十分熟悉的白俄罗斯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个小站上，他们的车厢正好停在站前小市场的对面。伊万诺夫斯基跳到站台上，赶忙买了一包普普通通的乡村食品——黄瓜、小水萝卜、农村香肠，甚至还买了一碗热乎乎的酥松、喷香的新鲜土豆。然后，他们一起吃了起来。小伙子们热情地招待着姑娘，姑娘跟他们也已经相处得很熟。她高兴地笑着，开着玩笑，大口地吃着黄瓜和土豆。饭

后，大概尼古拉从伊戈里的举止中发现到了一点奥妙，很明智地退出，爬到上铺睡觉去了。剩下他俩面对面地坐着，中间只隔着一张车厢里的小茶桌。

他跟雅妮卡在一起很高兴，虽然他还没能彻底克服后来出现的某种内疚心情，有点象追求人时的难为情，尽管他一直就根本没有追求人的意思。而雅妮卡看来很随便，很自然。她几乎毫不拘束，脱掉了白色的小号软木底凉鞋，把短短的连衣裙包住膝盖，在硬座上动了动身子，好坐得更舒服些，她带着惹人喜欢的俏皮劲儿看着伊戈里。

“你知道吗，我们那里有一条涅曼河，”她说，“涅曼”这个词确是照白俄罗斯语发音的。伊万诺夫斯基心里笑了，他想起了自己那不远的童年、学校、雅库布·柯拉斯的著名长诗以及“涅曼”这个白俄罗斯语的河名，一条他从未见过的河流。车窗下马上就要出现陡峭的岸坡，两棵垂柳和岸边的木筏。“我常常从木筏上跳下去洗澡。清晨，我很早就跑出去，河上还飘着轻雾，河水暖和得象刚挤出的牛奶，到处都没有人。洗够了，整天都痛快。”

“而我更喜欢湖，尤其是树林里的湖。风和日丽时，那就太好了。”伊万诺夫斯基说。

“看你说的！还是河好！湖水有沼泽的气味，可河水总是流动的，象晶莹的泪水。夏天，河上美极了。现在光说没用，到了我就领你去看，保准你会喜欢。”

当然会喜欢的。他已经相信，这一切一定很奇妙：一座小房，陡岸上两棵垂柳，岸边停着木筏，可以从木筏上跳进

水深流急的涅曼河。这是他用想象描绘出的一幅图景，尽管经验告诉他，即使最丰富的想象也从不跟实际相符。实际上完全不一样——或者坏，或者好，但就是不一样。

雅妮卡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就好象他们很早就认识似的；他却还是一直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拘束，这拘束不仅不消失，反而象是越来越厉害。在巴兰诺维奇车站无礼貌地招呼她，表现出自己是个轻率的、喜欢在旅途中搞些风流韵事的人，而这一点雅妮卡不可能不看到，——一想到这里，伊戈里就感到不安。虽然这里面并无任何的轻率，纯属孩子的淘气，也许，这对一个刚授予排长职务的二十二岁军校毕业生不太合适。当时，在月台上他没有仔细看她，只是看了一眼。但现在，他睁大了眼睛，几乎是惊异地看着她，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视线从她那柔情脉脉、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少女脸庞移开。

黄昏，列车快到格罗德诺时，他已经意识到，无法跟她分开了——越来越被她那青春的优雅和一种神秘的魅力吸引住了。这东西他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但时刻都能感觉到。他们不再谈她的旅途遭遇，好象她忘了这件事。只有一次，当她挪动架上那轻飘飘的小提箱时，才忧虑地皱了皱眉头。

“就连白颜料也给拿走了。这是给我爸爸带的。我们那里的白颜料弄不到。”

“他是干什么的？油漆工人？”伊戈里没有听明白。

“画家。”雅妮卡随便回答说。“现在颜料不好搞，以前我

们是从华沙订购……”

傍晚，列车到达了格罗德诺车站。他们带着微微激动的心情下了车。雅妮卡前后摆动着她的空提箱，领着他们来到集团军司令部，幸好司令部就在她回家的路上，不过司令部除了值班员，一个人也没有，得等到明天早上了。在这里过夜或者去警备区招待所都可以。但这两名中尉没有去找招待所，而是拿着自己的箱子，走进一个象是司令员住的小房间，里面靠墙放着三张军用床。戈莫尔科马上动手收拾壁龛下的那张床铺，而伊戈里随便抖了一下靴子上的灰尘，就急忙上街了。雅妮卡已经在最近一个街口的栗子树下等着他，他的出现使雅妮卡高兴，尤其是因为他今天这一夜没有事，他们就这样在这个黄昏时候的城市街道上散步了。这个城市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有趣的。

他和戈莫尔科在司令部停留的两个小时里，雅妮卡已经换好了衣服。现在，她穿着一条深色的裙子和一件带小花边领的浅淡色丝绸上衣，时髦的高跟鞋在人行道上发出均匀的响声。她这样打扮，显得比她的少女年龄要大，个子也高了——几乎跟伊戈里的肩一般平。他们在这黄昏时候的街道上走着，这里有许多人跟雅妮卡认识，跟她打招呼，男人们不失尊严地将手举到新式礼帽的帽檐，妇女们和颜悦色、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地点点头——看到这些，伊戈里心里高兴。雅妮卡回答他们既特别有礼貌，又叫人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尊严，她有意压低声音给他介绍在这条浓荫覆盖的繁华大街上见到的名胜古迹。

“这是我们的‘豪华大街’，在波兰时期这么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这座教堂，是为纪念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建的。虽说矮小，但里面是个很整洁的小教堂。我在那里受过洗礼。再往下，你看到那些很有趣的房子吗？就那一排，一个个带着蘑菇形的三角墙。这是从里昂来的纺织工人的房子。还是在十七世纪时，季津加乌斯富翁从里昂雇了一批纺织工人，并给他们盖了这些标准的法国式房子。这座小房是波兰女作家爱莉丝·奥若什科娃的，她住在这里，直到去世。你知道她写过好些很有趣的书。”

他的确已经喜欢这个小城市了，它朴素，但很舒适。小小的街道铺着长方石块；两边是方砖砌成的人行小道，斜斜的路面，镶着石边。许多房子的墙上绿色的葡萄树郁郁葱葱，有的房子，藤蔓缠绕到三楼。但他最盼望能跟雅妮卡所赞美过的涅曼河相见。据雅妮卡说，河流就打这儿经过，将城市分成不均匀的两半。

街道在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大楼附近拐弯了，他们走过成排的货摊和市政管理局，在街口栗子树下有一个推小车卖冰淇淋的女人。一直和伊戈里并排走着的雅妮卡，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伊戈里，我可以向你提个请求吗？”

“当然可以！”他答道，这时他乐于满足她任何一个、哪怕是离奇的要求。

“你知道，我早就盼望过……嗯，总而言之，我盼望过有……有那么一天，一个小伙子请我吃冰淇淋。”

“呵，吃冰淇淋……”

伊戈里羞愧极了，心想，自己实在是太笨了，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呢！但他似乎真的没有发现这个卖冰淇淋的女人，他被街道、被天主教堂高栅栏里那一排栗子树吸引住了，他根本没有料到，他身边的这个仙女会在这里提出这么一个要求。

“请，小姐！谢谢客气的先生，”当伊戈里不肯收下找回的几个零钱时，卖冰淇淋的女人用波兰话表示了感谢。

“谢谢，万达太太，”雅妮卡从中年妇女手里接过印有方格花饰、装着冰淇淋的华福里饼干杯，也用波兰话彬彬有礼地向她表示了感谢。

这条短短的街道尽头，在那些椴树的上方，只见一大片广阔的天空布满了晚霞，这只有在很高的山坡上才能望得到的。不一会儿他们走到了街头，看到了一座横跨护城河的石桥。这是一座断壁残墙的古老城堡的入口处，城堡的另一侧，在古老的公园深处，一座华丽的宫殿耸立在画墙里面。

“波兰国王巴托里的城堡，”雅妮卡庄重地说。“而这是他的‘新城堡’。再往那边看，看见了吗？”

他朝几乎一人高的石墙那边看去，不禁心里“哎哟”一声。原来，他们站在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往下远看，小小的人影正沿着石级向堤岸两头散开，河堤环绕涅曼河的这一岸，逐渐消失在参天大树的浓荫之中。

“看到了吧？这你喜欢吗？”雅妮卡紧靠着他的胳膊，一

个劲儿问他。

那古色古香、令人神往的古老城墙，飞架在石梯之上，那坚固的天桥，那郁郁葱葱的丘陵和山坡，那高耸入云、俯瞰全城的眼望塔的石柱，他当然不能不喜欢，他是宁肯看到天黑的。从这样高的地方去看，涅曼河就毫无惊人之处——不过是条平平常常的、两边有堤岸夹着的中等河流。他记得，浩渺的湖面都曾给他留下过深刻得多的印象。然而，正是涅曼河使雅妮卡兴高采烈，她在旁边象小鸟一样叽喳个不停：

“看哪，看哪，水流多急呀！看见了吧。那杨树下面多大的漩涡呀！真了不得！只要掉进去，就会把你卷走，别想出来了。”

他们往回走了几步，顺着那个石梯下到堤岸上。不，河还是很美的。显然，他在高处就是没能对这条河作出应有的评价。河的右岸是一条修得很好的堤岸，两旁树木成行，右边斜立着大片大片的岸坡，小径纵横交错，坡上头有堡垒的断壁残垣。河流缓缓转弯，消失在不远处密密的一片柳树林里。那儿快到城边了，针叶林青幽幽的，是红日西下的地方。他们沿着涅曼河走着，雅妮卡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与这美好的黄昏无关紧要的话。伊戈里心想，生活里的安排十分奇怪。今天早晨以前，他何曾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姑娘，在巴兰诺维奇站台上与她相遇纯属偶然，对她竟开了一个实在愚蠢的玩笑。这是一个有教养的青年所不应该做的吧。而现在，经过一天的相处之后，伊戈里已经不知

道往后怎么办了——往后的生活要没有她，简直就失去任何乐趣！

他们沿着涅曼河走了很久，当太阳在墙一般的、参差不齐的树林后面隐没了以后，他们才转身往城里走。听着身边雅妮卡的鞋跟频频的敲击声，他模糊地感到，他的生活似乎在奇怪地变化，变化的内容虽然还不能预料，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他对此感到高兴，几乎感到幸福。旁边，平静的涅曼河面粼光闪闪，几乎看不出水流的痕迹。白天人流不息，熙熙攘攘的河岸，入夜几乎变得空荡荡了。钓了一天鱼的人们，一个个疲倦地收起鱼竿回城去了。浪花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灰暗的礁石，松香扑鼻的黑色渔船在那里摇晃。高大的白杨垂挂在河堤之上，把河堤笼罩在浓黑的夜色之中，行人到那里就完全看不见了。从居民的院子里飘来了炊烟的清香，似乎听得见城市入夜前的均匀呼吸了，城市沉浸在大自然的安详宁静的气氛之中，只受永恒的自然规律约束，不受世上任何人的权力支配。

雅妮卡明显地靠近了他，大概完全克服了白天把他们隔开的某种东西吧，现在她紧挨在他的身边走，手指轻轻地牵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时候，雅妮卡对他改用了熟人之间的称呼，而伊戈里也几次这样称呼她，因此，他俩感到格外的随便了，白天那种不好意思的心情和长时间摆脱不掉的勉强生硬的态度一扫而光了。

现在他们来到白柳的浓荫之下，潮润的夜色更浓了，雅妮卡忽然往旁边一闪，顺着长满野草的山坡向上冲去，冲劲

那么猛，使他感到奇怪。伊戈里犹豫地站住了，想到了自己脚上讲究的、擦得锃亮的皮鞋，雅妮卡在黑暗处鼓励他——“来，来，”说完很快就钻进荆棘丛中去了，且不断向陡坡爬去。伊戈里看不见上面，半个天空象被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遮住了，但从雅妮卡的声音中，他感到，姑娘要领他看一种神秘奇妙的东西，于是也钻进了灌木丛。雅妮卡脱掉了鞋，继续往上爬，在黑暗中小声对伊戈里说：

“你马上就会看到……马上，马上……”

过了一会儿，伊戈里爬过了最陡的地方，一只手也划出血了，他现在站在一个凉台的边沿上。凉台不宽，围着栅栏，平整的石板还在散发着白天积聚的热量。旁边，一棵高大的古树遮住了半个天空，不知是什么建筑物的一面陡直的高墙凌空而起。四周又静又黑。下面，从河边的垂柳那里隐约传来涅曼河哗哗的水声，可以闻到城墙的石灰味和看来是附近菜园里的茴香味。

“喂，你明白了吗？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是科洛扎呀……十二世纪，你明白啦？”

“这我明白。看看去吧……”

“你会看到的，”雅妮卡有把握地说。

“你有时间看的。可现在……先到这边来吧……”

她又冲进黑暗里了，轻巧地钻过稀疏的栅栏，越过了一道什么墙，她那浅色的上衣在伊戈里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伊戈里不甘落在她的后面，在黑暗中紧紧跟随，一直走到一

个长满野草的小院子里。这儿很黑，天空全被树木遮住了。黑暗中，身边的这面灰墙只显出一点影子。雅妮卡机灵地倾听着静悄悄的四周，光脚走到一个壁龛的低矮的小门口，她扔掉手里的鞋，把门往外拉，神秘地低声对他说：“钻进去！”他好不容易钻进了狭窄的门缝，从里面把住两扇门，雅妮卡就从中间溜了进来。当两扇门又合上的时候，里面一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身边的她都看不见了。怕她丢了，伊戈里轻轻地扶着她的双肩。这里寂静得有点令人害怕，忽然头上有东西在拍打，发出低沉的声音。雅妮卡吓了一跳，同时赶忙安慰他：

“别害怕，这是鸽子。”

“我不怕，”伊戈里低声回答，尽管他这时又好奇，又害怕。

“这是圣像壁，这是读经台，而这里是……”

黑暗中，他们轻步在嗡嗡响的石板地上走着，雅妮卡把他领到一堵墙跟前，让他蹲下，自己猫起来。她稍稍欠起身，轻声地喊着：

“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从不同的地方轻轻响起了很多回音，这些声音使他感到很不自在。

“呵—呵—呵！”她重复了一遍，声音提高了些。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声音向远处传去，传到黑暗中看不见的教堂门廊的拱顶，向上面跑了，也许在钟楼那里消失了。

“这是回音孔。懂吗？”

“什么回音孔？”

“你不知道？瞧你！……到这边来……就这儿，这儿……”

雅妮卡又拽着他的手，象好人领着瞎子，在黑暗里走去。她在一个什么地方停住了，轻推了一下他的一侧。

“你摸。你个子高，也许能摸得着。”

他开始在粗糙的墙上摸起来，一会儿他就摸到了墙上一些磨得很光滑的坑，但他什么也没有明白。不过他什么也没问，什么也不感到惊奇。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天尽是新鲜事，但要想一一弄清楚，大概是需要时间的。

可时间偏偏很不够用。一年中这最短的一夜，过得飞快，黎明就要到了。当他们走出教堂，城市上空已经是星光暗淡，东方欲晓，一抹淡淡的晨曦映在遥远的天际，雅妮卡匆匆忙忙甚至不管伊戈里是否来得及消化，开怀畅谈她所看到的、所知道的、非让伊戈里分享不可的、一切有意思有趣味的东西，她拾起鞋，一下就钻进了陡峭的河岸上一丛带刺的野蔷薇中，伊戈里吃力地跟在后面，已经顾不得自己那双讲究的靴子了。这双靴子今天也许磨损得够呛了。

“来，到这儿来！你怎么这么不灵巧。别害怕，掉不下去。我扶着你……”

穿过一条沟壑，他们又来到堤岸，河水已经酣睡，微微冒气。雅妮卡接着往下跑，踩着光滑的石头到了水边。

“到这儿来，趁爸爸还在睡觉，我领你看看我的花坛。小冬青已经开花了，清晨特别好闻——香极了！”

他穿着皮底靴，顺着石坡，连走带滑，来到小船前，雅妮卡已经在那儿拿着桨，将船硬往岸边靠。他跳上船，刚刚抓住船舷，雅妮卡就调转船头，顺流划去。

“这样能近些。要是从桥上走，那你多久能走到……”

“嘿，你真！……”他赞叹地喊了一声。

“真什么？不好，是吗？说实话，是不是不好？”

“好极了！”

“什么好极了！父亲一会儿醒来，他会给这个好极了厉害瞧的。”

河水的急流把小船往下冲，但她用一只桨就把小船划到对岸，一会儿船靠近篱笆墙，墙头立着几棵高大的柳树。

“喂，抓住！要不然就冲走了。”

他急忙抓住水中闪现出来的一个朽了的小木桩，她跳上岸，他们把船拖到长有水草的地方。这里比她原来开船的地点只往下偏了一点儿。

“早晨船主会找到的。现在……先过这个胡同，然后再沿着花园穿过土豆地，我们家的小房就在河边的教堂附近。你不太累吗？”姑娘瞧着他的眼睛，突然关心地问。

“不累，不要紧……”

他们在郊区一个长满嫩草的胡同里走着。姑娘两手提着鞋，走时肩膀轻轻地挨着他。伊戈里感觉到了从她那薄料短上衣里透过来的体温，听到了她均匀的呼吸，闻到了她头发上奇怪的香气，伊戈里想，今天他实在是太幸运了。现在他已经感谢自己缺乏教养促使他在巴兰诺维奇车站上开

了那个荒唐的玩笑，他感谢这个城市和它的名胜古迹，感谢他一生中这个最特别最幸福的一夜。

“雅妮卡！”他轻声招呼，一面紧紧地跟在后面。但姑娘只是着急地加快了脚步。

“雅妮卡……”

“我们绕过这座小房，然后拐进一条小路，穿过园子就……”

“雅妮卡！”

“快，快！别拉下！要不爸爸快起来了，那他一下就会发现……”

顺着篱笆、踩着牛蒡丛生挂满露珠的小路，他们爬了一个坡，走得更快了。天开始亮了。附近，在果园菜地幽暗的浓荫里“涅曼”外区还在沉睡。他们过了一条踩得很结实的小径，来到一片白花开得象繁星一样的土豆地边，嫩绿的茎叶和新鲜的泥土散发着浓烈的清香。雅妮卡快步在前面走，他的靴子被土豆茎叶缠得几乎跟不上她。教堂已经很近了，在放亮的天空衬托下已经看得见它的轮廓。教堂后面什么地方，她说过的木筏在轻轻地拍打着温暖的河水。当她走到离教堂院墙还剩百来步时，一种奇怪陌生的声音，先是很轻，但很快就变成隆隆巨响，打破了这个还未睡醒的城市的寂静。雅妮卡在前面停了下来。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嗡嗡叫？是飞机吗？”

是的，这显然是飞机越来越近，但是他仍然不相信，近几周来人们担心、发愁、惶恐不安的最可怕的事，竟这样荒

唐无稽、不合时宜地发生了。他抱着一线希望，抑制住内心的恐惧，热切地希望那个可怕的事不要发生。能够平安度过，但看来还是发生了。

惊恐万状的雅妮卡好象寻求保护一样，向他猛扑过来。他刚用发冷的手搂住她，附近一阵巨响，把他们震倒在硬挺挺的土豆秧上。清晨被大片红黑交织的火光映亮了，一股股强烈的热浪扑打在他们的背上，泥土厚厚地盖满了他们一身……

等第一阵震耳欲聋的隆隆声过去，他站了起来。雅妮卡也在身边跳起，她披头散发，短上衣全弄脏了，却不知为什么还在使劲往那只踩脏了的脚上穿鞋。他因为被爆炸声震聋了，所以没有马上听见雅妮卡那弱得出奇的声音。雅妮卡向他喊：

“往桥上跑！快往桥上跑!!! 桥在教堂后面……”

当然，他应该往桥上跑，到司令部去；他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能这样去做了。

他再也没有回头，在爆炸的冲击下，几次他跌了又爬起，向着桥头飞跑；慌乱中恍惚看见一个惊呆了的姑娘，双手握着一只闪光的便鞋，孤独地留在挂满露珠、开满白花的土豆地里……

第十二章

不知从哪儿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从昏迷的沉思中惊醒。起初他觉得，这是村里头有谁无意中放了几枪，但当他提心吊胆、侧耳细听以后，就知道是从对面村子传来的：这正是他们昨夜来的方向，彼沃瓦罗夫也正是往那里去的。伊万诺夫斯基感到大难临头，心凉了半截。他屏住呼吸，凝神细听，但毫无疑问——枪声是从那里来的。

大概，最先的几枪他在沉思中没有听到。当步枪清脆地响了一声、而冲锋枪在寂静里嗒嗒地一阵扫射以后，他才明白过来。不用说，一定是他那支冲锋枪——德国人的冲锋枪不会那样打。这是他能准确感觉出来的。伊万诺夫斯基用一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但胸部感到有什么堵得慌，痛得喘不过气来，他大咳不止，吐出了一口凝结的血块，于是又有气无力地仰卧在长凳上。似乎在他咳嗽的时候，村子那儿已经平静了，他后来虽然仔细地听了很久，但再也听不见什么。

中尉勉强抑制住内心的焦急，在长凳旁边摸到了表，已经七点四十分了，也就是说，彼沃瓦罗夫已经走了将近两个半钟头了。如果离那个村子只有一公里，就算两公里吧，那

他也该回来了。但既然他没有回来，那就是说……他进了村子，就是说，他没有能够悄悄地回来，伊万诺夫斯基昨天那样的遭遇也落到了他头上。

中尉又欠起身子细听起来，他想从黑墙上透点毛毛亮的小窗口往外看，但身子还没有伸到窗口，就坐着不动了。他头晕目眩，眼前直冒火星。他一只手摸着显得格外沉重的步枪。但摸步枪干什么？澡堂里此时又没有什么动静，附近也没有人。彼沃瓦罗夫显然在村里陷入了困境，可是能有什么法子去减轻他的困难呢？然而，他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啊！他用了很大力气一只手抓住墙壁，来到更衣室，一脚把门踢开了。

这个冬天的夜晚，象今年十一月每个夜晚一样，刮着风，低矮的天空没有星星，大地昏昏沉沉；地上覆盖一层干净的新雪！雪地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彼沃瓦罗夫留下的一些深深的脚印，顺着澡堂的墙根，向墙犄角拐过去了。

伊万诺夫斯基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阵阵狂风呛得他喘不过来气，他倾听寂静的黑夜，但是再也没有听见什么——没有枪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喊声。于是，他没有掩门，在门槛旁边坐下，靠着圆木墙，这样坐了一个钟头，也许更长些。他清楚地意识到，彼沃瓦罗夫如果几分钟内不回来，那就是永远回不来了；他怀着这种焦急和痛苦的心情盼望他回来。

过了几分钟，过了几小时，但彼沃瓦罗夫还是没有回来。伊万诺夫斯基实在等不下去了，他跪着爬到门槛后面，摸到自己的小方表——时间是九点五十分。

“为什么，我为什么派他去呢？”中尉心情很后悔，“找他妈的什么滑雪板？什么参谋部？这只能毁了他，连我自己也毁了……”

的确，没有彼沃瓦罗夫，他已经什么也不能了，但既然自己已经非死不可，那么当时至少应该想法让战士活下去。可他却把彼沃瓦罗夫派去执行一个只有千分之一成功希望的任务。德国人可能安排好了埋伏，田野里可能设下潜伏哨，而且一定是加强了村里的警戒；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是不那么容易。既然昨晚他都没有成功——那时参谋部人员还没有被惊动，那么今晚就更不会成功了。

“那么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伊万诺夫斯基千百次地问自己。

其实，他都已经知道怎么办了。他现在只是故意拖延时间，对彼沃瓦罗夫还抱有也许还能回来的一线希望。但当他又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完全是幻想以后，他扶着墙站了起来。

他试了试自己究竟还能干些啥，也许是啥都不能干了。尽管很费劲，但还能站得住，特别是手下有支撑的时候。现在墙壁成了他的支撑，到了田野他可以支撑枪托。他的两条腿多少还听使唤，但呼吸和脑袋就更糟了。可他想，到田野经风一吹，神志也许会清醒，呼吸也可能会顺当一点。如果不急走，慢慢来，多停停，节省着体力……

中尉的主意已定，他回到澡堂，把子弹带里的一夹夹子

弹塞进了几个衣兜里。背囊他已经没有力气背上肩了，只好留在长凳上，但随身带了一个手榴弹。他一刻也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于是把着门框走了出来。

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但却以令人无法解释的顽强意志，沿着彼沃瓦罗夫清晰的脚印走了二十来步，也只是在这以后他才停下来。枪比刚开始重多了，但当他快要跌倒，特别是在停下来的时刻，还得靠它来支撑。如果只靠他那虚弱发颤的两只腿，那早就站不住了。他喘了口气，带着惊疑和狼狈的眼光回头看了看。澡堂的黑影孤零零地落在后面。可爱的澡堂啊！他们在那里平安度过了一天一夜，而他十有八九不会再回来了。

第二次，他摇摇晃晃地大概没有走出十五步，就咳得停下来。咳嗽是他这段路上最坏的事了——咳嗽深深地牵动他内脏的伤痛，痛得眼睛发黑。但彼沃瓦罗夫给他胸部包扎的看来还不错。干巴的伤疤虽然引起疼痛，但绷带能不让滑下来；伤口也不再流血了。要不是体内难忍的剧痛，该多好！

他想尽量走得快些，现在澡堂也就成了衡量他速度的标记。在两条腿颤颤悠悠站立不稳，他已经停下来四、五次了，每一次都要回头去看看。但每一次都看见澡堂灰蒙蒙的阴影，澡堂象是故意停留在那里，硬是不愿消失在黑夜中。大概过了至少一个钟头，灰黑的夜色才把澡堂吞没。

四周是雪、是风、是原野，——中尉知道好象已经走了一半路程，现在要想返回去已经是不行了，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力气了。他甚至不再往回看了，后面已经没有什么，也不

可能有什么——吉凶祸福，全在前头！

后来他接连两次跌倒，因为两条腿站不住。这两次没有马上爬起，都是在雪地上躺了一会儿，等受震动的伤痛过去才起来。还有一回，他就更是倒了大霉——跌倒时身体很笨，仰面朝天，摔得很重，痛得象是昏过去好一会儿。后来他苏醒了，但还是长时间地躺在雪地上，总感觉那颗手榴弹圆骨碌地咯在身下，但他还是鼓起了劲，爬起来坐着，以后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迈出了最艰难的头几步。

他竭力什么也不想，甚至连四周都不大去看，但目光一直盯着深深印有彼沃瓦罗夫脚印的雪地。这脚印朝着一个方向延伸。看来这个战士对他们昨天从村子出来的路记得很熟，所以是快步朝那儿走去的。现在伊万诺夫斯基最怕走岔了这些脚印。

走岔是容易的，特别是当他感到阵阵虚弱、眼前发黑的时候。但这时他就停下来，把枪拄在地上，等虚弱过去。另外，风也特别讨厌——刮得他不能往远看，眼睛尽淌泪；有时候，风是刮得那么凶，伊万诺夫斯基踉跄了一下，差点儿没刮倒。但他顽强地和风、和自己的虚弱、和伤痛搏斗。他当然知道，未必能再见到彼沃瓦罗夫，很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了；但彼沃瓦罗夫被他派去送死的这条路，他还是应该走完的。他不能只顾自己活命而让彼沃瓦罗夫下落不明。固然，在这场战争里被他拿去冒险的人够多了，有几个是由于他的安排在战争中牺牲了。但他的这次冒险非同以往——这是最后的一次，因此他伊万诺夫斯基决不能半途而废。虽

说在这场反对死神的激战中有许多人他没有保全下来，不过他又何曾保全过自己，唯有这一点还可以说明他没有辜负那种指挥别人的权力。这是在战争中他唯一希望的权力。至少在自己死以前应该知道可爱的彼沃瓦罗夫现在是不是流血负伤而躺在这原野的什么地方。

他摇摇晃晃，有气无力地走呀，走呀，他一再停下来，身子靠在彼沃瓦罗夫那支又重又长的步枪上。有一次，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他就坐在雪地上休息了很久。但这次站起来时，是那样吃力，那样痛苦，以致他再也不敢坐了，只敢靠着枪托去休息了。现在，他每走四、五步就要停一次。他的力气已经不够用了。

他又仿佛感觉自己走了大约三公里，也许还要多，因此怀疑起彼沃瓦罗夫说的距离是不是对。很难相信他们住过的澡堂离这村子只有一、两公里。遗憾的是他这次没带表，不能看时间。但凭着某些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迹象，他觉得村子已经不远，好象他已经到了村子的附近。可是，昏暗中彼沃瓦罗夫的印象是无止境地延伸在这原野上。虽然伊万诺夫斯基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还是很难估计这个战士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过也可能这样，他也象他们昨天一样，避开了追兵，负伤隐蔽在原野里的什么地方。

他差点儿从彼沃瓦罗夫身边走过去了，因为雪地上的脚印还在向前方延伸，而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但突然，在路的一边，那被积雪覆盖的黑乎乎的杂草丛中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又象是在一闪一闪，这吸引住了他的注意。最初他

甚至没有往那里看一眼，目光只是在雪地上一扫而过，但后来停下来，仔细一看，心里一怔。四周寂静，几乎没有一点儿声音，一种象碎纸片的东西在风中飘动。真是奇怪啊，这里怎么会出现纸呢？他离开了彼沃瓦罗夫的脚步，在深雪里拖着踉跄的脚步，蹒跚地向那里走去，眼睛一直盯着离得不远的那堆杂草。

他没有走到跟前，就好象突然看出杂草丛中一个模糊不清的白色小土包，——显然是一具躺着的人体的轮廓，还有那埋在雪里的长筒皮靴。他停住脚步，一个奇怪的疑问在心头一闪：谁能躺在这寒冬深夜的原野上？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承认眼前这个人就是彼沃瓦罗夫，战士彼沃瓦罗夫这样躺在他面前，总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也许这是别人吧，是偶然碰到的一个陌生人吧。

但这毕竟是他——他的最后一个战士，他可爱的彼沃瓦罗夫。他穿着撕成碎片的伪装服，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戴帽子，推光了的头撒满了雪，两条腿摊开。中尉过了一阵才发现，周围雪地上踩满了各种脚印，有些地方冲锋枪的弹壳在雪里露出来一个个小黑圈。

伊万诺夫斯基一瘸一拐地走到那堆杂草跟前，枪从手里掉下了，他倒在战士身旁，用冻冷了的手抱起他的头。但是那落满一层薄雪的头，早已没有一点儿生气，完全是个死人的头了，已不象他的彼沃瓦罗夫了。伊万诺夫斯基开始抚摸他的身体——那破烂不堪的伪装服跟血污冻在一起，棉背心也冻结在战士血糊糊的身体上。可能是被近距离的连

发射击打死的。尸体下面和旁边的雪地也结成一个个硬梆梆的血疙瘩。

“他们怎么把你弄成这个样？他们这是干什么？”一个惶惑莫解的问题好象凝结在他的嘴边。他们干的什么——这本来是一目了然的。彼沃瓦罗夫看来是在被迫到跟前射死的。也还可能，敌人射击时他已经负伤躺在这堆杂草里的雪地上，他棉背心上的许多窟窿里现在还露出来一团团灰白色的棉絮。裤兜翻在外面，军衣被解开了，血肉模糊的胸脯落满了雪。他身旁和附近都没有发现冲锋枪，看来是被德国人拿走了。

一切都完了，哪儿也用不着去了——当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全身软瘫、浑身无力，双手耷拉在雪地上，默默地坐着。旁边躺着战士停止了呼吸的身体。他心灰意冷，脑袋空空，感到异常的空虚。只是在感情这个火炉里还留下一点点微弱的怒火——这接近愤恨的怒火，犹如一块即将烧尽的火炭在缓缓地阴燃着。但是他坐的时间越长，这怒火还是越来越旺。这怒火已经不是针对什么具体人了，确切些说，此时此刻他正在对自己这个如此糟糕的结局发泄最后一点合乎人之常情的恼怒。现在伊万诺夫斯基已明确知道：他活不成、逃不掉、回不到自己人身边了；他也将死在两个不知名的村子之间这块原野上，不会有谁去向上级报告他们的牺牲和这个德军司令部的情况了。自然不会有谁对这个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了，因为我们的人离此很远，而作为死人的他俩又已完全丧失采取行动的能力。他除了坐在

旁边等严寒和伤痛夺去他残存的生命，别无他法。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宁愿这样，因为这可以使他不用去跟德国人、跟伤痛、跟自己进行痛苦的搏斗了。为了让一切快点结束，似乎应该拔出反坦克手榴弹的销栓，拉开引信……一声巨响，他俩的身体将被炸成碎片，周围雪花纷起，地上炸出一个不大的弹坑，这弹坑也就会成为他俩的坟墓。要是死神迟迟不来或者他实在忍受不住，看来就得这么做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愿祖国和人民原谅吧！他没有交上好运，也没有躲过去战争中这最可怕的悲剧（这种悲剧一旦发生，对他来说什么也都不存在了）——这并非他的罪过啊！

不多一会儿，寂静中随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大概是这个原因，他才没有在寒风里很快冻僵并永远留在自己同伴的身边。看来，在他的各种感觉中听觉是最经得起折腾的，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没有失灵；而现在，正是听觉把他和周围世界联系起来。起初，伊万诺夫斯基以为是幻觉，但仔细一听，一切疑虑都打消了，的确有辆汽车在什么地方呜呜响。他想起昨天夜里，在原野上遇到一条通往村子的汽车路。但公路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他一点儿也想不出来了。然而它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因为从灰蒙蒙的夜色中传来的汽车声已经很近了。中尉仰起头，长时间紧张地细听着马达的轰鸣，直到声音在远方完全消失。

这意外的事情搅乱了他几乎已经平静下来的思想，一种不听自己感觉支配的愿望在心头升起。他不再去想自己的不幸了，他警觉起来，决心拼它个鱼死网破——这成了他

生命的最后一个目标，这目标是他无法忽视的。咳！这要是
在他力气稍微多一点的时候该多好！……

因为怕晚，他立刻在雪地上忙碌开了，他收回那条受伤的腿，双手撑着地面勉强欠起了身子。先用双膝跪着，然后试着站起来。但他没保持住平衡，身子一歪，摔倒了，一个肩膀撞在雪地上，胸部痛得他哎哟哟地叫出声来。他咬着牙，怕做深呼吸，在雪地上趴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开始试着站起来，试到第三次，他到底成功了，借助两条颤颤巍巍的腿站住了，虽也摇晃了一下，但毕竟没有摔倒。他忘了去拿几乎就在眼前、也就是彼沃瓦罗夫脚边的步枪，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弯腰拿枪而不再摔倒的把握。琢磨了一会儿，还是不去因弯腰而再冒摔倒的危险；象跳远时起跑那样，两条腿在雪地上迈开了。他用尽力气去保持平衡，不让摔倒，但大风一直跟他作对，看来，风越刮越大，一阵狂风迎面扑来，两条腿实在立不住。他又摔倒了，从彼沃瓦罗夫身边也许只走出三十来步，他马上试着站起，但没有成功。他忍着右侧的剧痛，躺了一会儿，劝自己耐心等一等，自己这点儿体力更应该精打细算了。但又一心希望快一点走到公路，以致理智对他已经不管用了——现在是感情越来越胜过理智，支配着他的行动。

于是他又一次欠起身子，先是四肢撑地，而后双膝跪起，而后十分费力地用他虚弱的身体一挺——双腿站起来了。最难的是在迈第一步之前让两条腿站稳，以后身体的惯力起了作用，所以头几步迈的比较容易，但往后的几步又

缓慢下来，他身子东倒西歪，踉踉跄跄，终于伸着冻僵的双手向前摔倒了。

摔倒后被迫停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有时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神志恍惚，几次失去了知觉，在寒风中醒来时，甚至记不清自己到了哪里。但他牢牢记得自己该去的地方，一次也没有走错方向，在半昏迷的情况下清醒地记得自己生命中的最后那个目标。

但是有一次他摔倒了，以后，感到自己再也爬不起来了。前几次起来时他消耗的气力太多，剩下的越来越少了。他倒在冰冷刺骨的雪地上，躺了很久很久，也许永远也起不来了。但是就在这最后的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冻死，这一点使他害怕，他已经不能允许自己冻死了。于是他干脆用胳膊肘和膝盖推开柔软蓬松的积雪，向前爬去。

但很快就发现，跪着爬并不比站着迈步容易，甚至还更难。中尉已经精疲力尽，整个身子都趴下来了。这要求闭着眼睛，无休止地跟积雪斗，但这比起走也还有优越之处——因为不需要从地上爬起来，可以保存他那一点点儿、几乎已经消耗尽了的的气力。他扒一会儿，在雪地上静躺一阵，然后再扒，只要能喘得过气来。他这一路就是这样拼命地扒着雪，中间有多次长时间的昏迷。但每次丧失知觉的时间都不长，知觉受到临死前那个目标的维持，还强有力地支配着他精疲力尽的身体。

胸口堵得慌，非咳嗽不行，但他不能深呼一口气，咳出一口痰；他怕痛起来挺不住。但还是有一次，咳嗽震得他好

厉害，以致一口气上不来，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当他总算咳出一口痰时，他感觉嘴唇有点热乎乎的咸味。他吐了一口，雪地上清楚地看到了血。他用结冻的伪装服袖子擦干净嘴唇，又吐了一口，但血还是在流。黑呼呼的细流从下巴慢慢地流到雪地上，他侧身躺着，全身都瘫巴了，心慌意乱中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慢慢地离开肉体。

但是，这样躺了一会以后，他对死的接近又感到害怕了，虽然他也知道这不可避免的结局迟早总要发生的。但现在他更关心的问题是：公路在哪儿？他应该在死来临以前爬到那里。他在这田野上的全部努力，实质上就是他和死竞走——看谁赶过谁？好象，死现在已经赶上了他，并且尾随在后，等万无一失的机会把他打倒。

但这是绝对不行的！管它呢！血总不会流尽吧。他觉得：自己身上还留下一样东西——如果不是力气，那就是决心。他躺了半个小时，嚼咽着雪块，为的是止血，血也象是给止住了。上下腭的肌肉冻得抽搐了，但嘴唇不再感到咸味了。于是他缓慢地、几步一停地向前爬去，腰间拖着他那颗唯一的手榴弹。

昏暗的雪光夜色里，面前已经浮现出白桦树灰蓝色的影子，他知道：那就是公路，他终于爬到了公路。几乎一整夜的高度紧张，这时一下子全消了。他两眼发黑，双肘一松，被打穿的胸脯紧贴在他自己扒成的冰冻的雪沟里，他安静了，失去了知觉……

第十三章

虽然他真的开始冻僵了，但还是苏醒了，他立刻想起自己在哪里，应该怎么办。甚至在他失去知觉的过程中，心里还出现他那个最后的目标；他只是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久，现在还能干啥。在最初的一刹那，他甚至感到害怕，心想：晚了。公路上一片寂静，四周也没有任何声音传来，只听见风卷雪尘，在田野上沙沙作响。雪已经盖满中尉的双肩，两手麻木得连手指都不能动弹了。但他记得，应该爬上公路，只有那里他才算走到了终点。

伊万诺夫斯基又继续同积雪进行消耗战了。他缓慢地、顽强地爬着，一分钟至多爬一米。身体虚弱得两个胳膊肘也全不管用了，主要靠两条腿，在雪地上侧着身子挪动。受伤的那条腿不知怎的现在已不感觉痛了，也许是痛过劲了。但整个胸部，这时火烧火燎的，疼痛全集中到这里，不停地折磨着他。他很怕血再从喉咙里冒出来——他觉得，那样他一切也就完了。他不敢深呼一口气，也不能允许自己咳一声。他尽量保护自己被子弹打穿的肺，把它看成最重要的东西，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取决于它了。

他的身体情况很糟，他是知道的。他的知觉，象走钢丝

一样，一直在清醒与昏迷之间摇摆，随时都会丧失，所以中尉用了极大的毅力才勉强克服身体的极度虚弱。公路就在跟前了；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觉，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不是路沟象危险的陷阱横挡去路，也许他还能把握住自己，慢慢地、艰难地爬上公路。伊万诺夫斯基掉进了盖满积雪的深沟里，他立刻感到差点儿没憋过去，猛咳不止，开始流血了。一种粘糊的腥东西从嘴角溢出，一股热血从下巴顺脖子流到雪地上。他趴在路沟边，想：他历尽艰险，用超人的毅力往公路爬了整整一夜，难道是为了在离公路两步之远的地方死去？明天，德国人就要从这里过，他难道不是用手里的手榴弹去迎接他们，而是变成一具死尸在德国人面前现眼吗？难道能想出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知觉又开始悄悄地离开他。现在他的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眼睛被黑幕蒙住了，在他的感觉里整个世界缩小成一个小光点，这光点越来越小，终于熄灭了。但即使这一次，他仍然有一种东西战胜了死亡，使他受尽了折磨的身体恢复了生命。虽然意志未做任何努力，这光点又亮了，他重又感觉出来周围的雪、严寒和严寒中的自己——极度的虚弱，和全身的疼痛。他马上翻动身子，向前爬了，无论如何也要爬出这个积雪的深沟，到公路上去。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应该守住自己最后的阵地，应该在阵地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到底还是从路沟里爬出来了，侧身倒在路边上，他爬了四步以后，呆着不动了，全身的力气都消耗尽了。他已经躺在车辙里——这一点他是凭身体感觉出来的。汽车想绕

开他过去是不可能了。他满意地短吁了一口气，就开始准备手榴弹。

但为了取手榴弹，他又遭了不少罪，也许比在路沟时还痛苦。他冻得不听使唤的手指就象完全失去了知觉。他花了好几分钟去解腰间拴手榴弹的带子，但始终没解开。手指只是在胯骨上瞎碰，就是摸不到带子的两头——这实在太可怕了。他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为这双不听话的手差一点儿没气哭了；但的确的确是，最先不听他使唤的是手。于是他把胳膊肘挨近沉甸甸的弹柄，使尽他现在还剩下的浑身力气，把手榴弹从上往下向腹股沟里压。只听见嘶的一声，一个东西开了，他的心情立刻如释重负——手榴弹已落在他身下的雪地上。

但看来他消耗的力气太多，别的什么也不能干了。他在车辙里躺了好久，风转起地上的雪尘，在车辙上头飞舞。他想，自己大概会这样被雪埋上。但现在就让它埋吧，他再也不用急着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现在只要能把手榴弹管好就行。他还是用失去感觉的双手摸到了手榴弹的铁把，但揭不开销栓。这时，他好不容易把手榴弹顺着车辙挪近自己的下巴，用牙齿咬住已经拉直了销栓的两头。

在别的时候只要用两个手指稍微一动，就能够拉直这已经分开的两头，把它们从弹把里拽出来。可现在，不管他怎样努力，对它们毫无办法。它们好象冻结在那里，好象已经被焊死在那里。他咬着这些很难对付的铁丝，拧呀、弯

呀，足有半个小时，咬碎了牙齿，震破了牙床。大概经过上百次的努力，他才用牙齿咬住销栓的两头、把它们拧到了一起。他一直很怕自己错过了时间，就怕公路上出现汽车的时候自己无所作为。但汽车并没有出现，他做好投掷手榴弹准备以后，就耐心坚定地等待了。

等——几乎成了他在这一夜里遇到的最大困难。他绷紧灵敏的听觉，搜索着旷野上的每一点声音。但是除了风声不停的喧闹，周围万籁俱寂。公路，这条曾经如此吸引过他并迫使他付出过极大代价的公路，现在是空荡荡的。周围的一切都安然入睡了，只有雪尘打在冻冰的伪装服上，发出单调的沙沙声，在慢慢地掩盖他那躺在车辙里的身体。

伊万诺夫斯基听了又听，但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开始发愁了。他想，根据种种迹象，到天亮以前看来谁也不会来了。这条公路夜间不可能有车来往，说不定早晨才会来人吧。天亮一定有车从司令部出来或者到司令部去，司令部不走公路是断然不成的。但离天亮还有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他就弄不清楚了。他现在很后悔把表留在澡堂里。这也许是因为太粗心大意了吧！不知道时间，他简直无法计算自己的气力，以便维持到天明。

他失去感觉的手指紧紧握着手榴弹把，胸部贴在雪地上。他等着。他几乎没有睁开眼睛，不睁也知道：除了昏暗的雪光，周围什么也没有。在这万籁俱寂的雪夜，他紧张的耳朵能听清周围各种声音，但他如此盼望的那种声音，哪儿也听不见。

由于趴着不动，身体很快就开始冻僵了，他十分明白，不等德国人动手，严寒和冷风就把他干掉了。他身体全冻透了，甚至无力打哆嗦了，但他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可怕的结局。简单说，他在慢慢地、不可避免地、一步一步地冻死过去。这儿没有谁能给他帮助，给他鼓励，甚至没有谁知道他是怎样走完自己的路程。一想到这，伊万诺夫斯基突然感到害怕、甚至恐惧。他从来没有这样孤单过，困难时刻总有人在身旁，总有人依靠，总是同人一起度过危急关头。而这里却只有他一个人，象一条受伤以后又被赶得困乏不堪的狼，呆在严寒的茫茫荒野里。

他当然是非死不可了。虽然他神志不清，但这一点对他还是够清楚的；他对此也不感到十分惋惜。什么也救不了他，他也不幻想奇迹，他知道：被子弹打穿胸膛的人在战争里是不会有奇迹的。他现在一无所求，只是希望不白白死掉就行。只是不要先就冻死在这条公路上，而是等到了黎明，等到一辆德国人坐的汽车。万一碰上个将军，那就太好了！伊万诺夫斯基会让他连同阔气的小轿车一起升上天的！最次也希望能碰个上校，或者一个什么法西斯头子。很可能，村子里是个大的司令部，高级人物那儿有的是。

为了这，那就需要活到黎明，熬过这不祥之夜的严寒。这一夜竟是如此地难以度过，他不由得开始害怕了。他害怕冻死在公路上，害怕睡过去或者长时间地失去知觉，害怕妨碍他每一个动作的胸部伤痛，害怕咳重了一声，害怕因此

把血流尽。在这该死的公路上许多危险都可能发生，他必须战胜，或者躲开，用机智绕开这些危险，为了坚持到天明。

他的两只手几乎已经失去了感觉，而现在两条腿又开始冻麻木了。他想活动一下一只靴子里的脚趾，但毫无结果。于是，为了勉强维持身体的热量，他开始用两只结冰的靴子磕打着公路。在寂静的夜晚，身后响起了沉闷可怕的敲打声，他不磕打了。脚一点儿没有暖和过来，心里感到更难受了。他感到正在失去知觉，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手榴弹塞在身子下。此时他不得不把手榴弹看得比生命更可贵。没有手榴弹，他在公路上的存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极度的昏迷之后，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极度虚弱。这时他又感觉出刺骨的寒冷，他害怕地打了个冷颤。好象这茫茫的长夜没有尽头，什么高招也无助于他等到天明。但这怎么能行啊！——这种充满绝望情绪的抗议声几乎从口里喊了出来。难道就这样毫无结果吗？那么多的辛苦努力又为了什么？难道全都白费？但这么多的努力——是物质的“我”的产物，而且这努力本身大概也是物质的，这物质就是他那已经虚弱无力的肉体和被血流掉的鲜血。为什么这么多的努力要在这非常物质的世界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化为乌有？

然而，他几乎十分清楚，一切都将归于失败，但他不愿这样去想。他愿意相信：他历尽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总会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在什么东西上表现出来。就算不是在今天，不在这儿，不在这条公路上，而是在别的地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这场战争中，他的痛苦牺牲，也象成千上

万的人同样痛苦的牺牲一样，总应该导致一点什么成果。又怎么能不抱任何希望地去死呢？他总是为了点什么才生，才活，才做了这么多斗争，忍受这么多痛苦，还流了血，现在又正在苦难中献身。这里总应该有点什么意义，即使是微不足道，那也还是人生的意义吧。

他突然一下子相信了：会有意义的。一定会这样的，在这世界上任何的人生苦难都不能没有意义，何况是前方战士的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战士的鲜血洒在这块令人不愉快的、但毕竟属于祖国的冰天雪地里。这是有意义的！而且会有结果的，不可能没有结果，因为不应该没有结果。

只要他等到天明就好了……

这时，严寒冰雪已经侵入他的内脏——他感觉到这点。他用还没有完全失去的模糊意识注视寒冷怎样在缓慢地、却又是步步紧逼地征服着他失血过多的身体，他计算自己短暂的余生。有一次，他微微睁开了眼睛，突然感到吃惊，于是再用力睁大一些，旷野上空已经发亮。那象是永远笼罩着大地的夜幕，现在明显地升高了，田野更开阔了，天空蒙蒙亮了，结霜的白桦树梢映在天空里显得十分清楚。落满雪尘的公路伸向昏暗的远方。

他对这一切只是迅速地扫了一眼，但眼睛已经感到疲倦，他正想把头放回到雪地上，忽然发现了什么东西。起初他以为是辆汽车，但他定睛细看，觉得更可能是马车。由于看的时间长，他疲倦了，头耷拉到了雪地上，感到心慌意乱，又是害怕，又是希望。一个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摆

在他面前：马车上坐的可能是什么人呢？要是农民、农庄庄员，那就真是所谓奇迹了：他快要得救了！可这是不久前所不敢相信的。要这是德国人呢？……不可能！他实在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德国人要在这清早坐着马车从驻扎着大司令部的村庄来这儿呢？他全力反对这种荒唐的推测。他这一夜什么都想过，但就是没想到会出现这运东西的大车。他跟这大车是毫不相干的。

然而那确实是大车，正向这儿慢慢走来。拉车的两匹枣红大马已经看得清楚了，它们摇晃着短尾巴，轻松不费力地拉着满载麦秸的大车。车顶上坐着两个德国人坐在那儿，摆弄着缰绳，在低声交谈。

伊万诺夫斯基看到眼前这一切，全身都凉了，呆呆地躺在车辙里，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倒霉事。在做了这么大努力、受了这么多牺牲和痛苦之后，他竟然不是去炸弹药基地，不是去炸身穿讲究的“奥普伦式”上将服的将军，甚至连个带公文包的上校参谋也不是，而是去炸两个赶麦秸车的车夫！

但看来结果只会如此。至少，他的一切都快完了。为了伟大的胜利，为了尽战士的天职，他做出了自己最后的贡献。别的，更大的贡献将落在别人身上了。大型的弹药基地，不可一世的普鲁士将军，气势汹汹的德国法西斯匪徒——他们也许都能摊上。可他自己只摊上这两个车夫。他也只能跟这两个车夫进行最后一次早已定局的战斗了。但他非这样不可——为了自己，为了彼沃瓦罗夫，为了在通

过火线时牺牲的谢卢佳克和库德尔雅维茨，为了沃洛赫大尉和他的侦察员们。还为了很多很多人……于是他用牙齿咬着铁丝圈，把紧盖着的销栓从弹柄里拔出来。

马车缓缓驶近，看来他已经被发现了。军大衣领子高竖在脖子上的那个德国人，侧身对他坐着，他还在继续嘀咕什么，驾马车的另外那个船形帽罩到了耳朵的家伙，已经伸长了脖子，注视着公路。伊万诺夫斯基把手榴弹塞到肚子下面，一动也不动。他知道，自己穿着伪装服，远处是看不大清楚的；况且他在车辙里，身上又盖着不少雪。他极力不动弹，几乎是停止呼吸，他这样猫着，连双眼也闭上了。如果他们发现了，就让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让他们再靠近些吧。

但是他们没有靠近，而是在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停下了，并且朝他喊了几句什么。他照样一动不动，也不回答，只是眯缝着眼睛，偷偷地注视着他们。这一夜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象此时此刻这样深情地感觉到垫在肚子下的那颗手榴弹。

其中一个，即竖起大衣领坐在车上的那个德国人，没有等到回答，就抓起卡宾枪，屁股贴着麦秸滑下来。另外那个没有动地方，手里继续握着缰绳，伊万诺夫斯基因此气得哼了一声。事情的结果比他估计的还坏：向他靠近的只是一个德国人。中尉感到心里发紧，两眼发黑，公路和公路上的白桦树向一边歪倒。但他还是尽力维持住了知觉，等待着。

那个急步跑来的德国人，咔嚓一声，拨弄了枪栓，命令地喊了一声，就敞着长长的大衣襟，大摇大摆沿公路走来。他端着卡宾枪，枪托夹在腋下，随时准备射击。伊万诺夫斯

基一点点放开身子下面的手榴弹的金属板条，他默默地，象祷告一样，心里叨咕着：“你就来吧，来吧……”他等待着，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伟大的期待”当中，此外他已经毫无作为了。他无法把手榴弹扔到敌人跟前，他只能让自己跟敌人同归于尽，一起炸掉。

然而，这个车夫看来不属于勇士之列，他走得那样小心翼翼，似乎马上就要向后跑。但他毕竟还是在靠近。伊万诺夫斯基已经能看清他那没有刮脸、还有睡意的面孔，惊惶不安的眼神和结上霜的大衣钮扣。他根本没有走到伊万诺夫斯基跟前，就又喊了一声什么，站住了。紧接的一刹那间，中尉就看见德国人端起卡宾枪开始瞄准，他气得差点儿没喊出声来。这个德国人瞄准的动作笨，很费劲，枪筒长时间从这边晃到那边。他的同伙一直在车上向他说些什么，也许是教他怎么射击吧。但伊万诺夫斯基仍旧躺着不动，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凶手，绝望的泪水顺着面颊滚下来。他就是这样等到了黎明，就是这样在公路上碰到了德国人！一切就要这样愚蠢可笑、这样荒唐无稽、这样一无所获地结束了。这种结局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发生的！他还有什么办法呢？站起来吗？叫一声吗？举起双手吗？还是悄悄地、顺从地正面接受这最后一颗子弹而永远离开人世呢？

他当然是要离开人世的，现在他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秒钟了，接着将是他那“永恒伟大的安息”。处在他这种情况就是这样也不坏，因为这可以一下子解除他的一切痛苦。他虽然死了，但还有别人留下来。他们一定胜利，他们一定会

重建这块绿色的、幸福的土地，他们一定会尽情舒畅地呼吸、工作、相爱。然而他们的这种幸福也许还要归功于牺牲在这公路上的一位二十二岁的排长——伊万诺夫斯基中尉呢！

不，他没有站起来，因为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也没有喊一声，虽然喊还是能够的。当孤独的枪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清晨砰的一下，又一颗子弹钻进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体，他只是身体颤了一下。子弹打在他的肩上，大概把锁骨打碎了，但他仍旧没有动一下，甚至没有哼一声。他只是尽最后一点气力咬紧牙关，并且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怀着最后一点点希望，听着公路上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想：可能还没有完全失败，甚至可能成功。他还留有一丝一点的成功希望。他强忍住牵动全身的新伤痛，慢慢地、极其小心地向侧翻着身子，从身子底下抽出手榴弹。正当脚步声停在近处时，他到底抽出了手榴弹。他身子的一侧感到手榴弹的金属板条使劲地弹了一下，雷管啪地一声，震耳欲聋。那个德国人尖叫了一声，大概是在逃跑。伊万诺夫斯基还听到他在地上走了两步，再往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几秒钟过后，当混杂着积雪的尘土落下来时，公路上已经没有他了。只是公路的车辙里一个不大的弹坑在风里冒烟。周围被炸开的雪地上，到处是冻土块，被炸得飞起的德国人尸体，脸朝下地躺在路沟那边，军大衣的长襟摊开在弄脏了的雪地上。大车向一边倒了，麦秸撒了一地。套在车上的枣红大马挣扎地妄想站起来。另外那个幸存的德国人吓得把枪扔在车旁，沿着公路向村子跑去。

狼 群

李 树 森 译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ВОЛЧЬЯ СТАЯ》

据《РОМАН-ГАЗЕТА》1975. № 7 译出

1

在拥挤的人流中，列夫丘克好不容易穿过敞开的大铁门，来到了宽敞的、停满了汽车的站前广场上。刚下火车的、成群的旅客们，在这里一下子就散开了，向四面八方走去。列夫丘克放慢了他那本来就信心不足的脚步。他不知道现在该往哪里去：是沿着从车站去城里的街道走呢，还是到广场出口去乘那两辆黄色的、正在等候乘客的公共汽车。他犹豫不决地停下来，把那只已经不新、带金属镶角的小手提箱，放到被太阳晒得冒油的、滚烫的柏油马路上，四面张望起来。看来应该问问路了。他衣袋里装着一只揉皱的信封，那上面有地址，但是地址他已经记住了。现在他细心地观察过往的行人，想找个人打听打听。

在这傍晚时分，广场上人倒不少，可是所有的人从他身旁经过时，都带着一种急迫和忙碌的表情。他犹豫地观察了好久，才去向一个同他自己一样并不年轻、一边离开售报亭一边打开报纸的人去打听：

“请问，去宇宙飞行员大街怎么走？是步行还是乘公共汽车？”

那个人抬起头，眼睛离开报纸透过眼镜的玻璃片严厉地看了看他，列夫丘克感到，他好象不太高兴。他并没有马

上回答，不知他是在回忆这条大街，还是在打量这位显然是外地来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身穿揉皱的灰色上衣和蓝色的衬衫，尽管天气炎热，可是衬衫的所有钮扣，一直扣到领口。被这探究的目光一打量，列夫丘克为自己从家来时没把领带扎来而感到很后悔。他那条领带在衣橱里的专用钉上已经挂了好几年没用了。但是他不喜欢领带，而且也不会扎。他出门时穿的和在家过节时一样：几乎还是崭新的灰色制服、也曾经是很时髦的尼龙衬衫，这件衬衫他已经买了很久了，这还是第一次穿上。可是这个地方，人们穿戴不同：他们穿薄薄的短袖汗衫，假日穿白衬衫，扎领带。但是，总而言之，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穿得朴素一点也过得去，再说他哪有时间去讲究自己的外表……

“宇宙飞行员大街，宇宙飞行员大街，”那个人一面重复着这个街名，一面回想着这条街道，回头看了一下说，“从那儿乘公共汽车，七路。坐到广场，下车后向食品店那边拐，再换十一路汽车，坐两站下车。到那儿再打听一下，还有二百来米。”

“谢谢，”列夫丘克说道，虽然他并没有记住这条对他说并不简单的路线。但是看样子这个人也很忙，他不想多耽搁人家，只是问了问：“远吗？有五公里？”

“哪有五公里！顶多两三公里。”

“那好，两三公里可以走着去，”他高兴地说道，因为他要找的这条街，比他原先设想的还近一些。

他沿着人行道，不慌不忙地走着，尽量不让自己的小手

提箱妨碍别人。人们三三两两，甚至成群结伙地走着。有年轻的，也有上了一点年纪的。所有的人都显得很匆忙，而且不知为什么，他们都迎着朝着车站这个方向走来。他走到一个食品商店跟前，这里的人更多。他透过耀眼的大玻璃向橱窗里一望，感到很惊奇：一群顾客一窝蜂似的正在那里嗡嗡地拥挤。这种景象就象来到了什么节日或者城里有了什么大事一样。他细心地倾听身边人们匆忙的谈话，但是什么也听不出来。他继续向前走，突然在一个很大的招牌上，看见三个橙黄色大字：“足球赛”。他走到跟前，读着两个足球队于当天即将举行比赛的海报，这时他才怀着某种惊奇的心情明白了城里街道上活跃的原因。

他对足球不感兴趣，甚至电视里的足球赛他都很少看。他认为足球可以吸引小孩子和年轻人，可以吸引那些喜欢这种运动的人，可是对于上了一点年纪和头脑健全的人来说，那是一种不太严肃的事儿，是一种儿童的娱乐和游戏。

大概城里人对足球不这样看。现在，街道上挤得连走路都很困难，距比赛的时间越近，人们就越显得匆忙。公共汽车靠近人行道在缓慢地爬行，车里的人满满登登，挤得连车门都关不上，外面滴哩嘟噜地还挂着不少人。可是朝相反方向开的公共汽车却大多数都是空的。他在街道的拐角上停了一会儿，对城市生活的这种特点，默默地感到惊奇。

随后，他沿着人行道又从容不迫地走了好久。为了不因问路打扰过路行人，他自己注意察看楼房角上的街道名称。这时他看见在一堵墙上的蓝牌上，出现了他期待已久

的“宇宙飞行员大街”的字样。可是那上面没有号数。他朝下一所建筑物走去，发现他要找的那幢房子还离得很远。他继续向前走，一路上细心地观察着大城市里的生活。他没有到过大城市，假如不是接到外甥那封使他喜出望外的来信，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进城。尽管除了地址之外，外甥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甚至他也没有打听清楚，维克多在哪儿和做什么工作，家庭情况如何。但是对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还能要求什么呢。这个熟悉的姓名他还是偶然间在报纸上碰到的，地址是后来根据他的请求在民警局里查到的。现在他自己会把一切都弄清楚，他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最使他高兴的是，维克多已经度过了战争年代，战后大概就好过得多了。既然住在这样一条出色的大街上，那么大概也不会是城里最差的，还可能是一位什么首长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夫丘克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感到很幸运。当然他也懂得，一个人的身价不只取决于他们的职业和地位，而才智、性格，以及他待人的态度也很重要，归根结底正是这些，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

他端详着这些正面由浅色砖砌成带有许多的阳台的高大的多层建筑。阳台上各自放着各种不同的东西：吊床、折叠床、旧椅、小桌、箱子、用行李绳捆着的各种破烂。他心里竭力地想象着维克多的住宅，当然，也一定有阳台，而且是在上面的哪一层上。他认为住楼房当然是越高越好，因为那里阳光足，空气好，更主要的是可以向远处眺望。纵然不

能俯瞰全城，也能看到一半儿。六年前，他到哈尔科夫他妻子的妹妹家里去做客，在那里他很喜欢晚间从阳台上向远处瞭望，虽然那还并不太高，只是上层建筑的第三层。

耐人寻味的是他将受到怎样的接待呢……

当然，首先要敲敲门。不是用拳头，敲得乒乓响，最好是用指尖敲，象临来时妻子所嘱咐的那样。门一开，要后退一步。帽子最好事先就脱掉，可以在一进大门口或上楼梯时就摘下来。有人来开门，首先问问，他要找的那个人，是否住在这儿。要是维克多亲自来开门，那当然更好，大概他会认出他来，尽管已经过了三十个年头，在这个时间里任何人都可能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但是不管怎样，他一定会认出他来。对于他父亲他记得很清楚，而儿子至少有的地方要象父亲。要是他的妻子或哪个孩子来开门呢……不，孩子们恐怕还小。当然，孩子们也完全可以来开门，五六岁的孩子为什么不能给客人开门呢。那时他要问问主人的名字，并把自己的姓名告诉孩子。

这时他感到，最重要最难为情的时刻来到了。他已经体验到，会见自己久别的朋友是多么令人高兴和激动！又是回忆，又是惊讶，甚至当你惊奇地发现，你所认识、所记忆的那个人，完全不象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陌生人时，你还会产生一种尴尬的感觉。你所认识、所记忆的那个人，永远地留在你那遥远的过去，除了你那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变得模糊不清的记忆之外，谁也不能使过去的事再重现……然后，大概就是请他进屋，他跨过门槛。不用说住宅也

是高级的——锃亮锃亮的镶木地板、沙发、地毯。和现在城里的许多人家相比，也毫无逊色。他在门口放下小手提箱，脱掉鞋。一定不能忘记脱鞋。据说现在城里有一种习惯，鞋要脱在走廊上。在家时，他习惯穿着厚油布高筒靴或胶鞋从门口直接走到桌子跟前，但这不是在家。就是说首先一定要脱鞋。他的袜子是新的，是临来前在乡村商店花一卢布六十六戈比买的，袜子不会使他难堪。

然后就开始谈话，当然，谈话也不会很轻松。不管怎样冥思苦想，他都想象不出，他们将怎样谈话，从什么谈起。当然，到时候自然就清楚了。大概先要请他入座，这时他要转过身来，去取自己的小手提箱。那里面有一大瓶进口酒，一路上它都在轻轻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一些乡村的小礼品也算等到了自己出世的时辰。虽然现在城里很富裕，但是一根农村的香肠、一罐蜂蜜和一对自己捕捞、熏制的鲱鱼，在餐桌上大概也不是多余的。

他陷入沉思，走过了头，看见墙角上的号数已经不是七十几号而是八十八号了。他怪自己粗心大意，就转过身来向回走。他加快脚步走过一个小公园和一座挂着一块“理发店”招牌的大楼，这块招牌很大，足有一层楼高。这时他看见墙角上的号数是七十六号。他望着这个号码，一时间给弄糊涂了。他不明白，整个十所楼房跑到哪里去了，这时突然听到身旁很有礼貌的话音：

“叔叔，你找多少号？”

后面人行道上，站着两个小姑娘。其中一个，浅色头

发，八岁左右，在自己身边摇动着装着一袋牛奶的网兜，天真地望着他。另一个，黝黑的头发，个子比第一个稍高点儿，穿一件男孩的短裤，她一面舔着纸包的冰淇淋，一面在留神地观察他。

“我找七十八号。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七十八号？知道。多少栋？”

“多少栋？”

关于栋的问题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只记得门牌和住宅的号数，关于栋的事儿，简直就没注意，哪里又来的栋？

为了证明自己并没弄错，他把毕竟也还是比较重的小手提箱放在人行道上，从上衣里边的口袋里掏出来那个磨旧的信封，那上面有他现在所需要的地址。的确，在门牌号之前，是有一个“栋”字及数字“3”，再往下就是住宅号了。

“你瞧，大概是三栋，是第三栋！”

两个小姑娘一起凑上来朝信封看了一眼，肯定说，是第三栋，说她们知道这栋房子在哪儿。

“涅尔卡那个小厉害姑娘就住在那儿，就在带蘑菇顶的游戏沙地的后面，”吃冰淇淋的、黝黑头发的小姑娘说道，“我们告诉您。”

他不大好意思地跟在他们后面走去。小姑娘们绕过一所楼，后面是一所很大的、收拾得还不怎么象样的院子。这个院落是由彼此隔开的几所五层大楼围成的。楼和楼之间是一些被踏平的小场子、柏油路和不久前栽植的一行行的小树。门旁的长凳上，妇女们在聊天。楼和楼中间的什么

地方，有人在打篮球。在柏油路上，孩子们在骑自行车，儿童们到处在叫喊着，奔跑着，玩耍着。两个小姑娘和他并排走着，那个小一点的姑娘，瞅着他的脸，问道：

“叔叔，您为什么少一只胳膊？”

她的女友比较懂事，小声地打断了她的话：

“你还问啥呀，伊尔卡？叔叔的胳膊是在战争中失掉的，对吧，叔叔？”

“对，对，你很聪明，你真行。”

“我们院住一位柯利亚叔叔，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给德国人打掉了，他坐着小车子走路，是一个比摩托车大不多少的小车子。”

“我的祖父在战争中被法西斯打死了，”她的女友悲伤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们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消灭了，可是我们的士兵不答应，对吧，叔叔？”

“是的，是的，”他说道，聆听着孩子们这些喃喃的话语，他感到这么亲切和熟悉，嘴边上不禁现出一丝微笑。这时那个小一点的姑娘跑到前面，一面在身边摇动着网兜，一面向他转过身来：

“叔叔，你有奖章吗？我祖父有六枚奖章，我是在照片上看到的。”

“有六枚，这很了不起，”他说道，避开了她的问题，“这就是说，你的祖父是位英雄。”

“可是您呢？您也是位英雄吧？”那个小一点的姑娘对

着太阳有趣地眯起眼睛追问道。

“我？我是什么英雄！我不是英雄。我没啥可提的……”

“就是那所楼。”黝黑头发的小姑娘指着一些绿油油的椴树后面那所建筑说，那栋楼和这里所有的建筑一样，也是一栋灰色硅酸砖的五层大楼。“这就是第三栋。”

“好吧，谢谢，谢谢你们，小姑娘！”他几乎感动地说。两个小姑娘一起高兴地说声“请”，就沿着一条小路跑开了。这时，他突然激动起来，放慢了脚步。就是说，已经来到了。不知为什么，他不愿马上走进这所楼，很想把这次会见推迟一下。眼前要会见的就是他在漫长的三十年的时间里总也忘不掉，天天在想念、在回忆的那个人。他克服了心中现在这种不合时宜的胆怯。既然来啦，就应该走上前去。哪怕只是瞧上一眼，寒暄几句也好，哪怕只是让他证实一下：他没有弄错，这正是对他来说具有那么重要意义的那个人。

他首先走近大楼的一角，把信封上的号数和在粗糙不平的墙上用橙黄色油漆描上的那个号数对照一下。小姑娘们是对的，墙上写的的确是第三栋。他把信封揣进兜里，细心地扣好扣，提起小手提箱。现在该去找住宅了，在这住有百户或百户以上的大建筑里，恐怕这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儿。

他犹豫地四面观望，朝着第一个门洞走去，路上吓跑了懒洋洋地躺在花坛旁边的一只灰猫。开门之前，他把门上的信箱号码，离家时务请关闭电气开关的通知，还有印在烟卷纸上的，为研究修缮院落召集住户开会的通知等等，读了

一遍。门的上方挂着一个牌，那上面有第几个门以及从第一到第二十住宅的号数，因此他要找的那个住户不在这里。看完之后，他沿着大楼继续往前走，经过第二个门，朝着第三个门洞拐去。

在紧靠门口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两个很老的、在夏天还穿着棉衣棉裤的老太婆。其中一个脚上甚至还穿着毡靴。另一个手中拿着一根木棍聚精会神地在沥青地上划着什么。她们中断了自己的小声的谈话，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显然是在等待向她们打听什么。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打听，找什么以及到哪里去找，他自己都已经清楚了。他怀着某些难为情的心理，一面注视着门口上方的小牌，一面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看来，这回他走对了。他要找的那所住宅就在这里。这时他感到心里好象跳了一下，他用脚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第一个平台住四户，从第四十一户到第四十四户。他又慢慢地向上走，经过一个蓝色木箱，木箱里还有不少带号数的小格，报纸的一角还露在格子的外面。他明白了，第五十二户应该再上一层楼。

在前面楼梯拐弯的平台上，他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因为不习惯上楼，已经累得气喘了。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不安心情，老是缠着他不放，好象他是去求人，给人家添麻烦，或者有什么错处似的。当然，他也明白，不管他怎样想，怎样安慰自己，还是不能不激动。要是这次会见安排在几年以前，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那时他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消

息吗？

第五十二户的门，在平台的左边，象这里各家的门一样，也是用彩色油漆漆的。门前整齐地放着一块擦鞋用的粗地毯。门上面有住宅的号数，他把小手提箱放在脚旁，喘喘气，等踌躇的心情过去之后，用弯曲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门。之后，等了一会儿，又敲了几下。什么地方好象有人在说话，仔细一听，还是收音机在广播，于是他又敲了敲。这次应着他的敲门声，邻居家的门开开了。

“您按铃！”一位妇女急忙用围裙擦着手，从门口探出身来说。正当他疑惑莫解地在门上寻找按钮的时候，她跨过门槛，亲自按了按门框上刚能看得出来的黑色按钮。刺耳的铃声在门后响了三次，可是五十二号的门还是没开。

“不在家。”这位妇女说，“早上小姑娘还在这里跑，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就不见了，大概是到城里什么地方去了。”

行动受挫使他感到沮丧，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栏杆上。以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主人们可能不在家，他们可能徒步或者乘车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他自己是整天坐在家里吗？甚至是现在，当他已经退休了的时候。

看来，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也不能总等在这个平台上，于是他向楼下走去。女邻人在关门之前，从后边喊道：

“对啦，今天有足球赛！怕是看足球去啦。”

可能看足球去了，也可能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在天朗气晴的假日，城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公园、电影院、饭馆、剧院。这里不同乡下，有趣的地方多得很。他这个蠢货

怎能指望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老是坐在家里，等待他来做客呢？

他踏过四段比较陡的楼梯，下了楼，来到了门外边。他一出现，两个老太婆又中止了自己的谈话，重新带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他。这次他没有象方才那样感到难为情。他在小路的尽头上停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管怎样，大概总得等一等，而且已经走了好久，很想坐下来，舒展一下腿脚。他四面看了看，发现在院子深处一所砖房的荫凉里，有一条长凳空着，他拖着一个疲惫人的缓慢脚步，向着那里走去。

他把小手提箱放在凳子上，坐下来，带着一种享受的心情伸了伸两条累痛的腿。这时他把自己骂了一顿，因为临来时听妻子的话，穿了双新皮鞋，要是穿那双旧的合脚的皮鞋就好了。现在脱光脚可不错，但是他回头一看，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周围有人：在蘑菇亭下面的游戏沙地上，孩子们在玩耍，和这所砖房一样的那所建筑——汽车库旁边，有两个男子在卸掉发动机罩的“莫斯科”牌小轿车旁边弄着什么。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坐着两个老太婆的那个门口，便于观察出入的人，他觉得只要第五十二号住宅的主人在门口一出现，他就会立刻认出他来。

他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里等候。坐在这里，一般说来很安静，有荫凉，还不热。又可从容地观察新市区的生活。这种生活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其中有许多东西他是很喜欢的。当然，他的思想不时地回到他那久远的过去，回到

那两天游击队的生活，正是那两天的生活终于把他带到了这条长凳上。现在他勿需特意去回想，也不必过度地使用他那已非年轻的记忆，当时发生过的一切，直到最细微的情节，还都历历在目，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在他那清晰的记忆里，可什么也没有遗忘。所以能够如此，恐怕是因为在那两个昼夜里他所经历的一切，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

他常常在思考、回忆和评价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件，每次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有的东西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迟发的不安的情感，甚至是对自己的懊悔；而有的东西对于他这个朴实的人说来，却是值得骄傲的。那毕竟是战争。他后来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那时他年轻、健康，对自己行为的意义，没有专门去考虑，他的行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归结到一个目标上，这就是打死敌人，而使自己避开子弹。

2

当时一切都沿着自己的轨道进行着：艰苦、忧虑、饥饿。他们连续五天五夜打退了“围剿”者的进攻，疲乏到了极点，列夫丘克困极了。但是只要他在松树下一打瞌睡，就觉得有人在招唤他。这个声音他感到很熟悉，这时他的困劲儿

马上就减弱了，甚至就要完全消失了。但是没有消失。睡意是这样缠人，这样有力地控制了列夫丘克的机体，使他继续处在昏迷和清醒之间的朦胧状态之中，难以振作起来。林中令人不安的现实：灌木林中树枝的喧响、稍远处什么人的谈话、周围从被围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平息过的不高但也不远的枪声，不时地闯入他那半睡半醒的意识中。但是列夫丘克顽强地哄骗自己，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他睡着，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愿醒来。他要睡上两个小时，或者一小时也好。看来他在生活中还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权利。现在，除了德国人之外，在这个树林中不论是谁，班长也好、连长也好，甚至是支队长本人也好，都不能剥夺他这个权利。

列夫丘克负伤了。

那是在一个傍晚，在道尔嘎亚·格拉达。“围剿”者们在一天之内，发动了四次进攻，都被击退。他们从沼泽地上拖走了自己被击毙和击伤的人员，多少安静了一些。他就是在这之后不久负伤的。“围剿”者们大概在等待新的命令，可是他们的长官们正在犹豫。这是有原因的。在战争中常有这样的事：指挥官发动四次进攻，未获成功，那么在下达第五次进攻命令之前，就感到有必要认真地考虑考虑了。在军事问题上，列夫丘克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经验，他蹲在自己不深的、盘据着树根的掩体里就猜到，敌人已经伤亡惨重，连队取得了一定的间歇的时间。又等了一会儿，他把自己那挺很沉的“捷克佳略夫”机枪的枪托，搭在胸墙上，

从衣袋里掏出来昨天剩下的一块面包。他前面是一块不大的林中旷地，那上面长着灌木、菖蒲，还有一些不深的、多苔的水洼。他一面警惕地观察前面这块空旷地面，一面嚼起面包来。吃了一点东西，他又想起要抽烟。很不凑巧，烟叶抽光了。他倾听一会儿，就招唤邻居。在静悄悄的傍晚的空气中，从邻居的掩体——离他不远、象他的掩体一样，也是在沙土地上挖成的一个很浅的壕沟里，飘过来马合烟的香味。

“基谢尔！把‘烟头’牌扔过来！”

过了一会儿，基谢尔把烟头扔了过来，但是扔的不很成功。一根折断的、夹着一只“烟头”牌的树枝，没有扔到地方。于是列夫丘克就怀着某种谨慎的心理伸手去够，但是没够着。他从掩体里齐腰站起来，又伸手去取。就在这时，他感到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他的肩头上猛的撞了一下，还崩了他一脸针叶和沙子，同时从沼泽地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步枪的响声。列夫丘克扔掉这只倒霉的烟头，急忙缩回掩体里。虽然他还没有立刻感到袖子里有一种热呼呼的东西，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在上衣的肩头上有一个不大的弹孔。

“唉，他妈的！”

真是太倒霉了，不仅受了伤，而且还伤得这么不光采。不管怎么说受伤了，而且看样子伤得还很重：浓稠的鲜血很快就顺着手指流下来，肩头发烧、疼痛。他缩回掩体，骂了起来，用一块包面包的旧印花布对付着把伤口缠上，咬紧了

牙。只是到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这次负伤的全部的不愉快的含义。他恨自己的马虎大意，更恨沼泽地后面的那些人。肩头上的伤口越来越痛，他拿起机枪对准柳丛，要狠狠地打上一梭子。他们就是从那里阴险地伺机把他打伤的。枪还没放，他就压低嗓子哎哟了一声，枪托往肩上一搁，就感到钻心地疼痛。列夫丘克立刻就明白，从今以后他不是机枪手了。这时他躲在掩体里又向基谢尔喊道：

“告诉连长，受伤啦，我受伤啦，听见了吗？”

好在已经是黄昏。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过去之后，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沼泽地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烟雾，远方已经看不太清。德国人一直也没有开始他们第五次的进攻。天黑时，连长米耶维奇来到了长着松树林的小山岗上。

“怎么，负伤啦？”他伸长身子和他并排趴在干枯的针叶上，凝视着烟雾弥漫的沼泽地，从那里吹来火药的气味和傍晚的凉风。

“是的，肩上受伤了。”

“右肩？”

“是呵。”

“好吧，有啥办法呢！”连长说。“快到巴依金那儿去。把机枪交给基谢尔。”

“交给谁？他也算机枪手！”

开始时，列夫丘克认为，在连长的这个命令中，对他来说有一种侮辱性的东西：把这样一挺由他维护的、完好无损

的机枪，交给象基谢尔这样连步枪还摆弄不好的乡下佬，这就意味着在其他一切方面，已经把列夫丘克与他同等相看了。但是列夫丘克不愿和他相提并论，因为当机枪手是一种的特殊专业，是挑选优秀的游击队员——以前的红军战士来担任的。当然，现在红军战士已经没有了，机枪确实已经无人可给了，列夫丘克想，随连长的便，让他决定好了，这不关他的事，现在他已经是伤员了。

列夫丘克故意装做无所谓的样子，在邻近一棵松树下面，把机枪交给了基谢尔，自己就空着手慢慢地向着树林深处的水溪走去。那里是这个被围地区的后方，卫生所就设在那里。游击队员们开玩笑，把他们的医生威尔赫维兹和巴依金称为支队的“死神的助手”。这也有些道理。因为，巴依金战前是个牙科医生，而威尔赫维兹的手，大概从来还没有摸过绷带。但是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医生了，这两个人又管治病，又管包扎，而且有时还截断胳膊或大腿，就象给那位患坏疽病的克里茨基做过的那样。据说还不错。他住在一个村子里，正在恢复，尽管只剩了一条腿。

在小溪附近卫生所的窝棚旁边，已经有好几个伤员坐在那里。轮到列夫丘克的班了。医生摸着黑，用很浓的过氧化氢给他出血的肩膀好歹地消了消毒，用自制的粗麻布绷带紧紧地缠上。

“把手揣在怀里，这样一捺，没什么可怕的。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抡大锤了。”

谁都晓得，医生的几句好话有时比吃药更有效。列夫

丘克立刻就感到，他的肩膀不疼了，他想，明天天一亮马上就回道尔嘎亚·格拉达，回连队去。现在先睡一觉。在世界上他最希望的就是睡觉，而现在他取得了充分的权利。

在一阵短暂的、模糊不清的惊扰之后，他又在一棵松树下边，在它那些坚硬、多结的树根上打起瞌睡来。但是很快又听到近处的脚步声、说话声、树丛里车辆的沙沙声和旁边人们的忙乱声。他听出了巴依金的声音，听出了他们的新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个熟人，可是在睡梦中，他没有弄清楚是谁。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

当然，这是他们支队的女报务员克拉娃·沙洛欣娜。她那响亮的声音，就是在一公里以外，在几百个人中间，列夫丘克也能听得出来，而现在就在身边，离他只有十步远。睡意立刻就消失了，他醒了过来，但是眼睛还是睁不开，只是在棉袄下面动了动受伤的肩膀，屏住了呼吸。

“怎么不去？怎么不去？我们在这儿给你开一所医院吗？”他们的新参谋长——不久前某连的连长，用大家熟悉的凶狠的男低音喊道，“巴依金！”

“我在这儿，参谋长同志。”

“送走！马上就送走，和基赫诺夫一块！想法走到雅兹明克，到列斯柯维茨那儿，在五一大队，就能度过困难。”

“我不去！”在黑暗中又传来了克拉娃忧郁无望的反驳声。

“你要明白，沙洛欣娜，”巴依金用温和的口气加入了谈

话，“您不能留在这儿呵。您自己不是也说：到日子了吗。”

“到就到呗！”

“他妈的，要把你打死的！”看样子参谋长真的发火了。
“我们要突围，要匍匐前进，你明白吗？”

“让他们打死好啦！”

“让他们打死好啦，——你们听见没有？要死应该早死！”

一种不自然的间歇开始了，可以听到克拉娃轻轻的抽泣声。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车夫用鞭子在抽马：“你怎么不死了，下地狱的东西！”根据一切情况判断，后勤要转移了。但是列夫丘克始终还是不愿驱走睡意醒过来，甚至还没睁开眼睛，相反，他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在那里倾听。

“巴依金！”参谋长用坚定的声调喊道，“叫她上车，送走。和列夫丘克一块。有什么情况，他可以照顾一下。列夫丘克在哪儿？你不是说在这儿吗！”

“在这儿，方才我还给他包扎来呢。”

“这回让你睡吧！”列夫丘克懊丧地想。但他始终还是一动不动，似乎在指望，他不在也许还能招呼别人。

“列夫丘克！列夫丘克！格里勃耶特，列夫丘克在哪儿？”

“方才还在这儿睡觉来，我看见过，”从稍远的地方，传来了卫生所车夫那种大家熟悉的、沙哑的声音。他把他给出卖了。列夫丘克自言自语地骂道：“你看见过，谁请你看来？”

“找找列夫丘克!”参谋长吩咐道,“把基赫诺夫抬到车上。从沼泽地的栈道上走,那儿现在还没封锁。列夫丘克!”参谋长生气地喊。

“我在这儿,什么事?”他怒气冲冲地回答道。他认为现在已不必再掩饰自己的忿怒了。他慢腾腾地从几乎垂到地面上的松树枝里钻出来。

林中的夜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根据各种嘈杂不清的声音、游击队员们压低的谈话和夜里某种忙乱的情景,他明白了:阵地要转移了。有几辆大车从松树下面赶出来,在黑暗中有些车夫正在忙着套马。旁边有个人影动了一下,从穿着斗篷雨衣的魁梧身形来看,列夫丘克认出了,这是参谋长。

“列夫丘克!沼泽地上的栈道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吧,把基赫诺夫送走!不然小伙子就完蛋啦。经过栈道送到五一大队。侦察员们回来了,他们说那里敌人没有设防,还可以通过。”

“算了吧!”列夫丘克不友好地说,“五一大队我见识过!我回连!”

“回什么连?回什么连?你不是受伤了吗!巴依金,他哪儿受伤啦?”

“肩膀受伤啦,切线伤。”

“你瞧,是切线伤,到栈道去吧。大车归你领导。还有……把克拉娃也带上。”

“也送到五一大队吗？”列夫丘克不满地埋怨道。

“克拉娃？”参谋长讷讷起来，看来把克拉娃送到哪里更好一些，他还没有肯定的意见。这时巴依金在黑暗中小声地说：

“克拉娃最好送到一个村子去。找个妇女，找一个有经验的妇女。”

“妇女，妇女！”列夫丘克怒气冲冲地紧接着说，并把身子转了过来，一边用左手把皮带上那个德国巴拉贝伦手枪的硬皮套推了推。因为方才在松树下边睡觉时，它把大腿硌麻了。“已经够我呛啦……”

至于克拉娃，他已经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荒谬的任务：大家都去突围，可是他却要躲得远远的，要到五一大队去，而且还是同这样一些伙伴在一起：格里勃耶特、克拉娃、这位衰弱无力的基赫诺夫……列夫丘克昨天晚上从道尔嘎亚·格拉达一来，就注意到了基赫诺夫。这位空降队员孤独地在卫生所窝棚旁边躺着，身上盖一件什么粗麻布衣，他的头整个缠着绷带，从粗麻布衣下面翘出来，活象根木头桩子。眼睛上也缠着绷带。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好象连气都不喘了。列夫丘克从他身旁走过，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他想空降队员大概要完了。还有，这位克拉娃……以前，如果能和克拉娃一起坐车，在树林里多走上一公里，列夫丘克会认为那是幸福，但那是以前，而不是现在。现在克拉娃引不起他的兴趣。

这个枪伤真讨厌，它给他带来了多少麻烦，根据一切情况来看，以后还要有更多的事情呢！五一大队倒是不远，但是你试试看，怎样穿过法西斯的封锁线到达那里，虽然侦察员们说没有设防，但是究竟是怎么没设防，谁没设防还不清楚呢。由于夜间的潮湿，列夫丘克一边蜷缩着身子，一边自言自语地这样判断着。要是当时不把机枪交给基谢尔，根本不到这个卫生所来就好了。

列夫丘克准备同领导吵一架，回到连里去，大概连长也不会把他赶出来。他重新同其他的人一起去打仗，比这样不知去向、漫无目的地乱闯要好。但是当他打算提出申请时，已经无处去提了。参谋长已经走了，他那防雨斗篷在灌木丛中引起一阵簌簌声之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而巴依金还是在这之前就在黑暗中消失了。马在跟前站着，用它的尾巴抽打着大车的辕木。车夫格里勃耶特倒动着双脚，站在马旁边，收拾车套，克拉娃在一旁等着，轻轻地在抽泣，列夫丘克对别人连看也没看，骂道：

“这种领导，尽捉弄人！算啦，叫你妈得个寒热病吧！”

3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乘车在树林中行进。在经过什么大坑或土埂时，大车常常要翻倒。灌木的树枝无情地刮着

大车，抽打着车上的乘客。列夫丘克低着头，用披在外面的棉袄保护着肩膀。他已经不清楚，他们是在向哪里走。好在格里勃耶特对这地方很熟，用不着问路，马吃力地拉着车，他们觉得路是对的。列夫丘克的怒气还没消。他一声不响，谛听着周围特别是后方传来的隆隆声。有时什么地方燃起信号弹，它那遥远的颤抖的反光，在树林上空闪烁，经久不熄，照亮了夏天本来就微微发白的天空。

穿过茂密的灌木林，他们终于来到了一条林间小路上。大车走得平稳了一些。列夫丘克轻轻地挤了挤一动不动躺在他身边的空降队员，坐得也舒服了一点。基赫诺夫好象在睡着，再不就是失去了知觉。列夫丘克轻轻地拉了拉他的冲锋枪的枪筒，因为它在车上碍事。可是他刚一使劲拉，空降队员就用手在身边摸起来，并且紧紧地抓住枪托的颈。

“别……别动。”

“怪人！”列夫丘克吃惊地想，并且装做对他的步枪并不感兴趣的样子，“他要枪干什么呢？”

说实在的，列夫丘克并不反对拥有这支冲锋枪，因为他感到，他很快就会非常需要它。一路上大概不会碰不上德国人，可是他只有一支有两盘子弹的巴拉贝伦手枪，格里勃耶特背一支步枪，克拉娃可能还有一支什么勃朗宁手枪，总之，要想穿过二十五公里的路程，到达五一大队，这几件武器就显得太少了。特别是在栈道上再遇上德国人。大概一定会遇上的。既然整个地区都给包围了，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不切断栈道，不管侦察员们怎样讲……

想到这里，列夫丘克拉了一下格里勃耶特的胳膊肘：

“停下！”

车夫拉紧缰绳，马站住了。他们警惕地听了一会儿。后边很远的地方，仍有隆隆的响声。可是周围很静。杜布洛夫良附近好象也平静下来了，那里昨天从傍晚开始整整一夜，隆隆的射击声都异常激烈。现在可以清晰地听到身边马匹疲倦的喘气声和灌木林中夜风的喧响。

“栈道还很远吗？”

“已经很近了，”格里勃耶特说道，并没有向他转过头来。“过了森林残址，那边还有一片小松林和土堤。”

“不从那里走了，”列夫丘克决定说。

“原来是这样！那么从哪儿走？”

“顺旁边走。”

“怎么顺旁边走？”格里勃耶特想了想，不同意地说，象方才一样，并没向列夫丘克转过头来，“那边是沼泽地。”

“就从沼泽地里穿过去。”

格里勃耶特考虑了一下，带着明显的反感，勒着马离开了大路。因为没有路，马很不愿意走，特别是在通过草木丛生的地方。这时车夫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从车上跳下来，牵着马缰绳。列夫丘克也从车上跳下来，用那只好胳膊保护着那只受伤的胳膊，钻进灌木林，向前面走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侦察员们怎样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证明那里安全，可是他却顽固地不愿意从栈道走。德国人不可能不占领栈道。这一点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能

感觉到,当然,他也不知道有另外的路,沼泽地就要到了,怎样赶着马车通过沼泽地,他还没有明确的办法,他只是这样安慰自己,说到时候就清楚了。战争教育了他,他懂得:有许多事情只有到了当时当地才能清楚。任何最有远见的计划,也没有多大价值。不管你怎样计划、考虑,德国人或者环境会把一切都改变的。在自己参加游击队的全部时间里,他习惯于直接按着环境的要求行动,而决不象瞎子离不开板墙那样死抱住某种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就会使你重蹈“莫吉廖夫省”^①的覆辙,而且还把别人也拖进去。

看来,格里勃耶特有不同的看法。当大车在丛林中穿过时,他对马大发雷霆,一会儿骂它是讨厌鬼,一会儿骂它是骗子,一会儿紧紧勒住缰绳,一会儿用鞭子朝肚子上抽。对他这种锋芒毕露的发火,列夫丘克开始感到讨厌。正当他准备申斥车夫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丛林的尽头。前面是块不大的草地。周围明亮起来,头顶上是晴朗的天空。沾满露珠的草地上,笼罩着一层冷雾,有一种发霉和水草的气味,前面就到沼泽地了。

大车停下了,列夫丘克沿着不高的草地向前走,脚底下暂时还不泞。他站下来听了听。远方仍不时地传来枪声,但周围很静。赤杨树丛半埋在烟雾中,正在沼泽地中打瞌睡,不知什么地方,长脚秧鸡在吱扭吱扭地小声叫着。其它的雀鸟大概都在沉睡。列夫丘克又向前走了一会儿,脚下

① 白俄罗斯东部一个省,德苏战争初期,即被德军所占,损失惨重。作者在这里有影射斯大林之意。——译者注

的土地越来越软，开始出现苔藓，在底下直绊脚。右脚上的靴子有窟窿，脚已经湿了。但是这里还可以走，马能过去，车也能拉过去。

“哎，这边来！”他对着昏暗朦胧的烟雾，声音不高地喊了一声。

列夫丘克原以为，格里勃耶特很快就会离开那里赶上来。但是过了一会儿，后边还听不见一点儿动静，他就火了。很明显，这位车夫太自作聪明了，不管怎样，列夫丘克是组长呵，可是他的话他不听。过不一会儿，列夫丘克就快步回到林边，看到大车还停在原来的地方。格里勃耶特穿着他那身又小又瘦的德国制服，拱着背站在马旁边，看样子他根本就没想动。

“你怎么啦？”

“可是叫我往哪儿赶？”

“什么往哪儿赶？跟我来！我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赶。”

“往沼泽地里赶吗？”

“什么沼泽地！能擎得住。”

“这里暂时能擎住，可是再走就是泥塘了，这我知道。”

他知道！列夫丘克几乎要吼叫起来了。是泥塘，就得从泥塘里穿过去，也不能在这儿等到天亮啊，难道这位车夫是第一天参加战争吗？

但是他知道，格里勃耶特不是第一天参加战争了，他对这次战争的了解不比别人差，这使列夫丘克抑制住自己，没

有开口骂。只是听到车夫这样不满地唠叨时，他感到吃惊：

“不是告诉我们，要从栈道走吗，是这样说的吧？可是硬要往沼泽地里赶……”

“你说，要从栈道走，是不是？”列夫丘克勃然大怒。“对你射击几次了？射击两次了吧？那么，到栈道就要第三次对你进行射击了，而第三次是要把你打死的，”他又补充几句，口气变得温和了一些：“你以为德国人是傻瓜，栈道他们能置之不理吗？首长说了也不行，自己还应该动动脑筋。”

车夫顺从地听完他的话，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有什么！我不反对。可是怎么办呢？”

“跟我来！”

大车在不高的草地上，徐缓地、无声无响地向前滚动，一直走到沼泽地的紧边上。马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陷进泥地里，一会是前腿，一会儿是后腿，有时还陷得很深，为了把它们拔出来，就得往另外的腿上使劲儿，结果几条腿就都陷了进去。马就是这样一跌一蹦地挣扎着。它竭力要踩到硬的地方，可是硬的地方却越来越少。克拉娃也从车上下来了，跟着在后面走。格里勃耶特牵着马笼头，准确地跟在列夫丘克后面，可是得常常地停下。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就连列夫丘克自己也不得不停下来：出现了水草和稀泥，一缕一缕的云雾在沼泽的水面上飘浮，在一堆一堆的云雾的空隙中间，静止的水面微微地发着黯淡的光。

“瞧，到底陷进来了！”格里勃耶特长出了一口气，站在辕马的身边不吱声了。辕马浑身是汗，热气腾腾，肚子一起

一伏，喘得很厉害，两条后腿，陷在膝盖深的沼泽里。

“没关系，没关系！等一等，叫马喘口气。”

列夫丘克把棉袄扔到大车上，用那只未受伤的手抓住低矮的赤杨树丛，使劲地斜着走进沼泽里，因为这样还能擎住。他已经不再注意自己的两条腿了，因为膝盖以下都已经湿透。泥水在靴子里呱唧呱唧地响。那只受伤的胳膊碍事，他就把它揣进怀里挂在胸前。他很快地就陷了进去，都快陷到腰部了，只是在一棵赤杨跟前才挣脱出来，那里底下好象比较硬。应该估量一下了，下一步应该朝哪里走。

“喂，到这边来！”

大车猛然动了一下，马迈出了前腿，但立刻就陷了进去，一直陷到肚子。列夫丘克回头看了看，心想：本来可以拉出来，但是却没有成功。马用力地挣着拉着，但还是没能从深坑里挣扎出来，格里勃耶特抓住笼头牵着马。列夫丘克用那个健康的肩膀就从大车的后边扛。他拚命地推了一会儿，一直到胸部都浸湿了，这时大车才倾斜着从稀泥中拉了出来。克拉娃把裙子提到白皙的膝盖以上，跟在大车后边，走过了这个被车马弄得泥泞不堪的地方。

“噢，上帝呀！”

“瞧，这就是上帝的恩赐！”列夫丘克接过去挖苦地说。
“锻炼锻炼吧，以后用得着。”

他一边用脚在水中试探着，又走到前边去。但是到处水都很深，而且很泞。他在齐腰深的水中，踏着泥泞吃力地转游了很久。可是这里一条合适的路也没有。他走了一百

来步，还没有到岸——到处是稀泥、苔草、长着水草的土墩和广阔的黑色的水面。水面上笼罩着瓦蓝色的烟雾。这时他又回到大车跟前，一把抓住了车辕子。

“喂，拉呀！”

格里勃耶特拉紧了笼头，马顺从地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使出了牲畜的浑身的气力，大车从原地稍稍动了一下，但马上又停住了。

“使劲儿，使劲儿！”

他们俩真地和马一起拉起车来：列夫丘克拉车辕子，格里勃耶特从另一侧抓住绳索。马一冲一闯地向前拉，越来越深地陷进黑色的被马蹄所踩泞的稀泥里。看样子，马正在努力，它要勇敢地走向车夫牵它要进的深坑，它以超出自身的力量，在自己的身后，拖着那辆车轮已经陷入泥里的大车。他们全都齐胸泡在水里和稀泥中。汗水顺着列夫丘克的脸和脊背淌下来。克拉娃从后边也尽可能地帮着推。

他们就是在这水坑里挣扎到第二天早晨，大概也走不出这一片沼泽地。于是他们都一声不响地停了下来。他们抓着车辕和大车，免得完全陷进去。马齐背陷进水中。它仰着头，向前伸着，尽量地保持呼吸。看样子，如果后面没有车，它就要在这稀泥中游泳了，可是游向哪里呢？

列夫丘克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并为闯进这片沼泽地而感到后悔。也许真该顺栈道走了，那样大概早就过去了。可是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即使等到黎明，也毫无办法。是不是应该把车扔掉，空降队员

由大家抬着。还好，克拉娃还没有发牢骚，她始终一声不响地忍耐着，甚至还尽量帮着推。

“这才真算陷入了困境！”列夫丘克难过地说。

“我早就说过！”格里勃耶特马上接过去说道，“我们象些傻瓜一样，闯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们怎么走出去呢？”

“也许我们走有一公里了，”克拉娃在后边小声说。“噢，我的天哪，我受不了啦……”

“应该回去，”车夫说，“不然，马要淹死的，这一位也得淹死，还有我们自己，这里有大坑，哎呀，有一人多深。”

列夫丘克茫然若失地用衣袖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沉默着不说话。他自己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走：是前进还是后退？而且，不管是马或人也都没劲了，都已疲惫不堪。列夫丘克心想，的确，与其停在这里，真还不如到栈道去试试呢！

“你们在这儿站一会儿！”他稍微歇了口气说道，“我去看看。”

他重新进入水洼，并且尽可能地少发出溅水的响声。他在一个地方陷进深坑里，差点儿没顶。他抓住一个土墩，总算没有掉进去，但是这个土墩，沉入水中，越沉越深，不是一个好支点。他明白，他不能在这个土墩上支撑多久。这时他一下子就跳到旁边有水草的地方，这里水比较浅。这时他已经不是横穿水洼而是顺着水洼走了。现在他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从这该诅咒的水洼里穿过去，而是别把马掉进去，自己也别淹死就行了。的确，恐怕是到了最深的地方，

水面越来越宽阔，上面的水草逐渐稀少，柳丛及赤杨树丛则完全不见了。现在需要的是一只船，而不是一匹拉着一辆大车的马。列夫丘克已经不止一次地咒骂自己的轻率了。他不安地想，一切都是多么荒唐，现在恐怕只得从原路返回了。

他带着这个还没有最后形成的思想，向着那辆旁边站着两个人、孤零零地一动不动停在水洼中间的大车走去。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他。但是天很快就要亮了。亮天时待在这个毫无遮掩的水洼中间，可不是好地方。

但是还没等列夫丘克走到他们那里，还没等他想出什么办法，在不远的地方，在深夜树林的上空，就急速地掠过了打枪的回声。过了一秒钟，回答这次射击的是第二次枪响。机关枪爆豆似的嗒嗒响，迫击炮沉闷而庄重地轰鸣。炮弹尖叫着穿过高空，在林中什么地方爆炸了。这时一切都开始了：大炮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汇合在一起。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沉睡的烟雾弥漫的黑夜，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他们都在原地呆住了。列夫丘克惊讶得张开了口，凝视着黑夜，竭力想从中有所观察和理解，但是在昏暗的烟雾中，他什么也看不见。当他怀着得意和愤怒的复杂心情，猜到是怎么回事儿时，他几乎浑身抖了一下。

“啊哈，是栈道那边？”

“是栈道那边，”格里勃耶特沮丧地承认说。

他们被这突然袭来的灾难压抑着站在那里。这个灾难

落到了别人头上，它本来又是多么容易落在他们四个人的身上啊！他们避开了它，可是处在这个火力下的那些人，处境又是怎样呢？他们一面倾听着枪炮的射击声，一面心里在琢磨：这是谁在打谁？但是这里恐怕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是德国人在射击。因为一切火力都是来自他们那个方向。迫击炮又响了。支队里没有迫击炮。这就是说，终于有人经受不住栈道的诱惑，相信了侦察员的报告，而现在却付出了代价。现在，那里是很不愉快的。

列夫丘克浑身蜷缩，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侥幸。他带着庆幸和愤怒的心情，斥责起他的助手来。

“瞧，他妈的！你们还说要回去呢！往前走吧！竭尽全力前进！一、二，拉呀！”

他们倾听着枪炮的射击声，重新又开始推车、拉车，抽打已经精疲力尽的马。但是他们的力气已不如当初，而且大车大概也陷得很深了。毫无成效地折腾一阵之后，列夫丘克挺直身子站了起来。从黑夜的远方仍不断传来栈道上枪炮的轰鸣声。列夫丘克歇口气，又走进水中。他迈大步用脚在水中试探着，一会儿走到大车左边，一会儿又走到右边。好在他穿的靴子是皮的，而不是厚油布的，沾水一缩就紧紧地箍到脚上，不然他早就得光脚了。

他决定自己先去找出一条到达岸上的路，只要不在什么地方掉进没顶的水坑里，就能找出这条路，然后再把大车拉出去。现在他已经不顾水的深浅了，反正颈部以下都已经湿透。他用手抓着土墩，用前胸分开稠密的、难闻的稀

泥，有的地方是走，有的地方是游。他始终还在注意倾听栈道上时起时伏的战斗，很难判断，是哪一方占了上风。也许是我们的人打退了德国的阻击队，也许是阻击队消灭了游击队。“这些蠢货，”列夫丘克心里想，“当时为什么硬要往陷阱里钻呢？还是象现在这样，经过沼泽地好些，要是沼泽地那边也没有德国人的话。”

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现在他感到，沼泽地一点也不可怕了，正好相反：可怕的是那边，是大路和栈道那边。沼泽地不止一次地掩护了他，救了他，现在他简直爱上了它。只希望它不是无底的，当然也不是无边无际的。

好象很突然似的，他在烟雾中发现了灌木丛的树梢，心中高兴地想到，这就是岸。实际上，再走二十几步，水洼就到头了。在一条不宽的水草的后面，可以看见赤杨树丛，再过去就是一片不大的、刚割过的草地。他甚至还没有走到干燥的岸上，就立即转回来，蹚着齐腰深的水，吃力地向着大车走来。在烟雾中他走过了头，差点找不到大车，可是听到身后轻轻的溅水声，才转了回来。克拉娃坐在已沉下去一半的大车上，大概是在保护空降队员，免得他没进水里。格里勃耶特在马跟前忙碌着，为的是不叫它完全陷进水里。他们一声不响地在等待着他。

“这么办！”列夫丘克抓住车辕子说道，“分开走。把马卸下来，驮着基赫诺夫，然后再来拉车。岸就在这儿，不远了……”

4

他们在乳白色的雾霭中，终于从沼泽地里走了出来，这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们把失去知觉的基赫诺夫抬到湿淋淋的马背上，列夫丘克牵着马，格里勃耶特和克拉娃从两侧扶着。此外，格里勃耶特还拿着马轡和辕鞍。大车沉进水中扔在沼泽里，可是他舍不得把马轡和辕鞍也丢在那里。他们认为，只要有马和马具，以后遇到村子，大车还可以弄到。

上岸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才把基赫诺夫的软绵绵的身体，从马背上抬下来。他们把他放在被朝雾打湿的已经割倒的青草上，各自也都累得立刻就坐了下来。列夫丘克翘起左腿，把靴子里的泥水倒出来，右脚里的泥水已经从靴子的窟窿里自己流出去了。格里勃耶特按农民的方式，夏天走路赤着脚，现在他不必为鞋子的事儿操心。他卸下枪闩，把枪筒里堵的泥捅出去。克拉娃紧挨着他们悄悄地躺在那里。马站在跟前，它那耷拉下来的脑袋垂在他们的头上，脖子上带着湿漉漉的马轡，空瘪的肚子一起一伏地、急促地喘着粗气。

“瞧，出来了吧，可是你们说什么来着！”列夫丘克带着疲倦的满足长出了一口气。

列夫丘克用一只耳朵捕捉着，从栈道上传来的已经变

得稀疏的枪炮声，一面又用另一只耳朵锐敏地谛听着沼泽地岸上虚幻的平静。这时恰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们每走一步都可能与德国人遭遇。他警惕地向四周观察着，为了预防万一，他用左手把自己的巴拉贝伦手枪，从被水泡软的皮套里掏出来，在上衣的底襟上把它擦干。两个硬纸壳做的子弹匣被水泡胀了，他把子弹装进衣袋里，把纸匣扔到了草地上。接着他把基赫诺夫的冲锋枪从地上拿了起来。当 they 从沼泽地里往外驮他时，空降队员失去了知觉，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而现在则完全一声不响了。很可惜，冲锋枪只剩一匣子弹了。他把弹匣卸下来，用手掂了掂，好象还是满的。为了证实这点，他想把弹匣盖打开看看，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因为冷得要命。湿透的衣服使全身发冷，暂时又没有地方去烘干，只有等待出太阳了。虽然林子的上空天已经完全晴了，但是距离出太阳还得半个来小时。这时躺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的重伤员开始动弹了：

“喝水，喝水！”

“什么？喝水？马上，马上，老弟，马上就给你水喝，”列夫丘克高兴地回答说。“格里勃耶特，你去看看，说不定哪儿有小河。”

格里勃耶特把枪栓安到枪上，在烟雾中沿着岸边慢慢地走去。列夫丘克把视线移到在他身旁正在瑟缩颤抖的克拉娃身上，脑海里闪过一个怜悯的念头，于是他把底襟已被浸湿的棉袄从肩上脱下来。

“给你，盖上，不然……”

克拉娃盖上棉袄，又侧身躺在割过的草地上。

“喝水！”空降队员又要水喝，他动了起来，好象害怕什么似的。

“安静点，安静点，水马上就拿来了，”克拉娃轻轻地制止他说。

“克拉娃？”他听出了女报务员的声音，“克拉娃，我们现在在哪儿？”

“在这儿，过了沼泽地了。你躺着吧，躺着吧……”

“我们冲出来啦？”

“差不多啦，你别担心。”

“巴依金医生在哪儿？”

“巴依金？”

“你找巴依金干什么？”列夫丘克说道，“巴依金不在这儿。”

基赫诺夫沉默了片刻，好象有什么怀疑似的，又惊慌地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摸起来。

“冲锋枪，我的冲锋枪在哪儿？”

“你的冲锋枪在这儿，它跑不了，”列夫丘克说道。

但是他伸过手来，要求把枪递给他。

“给我冲锋枪。”

“给你，请吧！可是你要它做什么？”

空降队员摸索着把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就安静了下来。但是这种安静是相当紧张的，是新的爆发的前奏。的确，过不一会儿，他就完全突如其来地、喑哑地问：

“我要死啦，对吧！”

“你死什么？”列夫丘克故意用有些粗暴的声调吃惊地说，“我们抬你走，你会活下来的。”

“你们往哪儿……往哪儿抬我？”

“抬到一个好地方。”

基赫诺夫沉默一会儿，好象考虑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又重新想起了医生。

“叫医生来。”

“叫谁？”

“叫医生，叫巴依金！难道你聋了吗？克拉娃！”

“医生不在这里。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在空降队员的衣袖上温存地摸了摸，随机应变地回答道。

他舔了舔焦干的嘴唇，用颤抖的声音，惊慌失措地说：

“这怎么能行，难道我不需要了解事情吗！我瞎了。我干吗瞎了呢？我不想活着了。”

“不要紧，不要紧，”列夫丘克精神振奋地说，“你会想活的，稍微忍耐一下。”

“我需要……我需要了解……”

基赫诺夫说了半句话就咽下去不说了。列夫丘克和克拉娃会意地相互看了看，心里感到，麻烦的事儿太多了，于是克拉娃小声地说：

“基赫诺夫很不走运。”

“怎么说好呢，”列夫丘克不同意地说，“战争还没有结束，还不晓得谁走运谁不走运呢。”

不久，格里勃耶特端着盛满水的帽子回来了。没有找到小河，这水他是从水洼里舀来的。但是看样子空降队员又不省人事。车夫用手端着漏水的帽子踉跄地踏着脚。

“有提锅没有？”列夫丘克问道。

“没有。”

“哎呀，格里勃耶特老爷爷，你不是个好管家呀！”

“我不是什么爷爷，你也不是什么孙子。我才四十五岁！”车夫委屈地说，把水泼在地上。

“你才四十五？”

“是呵！”

“你瞧，我想，你足有六十岁了。你怎么长的这么老？”

“这这……”格里勃耶特支吾地说。

“竟有这样的事！”列夫丘克叹了一口气，接着就谈起别的事来，“应该去看看，也许什么地方有村子。”

“扎罗兹耶就在这附近，”格里勃耶特转过身去说道，“还没有烧毁。”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

“要是这个扎罗兹耶……要是那里有德国人呢？”

要是那里有德国人，当然就去不得了。最好是先去一个人看看，其他的人在树丛里等着。不然，有个什么情况，他们带着伤员，可就倒霉了，这样的灾难他们在这儿随时都能碰到。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耐性，在这沼泽旁边这么潮湿的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在这割过的草地上，克拉娃第一个打起了冷战。

“列夫丘克，应该去，”他抑制着自己，坚定地要求说。

“你们瞧！就是说应该去。”

他们不是同时，而是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把伤员抬到马身上。直到这时他始终抓住冲锋枪没放。他们好容易把枪给他拴到马的套包上。他又摸到了套包上的枪，就用两只胳膊搂住沾满水藻的滑溜溜的马脖子，把他那黄色的缠着绷带的头放在了那上面。他们从两侧扶着他，牵着马朝着草地的边缘走去，在那里烟雾弥漫，灌木林到了尽头，田野大概也就从那里开始。

过了几分钟，他们来到矮赤杨丛中，到了树林的边上。为了不走光秃秃的平地，他们沿着林边向一侧拐去。饥饿的马不时地低下头，去吃脚下的高草，差点儿没把基赫诺夫从背上摔下来。他们从两侧用力地扶着他。格里勃耶特一边用拳头捶马肚子，一边骂道：

“你老实一点，下地狱的东西！你老也塞不饱啦……”

“你骂什么！”列夫丘克满怀同情地说，“要知道它是活物，也要吃东西呵。”

天很快地亮起来。沼泽上的烟雾几乎全消了，原野一望无际。在前方地平线上，在林子的上空，一片深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眼看着太阳就要升起。林中潮湿的早上，冷得要命。湿衣服不干总是沾在身上，人们冻得发抖。被水泡松的靴子里很滑，噗哧噗哧地直响。而且，列夫丘克的肩膀还疼得很厉害，他用左手扶着空降队员的腋窝，尽量少用那只受伤的胳膊，这时他自己不断地环顾四方，焦急地等待

着扎罗兹耶的出现。

但是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这是树林地区，是相当荒凉的地带，到村子大概还得走一阵。一个惊慌的黑夜过去之后，他们勉强地移动着双腿，用很大的努力克服着睡意，慢慢地向前走。沼泽地这一关总算是平安地过来了，列夫丘克的心多少平静了一些，但现在马上又想到了栈道：那里怎样了——支队冲出来没有？如果还没有，那么今天那里将有一场激战。德国人这么多，可是支队里子弹早就很紧张了，手榴弹大概一个也没有了。一般来说，首长决定突围是对的，但是从哪里突？更加耐人思虑的是，把什么人派到栈道上去了，不正是包括卫生所在内的后勤人员吗，因为这些人当时正留在那里，这就是相信侦察的结果。

以前，列夫丘克也曾经当过侦察兵，他很了解侦察员某些报告的价值。出去侦察，能弄到多少敌情呢？可是首长要求要极端明确，于是很自然，不少的猜测就被当成了事实。他回想起一年以前，他当侦察兵时到基辅大队去取第一部电台时的情景。这部电台是莫斯科发给他们的。

要有电台了，这消息当时在支队里使人们高兴得叫起来。他们可以直接和莫斯科游击队最高参谋部取联系，这难道是开玩笑的吗！首长们为这件事，召开了群众大会。游击队员和伊里亚舍维奇政委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大家下保证，表决心，都争取承担任务。选出了以列夫丘克为首的三名优秀的侦察兵去接报务员。列夫丘克当时不象现在这样，还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这是一次不近的行军。出发

的前一天晚上，政委和参谋长做指示，给他们讲了很久：怎样走，应该带什么东西，怎样和生人谈话，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论在那以前还是以后，列夫丘克都不曾记得有过这样详尽的指示。这是派他们去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那是在三月，严冬过去了，太阳照耀着，越来越加喜人。白天大地融化，可是夜里快亮天的时候，路又冻得象镜面一样光滑，雪橇带着铃声和簌簌声跑过，马蹄碰击冰面的铿锵声好象整个地区都能听见。一宿的工夫，他们跑了六十公里，到早晨就到了基辅大队的司令部。他们在那里迎接了自己的报务员。报务员有两名。其中一个岁数大一些的——中士列舍夫，是一位黄脸膛、面带倦容的中年人，他吸烟吸得牙都熏黄了。初次见面，他们就不喜欢他：他吹毛求疵地打听，支队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走，雪橇好坐不好坐，马休息得怎样了，以及路上有没有什么盖的东西，因为他的铬鞣革靴子只有一层包脚布。他们给他弄到一件马衣，并用干草把脚包上，就是这样他还是冻僵了，他唠唠叨叨地埋怨潮湿，埋怨恶劣的气候和游击队生活的特殊，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不适合的。可是女报务员，刚一见面就使大家入迷，她是这样的整洁和招人喜欢：一件新的白色短皮袄，两只小靴子在寒风凛冽的早上发出清脆悦耳的轧轧声，毛茸茸的羊剪绒皮帽的两只帽耳朵娇媚地结在后脑勺上。前额上露出一络浅色的额发，两只小手上戴着两只无指皮手套，系手套的白带挎在短皮袄的领子后面。和中士不同，她喜

欢这里的一切，她拍打着两只小手，不住地放声大笑。她喜欢白桦树，喜欢松树上的啄木鸟，喜欢整个的树林。她在路上发现，有一只松鼠正在树枝中间顽皮地跳来跳去，这时她就叫雪橇停下来，在雪地上去追逐，直到把靴子都弄湿了为止。她那带小酒窝的温存的双颊，闪耀着儿童般的红晕，两只眼睛里流露着无限的喜悦。列夫丘克简直都看得发呆了，把昨天的指示已全部忘光，不管他怎样搜索枯肠，也还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可以在这个姑娘面前述说的话语。其他的人也都变得呆若木鸡，好象都被这个诱人的姑娘弄得茫然若失，不知所措，只是坐在雪橇上一个劲儿地抽烟。到后来，她不能不发现她的同行者们这种不自然的拘谨，她装做莫名其妙的样子，亲昵地问道：

“喂，小伙子们，你们为什么沉默？好象你们不是俄罗斯人似的……”

的确，她算说对了，他们三个人里边，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捷连柯是乌克兰人，列夫丘克和米热维奇两个是白俄罗斯人。而且这位除了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之外，连一句俄语都不会说的捷连柯，还不合时宜地开了一个玩笑。

“我们——是德高人！”^①

列夫丘克当时真不该学着捷连柯的腔调也开了一个玩笑，而且是一个更加荒唐的玩笑。直到今天他回想起来还感到害羞。但是谁能料到，事情竟会变得这样呢！他坐在

^① 因为他不会说俄语，所以把德国人说成是德高人。

雪橇后边，听到捷连柯的愚蠢的玩笑以后，突然敞开自己身上的光面皮袄，露出入冬以来为了保暖穿在里边的、在战斗中缴获的、带有许多饰纽和条带的呢子制服，喊道：

“汗得霍黑！”^①

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他们新来的报务员就慌张地一个斤斗从雪橇上翻下去，藏到壕沟后面茂密的小云杉林里去了。吃惊的捷连柯勒住了马。他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云杉林。一只深蓝色的什巴金式冲锋枪的枪管正从那里伸出来对着他们。

“站住，不许动！”一个陌生的、受惊人的声音从那里传过来，这种人现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还没等他们想出来，应该怎样对待这一切，这时坐在他们身旁的女报务员的顽皮而响亮的笑声，就突然爆发了。她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到干草上，尽情地大笑起来，把帽子都摔到道上，露出了一头精心理过的浅色头发。

“噢唷，我不行啦，笑死我啦……”

受了她的感染，他们的脸上也渐渐地露出了笑容。他们小心地望着云杉林，报务员迟疑地、谨慎地从那里走了出来。他提着冲锋枪，在大路上站住了，似乎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同行者——女报务员这种使人难堪的笑声。

她尽情地笑够之后，从大路上把帽子拣起来，把散开的

^① 这里是用俄语拼音说的德国话，意即举起手来。

头发整理好，重新戴上了帽子。

“好啦，列舍夫，够啦！把游击队员逗得够呛了……”

听了这些话以后，列舍夫才犹豫地放下冲锋枪，走到雪橇跟前，侧身坐到最后面，似乎还不大相信，是他虚惊了一场，同时也把别人吓了一跳。大家开始沉默起来，都觉得很难为情。克拉娃好不容易才停住了她那长时间的笑声。

可是第二天她就哭起来了。

有支游击队在沃尔柯波罗得斯克地区与警察发生了战斗。这个地方不能通过了。侦察员们不得不绕道走，他们不能按时返回，就在一个熟悉的村子里一个联络员的家里住了一宿。主人热情地接待他们，屋里烧得很暖和，地上铺上一捆干草，他们就在那上边躺下来睡觉。女报务员请求女主人，要和她一起在壁炉上睡，她从来还没有在那上面睡过。她详细询问女主人，问了好半天：那里烧的是什么，怎样烧的，烟从哪里走，各个炉角上放的是什么草，是干什么用的，炉膛中的袋子里装的什么。在睡觉之前，他们分配了夜里在院子里站岗的时间，虽然男主人要求由他一个人负责警卫，但是列夫丘克不愿只依靠这位伯伯一个人。为了不叫任何人受委屈，象侦察员习惯做的那样，决定大家抽签——每个人从他帽子里抽一个纸条，那上面写着站岗的时间。夜里每个人都站两个小时，就是这样一项工作。她也想和大家一样站岗。她抽了一个纸条，是第四班，从早晨三点到五点，这是一夜里最不方便、最困的时候。列夫丘克抽的是三点以前那班，他建议和她调换一下，但是她无论如何

也不同意，因为她想和大家一样地来承担游击队员的责任。列夫丘克没有怎样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一切方面总是喜欢迎合她。夜里，他站完自己那班以后，冻得浑身发抖，走进屋里。被炉盖遮住的小煤油灯在炉门口上抖动着发红的火光。小伙子们正在干草上打鼾。他走到壁炉后边去叫克拉娃。她没有回答。他没有再用其他方式叫醒她，他简直就不敢用手去碰一碰她那从被底下露出来的穿着制服的瘦削的肩膀。他又招呼一遍，可是她睡梦正酣，所以他没有再叫，在炉子旁边烤烤手，就出来了，他又替她站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叫醒小伙子们，他们就开始准备上路了。

这时她就大哭起来。

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因为她无缘无故地睡过了头，耽误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的战斗任务，而且他们又是这样不合时宜地来怜悯她。第二天整个一天她都沉默寡言，好象受压抑的样子。列夫丘克责备自己的犹豫和胆怯，但是他也是为了照顾她。他用自己的游击队员的尺度来衡量，谁知道这位莫斯科的姑娘却有她自己的、与他不同的标准。

5

灌木丛向旁边拐去，树林到了尽头，前面是一片马铃薯地，可是看不见村子。他们把马停住站了一会儿，四周看了

看。垅沟是新翻的，大概是这两天刚刚蹚过，它们从林边向田野伸去。嫩绿多汁的马铃薯秧，开着紫罗兰色的小花。他们隔着一条垅牵着马顺着垅沟并排着向地里走去。

马铃薯秧不太高，不妨碍走路。前方不远的地方，可以望见一片什么小树和灌木丛，再前边是一块谷地，谷地后面是一片黑乎乎的针叶林。他们找的那个扎罗兹耶在哪儿呢，谁也不清楚。

他们一声不响地走着，得常常扶一扶骑在马背上的基赫诺夫，因为他已经开始往下掉了。这位伤员耷拉着脑袋，不时地哼哼几声，但是还紧紧地抓住用皮带挂在马套包上的冲锋枪。看样子神智还清醒，的确，过了一分钟，他透过牙缝挤出来一句话：

“还要很久吗？”

“什么很久？”列夫丘克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还要折磨很久吗？”

“快啦，快啦，再稍稍忍耐一下。”

“德国人在哪儿？”

“这儿没有德国人。你怕什么？”

“我不是怕，我是不愿意白受罪了。”

列夫丘克并没有解劝他，因为他感到，空降队员有一定的正确性，他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各种伤员他见得太多了，他懂得，重伤员有时简直象小孩子——他们调皮任性、吹毛求疵。应该很好地、带着爱抚的心情对待他们。当然，有时候也需要严厉一点儿。严厉每个人都需要，尽管并

不是每一次都是良心所能允许的。有一些人，严厉地对待他们简直叫人于心不忍。

他们刚刚离开树林不远，身后突然响起了克拉娃的惊慌的声音：

“列夫丘克，列夫丘克，你瞧！”

列夫丘克回头一看：这位姑娘坐到垅沟里，缩着脖，正在向一边看。那边离他们不到一公里远的稀疏的灌木丛里，停着几辆盖着防水布的卡车。卡车中间闪动着绿色的人影。这是德国人。

列夫丘克往那儿一看，一个明确的、不祥的念头立刻刺痛了他的心：我们落网啦！处境太糟了——在田野中间，还有马，现在怎么办？……

逃跑大概已经来不及了。格里勃耶特立刻卧下，藏进马铃薯秧里。列夫丘克使劲儿地拉了一下空降队员的沉重的身体。他一只胳膊抱不动他，他们俩就一起滚进马铃薯地里。基赫诺夫哼哼了几声，可是马上就静了下来，伸长身子躺在了垅沟里。只有这匹现在已无人看管的马还站在那里，尴尬地注视着远方的大路。

“这一下才算闯入了险境！这可不同水洼！”过了一会儿，格里勃耶特嘶哑地说。

列夫丘克想走到马跟前，把冲锋枪从套包上摘下来，但是枪已经不在那里。大概是空降队员掉下来时一起带下来了。这时列夫丘克从马铃薯地里小心翼翼地探头往外看了一眼：被灌木林遮住的几辆卡车还停在原来的地方，从一辆

卡车里好象走出来一个人，隐约地可以听见远处关车门的响声。大概那里一定有条大路，德国人是临时有事停在那里的。看样子，他们还没往地里瞅，还什么也没有发现。

也许，他们很快就会走开吧？

一夜来，马铃薯秧上挂满了露珠。游击队员们坐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这时林子的上空已经升起了太阳。早上太阳的清冷的光线，呈扇形照射在田野上。大概就是因为太阳光晃眼，所以德国人还没有发现地里有人。

太阳升得更高了，他们一直躺在那里，既不知期待什么，也不知有什么希望。基赫诺夫很安静，他躺着一动不动，一声没响，可是列夫丘克感到，他在倾听，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列夫丘克不时地从马铃薯秧中探出头来观察，他很快就发现，那边在大路上已经有人面向田里站着，正在向他们这边看。格里勃耶特大概也发现了这个情况，他开始用凶狠的耳语撵马。

“滚，滚开，滚开，讨厌鬼！……”

但是已经晚了：德国人一定是发现了田地里这匹孤单的马。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穿着很长的军大衣，手里提着水桶的高个的德国人走到第一个人跟前，他们一边挥动着胳膊，朝他们这边望着，一边说了一些什么。列夫丘克深信。德国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只是看见了马。

要是他们突然到地里来抓马呢？

这个念头使列夫丘克不寒而栗，他也开始嘘嘘地来撵他们这匹可怜的马，从夜里到现在它身上还一直未干呢。

“滚开！滚，滚，滚开！”

这个不懂事的牲畜站在那里，向四面张望着。主人們的吆喝，它不理解，没有引起它任何的反应，它用嘴巴撕扯着马铃薯秧，开始吃起来。列夫丘克简直懊丧得要吼叫起来，但是他不能站起来去把它赶走，甚至都不能大胆地向它挥一挥手。

“格里勃耶特！格里勃耶特！把它撵走，赶快撵走！”

“滚，讨厌鬼！滚开，滚开！走开！……”格里勃耶特压低了声音使劲地喊，竭力想把它吓跑，可是它却转过来，横站在垅沟上，泰然自若地撕扯着嫩绿的马铃薯秧。

“你死了吧！让狼把你吃掉吧！……”

要是它死了，当然，他们会感到轻松。但是很显然，它还不想死。它撕扯着马铃薯秧，正忙着塞满肚子，尽管颈上还带着套包。他们懊丧起来，只好偎缩在自己的垅沟里，怀着惊恐的心情，不时地朝大路那边张望。

“怎么，德国人还远吗？”基赫诺夫不安地问。

“小点声，你躺着吧……”列夫丘克制止他说。

“德国人还远吗？”

“小点声！远什么……那边就是，就在大路上……”

“正往这边来？”

“没有，躺着你的吧……”

“怎么没有，”格里勃耶特藏在自己的垅沟里嘶哑地说，他探出头去看了一下，马上又缩回来藏了起来，“已经过来啦。”

列夫丘克从马铃薯地里伸出头来，只一瞬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两个德国人正不紧不慢地横穿堅沟，朝他们走来。是朝他们来的，这毫无疑问，他们前进的方向，他看得很准。马一边吃着马铃薯秧，已经离开他们有二十来步远了，一会儿可能还会走得更远一点儿。列夫丘克的意识中闪过一个微弱的希望，只有这个才能使他们得救，其他的出路已经没有了。

“德国人在哪儿？”基赫诺夫又惊慌起来。

“小点声！别动！”

“德国人在哪儿？走过来啦？”

“走过来啦！小点声……”

“抓我们来啦？不，他们抓不到我啦！……”

他最后这几句几乎是喊着说出来的，是新的不幸即将发生的预兆，这使列夫丘克感到震惊。他正横穿堅沟急忙向他奔过去，这时一梭子冲锋枪子弹立刻从他那里喷射出来扫射在马铃薯秧上。

列夫丘克失去了克制，一下子就把他的冲锋枪抢了过来。当时由于急躁，他认为他是向德国人开了枪。但是他立刻就看到，在他那向后仰着的头上，绷带被穿破了，被血染红了，鲜血从那儿悄悄地流进松软的土地里。这时他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他跳起来，把冲锋枪扯下来，放到膝盖上，也没瞄准，就嗒嗒嗒朝德国人打了一梭子。开始时德国人在马铃薯地里楞了一会儿，然后就飞快地朝着大路向回奔去。格里勃耶特的步枪在身边也打响了，列夫丘克喊

道：“跑！”这时他们就弯着腰朝着树林拼命地往回跑。

“唉，你这个傻瓜！唉，你这个笨蛋！”列夫丘克边跑边骂道，他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实际上，这就是背叛。他谁也不考虑，只关心他自己，只关心他自己的毫无意义的死……列夫丘克很快就追上了克拉娃，她也正在向着树林里奔跑。在奔跑的路上，他们还不时地回过头去往卡车那边看。德国人已经跑到那里，并从那里打来了几枪，子弹吱吱地响着从他们头顶上飞过。但是从大路到林边毕竟不算太近。不久列夫丘克又恢复了以前的信心，觉得他们是逃出来了。灌木林就在眼前，跑进灌木林，远方射来的子弹就不可怕了。

在跑进树林之前，列夫丘克回头看了看，卡车旁边有几个德国人正从后面看他们。大概是认为已经打不着了，所以也没再对他们进行射击。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那匹马，颈上带着套包，摇动着尾巴象孤儿似的站在马铃薯地里。基赫诺夫从这里已经看不见了。

“蠢货！”列夫丘克还是平静不下来，“跟他遭了多少罪，可是他……”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钻进灌木林里，并且连走带跑地又走了好久，想尽量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远一点。这里树林并不密，有幼桦和稀疏的小松树，遇到密的地方，列夫丘克就从旁边绕过来。本来他们还可以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克拉娃跟不上，他们怕她落后，步子就放慢了一些。这位姑娘尽量地追赶他们，为了不致摔倒，她用手抓住树干或树枝。

克拉娃感觉很不好受，这一点列夫丘克也发现了，但是这里不能停留，要尽可能地走得远一些，列夫丘克顽强地向前面奔跑。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从矮林中走出来，来到一片开阔的河湾的草地上，这里草很高，里面还长着稀疏的柳丛。为了喘口气，等一等克拉娃，列夫丘克在草地的边上停了一下。看样子，德国人并没有追他们，但是他的五脏六腑好象都抖成了一团，他想，这次只是由于奇迹他们才逃避了死亡。这一切都是由于基赫诺夫。当然他有充分的权利自杀，但是他这种行为几乎没把其他的人也给毁掉。为了不致在什么地方再撞上德国人，列夫丘克凝神地注视着草地上的灌木丛，不知为什么。好象和自己的心境很不协调似的，他突然想道：也许是空降队员救了他们？事实上，如果他不放枪，不把德国人吓跑，那么他们当然就会走到跟前，就一定会在马铃薯地里发现他们。一场不大的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在这场冲突中谁更走运一些还不清楚，很可能大家都倒在那里。

你看，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笨蛋！

的确，看起来似乎是空降队员救了他们。他自己得到了解脱，这是毫无疑问的。仅为这一点就应该感谢他，不然，他们没有马，又带着伤员怎么能跑掉呢？在战争中他认识到的东西太多了，认为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再使他感到惊奇。可是结果还是有令他吃惊的事。可能战争就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大概就是一辈子你也不能把它那些离

奇古怪的事情都弄清楚。

就说克拉娃吧。

女报务员神色痛苦，脸上呈现着褐色的斑点。她追上了他们，疲倦地跪到了草地上。

“哎哟，我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又来了，”列夫丘克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么怎么办？我们总共只跑出来一公里……”

“已经有两公里了，”格里勃耶特纠正说。

“两公里又能怎样！对他们来说，这只需要二分钟就够了，没看见卡车吗？”

大家都沉默起来，谁也没有反驳他。克拉娃还是原来那个姿势，疲倦地用两只手撑着地，不停地喘着粗气，看样子她好象就要放声大哭了。他们两个在她身旁站着也不知该怎么办好。格里勃耶特皱着眉头，从自己的棉帽下面望着她。在他的心里某种关切的情感正在消失，这种情感也许是对她的怜悯，也或许是对她所发生的一切的责备。列夫丘克简直要对她发火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是不能停留的，这不是地方，德国人很容易就追上他们。

“好吧，站起来。过了草地，有一片小松林，我们到那儿再休息。”

克拉娃屏住气，使了很大的劲儿，站了起来。

他们慢慢地、时走时停地走完了草地，又过了一条生满菖蒲的小河，这是格里勃耶特扶着她过的。他们爬上一个长着稀疏的小松树的山岗，这时克拉娃又累得倒在干燥的

石南丛上。两个男人也站住了。列夫丘克热了，把他那顶已被汗水湿透的鸭舌帽从头上摘下来。太阳从空中暖人地照射着。看样子，这是个无风的热天。他们得熬过这一天，可是在他们这种情况下，度过这一天就赶上过一辈子了。特别是跟她这样的伙伴在一起。

“事情不妙呵！”列夫丘克说道，全神贯注地看了看格里勃耶特。格里勃耶特穿着按德国样子做的有很多兜和扣的窄肩制服，艰难地喘着粗气，不知所措地站立着。“哪怕什么地方有个妇女，或者家属营什么的也好。可是真倒霉……”

“需要有马和车。没有马怎么能行呢？……”格里勃耶特议论说。

“我们原来有车，也有马。可是叫我们这些糊涂虫轻易地失掉了。这样吧，你去找个村子，或许附近什么地方就有，没有德国人的。”

格里勃耶特没有拖延时间，他关切地看了克拉娃一眼，就悄悄地走下了山岗。

“别耽搁，听见没有？”列夫丘克从他后边喊道。

克拉娃在草地上安静了下来。列夫丘克向四周看了看。松林后面是一片荒地，荒地后面又是连绵的树林，在这附近，任何地方都看不出任何有村庄的迹象。在这静悄悄的早上，鸟儿无忧无虑地在枝头嬉戏。既没有枪声，也听不到人语。列夫丘克一面观察着松林，一面沿着小山岗绕了个半圆形，他听了一下，那里好象也没有人。这时他又回到克

拉娃身边。他在姑娘的身旁坐下来，始终还在注意倾听着林中的各种声响。他想格里勃耶特大概不会很快就回来，于是就把鞋脱掉，把弄湿了的包脚布散扔在草地上。

克拉娃侧身躺着，她那两只饱含着忧虑的大眼睛望着松林。

“我给你们添了麻烦，原谅我吧，列夫丘克。”

“原谅什么。战后再算吧。”

“噢，怎能活到战争结束呢！我活不到了！”

“应该活到。他没有活到，你应该活到，应当努力。”

“难道我没努力吗……”

她突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低沉而伤心。他坐在她身旁，沉默着，伸出两只发红的磨出了老茧的脚掌在晒太阳。他没有安慰她，因为他不会安慰人，而且他认为，她落到这个地步，是怪她自己不好。

6

克拉娃低声抽泣着哭了好久。列夫丘克终于忍耐不住了。

“不要紧，”他说道，口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会有办法的，你稍稍忍耐一下。”

“噢，我是竭力忍着呢，可是……你瞧……”

“主要的是，得找一个村子。可是一个也没有，周围都给烧毁了。”

“要是没有烧毁，那里就一定有德国人，”克拉娃带着痛苦的忧郁心情说道。看得出来，一路上她老是想着这件事。

“当然有德国人，”列夫丘克扫兴地同意说。

他竭力地抑制着自己，从表面上看，他对她好象是无所谓，可是内心里却已经怒不可遏，因为他没有料到事情会变得这样。昨天，在道尔嘎亚·格拉达时，萦绕在他脑际的思想只是敌人的进攻击退了没有？如果还没有，那么应该从哪里突围，怎样突围，哪里能脱险？可是真倒霉，突然负了伤，一切就都给改变了，给他带来了新的任务——运送基赫诺夫和这位克拉娃，要是现在她突然要分娩，那可怎么办？他甚至开始担心起来，生怕这样的事儿马上就会发生，他不时地用斜眼瞧着她。克拉娃躺了一会，大概是已经松了口气，就在棉袄上坐了起来，还是用两只手拄着地。她那双定做的靴子和被草磨破的白袜子都湿了，裙子的下边也湿了。列夫丘克说：

“把靴子脱掉，让它干一干。”

“算啦……”

“脱下来，脱下来！”他想，象她现在这种情况，自己不好脱，于是就站了起来，“好吧，我帮你脱！”

他用左手从她脚上脱掉一只，随后又脱掉另一只。忸怩不安的心情马上就过去了，克拉娃感到舒服了一点，她抬起头来，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

“你的肩膀怎样了？也许得包扎一下吧？”

“没有什么，用不着。”

对于肩上的伤口，他已经忍受惯了。可是他老是感到很后悔，觉得不去卫生所留在连里就好了。可以和大家一起突围冲出去，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了。

“这个基赫诺夫也真是，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看，”他在离克拉娃不远的草地上坐下来说道。

“惊慌了。可是也许……”

“是惊慌了，这是事实。可是，要是他不惊慌，我们怎么办呢？”

“也许，他是为了我们？”克拉娃说道。

“谁知道呢？难道现在能弄清楚吗？人心隔肚皮呀。”

“你知道吗，好人老远就看得出来。”

“算了吧！你以为那些坏人不会伪装，不会装好人吗？就说那个坏蛋吧！他装得多么讨人喜欢……”

“你说的是谁？”

“还是说的那个呗。”

“现在提他干什么！”克拉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事后我们都很聪明。”

“正是这样，事后既聪明又严厉。可是当初是多么慈善。你正凝神地竖起耳朵听，可他却突然在你背后一刀。”

“普拉东诺夫当时就说：可疑。可是没有证据呀。”

“你还等证据？这回可等吧。”

他们沉默了片刻。列夫丘克用一只胳膊肘支着地侧身

仰着，嘴里嚼着一棵小草棍，环视着松林。克拉娃好象在心里克服掉了一种什么东西，小声地开始说：

“当然，关于普拉东诺夫，我们现在可以有不同的议论。可以谴责他，可是当时他的处境又怎样呢？我还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有点可疑，但是怎么弄清楚呢？要想弄清就得时间。”

“应该把两个人都干掉，”列夫丘克不假思索地决定说，“有什么好说的？既然可疑，那就把两个都干掉。这样就没有怀疑了。譬如，在基斯良柯夫那里，有一次从村里跑来一个人，要求加入游击队，可是他的兄弟是个警察。怎么办呢？正象人们常说的，老太婆的卦，双关话：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奸细，于是就把他干掉了。一切都很好。开始时良心有些不安，可是慢慢也就好了。由于这样做了，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不，不能这样，”克拉娃悄悄地说。“在这次战争中你们都变得凶狠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好。普拉东诺夫就不这样。他是讲人道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和他才处得那么好。他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

“说得正对，一点不错！”列夫丘克坐起来，紧接着说道，“好一个人道的！由于他的人道你今天的处境才这么难，而且我们也……”

“那又怎么样，也许将要很糟糕。但是不管怎样，他是个好人。主要的是善良，而善不能变成恶。”

“你说什么？”列夫丘克吃惊地跳起来，挖苦地说。“善

不能变成恶？譬如说，我善良起来了，我很快就把你打发到哪个村子去。打发到我第一个碰到的村子去，你不是希望快点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吗，是这样吧？现在我就把你安置起来。可是第二天德国人就把你抓去了。不，不，我不善良，我折磨你，拖着你，你诅咒我，对不对？可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把你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象个人那样生孩子，并且有人照顾你。”

他象连珠炮一样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大概是太激动了，但是她沉默着，没有回答。可是列夫丘克既不需要她的同意，也不需要她的反驳，他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他参加战争很久了，他懂得，在战争中其它的真理是没有的。什么善良不善良——战争不需要它。也许，在一定的時候，它还是个不坏的玩意儿，甚至是很合时宜的，但不是当你随时都可能被子弹打中的时候。

克拉娃安静下来，陷入了自己并不轻松的沉思里。列夫丘克光着脚踏着多刺的草地向着山岗走去。一片小松林从山岗上向下伸展，他透过松林的树梢望着河滩地。看样子那边既没有大路，也没有村庄，既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到任何有德国人的迹象。大概他们终于安全地藏进了树林的深处。只是再有个什么村子就好了。现在他们急需有个村庄或者有人住的护林人的小屋，现在克拉娃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是不行的。

列夫丘克悄悄地沿着山岗穿过了小松林。他一面谛听着，一面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踏着带刺的草地又回到了克拉

娃跟前。女报务员闭着眼睛侧身躺着，他怀着某种惊奇的心情想起了方才她为普拉东诺夫辩护的情景。他把这个姑娘弄到这么不愉快的地步，自己也死掉了，可是就是死后，对她来说，他仍然很重要。她爱过他，因此，他给她带来的这种极其痛苦的生活，在她看来，就变成了甜蜜的天堂。

他悄悄地在草地上坐下来，把冲锋枪拿得靠近一些。他很想躺下来，舒展一下疲倦的身子，但是他怕一下子睡着了，就没敢躺下。在这林中寂静的早上，他想到他们的处境，想到苦命的基赫诺夫，想到现在正在哪里游荡的格里勃耶特！当然，也不能不想到克拉娃。

关于普拉东诺夫，她可能还是正确的。普拉东诺夫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他对待一切人都是罕见的公正，而且安静得不象一个军人。列夫丘克跟他战前就认识。当时他们一起在布列斯特服役，列夫丘克是通讯班的班长，普拉东诺夫大尉是侦察兵团参谋长的助手。当师团被围和溃散之后，列夫丘克在乡下他父亲的家里，熬过整个一个冬天。等到第二年春天，当他们的中队与乌达尔采夫中队合并的时候，他在那里又遇到了普拉东诺夫。说起来也是怪事：不论是战斗、破坏、还是充满了明显的和隐蔽的危险性的林中生活好象都没有对他的性格发生影响。他依然还是那么沉着、稳健、富有朝气，他对待一切人——不论是上级和下级都一样，他从来也不发火，他的一切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准确无误。但是只有一次和以前不同，他着忙了，没有考虑周到，可是就是这一次疏忽大意就使他丧了命。

一切都是从五月底来游击队的那两个红军战士开始的。

他们是从一个火车站上跑来的。那个火车站上有一大队战俘，他们专管从窄轨铁路上卸木材往德国运。他们俩是游击队在铁道兵营房的联络员卓依卡介绍来的，他们请她给他们联系游击队，于是她就给联系上了。当时游击队里已经有不少从俘虏营里逃出来的人，所以这两个人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奇。引起惊奇、甚至引起惊慌的那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特务科开始找这两个新来的人谈话的时候。

第一个找去谈话的叫谢甫卓夫。这个人高个子，瘦瘦的，是从事力不胜任的工作累瘦的，据他自己说，参军前是凯米洛夫的一个工程师。他说，他想找机会从俘虏营逃出来找游击队，已经等了一年了。现在他很幸福，他的幻想实现了。他请求发给他武器，他要狠狠地打击给他带来这么多苦难和痛苦的那些人。

和游击队里许多人的经历一样，这一切既平凡而又简单。谢甫卓夫没有经过特殊审查，就被编进第二连，送到小河对岸连队的窝棚里去了。

和他那个同伴的谈话，不得不推迟到晚上，因为特务科科长佐诺维奇得到什么地方去一趟，饲马员牵着背好鞍子的马，已经在窑洞旁边等着他。佐诺维奇回来时已经很晚，游击队员们已经吃完晚饭正在准备休息了。他在自己窑洞的旁边遇到了第二个逃出来的人，他叫库德里亚夫采夫。原

来他有要紧事等首长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佐诺维奇略略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把马交给通信员，开开窑洞的门，进屋点上了桌上的小油灯。

库德里亚夫采夫——这个长着两道黑眉毛、脸上带着天真的微笑、外貌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立刻详细地讲述起自己的情况：他怎样在残酷的战斗中失掉了坦克，同志们怎样把他从战火中救出来，甚至还让看看他背上严重的伤痕，就是因为这次负伤他才被俘的。他生在列宁格勒，参军前在一个有名的大工厂里工作。他憎恶德国人，热爱祖国。为了和敌人搏斗，他要参加游击队，虽然他是一名高级的报务员，具有专长，但是叫干什么都可以。他并且秘密地报告说，他的同伴——谢甫卓夫在他们逃出来以前不久，有好几次被叫到法西斯特务头子那里去，他好象是个奸细。可是库德里亚夫采夫也可能弄错，因为特务头子和谢甫卓夫谈话时，当然，他没在场，但是作为一个爱国者和诚实的人，他不能不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游击队的领导。佐诺维奇故作镇静地说，这一切他都清楚，只是他和特务组织的关系，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很快地结束了这次谈话，马上就派值日的去找谢甫卓夫。

谢甫卓夫没有很快就被找来，原来他已经睡觉了。现在听说法西斯特务机关曾经找过他，他还感到很吃惊，也可能是假装吃惊。他否认德国特务机关曾找过他，他发誓说，他没有接受德国人的任何任务，他不是奸细，关于库德里亚夫采夫，他不能说出任何不好的东西。他们一起劳动，睡在

一个营棚里，后来当从高架桥上往下搬运积年的基础梁木时，就找机会一起逃出来了。

佐诺维奇把这一切都向首长做了报告，他们研究之后，命令搜查谢甫卓夫。当天夜里游击队员们就拆开他裤子的贴边，发现里面有一个印花布条，那上面有一些用防水漆写成的数字。这是什么东西？谢甫卓夫解释不清，可是大家都明白，这是德国密码。这些玩意儿游击队员们已经很熟悉。第二天谢甫卓夫就在山谷里被处决了。

库德里亚夫采夫用自己的行动，博得了游击队员们一致的好感。的确，他帮助揭发了德国的奸细，也可以说是挽救了整个支队。不难想象，如果这位谢甫卓夫留在游击队里，那么后果将多么严重。而且这位新来的队员本来就是個非常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他是优秀的射手，会修理手表，此外，手风琴也拉得非常出色。他们有一个风箱破损、键盘下陷、声音走调的很不象样的手风琴。但是就是这个破玩艺儿他也能拉得非常动听，叫你听得出神。一有时间，他就在一连窝棚旁边的那个小树墩上坐下来，轻轻地拉起他的《痛苦》或者《蓝色的小手帕》。小伙子们聚在他的周围，留神地倾听着，并观察他的几个手指如何敏捷地在键盘上跳动。手风琴手也愉快地向大家微笑，暗暗地欣赏着自己的演奏才能。

克拉娃不知不觉地也开始常常到一连这里来。

克拉娃一个人来这里，还有些胆怯和害羞，她站在一棵小白桦树下，离开那些高声叫喊强求她走近的那些小伙子。

对她每次在小桦树旁的出现，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反应，向来都很敏感，只要她一出现，那么他在演奏中就只对她一个人微笑了。克拉娃发现对她的注意，心里有些发慌，但是她还是站在那里听着，轻轻地很有礼貌地拒绝那些放肆的小伙子们的邀请。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也并不特别纠缠她，因为她和参谋长普拉东诺夫的关系，在游击队里大家已经有所风闻。列夫丘克当时也常在那里，或者在那附近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在手风琴手身旁一出现，他就能看见。她的每一个举止音容，都逃不过他的注意。他马上就发现了库德里亚夫采夫对她的好感，这引起了他的警惕。

列夫丘克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否已经爱上了克拉娃，也许只是觉得有点喜欢她罢了，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来，因为他不愿意挡普拉东诺夫的路。在他把她从基辅大队接来的当天，从她和他们参谋长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就看到，他们俩彼此太合适了，他们的关系绝不会只限于一般的关系。于是他让步了，他让步只是为了普拉东诺夫一个人，对世界上任何另外一个人他都不能这样做，甚至就是相貌美丽、会弹钢琴，而不是玩这个破手风琴的天使也不行。列夫丘克怀着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力量和热诚，悄悄地但也是顽强地憎恨他们这位新来的并为大家所喜欢的人。有一次，他甚至决定要和普拉东诺夫谈谈这个人，而且在小道上遇见时，已经把他拦住了，但是参谋长却被别人叫进司令部的窑洞里。列夫丘克等了一会儿，就走开干自己的事儿去了。这次谈话没有实现。后来他感到非常后悔。谁知道呢，也

许他本来可以防止一次巨大的不幸。可是这不幸不久却在支队里发生了。

有一次，克拉娃的电台出了毛病。她没有找到自己的“北方”，失掉了早晨的联系。当时列士切夫已经不在队里，调到捷斯留克小组去了，这时司令部里人们就想起库德里亚夫采夫。他也很愿意帮忙，他这儿拧拧，那儿弄弄，电台果然就好使了。但是不能持久，还需要换个齿轮。可是在树林里到哪儿去弄齿轮呢？库德里亚夫采夫想了想说，他在车站有个朋友，在那里或许能弄到，不过这个人除了他之外，谁也不相信。普拉东诺夫想了想，又和克拉娃商量了一下，决定冒一下险，派库德里亚夫采夫去一趟，但不是叫他一个人去，而是去一个小组，让列夫丘克当组长。列夫丘克到这个车站已经去过好多次，他在那里已经有了些熟人。他并没把这次任务看得怎样了不起。许多比这更艰巨得多的任务他都担任过，而且都没发生差错，他认为这一次也一定能完成。

列夫丘克应该星期天出发到车站去。可是星期六，他带着三名侦察员从克列斯卓夫回来，在路上顺便弯到一个庄子一个朋友家里。主人很好客，慷慨地款待了他们。他回到队里，向指挥员报告了任务完成的情况。这时指挥员立刻吩咐把他送到警卫室旁边的地窖去，那是游击队的禁闭室。列夫丘克一听就火了，对首长说了不少粗野难听的话，于是他不得不交出冲锋枪，在司令部传令兵的押送下进了地窖。他怒气冲冲地先把棉袄扔进去，自己跟着也跳了进

去。他立刻就躺下睡了起来，他想，明天一早就会放他出来。

但是不论是早晨和傍晚，都没有放他出来，他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二。这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已经在队里传开，说参谋长普拉东诺夫在车站上中了埋伏牺牲了。

听到这个消息，列夫丘克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不顾卫兵的阻止，从地窖里冲出来直向参谋部的窑洞奔去。克拉娃在窑洞旁边的草地上抖成一团，哭得死去活来。支队的司令正在大发雷霆。其他的首长们都沉痛地叹息着，低着头走来走去。

正象列夫丘克所预感到的，对参谋长的意外的牺牲，他也有很大的责任。普拉东诺夫是替他指挥这个小组，星期天晚上带着三名游击队员与库德里亚夫采夫一起到车站上去的。其中两名现在正坐在这里向司令员讲述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们被库德里亚夫采夫出卖了。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任何可疑的情况。他们趁着傍晚时分的昏暗，走进车站附近的菜园子，藏在一块大麻地里，这块大麻一夏天已经长得很密。过了一会儿，天就完全黑下来，库德里亚夫采夫顺着一条小胡同去找他那个朋友，其他的人在大麻地等着。已经等了很久，他们想是不是库德里亚夫采夫出了什么事情。普拉东诺夫等得不耐烦了，就从黑暗的大麻地钻出来，想看看附近的情况。还没等大尉走到篱笆跟前，就听见他压低嗓子喊了一声，这时不远

的地方就响起了枪声。小伙子们从大麻地向菜园的另一方向奔跑，在那里也碰上了警察，警察们正用冲锋枪顺着堖沟向他们射击。他们知道是中了埋伏，于是就分散开向四面跑去。正跑的时候，就听到了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声音，他正在向警察们喊：“抓住、抓住那个，那个戴库班帽的！”

他们里面戴库班帽的是普拉东诺夫。

后来才知道，参谋长的胸部被子弹穿透，等弄到警察局去审讯时，他已经不省人事，很快就牺牲了。在这次事件以后，库德里亚夫采夫就从车站上消失了。大概他的主子又把他抛到别的地方去了，那里的人们同样也会欣赏他那出色的演奏手风琴的才能。

克拉娃非常难过，悲痛欲绝。列夫丘克气得咬牙切齿。几天以后，他就离开侦察排给调到三连当机枪手去了。

7

格里勃耶特过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

列夫丘克挪到荫凉底下，天已经热起来了，包脚布被太阳一晒，硬得象白铁片一样，靴子也晒焦了，他好不容易才把它穿到脚上。克拉娃不知怎的还感到冷，浑身直打哆嗦。列夫丘克把棉袄给她盖上，劝她安静一会儿，睡一觉。他以为睡着了就不会发作了。他自己也困得直打盹，但是他不能

睡。为了驱走睡意，他决定做点事儿：把冲锋枪的弹盘取出来，把盖卸下来。弹盘不满了，他数了数，只剩下四十三粒子弹，可装四满梭子。他又把弹盘装好，接上断了的皮带。这时他开始频频远望，焦急地等待着格里勃耶特。他在他走的那个方向等着他，可是他却穿过松树丛从后面回来了。他回来以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抖掉沾在毛茸茸的皮帽子上的针叶。

“喂，怎么样？”从车夫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明确的表情，列夫丘克就忍耐不住了。

格里勃耶特走到跟前，一声不响地把步枪放到草地上，自己也疲倦地坐下来。他从头上摘下皮帽，露出了汗湿的、没有晒黑的、布满皱纹的前额。看样子，他还是上一周刮的脸，脸上已经覆上一层很厚的密密麻麻的胡茬子。

“怎么说好呢？村子那边倒是有一个。可是给烧毁了。”

“烧毁了的有什么用！”列夫丘克失望地说，“我们需要有人的村子。”

“是的，被烧毁了，”格里勃耶特继续说道，并没有注意列夫丘克的不满，“但打谷场还是完好的。在村子边上。我以为是空的，一看——有一个女人在那里走动，在打谷场旁边。”

“女人？”

“是啊，一个女人。”

“和她说话了没有？”

“没说。我一看见，就回来啦，我着忙呵！”

“好啊！”列夫丘克紧接着说，“咱们走。克拉娃，站起来。很远吗？”

“不太远，小松林后面有一条沟，是一条小河。再过去是一片幼林的残址……打谷场就在那儿，”格里勃耶特开始回忆道。

“有多远？二公里，三公里？”

“嗯，可能有二公里，或者三公里。”

“走！”

克拉娃使使劲儿站了起来，摇晃了几下，好不容易才站稳，随后，格里勃耶特也吃力地站了起来。他也显得很疲倦，大概也应该先休息一下。但是列夫丘克急于要找到人，以便摆脱林中这种前途未卜的状态。他一直为克拉娃担心，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担心越来越增强了。

为了不让女报务员落后，他们慢慢地走着。他们从长着松林的山岗上走下来，绕过一道山谷，不一会儿就到一条林间小道上。在走上这条小道之前，列夫丘克左边瞧瞧，右边看看，又细心地察看了小道上的各种痕迹。可是一切痕迹都是旧的。车辙被雨水冲洗过了。马蹄印和车轮子印也不新了，看来，这条路很久没有车马经过了。尽管如此，列夫丘克还是把肩上挎着的冲锋枪移动一下，枪口朝前，端了起来。他就这样地向前走着，每到道路拐弯时都注意观察。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你瞅什么，”格里勃耶特看见列夫丘克那种小心翼翼的神色，这样说道，“我来过了……”

“瞧你，多么勇敢，来过了！”列夫丘克反唇相讥地说道，

“要是德国人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看来，命该如此。你往哪儿躲呢……”

“你要知道……你可以这样想。可是我们还想活。对吧，克拉娃？”

克拉娃一瘸一拐地在后面跟着，没有搭腔，看得出来，现在她没有闲心开玩笑。她咬着焦干的嘴唇，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列夫丘克关切地皱紧了眉头，心想：快点走到格里勃耶特发现的那个打谷场吧，不然她又要在树林中分娩，那可怎么办呢？格里勃耶特关于自己命运的谈话，列夫丘克很不喜欢。他本来就反对任何的顺从，特别是在战争中。可是对于这位没有怎样被生活娇惯过、可是却被战争完全毁了的车夫，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你知道吗，我呀，本来就不太想活着了，也可以说完全不想活着了。”格里勃耶特用两只赤脚登着淤实的沙土说道，“什么人都没有了，老婆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战争结束时我怎么办？谁还需要我？”

“你真是个怪人！”列夫丘克说道，“战争一结束，你就受人尊敬了，瞧，你不已经是个很有功的人了吗！是从第一个春天参加游击队的吧？”

“是呵，是从第一个春天。”

“得一枚勋章，你就是重要人物了。当然，为了获得勋章，不能老赶车。”

“哎，我要勋章有啥用！我要我的沃洛琪卡，我宁肯把

所有的人——姑娘、老婆都豁出去，只要给我留下一个沃洛琪卡就行……”

“沃洛琪卡怎的了，被打死啦？”列夫丘克问道，感到事情有点蹊跷。

“是呵，可以说，就是死在我的手上啊。一颗爆炸枪弹打在腰上。肠子都流出来了。这么细呀，就象小鸟的肠子。往里收呀，收呀，可是有什么用呢，是颗炸子啊！”

“是啊，这真糟糕，”列夫丘克同情地说，“没有比这再糟糕的了。”

在这次战争中倒霉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格里勃耶特的命运尤其不幸，很难说是由于什么原因，或者是完全由盲目的偶然性所决定，不过这个老头的不幸遭遇，真是叫人目不忍睹。关于这个人的不幸，列夫丘克在游击队里早就听说过。他认为，他的不幸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善良。

格里勃耶特和家人当时住在一个叫做维谢尔基的村子里，这村子远离大路，靠近密林。他的家住得更远，在村子外面，几乎就在树林的边上。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夏天，当战线悄悄越过这里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察觉。农民们既没有发现我军的撤退，也没有看见德国人的来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从事他们战前千百年来所从事的工作。这一天人们在起马铃薯。卡里斯特拉特·格里勃耶特和他的妻子、年迈的老母也在起马铃薯。大一点的孩子们——卡利娅和沃洛琪卡在帮助他们。舒拉和最小的玛涅奇卡围在小道上火堆旁边，在烧马铃薯。马铃薯剩下不多了，格里勃

耶特正在忙着挖。他一直腰，突然看见在赤杨树丛旁边，有一个人正在悄悄地向他招手，叫他过去。

格里勃耶特把一颗马铃薯扔到篮子里，回过头来看一下。他的妻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用两只手扒拉土，周围的情况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就迈开大步，越过垅沟，向着林边走去。

一个陌生人躲在一棵小松树后面，正在等候他。这个人满脸胡须，但年龄并不大，穿一身呢子军服，手里拿着德国冲锋枪。他向格里勃耶特打听，村里有没有德国人或警察，并请他帮帮忙：他的同志们在沼泽地后面，离这儿不远，其中有两个人负伤了，自己不能走路。此外他们需要找个地方，暂时隐藏一下。格里勃耶特全清楚了，他二话没说，急忙回到地里，套上车顺着小道，就向赤杨树丛赶去。那个手里拿德国冲锋枪的人也在这里坐上了车。

他们走了不远，那个军人就指着密林里大路旁边的一个地方告诉他，说他的同志们就在那里。他们一共三个人：两名自己不能走路的重伤员和一个名叫维尼亚的、翘鼻子、两颊上长着茸毛的年轻战士。他们把伤员抬到车上，等到天一黑，就来到格里勃耶特家里。

两名伤员——坦克兵上校和一名政委，在他家里躺了三个星期。妇女们尽可能地照顾他们。有一天，格里勃耶特从镇上请来一个医士，他跟这个人认识，又给了他不少钱。医士给留了一些治伤的药。药还挺好使，伤口愈合得不错，虽然并不象伤员们所期望的那样快。那两个健康的

同志——捷列霍夫和维尼亚常常离开格里勃耶特的家，一连几天不回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主人，但是他知道——他们是在寻找游击队。

一切还算顺利。上校渐渐地能起床，能在屋子里走动了，政委还刚刚能在床上坐起来，这时维谢尔基村突然来了警察。

诚然，格里勃耶特及时地看到了危险，急忙把两个伤员藏到炉子后面，用些破烂东西盖在上面，两个警察进屋后没有发现。格里勃耶特为了叫警察高兴，塞给他们一瓶自酿的白酒，他老婆又从木箱里取来一块腌猪油，两个警察就心满意足地找地方喝酒去了。但是喝完之后，又继续搜查，临回镇时还带走三名在村子里搜出来的陌生人，他们的主人们也给带走了。傍晚，捷列霍夫和维尼亚回来了，他们大家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最近就转移到树林里去。

他们在格里勃耶特家的院子旁边赤杨树丛的后面，挖了一个窑洞，用苔藓和松树枝仔细地遮盖了，伪装得很好，在十步之外你就想不到这里会有窑洞。窑洞里安了一个用白铁皮做的小炉子，烧得很暖和。十月革命节前的一天夜里，就把伤员们送到这里来了。当然，长时间呆在这里不出来是不可能的，吃穿的问题需要张罗。他们夜里常常到格里勃耶特家里来探望，他自己也时常到窑洞去。落雪之前，一切还都顺利。但是初雪之后，地上就有脚印了，越往后脚印就越多。在格里勃耶特的家和赤杨树丛之间甚至出现了一条小路。不管格里勃耶特怎样伪装这些痕迹，有些蛛丝

马迹到底还是被坏人发现了。并且报告了德国人。

也许是偶然性，或者按格里勃耶特自己的说法，是命运救了他。但是其他的人就不那么走运了。

在新年之前不久，木柴烧没了。现在烧柴要费一倍，因为窑洞里生炉子的时间长，还得常常生。就是这么烧还感到冷呢，特别是伤员。但是附近已经没有好木柴了。农民们要出去十几公里到大密林里去弄柴禾。一天早上天刚亮，格里勃耶特就叫醒沃洛琪卡，套上小母马，坐上爬犁到一个熟悉的采林区去拉柴禾。准备运往顿巴斯的坑木已经在那里堆了好几年了，还没运走。采林区很远，但是格里勃耶特打算入夜之前赶回来，一直拉到窑洞去。而且从早上起就下小雪，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更安全。

但是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当他们乘着满载的爬犁从一条弯曲的小河上驰过时，爬犁的两根台柱折断了，坑木的前端栽进雪里。不管小母马怎样使劲儿，还是拉不出来。他们不得不把木头卸下来，分三次从山谷里拉出来。这就耽误了时间。等回到维谢尔基的时候快到半夜了。格里勃耶特和小母马并排走着，沃洛琪卡累了，坐在木头上。他早晨觉没睡够，现在已经开始打瞌睡了。父亲老是回头看，深怕他睡着了从爬犁上掉下去。

距离窑洞只剩下两公里左右了，可是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枪声不多：步枪响了几声，冲锋枪哒哒了几下，马上又沉默了。好象还听到有人的叫喊声，也许是他们的错觉，过

后一切又重新恢复了平静。这些不祥的预兆弄得格里勃耶特有些心惊，他赶着爬犁离开大路，走到松林跟前，把缰绳交给沃洛琪卡，自己穿过树林直接向窑洞奔去。

还没等跑到窑洞跟前，他就明白了：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窑洞的门从自制的合页上掉下来。草垫子、长凳、及窑洞里其他破烂东西，都乱扔在雪地上。周围的雪地上踏满了生人的足迹。方才的枪声大概就是发生在这里。格里勃耶特从地上拾起几只弹壳，是刚刚用过的，还发散着一股火药味。

格里勃耶特踏着雪地撒腿就往家跑，他的家隔着一条小河，离这儿不远。他很快就听见，警察们正在那里发号施令。传来了警察官的高亢的嗓音和妇女们的哭叫声。正象后来所了解的，当时他们正在捣毁他的家，抓走他家里的人，并把东西装上爬犁。

格里勃耶特在灌木林边站了一会儿，突然看见有三辆雪橇正向通往镇上的大路驰去。他本想走进自己被洗劫一空的房舍，但是看见房门四敞大开的情景，就在那棵柳树后面藏了起来。他已经明白，一切全完了，现在只剩下他和沃洛琪卡两人了。院子里还可能有埋伏，因此他在柳树后面站了一会儿，就转回来拖着沉重的步子，慢吞吞地向着灌木林里走去。

他回到惊愕的沃洛琪卡跟前，说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扔掉柴禾，赶着爬犁向着密林的最深处走去。他们在一棵松树下面，搭了一个小窝棚，在那里挨了两天两夜

的冻，来时随身带来的面包，也都吃光。他们开始挨饿了。又过了两天，饥饿和对家人的忧虑，又驱使格里勃耶特重新来到维谢尔基。这次那里没有埋伏。他在寒冷的、静得异常的房舍里转了一圈儿，找到几件衣服、一只水桶，在地窖里弄到一点马铃薯。其他的東西什么都没有了，全被警察拉走了。就是这些可怜的财产和这点马铃薯，暂时救了他俩的命，使他们在密林里没有死于饥饿或严寒。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在这里挖了一个很小的窑洞，又做了一个小炉子，炉子虽然很冒烟，但也暖和一点儿。

就这样，父子二人决定等到第二年春天。要不是他们那匹怀驹的小母马，他们本来也能够活到那个时候。马要吃东西，但是数九寒冬在森林里哪儿也弄不到干草，干草在村子里。格里勃耶特可怜这个牲口，就回去了两趟。一切都很顺利，谁也没有碰到他，而且也不可能发现他的踪迹，因为他都是选择在大风雪的时候去的，路上留不下脚印。

有一次，沃洛琪卡非要和他一起去拉干草。森林中的孤独生活，使这孩子感到寂寞，他既不说，也不笑，每天总是闷闷不乐。看得出来，他在想念母亲和姐妹。开始时格里勃耶特没有太注意这些，可是后来他甚至担心起来，生怕这孩子精神上会发生什么不正常，落在孩子头上的灾难，和他的年龄太不相称了。所以，当儿子开始向他请求，要和他一起进行这次不远的夜间旅行时，他勉强地同意了。

不管怎样，他还是很不愿意带他去，心里好象有种不幸的预感，可是他压抑不住对自己最后这个孩子的怜悯心，因

此当孩子爬犁前面坐下来时，他没有把他赶下去。

是一个有风的漆黑的夜。大风从雪地上掠过，松林发出骇人的喧响。一路上小母马几乎老是转动着头，回避着风，一步一步地走着。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走出密林，拐到了刚能认得出来的去维谢尔基的大路上。他的家已经不远了，格里勃耶特透过昏暗的风雪，焦急地凝视着前方，想竭力看出什么东西。他怀着一个侥幸人的心理，想：窗子上突然又出现熟悉的灯光，在这里他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警察可能把她们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拘留她们呢？在德国人的政权面前她们有什么过错呢？

但是格里勃耶特是注定见不到自己任何一个亲人了。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在警察审讯时早被折磨死了，几个孩子也不知给送到哪里去了，他那年迈的母亲忍受不了折磨，已无声无息地死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三个警察埋伏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在已经是第三天。

这时格里勃耶特正驱赶着小母马，越来越走近他们自己的灾难。在昏暗中已经能够看出：大门旁边那棵弯曲的柳树、井上的吸水吊杆，以及被别人的马弄坏了的小棚子的板墙。这时小母马不知为什么站住不走了，它昂起头，轻轻地、惊恐地打起响鼻来。小母马这种嗅觉灵敏的习性，纯粹象一条狗，而不象一匹马，格里勃耶特很了解它这个习惯，于是就扯紧了缰绳。他竭力地向黑暗的院子里凝视，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还是感觉到，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沃洛琪卡也非常害怕，他坐在雪橇上悄声地央求说：“爸爸，别

进去！别进去，爸爸！”

格里勃耶特急忙往回拐。

但是还没等小母马从路旁的积雪中挣扎出来，把雪橇的辕木转到大路上，从院子里就传来了凶狠的吆喝声：“站住！”格里勃耶特狠狠地在马身上抽了一鞭子。就在这同时，响了一枪。沃洛琪卡用陌生的、变了调的声音说了一句什么，立刻就倒在了雪橇上，但是格里勃耶特正跪在雪橇上竭力地抽打母马，没有注意他。马好象也感觉到了人间的不幸，往前一冲，就拼命地奔跑起来。他们冒着后面的密集的射击，刹那间，就越过了这段没有遮掩的路面，钻进树林里。一直等到钻进密林的深处以后，格里勃耶特才停住雪橇，抓住了沃洛琪卡的肩膀。

沃洛琪卡侧身躺着，用两只手抓住上衣的底襟捂着肚子。父亲扳开他那两只忙乱的抽搐的手，掀开衣襟一看，大吃一惊。沃洛琪卡的小肠子，在他的手下奇怪地冒着泡儿，象活物似的从流血的伤口里钻出来。这孩子一边悄悄地凄厉地哭着，一边惊慌地把肠子收到染满了鲜血的衬衫里。他由于疼痛和这无可挽救的灾难而哭泣。

往窑洞里抱时沃洛琪卡还活着。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些什么，他招呼妈妈，后来就安静了，一直躺到早晨，一句话也没说，只有脚或者手有时轻轻地抽动几下。

在黎明的时候，他死去了。

8

他们沿着一条林间小道，穿过松林的一角，绕过长满了幼松的旧伐区，向左拐去。一刻钟以后，格里勃耶特把他们领到一片丘陵形黑麦地的地边上。几条耕得很浅、很不经心的田间小路把整个麦田分割成几个长条，在这几块地上，稀疏的黑麦快要成熟了。在枯萎的黑麦茎中间，闪耀着一些繁茂的蓝色的矢车菊和白色的甘菊。格里勃耶特选择一条较宽的田间小道拐去。他们蹚着小道上的硬草地，跟在他的后面。

“村子就在这儿，”车夫说道。

列夫丘克以为一定会有什么建筑，或者至少得有带烟筒的干草屋顶，这是一般临近村庄的特征，但是在这里他却什么也没有看到。离得稍远一点儿，在黑麦地的后面，长着几棵高大的树，只有它们还可以使人想到，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过村庄。现在村庄没有了。他们走到跟前，透过长满了杂草的篱笆，看到了熏黑的壁炉残址和小棚四角上的木桩。这些木桩没有烧尽，但许多地方已被烧糊。一些圆木在荒芜的院子里滚得到处都是。许多房子只剩下了房基的石头。靠近火灾场的树木都已干枯，树枝上没有叶子，光秃秃地立在那里。井台旁边那棵高大的椴树，一半还是绿油

油的，可是另一半已经烧焦，把它那黑色的枝子，奇怪地伸向空中。在已被踏平、没有小畦的菜园里，到处是砸坏的木桶、家庭用具、木棍和烤干了的灰色的破布。村庄大概是在春天种地以前烧毁的。秋播作物长在那里，已经变成没有主人的东西，可是哪里也看不见春播作物。菜园旁边的田地都荒芜了，长满了灰菜和苦苣。

“你这是往哪儿领我们？”列夫丘克站住了，“哪里有人？”

“快走，快走，这边来！”

格里勃耶特催促他们匆匆忙忙地沿着村边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在灌木林旁边穿过一道不深的峡谷，从这里出来马上就看见，在山岗上赤杨树丛旁边，有一幢有两所房子的打谷场。

“你瞧，看见了没有？那个女人就在那里采什么东西来，是采集药材或者别的东西。”

“好啦，静一下。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列夫丘克推开车夫就快步向打谷场走去。

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路，从赤杨树丛里伸出来。这条小路春天时大概很泞，而现在却已干涸，在快到打谷场的时候，就朝以前村庄那个方向拐去。小路上没有新鲜脚印，但是列夫丘克却很不放心，他向四周环顾了一番，才从它上边走过去。打谷场包括两所房子。靠近道边是个小棚，小棚里边的一侧还残存着去年的麦秸。再过去就是脱粒场，这是一所墙壁倾斜、屋顶露天的老房子，房子的梁木象肋骨一

样露在外面。列夫丘克老远地绕过墙角上的一堆石头和墙壁跟前茂密的马林丛来到了有门的这一面。门掩着，附近一个人也没有。麦地边上长着一棵小野苹果树，一只很大的老乌鸦落在树梢上，正轻轻地上下摆动。它转过头来，警惕地望着列夫丘克。他向乌鸦挥了挥手，但是它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直到列夫丘克把冲锋枪从肩上摘下来，它才懒洋洋地挥动着翅膀，很不情愿地向着村庄那个方向飞去。

列夫丘克在哪儿也没看见一个人，就把门轻轻地推开一道缝。脱粒场里很暗，有一股烂草和尘土的气味。两只燕子吱吱地小声叫着从他头上飞过。大概这里有燕子的窝。列夫丘克一下子把门推开，就跨了进去。

不，格里勃耶特说有位妇女，看来并没错，这里的确有人住。

墙根底下，在一捆已经压实的麦秸上，铺着一块旧粗布，地上乱扔着一些破烂东西。这里还立着一个盛水的小木桶。墙上挂着一件羊皮袄。屋地是土的，打扫得很干净，屋门旁边，整齐地放着一双割掉了靴筒的皮靴。阳光从黑暗墙壁柱子中间无数的缝隙里射进来。门左边还有一道很矮的小门，大概是通干燥室的，那里还有一个用木棍钉成的小梯子，斜着戳在墙上。

列夫丘克等了一会儿，听了听，就小声地喊道：“喂，有活人没有？”

没有人回答，大概脱粒场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既然有人住，早晚就一定会有人来，列夫丘克心里这样想，就从

屋里走了出来。格里勃耶特和克拉娃正从树丛里紧张地望着他。

“这边来！”他用那只好胳膊招了招手。

他们来到时，他给他们敞开门：“请进！”克拉娃用手抓住门，跌跌撞撞地第一个走了进来。她用胆怯的目光环顾一下他们这所光线暗淡的栖身之地，看见地上铺着的那块旧粗布，就立刻无力地在那上面坐了下来。

“这回可哪儿也不去了，”列夫丘克说道，“但是女主人在哪儿呢？”

格里勃耶特没有进屋，他围着院里长满马林丛和荨麻的各个角落，转了一圈儿，他站了一会儿，听了听。但是，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当清新的晨风阵阵吹来时，不远处那棵苹果树才发出喧响，田野里的黑麦也摇晃着沙沙作响。

这时列夫丘克检查完了屋里的每个角落，登上梯子，向干燥室的顶间上瞥了一眼。他想，这里的人也可能藏在什么地方了。但是顶间上也没有人，有的只是一层浮土、人脚没有触动过的破烂和燕子的粪。小燕从横梁底下灰色的小窝里，探出头来好奇地向外张望，惊恐地吱吱地尖叫。列夫丘克从梯子上下来，敞开了底下的矮门。干燥室中靠近炉子的地方是一个狭窄的墙壁熏黑的角落，里边很暗。一只张满了蛛网的小窗子，透过来一点儿光线，照射在熏黑的石砌的烤炉上，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发霉的使人感到气闷的发臭的烟味。

“好吧，没什么，我们等一等，你怎么样，还能忍耐一会儿吗？”列夫丘克转向克拉娃问道，但是她没回答，“要是现在吃点什么呗……”

吃点什么东西可不错，但是他们甚至连一片面包都没有。关于吃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列夫丘克来到院子里，从外面环顾一下脱粒场，细心地察看了一下不远处那片赤杨树丛。但是看样子，主人们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沿着黑麦地边慢慢地走去。他过了一条大路，站了一会儿，确信周围都很安静，这时他从尽边上向赤杨树丛后面看了看。

有一片很大的林间空地或者地边展现在那里，再过去是一片黑黝黝的松林。大麦地旁边那条子马铃薯地吸引了列夫丘克的注意。马铃薯的秧很高。边上几垅的垅沟里堆着枯萎了的马铃薯秧。这说明已经有人开始起马铃薯了。他想可以挖点马铃薯煮煮吃，于是就赶紧往回走，去找水桶或者篮子。

“喂，老头儿！给个家伙，有马铃薯！”他对着脱粒场敞开着的门嚷道。

但是格里勃耶特没有回答，他继续一声不响地在克拉娃的身边蹲着。克拉娃盖着一块粗布，这时，正在麦秸上神色痛苦、弯腰伸背地折腾呢。真的要生啦？一想到这儿，列夫丘克的心里就凉了半截。他悄悄地跨过了门槛，但格里勃耶特听见他进来，就向他摆了摆手，他又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列夫丘克想，可怜的克拉娃，看来这一天到底来到

了，不管哪里连一个女人都找不到，在这种事情上他帮不了她的忙呵。恐怕只有靠格里勃耶特了。

列夫丘克在门旁站了一会儿，以为格里勃耶特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是他沉默着没说话。这时列夫丘克想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温点水，也就是说应当生一堆火。他跑去找柴禾，在小棚跟前找到几根干树枝，用脚把它们折断，虽然用左手不太得劲儿，可是院子里的火堆也马上生了起来。困难的是没有盛水的家伙。他找了找，发现在马林丛里有一个被人扔掉的带窟窿的小铁锅。他用木片把锅底上的窟窿塞上，就拿它到小河里去打水。在这个时间里，他一直注意倾听脱粒场里的动静，虽然他什么也没听见，但他仍然没有到那里去。他在篝火旁边张罗起来，这天有风，火很旺，小锅里的水渐渐地热了起来。

“挺好，挺好，”格里勃耶特从脱粒场里跑出来说，“你真机灵！”

“里边怎么样？”列夫丘克问。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你……明白点不？”

“怎么说呢，多多少少……”格里勃耶特支吾地回答说。立在墙边的耙上晾着一块抹布，他拿起抹布又消失在脱粒场中。

列夫丘克心想，还好，有格里勃耶特帮忙，也许还能对付，要是只剩他一个人，那就糟了，他能给她帮什么忙呢！现在他不知道里面怎样了，但他越来越放心不下，开始不安

起来——万一突然有个什么情况？

但是看来一切都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生的那样。不一会儿，格里勃耶特又从脱粒场里跑出来，用弄脏了的上衣底襟慌忙地把篝火上的小锅拎走了。

“怎么，已经生啦？”

“生啦，生啦……”

列夫丘克有些惊讶：他以为得先听到婴儿的哭声，或者至少是母亲的呻吟，可是现在既没有哭声，也没有呻吟，但是这个老接生婆却说已经生了。

“马上，马上，”大概是为了让他听见，格里勃耶特把嗓门特意提高了一些，在脱粒场里说道，“马上！”

列夫丘克在门外站着，象父亲一样激动，孩子的父亲现在已经不可能体验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个责任现在落到他的战友们的身上了。在列夫丘克对待克拉娃的态度中，现在有许多东西是取决于他和普拉东诺夫的关系。总之，列夫丘克的这种责任感，与其说是为克拉娃本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已故的参谋长。

“生个什么？”列夫丘克着急地问，“小子还是姑娘？”

“是个男子！”格里勃耶特用一种陌生的、变得善良起来的声调说道，“是个好孩子。进来吧……”

列夫丘克怀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对他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好奇心跨进了脱粒场，看见格里勃耶特手上正抱着一个用降落伞的绸子包的小包。克拉娃在昏暗中，躺在别人家用麦秸铺成的床铺上，用被折磨得可怕的目光望着他们。

“噢，你瞧，这简直就是普拉东诺夫，对不对？”

皱皱巴巴的小脸，紧紧闭着的小眼睛，看起来只能说是个有生命的活物，如此而已。但是为了鼓励母亲，也叫这位接生婆高兴，列夫丘克同意了他的说法：

“当然，当然……”

“我们又是三个男子汉了，”格里勃耶特用平常的、关切的声调说，“可是咱们吃什么呢？”

直到此刻为止，列夫丘克一直觉得，他在这里几乎是多余的，可是现在他突然醒悟过来，看到了自己的新的责任。他拿起小锅，从脱粒场跑了出去。他穿过茂密的赤杨树丛来到马铃薯地里，急急忙忙地用左手开始拔马铃薯秧，鸽蛋一般大小的马铃薯从地里带了出来。现在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新的、他还没有体验过的、或者也许是已经忘却了的参与人类永恒生活的感觉，在战争中这种生活是没有地位的。他对克拉娃的态度也起了明显的变化，他对她不再那么漫不经心和吹毛求疵，而是尊敬她，并且觉得她简直就是自己的亲人了。对他来说，现在她已经不是从前他接到游击队来的那个风流的克拉夫卡^①，也不是和他们那位尽管是受人尊敬的首长弄出了孩子的游击队的丫头，而首先是一个年轻的妇女和母亲了，照顾她是他们应尽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此外，他也非常清楚，在这森林中，突然当起母亲来将是多么艰难，因此，他竭力想减轻游击生活为她所准备的一切不

① 克拉娃的卑称。

幸，哪怕是暂时减轻一下也好。不管是多么令人惊奇，可是正是现在，通过克拉娃，他多年来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个游击队的战士，不是一名侦察兵或机枪手，而首先是一个人，对他来说，这种感觉是新鲜的，也是非常愉快的。这样，战争也就好象不存在了一样。

他把冲锋枪背到背后，开始弄起马铃薯来：在冰凉的河水里把它洗干净，小锅里添上水，重新把火吹旺，把小锅架在篝火上。

“我还有点盐，”格里勃耶特从脱粒场出来，看到篝火上煮马铃薯的小锅说道。

“真的呀，说不定你还有面包吧？”列夫丘克接上说。

“不，没有面包，盐可有点。”

车夫在篝火旁边跪下来，从制服上衣的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把它打开，然后又打开一个小纸包，用两个指头捏了一小撮盐。

“多拿点，怎么捏这么一点儿！”列夫丘克说。

格里勃耶特稍稍多取了一点儿，但是想了想，又放回去一些，用三个指头捏着撒到了锅里。

“应该俭省点，以后到哪儿去弄呢……”

“算啦，克拉夫卡那里怎样？”列夫丘克问。

“睡啦，叫她睡一会儿吧，她现在需要睡觉。”

“小孩呢？”

“小孩也睡啦，吸了吸奶头就睡了，他还有啥事儿……”

“那好，在这儿坐会儿吧。”

“不，我到阴凉地方去，这儿热，我脑袋怕晒。”

的确，太阳升得越来越高，打谷场里热了起来。甚至叫人不能相信，不久之前他们还冻得难受呢。但是冷热算个啥，主要的是他们摆脱了德国人，来到了树林的深处。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既没有游击队，没有农民，也没有德国人。在小锅里煮着新鲜的马铃薯，这对于饥饿的人们，不管怎样还预告着一顿饱餐。最大的灾难总算已经过去，要不是死了基赫诺夫，列夫丘克对自己今天的命运也许还感到相当满意呢。

当然，使他有些担忧的是这个住户的主人不在，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很需要主人，特别是女主人，因为他们今后可以照顾克拉娃。而且，列夫丘克也需要向他们打听一些事情，或许还能向他们弄到一辆大车呢，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车已经失掉了。不过这些都是一般性的事情，还可以留到以后再说，主要的是——克拉娃的分娩，似乎是已经顺利地过来了，其他的事情也许同样能够得到解决。

马铃薯开锅了。为了不煮过火，列夫丘克老用冲锋枪的枪条试验。现在还扎不动，还得烧火，他把附近能弄到的柴禾：朽烂的木棍、板子，折断了的很细的篱笆杆子都放到火堆上。格里勃耶特面带倦容，在墙边的耙上坐着，若有所思地望着篝火。

“喂，为什么不高兴，老头？”列夫丘克看了他一眼，“不是一切都很好吗！”

“好是好，但不是一切都好，”格里勃耶特叹了一口气

说。

“那么，什么不好？基赫诺夫吗？”

“就说基赫诺夫吧，还很年轻，为什么不想活了呢？”

“都想活，但不是都能办到。”

“我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小孩……”

列夫丘克想，小孩生的不是时候，甚至是很不是时候。哪怕再早一个星期也好，当时还没被围。的确，现在她多么困难，一个人带着小孩留在陌生人中间，而且在这破了产的、毁灭性的地带，这些陌生人还不知到哪里去找呢。

“看来，还得到哪儿去找找，”列夫丘克说道，“不然鬼才知道，能不能有人来。”

格里勃耶特一声不响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篝火。列夫丘克饿得肚子直响，用那只好胳膊挥了一下说：

“好吧，咱们先吃马铃薯，其他的事到时候再说……”

9

列夫丘克在院子里足足坐了有两个来小时，只多不少。太阳沉到邻居家屋脊的后面去了。整个院落湮没在一大片扩散开的阴影里。他在这个长凳上坐着，谁也没来打扰他。整个院落过着它自己的习惯的生活：孩子们在做着孩子们的游戏，成年人从事一些假日要做的家务；在离门口稍远一

点的地方，有人在敲打擦脚的长条粗地毯，有人在清扫道路，一个年青的男子在篱笆跟前，敲打着一块沉甸甸的花地毯，他那有力的敲打引起了远方的回声。太阳落山以后，两个老太太又坐了一会儿，就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了。离这儿不远的车库旁边，那两个男人还在他们那台卸开的“莫斯科”牌的小轿车里修理什么，一些好奇的小孩子围在他们周围。

对这整个院子，它的每个角落、每条小路，列夫丘克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总的说来，他很喜欢这里，这里一切都安排得精心细致、清洁干净，只是人口过多，太嘈杂，好象节日的市场。当然，一切大概都得习惯。比如他过惯了乡村的安谧生活。在乡下，人的嘈杂声少些，更多的是牲畜和雀鸟的叫声和远方田野里拖拉机的哒哒声。可是在城里，又是嘈杂声，又是轰隆声，又是哒哒声，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

当列夫丘克回顾久远过去的种种情景时，他就摆脱不掉这样一个问题：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他为人怎样？列夫丘克有时陷入沉思，这时他那魁梧的身影、充满自信的面孔和他那细心的善良的微笑，就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列夫丘克不喜欢沉默寡言的人，虽然他自己也并不健谈，但那是他自己。他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是理想的。他可能是个什么工程师，或者机械专家，这种人现在到处都多得很。甚至他自己就是制造机器的，比如说制造汽车，列夫丘克很早就喜欢汽车，要不是因为胳膊的问题，以前有个时期，他还曾经幻想，要当一名汽车司机呢，可是一只胳膊他能干什么呢！

三年前有几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从城里到集体农庄来，给农场安装饲料调制室。列夫丘克和他们唠过，他很喜欢他们。列夫丘克甚至想，大概他也是一名高级专家。总之，他坐在这里，任凭想象的驰骋，是很惬意的。

他也能是某个著名医院的医生，给人开刀、治病。列夫丘克懂得，能够熟练地给人治病是件了不起的事儿，战后他自己就拜访过许多医院，甚至还在克里米亚残废军人疗养院住过。很遗憾，在那里，他曾经和一个女医生发生了一场误会，他想，如果把这位女大夫换上一位男医生，那么任何的误会也就无从发生了。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梦见过，他给自己看病，当然他不知道他在给谁看病，而列夫丘克也不能告诉他自己是誰，因为告诉了他难道能相信吗？的确，这一切仅仅存在于他自己的记忆里，他又如何能加以证明呢？

当然，他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如果一个人不笨，而且学习过，那么他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可做些什么，这个你甚至都无法想象。他学习过，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学毕业，或者还念过别的什么学校，甚至还可能是个副博士呢，再不就是什么学者，这些学者他们都有专门的称呼。邻村有个姑娘嫁给城里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夏天他们一起到她妈妈家里来，妻子称丈夫总是我的副博士。众所周知，妈妈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她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有几次把女婿叫代表^①，可是他也不见怪。

① 在俄文中，副博士和代表这两个词的读音很相近。

他大概还挺会过日子，喜欢精打细算，说什么也不会象其他许多男人那样把杯中之物当作主要的乐趣。不错，列夫丘克自己从前有个时期曾经有过这种罪孽，但是很久以来他就只是在节日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来客人时才喝几盅。但是列夫丘克的生活不是他的榜样，他应该更好一点。

还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骂人。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一句粗野的话，但是也决不会象现在的某些人那样开口就骂娘。列夫丘克一点也不尊重这样的人，哪怕他们是了不起的学者，甚至是首长。那是在战争时期，当时流血、饥饿、死亡，这时人们互相争吵、辱骂，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在现在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但是，不管他干的是哪一行，地位怎么样，他首先应该是个人。列夫丘克并没有赋予这个概念以什么复杂的或者什么哲学的含义，对他来说，这个概念也很简单：做一个善良、聪明、万事如意的人，但又不损害别人。那些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善于为自己争取私利的形形色色的机灵鬼，列夫丘克在生活中见得太多了，这些人的目的就是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私利。列夫丘克憎恨这些人，就象战争时期他憎恨企图以牺牲别人来保存自己的那些人一样。他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耍过滑头，从来没有为了私利欺骗过谁，他讨厌这些，他憎恨人们中间那些大大小小的诡计。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一切只是他自己的思想和向往，是

他在三十年漫长的时间里，即在他这不很成功的半生中所反复思考的。当然，他也知道实际上一切都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他不希望不是这样。他渴望一切都能象理想的那样，要是他有儿子，他肯定会希望他能够这样。可是上帝没有赐给他儿子，却给了他三个姑娘，她们具有母亲的一切特点：她的性格和外貌，却没有一点父亲的特征。当然，维克多不是他的儿子，不过他跟他的关系是多亲密呵！后来，直到战争结束，他所经历的一切虽然也并不轻松，但那已经不比当初了。当时他可以说是尽了最大努力，甚至也许还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假如这样的事再来一次，那他就一筹莫展了……

10

列夫丘克又用枪条扎了一下，这一下感到戳到了锅底上。这时他让格里勃耶特把小锅里的水滤出去，自己一只胳膊干这活儿不得劲儿。格里勃耶特的制服上衣是毛料的，带贴边，以前有个时期，大概也曾经是很讲究的呢。他就用这件上衣的底襟盖着，把小锅在草地上倒空着翻了过来，锅里剩下的水不多了，等水流尽，一滴也没剩时，他又把它放到篝火上。

“让它干一干。”

“干什么，拿到屋里去吃吧。”

格里勃耶特又把热气腾腾的小锅端起来，列夫丘克打开了脱粒场的门，克拉娃怀里抱着白色的小包包正在打瞌睡，听见开门声就清醒了过来，正象列夫丘克所感到的，她的嘴角上现出了一丝苦笑。

“来吃吧，新鲜的马铃薯。今年大概还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马铃薯呢。”

她试着要欠起身来，列夫丘克帮助她，在她背后垫了一些麦秸。把墙边上的羊皮袄也往她的身后掖了掖。她没有放下小孩，勉强地坐了起来，用手理了理额角上的头发。

“睡啦？”格里勃耶特把小锅挪到她的跟前问道。

“睡啦。不知为什么老是睡呀，睡呀，”女报务员回答说，她的话音里流露出一种不安的心情。

“没关系，让他睡好啦。这就是说，将来也象他爸爸一样，是个安静的人。”

“谢谢您，老伯伯，”克拉娃温顺地说。

“谢什么，当然，要是有个女人，也许能弄得更好一些……”

“你弄的也不错！”列夫丘克说道，“既没有叫，也没有哭。”

“这不是我。我能干啥？这是她。”

马铃薯还很热，他们俩也不管烫手不烫手，就伸手到锅里去拿。克拉娃抱着小孩，仰身靠着墙，安静地坐在那里。列夫丘克瞧了她一眼说道：

“吃呵，你怎么啦？”

“手提包里有个汤匙，”她说。

他从她身边拉过来一个很瘪的德国手提包。伸进手去掏。

“汤匙在这儿，给你。”

“那里还有一个小水壶，也拿出来吧，我们来庆祝一下。”

“小水壶？好家伙，真行呵！”列夫丘克喜形于色地说。果然不假，不一会儿他就从里面掏出来一个白铝壶，那里面还有种东西哗啦哗啦直响，“自制的白酒？”

“一点酒精。我一直保存着。”

“哎呀，你真了不起！”列夫丘克满怀热忱地说，“祝你健康，也祝婴儿健康。格里勃耶特，怎么样，喝两盅？”

“既然是这样，那就喝吧，”格里勃耶特怪难为情地回答说，在脱粒场里由于许多阴影而形成的斑驳的昏暗中，可以看到，在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种喜悦的神情。

他们高兴地、甚至是带着某种庄严的神情，喝起壶里的稀释的酒精。开始时，列夫丘克先喝一口，吐一口气，稍稍停了一会儿，就津津有味吃起马铃薯。水壶递给了格里勃耶特，他先皱了皱眉，喝一小口，又使劲儿地皱了皱眉，在他那整个未老先衰的面孔上，凡是长满了硬毛的地方，都一起跟着抽皱了起来。

“去它的吧，还是自制的白酒带劲儿。”

“看你说的！这是纯酒呵，是工厂里造的。自制的白酒

算个啥……”

“工厂造的又怎么样。我对你说吧，自酿的好喝些，好象也软一点。”

“你不喝点儿吗？”列夫丘克抬起眼睛，望着克拉娃。

“我恐怕不能喝吧，”克拉娃难为情地回答道。

“为什么？”格里勃耶特说，“喝吧！从前我老婆奶孩子的时候，就常喝酒，比如，在复活节节期，那时孩子睡的还好呢。”

“那么，我少喝点……”

她把水壶送到嘴边，稍稍喝了一点儿，好象尝一尝似的。列夫丘克以他人之乐为己乐，十分满意地发出了咯咯声。

“这就好啦！现在吃点东西吧，马铃薯虽然没削皮，但是很香，对不对？”

“是呵，马铃薯很香。我生来好象还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马铃薯呢。”

“赶上蘑菇好吃了。盐再多点呗，对不对，格里勃耶特？”列夫丘克暗示说，但是格里勃耶特却摇了摇头。

“不，不能多给了，剩的太少啦。以后还得用呢。”

“我过去还不知道呢，你这么吝啬。”

“什么吝啬？要是多，那也罢了，可是现在……只剩下够舔一舔的了。”

克拉娃吃了两个马铃薯，向后退靠在墙上。

“噢唷，我的头晕的好厉害呀！”她说。

“没关系，一会儿就过去，”列夫丘克安慰她说，“我的脑子里好象整个乐队在演奏。这样更快活。”

格里勃耶特不以为然地看了看他，脸上的皱纹更加显明了，在他那经常不安的目光中流露出来一种他所特有的那种谴责的神情。

“快活什么？你看太阳还在哪儿呢。”

“那又怎么样？”

“就这么样，你看距离到晚上，还有多长时间呢！”

列夫丘克食欲旺盛，大吃了一顿马铃薯。象其他两人一样，列夫丘克一夜来也是又累又饿，可是现在喝了点酒，不知为什么又感到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当然，他也明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他有一支冲锋枪，还有一只结实、健康的胳膊，而且另一只胳膊他克制着疼痛也学会使用了，它可以帮助好胳膊。在战争中间，他遭遇过很多次最难以置信的困难环境，但是都活过来了。现在他想象不出，在这密林的深处，他们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当然最糟糕的就是死亡，但是死亡已经不能怎样使他恐惧，因为他已经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就不那么可怕了。他还有足够的斗争的力量和自卫的准备。

其他的人和他不一样。

看得越来越明显，格里勃耶特好象回忆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沉思中。他嚼着嚼着马铃薯，胛骨突然就停止蠕动，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下。克拉娃总是同时做好几样事：一边吃东西，一边带着神经质

的不安心情看护着婴儿，同时好象还在倾听着什么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列夫丘克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她这个特点。他一面吃着最后的一个马铃薯，一面向她问道：

“你总谛听什么？”

“我吗？似乎听见了什么，好象有人说话……”

他们三个一起倾听了一会儿，但是没有听出什么来，可是为了难保安全，列夫丘克拿起冲锋枪从脱粒场里走了出去。

快到晌午了。灼热的太阳照射着打谷场。风小了，苹果树也不再那么喧响。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一切都是懒洋洋的，昏昏欲睡。列夫丘克在打谷场周围转了一圈，又回到脱粒场。

“这是你的幻觉，克拉娃，哪儿也没有人。”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克拉娃放心地同意说，“我常有这样的事。我小时候胆就非常小，不敢一个人在家，特别是晚上。当时我们在莫斯科，住在索良卡，是幢老房子，耗子很多，父亲常常外出，要是妈妈回来晚了，我就躲在餐具橱后面的角落里哭。我怕耗子。”

“怕耗子？”格里勃耶特吃惊地说。

“是的，怕耗子。”

“耗子有啥可怕的。难道它们咬人吗？”

“耗子不同狼。要是狼——那是另一回事，狼我也怕，有一次，把我吓坏了，”列夫丘克说道，带着享受的心情放松身子在屋里的硬土地上躺了下来，“现在睡一觉儿可不错，

你说呢，格里勃耶特？”

“你说了算，你是头。”

格里勃耶特无精打采地吃完锅里的马铃薯。列夫丘克打着呵欠，正在考虑怎样才能叫格里勃耶特留下警卫，而自己真的能睡上一觉。困得要命，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已经不太饿并且喝了一点酒的时候。但是他什么还没来得及和格里勃耶特说，身边的克拉娃就带着不幸的神情抽泣了一声，痛哭起来，哭得都上不来气了。列夫丘克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啦？你哭什么？不是一切都很好吗，克拉娃！”

但是克拉娃还是用两只手捂着脸，抽抽搭搭地哭着。列夫丘克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就尽量想法安慰她。但是格里勃耶特却一言不发，蜷起一双赤脚坐在那里，忧郁地望着他们。

“哎，算啦，你何必呢？”过了一会儿，他对列夫丘克说，“没关系，让她哭一会儿好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她有她的不幸，让她哭一哭吧。”

列夫丘克又在原来的地方坐了下来。真的，克拉娃呜咽了几声，就用军便服的袖子把眼睛擦干了。

“对不起。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再不哭了。”

“你别这么开玩笑啦，”列夫丘克严肃地指出说，“要不然，你知道吗，看着你这个样子，我们都要放声大哭了。”

她的嘴唇又哆嗦起来，好象心里又有什么委屈的事儿

要爆发，格里勃耶特赶忙解劝她：

“没有关系，一切都挺好。主要的是已经有了孩子。是个很不错的孩子。他会长大的。讨厌的战争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转。年轻人一切很快都会好起来。老年人完了，可是年轻人还有前途。你别难过。现在谁轻松？你以为我轻松吗？要是我只有你这点痛苦……”

“是呵，”列夫丘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咱们谈点高兴的事儿吧。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在战前我怎样差一点没结了婚。”

但是格里勃耶特仍在想自己的心事，列夫丘克的可笑的提议无论如何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他依旧两眼发楞，忧郁地坐在那里。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要带他到维谢尔斯基去呢？为什么没有揍他一顿把他留在窑洞里呢？”

“你说的是谁？是儿子吗？”

“对，说的是沃洛琪卡。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可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听父亲的话呢！”列夫丘克坐好，接上话茬，就活跃起来。“这是在四一年，我跑回家里，还好，用不着跑很远，只从卡布林到斯塔洛宾。我们的村子就在斯塔洛宾附近，村名叫库洛奇基，德国人把我们一团人打得丢盔卸甲，打失散了；有的人做了俘虏，有的人跑到东边去了，有的人进了森林。可是我跑到父亲那里。跑来了，把军装一脱，穿上便服，我帮助父亲，就住在那里。父亲说：快藏起来，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哪能干这事儿呢，我这

个英雄，我怕谁？暂时还没有德国人，全村只有一个警察。他叫柯兹留克，一个先天不足的小个子，结着臂章，腰里带着枪。所以，我能怕他吗？我在厨房的房檐里还放着一支托卡列夫自动步枪，有什么情况就给他一枪。当真，他没动我，有点害怕。可是到春天，象我这样的人都让到区里去登记。有些人害怕，就去了，给抓起来啦，完蛋啦。我一看是这样，就拿了枪跑进林子里打游击来了。这时柯兹留克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带着这个地区的一帮警察来抓父亲。‘儿子在哪儿？’‘不知道。’‘呵哈，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就这样把父亲给抓去了，父亲完蛋了，都是因为我这个英雄，我太勇敢了。本该听父亲的话，藏起来，可是当时我哪能听他的呢！他整天呆在家里，可我已经打过仗了。我是祖国的保卫者，可是连父亲也没保卫住！”

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在自己的丝绸的襁褓中开始不安地乱动起来，大概人们还是第一次听见他那微弱的哭声。克拉娃很小心但也是很笨拙地把他抱了起来，并且轻轻地对他说着一些温存的话语。格里勃耶特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说道：

“好啦，快，快，他要吃奶。喂，转过身去，你瞅什么？”

列夫丘克把身子转了过去。克拉娃用那块粗布轻轻地盖着，把孩子抱到奶头跟前。

“哎呀，真好，我的上帝！”列夫丘克说着，又放松身子在地上躺了下来。“要是没有战争，我就结婚了。我已经有了个对象，她叫甘卡。可是哪有这样的坏事呢，既没有甘卡，

也没有妻子，战争爆发了。”

“我的上帝！”克拉娃带着突然涌来的痛苦心情说道，“当时我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儿吗？我是自己死乞白赖要求要来的，人家还不收，我是托人进的无线电学校。我以为……可是现在，上帝呀，多少痛苦、流血、牺牲，我就不明白，本地的这些人怎么能受得了呢？男人们还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妇女、姑娘和孩子们呢！这些可怜的人，他们有什么罪？要枪杀，狗咬，烧毁，而一切又都做得野兽般的残酷！”

“他们所以挨打，”格里勃耶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就是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他们的头子也让这样干，对待游击队他们就不敢这样，因为游击队能还击。可是这些人象绵羊一样软弱。他们来啦，把大伙围起来，赶到俱乐部或棚子里，说是要验证件。虽然都知道不是验证件，可是也去，心里希望是验证件。已经给关起来了，可是却想，万一只是吓唬吓唬呢？已经开始射击了，可是又想：不会都给打死吧。一直到死总是往好处想，总是抱着幻想，这个幻想真该死，它就是这样帮助敌人损害我们自己的。”

“德国人还好理解，可是我们自己的人——这些警察也打。他们的手怎能抬得起来呢？”

“能抬起来，”列夫丘克坐好了说，“因为有命令。既然干了这一行——穿了人家的衣服，拿了枪，人家让干啥就得干啥，不能拒绝。”

“那么为什么要去干这行呢？”克拉娃不能理解。

“因为想要活命。想要比别人生活得好。另一些人是

由于愚蠢，他们想，带上臂章走来走去多好玩。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对苏维埃有仇恨，他们觉得受了委屈，所以就给德国人干事去了。那些德国人开始时还装得很慈善，口中不断地说‘是，是，’对你表示同情。随后就把枪塞给你，命令道：去打，去打吧。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如果说由于压力，那还情有可原，”格里勃耶特评论说，“如果由于压力，那也看得出来。比如，在扎鲁德奇发生过这样一件少见的事儿：正在猛烈射击，一个德国人看见炉子后面有一个孩子，这时他就用枪托把他推到尽里面去，叫他藏在那儿。这个孩子没有伤着，所有的人都给扫射死了，可是小孩活下来了。这个德国人救了他。可是有些人象野兽一样，一看见血，看见酒就发疯了，血流得越多他们越来劲儿。”

“天呐！”克拉娃说，“直到今天，我只为自己担心，现在我的忧虑成倍地增加了，还得替他操心。我的苦命的小宝宝，我的可怜的小乖乖，我怎么保护你呀？咱们的命为什么这么不幸？”

列夫丘克很不满意，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这些痛苦的诉说他受不了，特别是女人的哭诉他从来就听不惯。

“拉倒吧，别哭啦！我们无论如何也能想法把他抚养大！要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好了。看来，这里一个人也不会来了。”

“现在不要惊动她，她需要躺着，”格里勃耶特说。

“叫她躺着吧。你和她在这儿。我出去一趟。总得去

找一找，不定在哪儿，总该有人的。不能都被打死。恐怕还有活下来的。”

“应该到克鲁格连卡去一趟。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子。离这儿有十几公里。”

“也好，也可以到克鲁格连卡去一趟。我那里还有一个熟人。五月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撵过警察呢。”

“再不就到士普士诺维齐去一趟。可是士普士诺维齐是不是保存下来了，不清楚。它在树林的边上。”

“在树林边上，恐怕未必……把提锅给我，去打点儿水，有点渴啦。”

格里勃耶特刚要探过身子给列夫丘克去拿提锅，这时克拉娃又惊慌地战抖了一下，由于注意力集中，整个身子都紧张起来了。

“怎么啦？”列夫丘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什么？”列夫丘克不满地对她斥责了一句，可是这时他自己也立刻吃惊得在这脱粒场的中间呆住了。

在这中午的寂静时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口琴的轻轻的旋律。列夫丘克二话没说，抓起冲锋枪，就向门口冲去。

11

他把门刚轻轻地推开一点，它马上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就是不开门，从木板之间的窄缝里也看得很清楚：大路上有两辆大车，正从被烧毁的村子走过来。上面坐着头戴黑色船形帽、背上背着步枪的乘客。从那里传来了他们的谈笑声和轻柔的口琴声。

列夫丘克恶狠狠地骂了起来。

“那边是什么，是什么？”克拉娃开始惊慌地追问道，“德国人，对不对？是德国人吧？”

“是德国人！”列夫丘克说着，马上就从门口跳开了，“格里勃耶特，到墙角去！你盖上！”他跑到克拉娃跟前，从她背后把羊皮袄扯了出来，“你躺下，别吱声。他们是从这里路过，”他想安慰朋友们，但是连他自己对这些话也不相信。

格里勃耶特顺从地跑到犄角去，在那儿找了一个方便的墙缝，把脸紧凑在那上面，监视着大路。列夫丘克趴在门旁边的一个墙缝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车：大车从山岗上很快地走下来，过了一条小河，又开始上坡，走得慢了起来。他数了数，第一辆车上四个人，第二辆车上三个。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从这里路过，还是要在打谷场跟前停下来。

不，他们不是路过，大车在小河的这岸上停了下来。传

来了什么口令声或者是吆喝声。有一个人从车上跳到大路上，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下了车。不幸的预感使列夫丘克的心都收缩了，看来这场灾难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

“格里勃耶特，注意，静！”

就是没有他的命令，脱粒场里面也已经鸦雀无声，克拉娃本来应该盖上羊皮袄躺下，可是她却抱着小孩在麦秸上跪了起来，注视着列夫丘克。格里勃耶特紧张地弯着腰站在一个墙缝跟前。

“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列夫丘克一边无声地重复着自己这个问题，一边注意地观察着：德国人正在那里领取枪支，和另外一种什么东西，并把子弹盘分别塞进口袋里。他们把大车停在大路上，沿着小径朝打谷场走来，几乎就在刚刚走上小道的时候，就分成了两伙，一伙直奔脱粒场，另一伙——人数少的那伙，开始从另一侧，从赤杨树丛那边包抄打谷场。如果他们不是象现在这样愚笨和无忧无虑，那倒是很简单、很好理解。他们一边吸着烟、谈着话，看不出有什么害怕的样子，好象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似的，大摇大摆地沿着小道朝打谷场走来。正是他们这种愚笨的或者说造作的无忧无虑，又加上列夫丘克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就把他给弄糊涂了，并且给了他以希望：大概不是到这儿来的，他们也许是去别的地方，从这里路过。列夫丘克贴在墙缝旁边手握冲锋枪摆好射击的姿态，用左手的拇指轻轻地动了动快慢机，把它推到了连发的位置上，他一动不动地靠在墙上，紧张地等待着。

这四个德国人迈着懒散的、心不在焉的步子，已经来到脱粒场的跟前。现在瞄准了只要一梭子列夫丘克就能把他们都打倒。但是直到现在他还不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所以一直还没有开枪。万一他们只是从这里路过，是有事，往黑麦地那边去呢！否则他们怎么能知道，脱粒场里有游击队！列夫丘克心里这样想着，整个身子都紧张得麻木了。

“列夫丘克，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在哪儿？”克拉娃绝望地小声地追问道，但是他只是摇了摇头：“静！”

有一段时间，警察们被脱粒场的一角儿挡住了，列夫丘克把前额贴在墙壁上粗糙不平的柱子上，可是一点什么也看不见。等他们重新出现时，已经来到在马林丛后面快到墙跟前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呢子制服，手里拿着德国步枪，腰里皮带上挂着一个很沉的子弹盒的高个警察。他另一只手上夹着一根烟卷，在把烟头扔掉之前，又急急忙忙地吸了两口。

他已经来到院子中间，列夫丘克依然还存着一线希望：也许他们会走过去。列夫丘克从墙缝里紧张地注视着，看这个高个子警察都往哪里瞅，这个警察的视线先是沿着脱粒场的墙壁滑过，在墙角上，大概是在马林丛最密的那个地方稍稍停了一会儿，之后就转到别的地方去，最后在原来生篝火的那个地方，停了下来，那里有几块木头没烧透，可以看出还在冒烟。列夫丘克默默地诅咒起自己来，真要命，太粗心大意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警察朝着门口又迈了一步，门吱扭响了一声。

列夫丘克端起冲锋枪，把脊背紧贴在墙上，可是他的心里依然不能放弃最后的希望。他认为，脱粒场里很暗，从外面看不清楚。但是还没等警察把门打开，克拉娃的昏暗的身影，就从对面墙根底下跳了起来。在紧张的寂静中，响了一枪，两枪，三枪。警察轻轻地叫了一声，不知是倒在了门外边，还是钻进了马林丛里。列夫丘克透过门板打了一短梭子，他感到，马上就要朝他们射击了，于是就在地上趴了下来。在对面墙角下，克拉娃拿着手枪藏到麦秸后面，神经质地颤抖着。

“趴下，趴下！”他刚喊了两声，第一颗子弹就从外面打进来，在靠近门口的柱子上，掀起一块很厚的干木片。这时，立刻就从两面一起向脱粒场扫射起来，腐朽的柱子上有几个地方已被子弹穿透，打扫得很干净的粘土地的地面上落满了腐朽的木屑和灰尘。

列夫丘克在门旁边趴了一会儿，就爬到对面墙跟前去，从底下的墙缝里往外看。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了步枪声，子弹头吱吱地尖叫着，在屋顶下，在天空中穿过，但是他们趴在地上，房基的石头颇为有效地保护着他们。脱粒场外面长满了马林丛，有的地方把墙缝挡得严严实实，列夫丘克深怕这些坏蛋走到跟前来。距离近了，他们可能冲进来，向他们扔手榴弹或者用冲锋枪向他们扫射。要竭尽全力，让他们离得远一点。让他们在远处射击去好了。现在，当这场战斗打响以后，对列夫丘克来说，一切又都变得既简单而又平常，一切不明确的地方都已消失，因为儿童般的天真

的侥幸的心理已经完结。他明白，他们的处境够糟的了，现在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决不屈服。

他在脱粒场里，从这边跑到那边，又从那边跑到这边，到处从墙缝里向外观察，但是警察们大概也藏起来了，要不是格里勃耶特在墙角里开始射击，他真不知道敌人跑到哪里去了。格里勃耶特既然射击，这就说明他那面一定发现了什么情况。克拉娃在墙根底下躺着，把婴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两只眼睛紧紧盯着门。看到她那充满绝望的目光，列夫丘克立刻就明白了，女报务员彻底地完了。他们的处境都很糟，但是其中属她最不幸。他本想鼓励鼓励她，但是不知该怎样说才好，只是悄悄地骂了几句，就向干燥室奔去。脱粒场的这一面还没有被封锁，自己应该把它控制起来。

干燥室里发散着烟的臭味，里面几乎是漆黑的，除了墙上一个很窄的不大透光的小窗子之外，一丝光线都照不进来。他用冲锋枪的枪口把窗上的浑浊不清的玻璃撞碎，赶紧趴在用木杆铺成的地板上。就在这个时候从不远的地方打来一枪，在被熏黑的柱子上现出了一个白色的斑点——子弹头的痕迹。列夫丘克沮丧地想，脱粒场的这一面也给他们占了，就是说想从黑麦地这边逃跑也不行了。他们的不妙的处境更加恶化。

他在地下趴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透过窗口从侧面向赤杨树丛那面瞥了一眼。在黑麦地的地边上，有两个齐胸露在外面的、头戴船形帽的人影，他们正在伺机对他进行射击。他从里边透过窗子对着他们那个方向打了

一短梭子，让他们知道知道，这里也有人守卫，不要抱幻想。然后，他就猫着腰跳过干燥室的高门槛，倒在了正在全神贯注地从墙缝里向外观察的格里勃耶特的身边。克拉娃藏在麦秸后面，竭力用自己的身体遮着裹着婴儿的白色小包。打来一枪，子弹吱吱地尖叫着从屋顶底下穿过。四周的枪声不知为什么，又静了下来。

“格里勃耶特，子弹还有很多吗？”

格里勃耶特的视线没有离开墙缝，他侧过身来用手摸了摸制服的衣袋，从里面掏出来几盘子弹。

“还有四盘。”

“就这些啦？”

“对。”

“你有多少，克拉娃？”

“原来是八颗。”

“打了三颗，剩五颗了。是呀，真够打一气的了！”

他们的处境，一般来说，如果说还不是完全绝望，那么也是很不妙了。他们已被包围，而且经常处在敌人火力的控制之下。当然，警察们的子弹是充足的。而他们想用五十几颗少得可怜的子弹长时间地抵抗下去，简直想起来都叫人好笑。那么怎么办呢？应该有个指望，或者下个决心，但是他想不出这个指望和决心是什么，他趴了一会儿，把冲锋枪的快慢机扳到点射的位置上。现在他决定以后只能瞄准了再打，只能单发射击了。

“我们怎么办，列夫丘克？上帝呀，我们怎么办？”克拉

娃带着平静的绝望心情问道。

“静点！你躺着吧！看着门。你看着门，如果有人攻上来，就迎头痛击！”他看了看这道该死的门，这样命令道。这道门是用未刨的薄板做成的，门很大，有两扇，是向外边开的，从里边不能支，也不能关。只要这些下流坯扔一颗手榴弹，他们的门就不存在了，那时敌人就会冲进来，把他们统统就地扫射死。在射击中间，出现了一定的停歇时间，大概是警察们在研究，应该怎么办。这时从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了由于隔着墙而变低了的声音：

“喂，蓬头发的！该投降了吧？”

列夫丘克不禁战栗了一下：在他当侦察兵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人们叫他蓬头发的，而且现在这个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以致他感到吃惊，这个人是谁呢？

“喂，你听见了吗？该投降了，趁现在还没有把你们烧死，再不你就是……已经完蛋啦？”

“就是那个人，”格里勃耶特转过脸来，对列夫丘克说道，“就是从车站上跑来的那个。”

“库德里亚夫采夫？”

“对。”

列夫丘克低声地骂起来，这个意外的情况，使他大为震惊。他一声不响地趴了一会儿，感到全身充满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愿望，想要立刻从脱粒场里冲出去，把冲锋枪里的全部子弹都射在这个坏蛋的身上。自己就是被打死也心甘情愿。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内心里突然爆发的愤怒，没

有冲出去。他跪着挪到格里勃耶特跟前。

“你瞧，小棚子后面，在麦秸后面探头呢。”

“好，给我！”

他拿过车夫那支已经震得松动的步枪，靠着墙找好了位置。不管他怎样努力，想把枪筒伸到墙缝里去，可是只有带准星的那截细筒能够伸进去。好在有马林丛挡着，从外面大概看不见墙上的缝隙。可是从里面向外看也看不清。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步枪对准了小棚子的角上，对准库德里亚夫采夫在那后面趴着的那个地方。他等那个人一动，黑色的船形帽一露头，就打了一枪。然后，很快地又把子弹推上膛，对着原来的地方又打了一枪，他又继续等待。

但是没有等很久，从小棚子后面，好象若无其事似的，又传来了那个很高的熟悉的声音：

“打下去没好下场，蓬头发的，等我们把你吊起来，在电线杆上去送命吧。”

“呵哈，你别妄想！”列夫丘克没有控制住自己，喊了一声。

“别胡闹了，蠢货！把女报务员交出来，举手投降，还可以活命！”

“我本来就活着呢，下流坯！你倒要被绞死的，出卖灵魂的坏蛋！”

“这只好怪你自己了！”从外边传过来这样的话，“好，小伙子们，打！”

这样猛烈的火力，列夫丘克很久没听到了。小棚后面、

大路两旁、赤杨丛里同时轰鸣起来。森林的回响使射击声更显得增多起来，就象一整排人从四面八方同时向他们开了火一样。密集的枪弹带着不祥的撞击声不停地打在墙壁腐朽的柱子上，并把它弄碎，木片、粉屑和墙缝里的干苔落在他们的头上。地上落了很厚的一层干草末。尘埃象柱子一样腾向空中。要不是外面有马林丛挡着的石头地基依然象以前一样掩护他们，警察们大概早就把他们都打死了。诚然，现在要想抬起头来，从缝隙里向外边看看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得看一看。列夫丘克懂得，这样的攻击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一群狼是想借助火力的掩护接近脱粒场。他在墙根底下卧着，敏锐地倾听着外面猛烈而零乱的射击声，以便抓住时机，进行还击。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现在，他与其说是看见了，还不如说是感觉到了，敌人已经很近。这时他端起冲锋枪，顺着墙缝朝一个方向打了一枪，又向另一个方向打了一枪。这时格里勃耶特的步枪在他的身边也响了好几下。他藏在石头地基后面，突然一探头透过枯萎的马林丛看见那里有个人也扑倒在地上，另一个人弯着腰跑到小棚子后面去了。大概他们也不大愿意死在这个打谷场里。过了一分钟，从赤杨树丛里又射击起来，但是小棚附近已经沉寂。看来，他又给自己赢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可以考虑一下以后的问题。但是脱粒场的另一端，这时又引起了他的新的不安，他顺着梯子向干燥室奔去。

他踩着那层浮土走了三步，就顺着陈旧的麦秸墙趴了

下来。墙上有几个小洞，他透过一个洞，从上面向黑麦地里一看，脸上不禁现出了得意的微笑：两个敞着制服大领、头戴黑色船形帽的家伙，象小偷似的，正悄悄地走近脱粒场。他不禁感到一种内心的喜悦，慢慢地拉开了枪栓。两个警察为了不把身子露出太多，正弯着腰走路，他们不可能看见他。他仔细地瞄好准，打了一枪。前面那个警察好象感到有些吃惊似地，伸直了身子，头向后仰，以脚跟为轴扭过身去，就一下子倒在了麦地里。第二个还没等人家瞄准他，就急忙地向赤杨树丛奔去。列夫丘克匆匆忙忙地在后边打了一枪，根本不可能打中，白白浪费了一颗子弹，他马上就感到很后悔。

只要有两枪他就可以被打死。可是当第一颗子弹刚击落尘土从下面穿过屋顶时，他已经顺着梯子滚进脱粒场里。他很感激这所老房子，它以它那广阔的空间救了他们。他想，脱粒场很大，让他们射击去吧，并不那么容易打中谁。

他趴在克拉娃一直躺着的那面墙根底下，从柱子的窄缝里往外瞅，想看看从黑麦地里跑掉的那个警察藏到哪儿去了。但是从这一面哪里也没找到他，也许他已经钻到赤杨树丛里面去了。小棚后面又打来两枪，然后不知为什么一下又都静了下来。

“喂，你还活着吗？”又传来了那个库德里亚夫采夫喑哑的声音。“不必互相射击了，把女报务员交出来，滚你妈的蛋吧！听见了没有？”

在一阵疯狂的射击之后，是一种使人感到压抑的寂静。

墙外传来的这些话，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列夫丘克沉默着，那些家伙也开始沉默起来：大概在等待回答。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她，而且他们又怎么知道她在这里。但是看样子，他们已经知道了。这时列夫丘克突然明白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到这里来的。而他这个蠢货，还老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丢不掉幻想。早就应该给他们一梭子，那时他们剩的人就少了。可是现在怎么办？他们第二次喊话时，克拉娃听见了他们的要求，她把婴儿放在麦秸上，就哭了起来。

“噢，天呐！噢，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的确，该怎么办呢，谁也不清楚，可是也不能向这些败类投降呵！这时列夫丘克趴在石头地基后面，大声地回答他们：

“喂，你来领女报务员吧！喂，来领呵……”

这时他端起冲锋枪，顺着墙缝朝着他们就打了一枪，他只打一枪，他不能允许自己再多打了，但是就这么一枪，对他们来说，看来也就足够了。

“好吧，混蛋！”库德里亚夫采夫喊了一声，“你等着吧，我们很快就象用干草烧野猪那样把你烧死！”

列夫丘克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他们真正的意图，而不是空洞的威吓。当然，他们想得很美，想把他们和脱粒场一起烧掉，但是为此他们需要靠近一些。他决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抵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他们接近脱粒场。他的巴拉贝伦手枪还有几颗子弹，格里勃耶特还有两盘子弹，克拉娃还有五粒，他们也许能够坚持到夜里。他们很需要黑夜，也许到夜里他们能脱险。让狗把太阳吃掉吧，它还有这么高呢！到黑夜还得等很久。对他们来说，熬到黑夜不比等到战争结束更短些。

“格里勃耶特，注意，他们要往跟前爬了，揍！”

他自言自语地估量了一下，他们已经打死了两个，甚至是三个。根据射击的情况很难判断，他们还剩几个人，恐怕至多不超过五个了。小棚后边趴着两个，赤杨树丛里藏着两个，黑麦地里大概还埋伏着一个，那里另外的那个已经起不来了。再加把劲儿，大概还能打死两个，如果他们不来援兵，那么到傍晚双方就势均力敌了。到那时，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呢。

列夫丘克监视着面对森林这一面，这面现在最危险。他想一定会有人从那边带着火爬过来，来烧脱粒场，或者先烧

小棚。当然，他不知道今天是什么风向，火往哪面刮。但是他已经高度地警惕起来，决不能让放火的人靠近。

小棚后面打来一枪，子弹在屋里闪出一道光，从下面穿透屋顶，打了出去。这时，他一点也没害怕，他想这是曳光弹。接着是第二枪，一点光亮也没有，他认为这是一般的枪弹。可是等到打三枪时，他明白他们想干什么，气得眼前都发黑了。

他们开始打燃烧弹了。

克拉娃在墙根底下侧身躺着，用自己的身保护着婴儿。格里勃耶特在墙角上自己的缝隙旁边呆然不动。他们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他想，如果火着到了房顶上，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甚至不能到上面去把火熄灭，而且拿什么去熄灭呢？

用不着他久等了。打了四、五枪之后，脱粒场里已经冒烟了。克拉娃在墙根底下第一个转过身来，朝上面看了一眼，用压低了的声音，好象由于疼痛似的突然喊了起来：

“列夫丘克，列夫丘克！”

“静！等一等！静！……”

但是还等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开始时他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们头顶上的房檐，从一端开始，渐渐地着起火来，屋里的烟也越来越多。房顶先是烧出一个小洞，接着，火焰就从这里迅速地向上和向外扩展。急剧的火焰，聚足了力量，熊熊地燃烧起来，贪婪地吞噬着屋顶上干燥的麦秸，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燃烧过的灰屑和木炭在浓烟中

撒落在他们的头上。过了不一会儿，格里勃耶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角落，挪到门跟前来，克拉娃抱着婴儿也来到这里。列夫丘克还留在原来的地方，不时地监视外面。如果不是一股令人窒息的浓烟刮进了脱粒场，一般来说，列夫丘克还是能够忍耐的。现在他想象着，如果整个房顶都着起火来，那时将会怎样。

“克拉娃，到干燥室去！”他向女报务员喊了一声，“快！”

克拉娃用不着多劝，她敏捷地从门槛上滚了过去，格里勃耶特用脚把门一踢，就把她关进干燥室里。

只剩下他和格里勃耶特两个人，列夫丘克感到轻松和简单得多了，用不着再总为这个不幸的母亲操心。趁暂时还没有对他们射击，他们还可以商量商量，决定一下该怎么办，因为用不了多久，他们的一切决定就可能毫无意义了。

“我们大概要完蛋吧？”格里勃耶特把他那惊慌失措的面孔，转过来对着列夫丘克问道，他的眼睛都被烟呛红了。

“让他们完蛋吧，”列夫丘克说道，他也找不到任何其它可以安慰人的话，“我们还得看看……”

列夫丘克疯狂地在脑海里搜索着一切可能脱险的方案，但是他什么也找不到。现在警察们正紧紧地围着他们，要想从脱粒场里往外逃，那是不理智的，但是留在这里，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支架烧坏了，紧靠边上的两个人字梁，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把脱粒场这端的火焰吹得更旺了。格里勃耶特把两只赤脚往一边挪了挪。列夫丘克迅速躲开火焰，用皮靴踢开

一根燃烧着的木棍，跑到了门跟前。

“瞧，我们都得给烧死了。”格里勃耶特平静地说着，咳嗽了起来。

“是呵，恐怕得烧死了，”列夫丘克心里想道，但是在烧死之前，应该做点什么事，哪怕只是试图做点什么事也好。如果是做不成，那也就没有办法，只有等待烧死了。

“格里勃耶特！”他喊了一声，也咳嗽起来。“格里勃耶特，门，把门推开！”

格里勃耶特伸出一只手，推了推门，这扇门刚刚开开一道缝，棚子后面马上打来两枪，薄薄的门板上又出现两个新的弹洞。

“哎，这些瘟神！……”

但是他们没有另外的出路。应该从这个地狱里冲出去，要想冲出去只有经过门这一条路。脱粒场的一端，已经熊熊燃烧起来。呼啸的火焰烧得房顶噼啪作响。屋顶上的房笆和麦秸几乎完全烧坏，房架和柱子的上端也都起了火。火苗象条火蛇一样沿着房架和柱子爬着。地上落了很厚一层灰烬、焦块和烧过的麦秸。格里勃耶特裹在身上的一块带条纹的粗布燎焦了。列夫丘克突然发现，他的裤子后面也着了火，他在地下蹭了一气好不容易才把火熄灭。屋里热得令人难忍。底下也充满了烟，呛得嗓子痛，眼泪不停地从眼里流出来，有时什么也看不见了。门已经推开了一点，只有在门旁边，才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

干燥室里大概也呆不住了。尽管顶间上的那层土可以

防火，但房顶上的火苗已经烧到了干燥室。过了几分钟，干燥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克拉娃呛得咳嗽着，倒在门坎上。

“我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啦！列夫丘克！我出去！你救救孩子吧……”

“住口！”列夫丘克恶狠狠地对她喊了一声，“我看你敢！爬到这边来！”

克拉娃一边不住声地咳嗽着，爬到了门跟前。他往一边挪一挪，给她让了一个位置。有一扇门开着一道缝，一股风刮了进来，把一团烟吹得在这里打转儿，不知是往里刮的，也不知是往外去的。列夫丘克探过身子，用冲锋枪把门推了一下，它开得大了些。这时又打来两枪。一颗子弹正打在锁环的旁边，把门框打坏了，另一颗看样子没打着什么，从一旁穿了过去。他对格里勃耶特喊了一声：“扶住！”好不叫门关上，同时就向克拉娃点了一下头：

“快，听见没有？到马林丛里去！”她抬起了泪痕斑斑的面孔，把婴儿紧紧地抱在怀里，望了他好几秒钟，不知是害怕还是不了解他的意图。但是时间越来越紧迫。整个房顶几乎都燃成了熊熊的烈火，火势越来越低，墙壁也着起来了。屋里热得好象他们自己眼看着也就要被烧着了一样。列夫丘克怕来不及了，一把就将克拉娃推到门口上。她整理一下衣襟，顺从地四肢着地趴下来，犹豫了一下，就侧身从门口向马林丛滚去。他以为敌人又要射击了，但是警察现在还没有打，大概是门里冒出去的烟掩护了她，他们在

棚子后面没有立刻发现。

“格里勃耶特，揍！揍他们！”列夫丘克喊了一声，就冒着被烧死或窒息的危险，穿过烟火，顺着梯子向上方奔去。他要从上面掩护她，免得她在脱粒场旁边被打死，或是在黑麦地里被捉去，她必然要到那里去的。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应该怎样帮助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冲锋枪里还有几颗子弹，但是他还是冒着烈火疯狂地向着干燥室墙上那个熟悉的有洞的地方奔去。

下面黑麦地里笼罩着一片浓烟，风变得清新起来，把一团团浓烟向田野里吹去。列夫丘克喘息着，透过由于流泪而变得模糊不清的视线，朝麦地里瞥了一眼，可是哪里也没有看见克拉娃。她可能被打死在马林丛里，也可能从脱粒场里已经逃出去，藏到麦地里去了。的确，在赤杨树丛边上，有两个黑色的人影，正对着浓烟向什么地方射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刻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在烟火中他把枪里仅有的子弹全部向着他们射去。他又吸了一口气，但空气已经灼热烫人。他想，要呛死了。眼前发黑，他深怕失去知觉，于是就用左手扳着柱子，经过墙上的洞口对着马林丛向下跳去。

他掉到了石头上，屁股摔得很痛，但他马上就跳了起来，他感到有颗子弹打在什么东西上又从他手下蹦了回来。看来子弹没有碰着他，他弯着腰，向麦地奔去。这时他立刻又陷入炽热的浓烟中，呛得透不过气来。他绊在麦子上跌倒了，重新跳起来，奔跑着，他要赶快离开大火、离开脱粒

场，脱粒场附近的枪声密起来了，大概是来了德国人。赤杨树丛那面也有人开始朝这里射击，几颗绿色的曳光弹，在麦地上空的烟雾中闪了一下。这时他就朝着另一个方向，朝着田地里跑，因为去赤杨树丛的路已被切断。可是闷热的烟雾在麦地里散开，变得稀薄起来，列夫丘克弯着腰继续向前跑。后面在射击，甚至喊了几句什么，但是他没有听，他要赶快跑进树林，哪怕就跑到那个赤杨树丛里也好，留在田地里是危险的。他开始转变方向，横跨了一条垅、两条垅，这时他始终是弯着腰跑。跌倒了用两手拄着地再爬起来。右肩上伤口的疼痛他早已不再注意，疼得厉害时，只是咬一咬牙，帽子也在什么地方丢掉了。他满脸是汗，汗与烟混在一起，呛得睁不开眼睛。后来不知怎的枪声离远了，好象就要完全停止了，他想，是逃出来了，可是应该到赤杨树丛里去。

他沿着开着白色甘菊的麦垅，刚从麦地跑出去，马上又缩了回来。他已经迟了。在麦地和树林中间这块不宽的长满了草的空地上，有两个人拦着他的去路疲倦地跑了过来。看见他之后，后面那个人对前面那个喊了一句什么，这时前面那个人就熟练地跪下来一条腿，打了一枪。列夫丘克深深地弯下腰，撒腿就往回跑，横穿垅沟，向麦地里边跑去。可是不一会儿，麦地就到了头。前面是苔草尚未割掉、变成了沼泽的一块不大的草地，再前面又是田野。他没有必要再朝田野里跑，在那里很容易被打中。而且也没有劲儿了，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气也不够用了。他停下来，从皮套里掏

出巴拉贝伦手枪，拉响枪闩，把第一颗子弹推上了膛。

追击的人很快地就出现了。他从麦地一探头，看见了他们的黑色的船形帽，连着打了两枪。船形帽消失了。他又抬起头看了一下，当第一个船形帽在麦地上再一露头，他又打了一枪。随后他拎着手枪，沿着草地的边从麦地朝着赤杨树丛斜着跑去，这时他已经没有一点劲儿了。

在奔跑中，他明确地感觉到，已经跑不掉了，追击的警察跟着就要从麦地里跑出来。他正使出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力气消耗得太厉害了。他的体力越来越弱，步子迈得越来越小，两腿已经发软。他深怕倒在地上，到那时一切就全完了。后面响了一枪，子弹离得很近，就从他的头上穿了过去，他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就在这时，他也没有加快脚步，相反，却几乎是一步一步地走起来。他的追击者在麦地的边上停了下来，站着打了一枪，然后把卡宾枪重新装好子弹，把胳膊肘放到了膝盖上。当然这样瞄准比较得劲儿，打得准。但是就在这时候，列夫丘克也没跑。除了精疲力竭之外，在这为了生命而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他内心里好象有一种什么东西受了伤，他自言自语地对追击的人说：“打吧，狗东西！”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朝着赤杨树丛走去。

距离树林已经非常近，眼看就可以藏到那里面去了，这时警察打了一枪。子弹头有力地打在他的脚跟下，斜着掀起来一片黑色的草皮，反射回来又飞到空中。“打吧，打吧！”他脱口说道，连回头看都不看一眼，继续举步艰难地向前走

去。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任何一个瞬间，枪弹都可能将他的身体穿透，但是他已经毫无办法。

他听到第三次枪声，是在枪弹擦破他制服上衣的下摆，几粒子弹从衣袋里掉在草地上的那一刹那。他吃惊地用手抓住了衣兜，好象这些枪弹现在比他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似的。他很快地又把它们从草地上拾了起来。后来，一边用一只手抓着衣袋，他突然明白了：不管怎样，他终于离开麦地很远了，被打中的可能性显著地减小了，尽管枪弹还在他后面呼啸，他已经完全不去注意它们了。

在树林边上，他穿过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茂密的树枝，登上一个长着松树的山岗，森林就从这里开始。看来，后面已经没有人追了，但他还是继续走着，继续在松树中间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个温暖而干燥、生满了苔藓的空地上。他绊在一块石头上，倒在了一片松软的、盖满了针叶的苔藓上，他已经无力侧过身来，就这样一直脸朝下趴在那里。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夏天的明亮的天空已经开始发暗。松林里，凉风徐徐，暮色正浓，夜已来临……

13

没有希望了，在这里一个人也不会等到了，列夫丘克提起小手提箱，就到门口去按门铃。他想，也许是他没有看

见，其实他们早已回来了。当然，按面孔来说，他谁也不认识，但是他有一种感觉，他以为，如果在哪里遇见，他一定会认出他来。

他按了三次铃，可是没人回答，屋里异常静，没有一丝声响。这一次女邻居也没出来，列夫丘克又下楼回到院子里。为了消磨时间，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回到砖墙跟前方才他坐过的那只长凳上。应该等待。尽管这里谁也没有等他来，但是他既然已经千里迢迢地来了，那么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能这样就返回去的。这次会见，与其说是为了别人，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无法忘却当时经历的一切，甚至就是他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另一个不走运的夜晚也同样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就在那一夜为了他的生存，另一个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高昂的代价，象永远也偿还不清的债务一样，三十年来一直压在他的良心上。带着良心上的重担生活是困难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那天他们去破坏一条铁路。

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前中士科洛鲍夫带领着他们三个，一夜的工夫就到了谢列特涅夫。这是靠近森林的一个不大的村子，离铁路线还有两公里。白天他们藏在自己人的家里，天一黑就到铁路上去。德国的警卫没有发现，他们迅速地就把地雷埋好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一辆开往前方的载重列车轰隆一声就炸翻了。德国人大为震惊，很久没有清醒过来，他们没有及时开枪，爆炸手们安全地绕道回到了

村庄。他们吃点喝点，就躺下来睡觉了。但是他们还有一颗备用地雷，总不能把它再带回来吧。第二天夜里，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又从森林这面到铁路上去。他们原以为德国人想不到他们会从这面来，所以也能象昨天一样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发现，在路基拐弯的地方有巡逻队，于是就在距铁路还有五十步远的用树木堆成的路障的后面隐藏了起来。应该等一下。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直冻了三个来小时，直到巡逻队回碉堡去烤火时，才把地雷埋上。一般说来，线路上还很平静，从前线上回来的列车在这之前已经过去，因此，开往前线的列车不久就要过来了。这时科洛鲍夫觉得，他们在匆忙中地雷伪装得不太好，巡逻队过来时可能发现并发出警报。列夫丘克很不愿意经过盖满了雪的路障再到路基上去，他好象已经预感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要想说服科洛鲍夫，叫他改变主意，是不可能的。本来可以让他们三个——列夫丘克，费利波夫或者柯留克谁去，可是科洛鲍夫要亲自去。

与铁路平行杂乱地堆放着许多多枝节的白桦树和松树，要通过这道障碍物可不容易。他通过这些障碍物时大概费了不少时间，这时铁路上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可能是巡逻队把他们的巡逻提前了，也可能是他们的官出来检查线路了。他们在路障后面看不太清，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突然听到一声叫喊，一颗颗的曳光弹马上向着路基射来，象阵旋风似的在路障上空掠过。紧接着，碉堡里的机枪也响了起来。为了掩护同志，他们用步枪向那里

打了几下，但是机枪的火力是这样猛烈，以致他们在树木后面趴了五六分钟，连头都不敢抬。就是在这个时候，列夫丘克听到了科洛鲍夫微弱的叫喊声，他知道指挥员发生了不幸。

碉堡里的机枪发了疯，由于射击过猛，中间还夹杂着短促的停顿，巡逻队也从路基里面连续地向外扫射，密集的子弹象一条火龙铺天盖地地向路障扑来。列夫丘克穿过土埂和树枝向着线路那侧奔去。他丢掉了手套，刮破了棉袄的袖子，终于进到了路障里面，立刻就撞到科洛鲍夫身上。穿着伪装服的科洛鲍夫浑身是血，正躺在一棵高大多枝的松木旁边，他已经无力翻过这根圆木。列夫丘克一声不响地扳着他的腋窝，从一根松木上爬过来。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扳着他又爬过一棵斜放在那里的松木。科洛鲍夫咬紧牙，不时地悄悄地哼着。黑色的血液从他的一条裤腿里流到雪地上。尽管天气严寒，但列夫丘克还是累得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一刻钟之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可诅咒的路障，来到了外面，但这时同志们已经不在了。他想他们大概是跑到跟前的树林里去了。他把科洛鲍夫背起来，冒着碉堡里不停地向外射来的炮火，在树木中间摇摇晃晃地向着树林深处跑去，他要离开这个震撼周围十几公里的炮火的地狱。

在这个时间里，他一直以为，费利波夫和柯留克，马上就会来接他，但是他在松林里走了有半个小时了，可是那里也没有看到他们。他疲乏到了极点，倒在雪地上，很久没有

站起来。后面的射击似乎已经停止，虽然机枪有时还哒哒响一阵，但是在树林里子弹的光痕已经看不见，这使他产生了希望。科洛鲍夫一直一声没吭，只是有时把牙齿咬得吱吱响。列夫丘克想，看样子指挥员的伤很严重。他歇了口气，决定看看他的伤口。他解开他的裤子一看，大吃一惊：裤筒里全是血，在严寒中都已经凝固了。他把自己很薄的裤腰带解下来，把科洛鲍夫被打伤的大腿缠上两道，至少得把血止住呀！后来他一面注意倾听着这不祥的夜里的各种声响，一面背着指挥员在这寂静下来的令人不安的林子里又走了好久，可是在哪儿也没有碰到同志们。起初，他还很生气，以为他们是逃跑了，但是逃跑也用不着跑这么远哪。这就是说……这就是说，他们是永远地留在那个路障里面了。

大概在半夜的时候，他从林子里走了出来。松林走到了头，前面是些灌木和矮树，周围完全静了下来。在这没有月亮的天空中，闪烁着无数的星辰，夜里越来越冷。列夫丘克早已感到了圣诞节前后严寒的威力，首先是他那两只抓着科洛鲍夫的手，好象就要冻掉了一样。他的身子和穿着毡靴的双脚很热呼，胸部累得好象着了火，口里吐着热气，可是手却冻得简直叫他受不了。他没有和科洛鲍夫说话，科洛鲍夫大概是失去了知觉，再不就是不能说话了。

他不知道离开铁路有多远了，也不知是几点钟，但是他感到附近应该有村子了。他透过朦胧的夜色不断地仔细地，向四周察看，可是认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他简直就不

知道他是在向哪个方向走，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是懵着走，以为总会遇到村子的。

时间在过去。他停下来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疲倦得要命，两只手也都冻麻了，但是对此他却毫无办法，他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在灰暗的夜色中，他集中精力凝视着前方，累得两只眼睛都要流泪了。他心里老是在想，也许能在什么地方，发现临近村庄的某些迹象。只有找到村庄他们俩才能得救，但是他的这个希望，象口中的冰块一样，逐渐地消失。这是个荒凉的、人烟稀少的地方，在这样的地带想找到一个村子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夜里。科洛鲍夫的身躯已经沉得要命，列夫丘克不止一次地跪下来，把他重新背在背上，在小树林中间艰难地向着那个方向——向着他感到是密林的那个方向走去。好在雪还不深，还不怎么妨碍走路。

他发现它们，是在一次休息的时候，当时他刚刚把科洛鲍夫放到雪地上，用撕破了的伪装服上衣的袖子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在寒冷的昏暗中，开始时他以为是个人，但仔细一瞧是只狼。它在矮灌木丛中间站着，离他只有五十来步远，警惕地凝视着，好象在等待着什么。看它那个架势还很不简单呢，但是列夫丘克并没太害怕。他有一支步枪，而且还有科洛鲍夫的冲锋枪，一只冬天的饿狼能把他怎样。他站起来时，甚至还向它挥了挥手，心想：滚你的吧，傻瓜！但是狼只是耸了耸耳朵，并且把头轻轻地向一边摆动了一下：那里又出现一只狼，紧接着又出现两只，这两只象第一只一

样，也是些神态端庄、戒备心强、正准备捕食什么的野兽。列夫丘克感到，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在他这种情况下，对付四只狼可不是开玩笑。他想，它们可能向他猛扑过来，于是就立刻把挂在胸前的冲锋枪端了起来，用冻僵了的手指抓住了枪闩的把手。但是这几只狼对他好象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继续站在稀疏的灌木丛里：前面三个，另一个隔开两步，站在后面。它们在等待什么。可是究竟在等待什么呢？

他的惊慌感染了科洛鲍夫，他从列夫丘克背后欠起身子，也仔细地向朦胧的雪夜凝视。

“坏蛋，真是祸不单行……”

列夫丘克两只眼睛紧紧盯着狼，站了起来，向着灌木丛走了几步。可是几只狼也向后面退了几步，看不出有什么害怕的样子。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列夫丘克回到科洛鲍夫身边，把他背在背上，继续前进。在行进中，他低着头，看不见狼，仅仅能看见自己脚下的雪地，但是他感觉到，它们没有落后。它们与他的方向平行，并排着跟在他的后面，仔细地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列夫丘克心想：也许应该用冲锋枪给它们一梭子，把它们赶走。也许正相反，不应该动它们，它们暂时不也没动他们吗？也许它们跟一会儿，就会走开，去干自己的事：它们跟着人干什么呢？

但是对于这两个精疲力竭的人，看来野兽们是有着它们自己的企图的。

这时灌木丛已经到了尽头，前面是一片空旷的白茫茫的原野。列夫丘克突然产生了希望，心想：这里一定会遇到村庄，那时这些野兽就不得不调转头回去了。他跪在雪地上，侧身躺下，把科洛鲍夫放在地上。他并没有立刻抬头去看，但是这些狼还在，甚至走得更近了。前面那只高高的、一只耳朵比另一只耳朵显然长不少的狼，离他们更近了，只隔四十来步远站在那里，在它那警惕的、有所期待的姿态中有一种挑衅的表情。另外两只在靠后面一点的地方等待着，可是第四只狼不知为什么这时却不见了，列夫丘克感到诧异：它跑到哪里去了呢？但是使他更加诧异的是：他一回头，看见绕着积雪较深的灌木丛，又出现一小群狼。在洁白的、笼罩着朦胧烟雾的雪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四只狼正迅速地从另一侧向他们包围过来。

列夫丘克有些紧张。他决心要鸣枪把它们赶走，于是就把挎在脖子上的冲锋枪摘了下来。他刚一拉枪闩，身旁的科洛鲍夫就突然无力地慌了起来。

“住手，你想干什么？”

“怎么？你看，已经七只了。”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你没看看？”指挥员用嘶哑的嗓音说。列夫丘克惊慌地向昏暗中凝视，竭力想猜测出他们是来到了什么地方。事实上，树林他们已经全部走完，前方原野中发黑的地方，正象列夫丘克后来所猜到的，既不是灌木丛，也不是高棵的莠草，而是一半已经埋在雪里的芦苇。芦苇后面黯淡发白的地方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地。平地的旁

边好象是隆起的山岗，但是在那里，除了满天星斗的黑夜的天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扎罗夫斯克湖，”科洛鲍夫停了一会儿之后说道，说完就脸朝下倒在了雪地上。

“扎罗夫斯克湖？”

列夫丘克吃了一惊，他们这是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但是，看样子，科洛鲍夫是正确的。芦苇后面那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平地，他们当做了田野，实际上是个湖。当然，对他们来说，湖本身并不危险，湖大概已经结冰。危险是在另外的方面，这使列夫丘克没敢向狼开枪。在绵延的山岗上，就是在黑夜里影影绰绰刚能看到的那个地方，列夫丘克知道，有一个叫做扎罗维耶的很大的村庄，这个村庄他们是经常绕着走的，离得越远越好。因为那里驻扎着德国的警备队，筑有战壕和明碉暗堡，并昼夜巡逻。在敌人警备部队的鼻子底下放枪就等于自杀，特别是在他们这种情况下。

但是这一群狼怎么办？

这群狼大概也感到，它们的领土快要到了尽头，在即将开始的新地带，它们就不是主人了。它们从两侧向这两个人迂回过来，并在雪地上站了起来，好象在等待着，看他俩下一步怎么办。

但是往前走还是过得去的。

为了利用对他来说这暂时还可利用的唯一的可能，他把冲锋枪挎到脖子上，使足力气，把科洛鲍夫背了起来。科洛鲍夫躺过的地方留下了黑色的血迹，他想，很显然对野兽

来说这是一种诱惑，使它们想到不久即将到口的外快。但管它的呢！既然这是扎罗维耶，就应该赶快穿过湖去。记得那面还有一个村子，也许那里还没有德国人，在那里可以找到好心人帮帮忙。

还差十几步没到长着芦苇的那个地方，这时他的一条腿突然陷进深雪里，他往另一侧一使劲儿，两条腿就都陷了进去。他立刻感到，是掉到水里了。这里大概是个泉子，或者是入秋以来尚未结冰的水洼。他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积雪扒开，踩到了硬地方，这时他发现两条腿膝盖以下都弄湿了，靴子里也灌满了水。他回想起执行这次任务之前，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巴什雷克用自己那双完好的皮靴换来了这双毡靴，于是就懊悔地骂了起来。现在还没有走上五十步，严寒就象一把钢钳有力地挟住了他的脚掌，以后的路可怎么走呢？

他背着科洛鲍夫好不容易才走到湖边上。他穿过了芦苇丛，又两次陷进了深雪里，不过没象第一次陷得那么深，没有沾着水。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对他来说，沾不沾水已经是无所谓了，甚至在水里走也可以。两只靴子结了冰，冰上的积雪有的地方已被风吹走，这样的地方更加难走。靴子冻得梆梆硬，踩到冰上很滑，差点儿没摔倒。这次他走了没多远，就感到应该停下来，不然就要连科洛鲍夫一起摔倒了。他小心翼翼地跪在铺着雪的冰面上，把科洛鲍夫轻轻地放了下来。

有一段时间，几只狼跟在那只翘着一只尖尖耳朵的头

狼的后面，懒洋洋地小跑着。头狼站下，整个狼群也都跟着站下。它们还在等待着，可是列夫丘克却失去了耐性。所有这些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向着他头上袭来，使他难以控制自己。他高声地、凶狠地咒骂起来，借以发泄自己心中的绝望。逃跑不可能，打枪也不行，难道要他们死在这个该死的湖上吗？

大概狼也感到了这两个疲惫人的无能为力，于是便毫无顾忌了。当列夫丘克和科洛鲍夫一动不动地在冰上躺着的时候，它们围成一个半圆形把他们包围了，并把往前去的通路也给堵死了。这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只留下一条二十来步宽的往回走通往树林的路，其他三面都给切断了。它们拉开很宽的距离分散在冰面上，但并不向人走近，只是远远的站在那里警惕地监视着他们。

“萨士卡，你看见没有？你瞧，它们在干什么？”列夫丘克激动地说。科洛鲍夫显然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头抬起来一点：

“算啦，你去吧。”他说道。

“怎么？它们立刻就会把你……”

“你去吧。把冲锋枪留下，走吧。”

“如果它们朝我……”

“不要怕。我留在这里……你弄一匹马来。”

“可也是呵！”列夫丘克的脑海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这还是一条出路。他从这个陷阱里冲出去，找到村子，弄匹马，再领些人来。假如科洛鲍夫能坚持到那时候，假如狼能

放他出去，假如他在村子里撞不上德国人，假如在这之前，德国人不发现科洛鲍夫……这个该死的“假如”也太多了，但是他没有另外的出路。

列夫丘克用他那暂时还好使的双腿，吃力地站了起来。他拿起了步枪。冻僵了的双手，好不容易拉开了发紧的枪栓，把子弹推上了膛。然后，他把卡在喉咙里的一块什么东西咽下去，就向着由这群狼所围成的这条链条的正中间奔去。他明确地意识到，如果狼不放他走，就会把他撕碎。这支步枪他只能当棍子使，而不可能用它射击，因为第一次射击就会给他们招来毁灭。好在扎罗维耶的德国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大概是他们为这个任务自制的伪装服救了他们。

列夫丘克勉强地抑制着内心沸腾的愤怒，朝着狼群走去。他只看见前面离他最近的这只狼，它把粗壮的尾巴垫在下面，正神色自若地坐在雪地上。列夫丘克拿着已经装好子弹、以防万一的步枪，如果狼不给让路，就准备用它敲它。狼给他让了路。它龇了龇牙，趴在两只前爪上，好象准备要跳跃一样，但是它好象也感到了人的愤怒和决心，在最后的时刻，还是往后再一跳，躲开几步把路给让开了。列夫丘克没有放慢脚步，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用眼角瞟着它，很快地又走了十几步，就从它们的包围圈里冲了出去。

这些狼并没有追他，马上又急急忙忙地把包围圈合拢了起来，并正在向着中间科洛鲍夫呆的地方推进。奔跑着的列夫丘克站住了，从这里他看不清科洛鲍夫，因为他穿着伪装服，可是狼他却分辨得很清楚。它们正信心十足地压

缩包围。随着包围圈的缩小，列夫丘克的心也收缩得更厉害了。他失去了自制力，撒腿就往回跑，朝着科洛鲍夫跑来，可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又拼命地沿着湖面朝着原来的地方奔去。

他跑了一会儿，连头也不敢回。冻硬了的靴子很滑，他摔倒了，屁股摔到什么东西上，摔得很疼。他急忙跳起来，而且到底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只见在朦胧的远方闪动着几个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既听不见叫喊，也听不到枪声，他向前跑得更快了。他很怕来不及，很怕不等他找到村子，狼就把科洛鲍夫吃掉。这个村子还不知道哪里去找呢，可是狼就在科洛鲍夫眼前，大概举起前爪已经够得到了。

尽管他已累得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仍在继续奔跑，还不时地回过头去往后看，并一直注意倾听着。他深恐发生最坏的结局：枪声或狼嚎。他紧张地凝视着前方，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焦急心情期待着村庄的出现。在奔跑中，他的两只脚已经麻木了，也许是热呼了，也许是完全冻僵了，他已经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但是他已经不去注意它们，只要它们还听使唤就行。

后面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列夫丘克屏住呼吸惊呆得一丝不动地立在那里。他以为，这是科洛鲍夫没有控制住自己。但是一遍又一遍的射击声太猛烈了，从远处湖面上传来响亮的回声。列夫丘克心想，回声太响了，这大概不是冲锋枪。好象是为了证实他的怀疑似的，立刻响起了步枪声，喊叫声，他完全不知所措。

他感到比狼群扑向科洛鲍夫更坏的事情发生了，大概和狼没有关系，这是德国人。但是他们是从哪儿射击的呢？听起来，好象是向湖面射击，莫非说他们已经发现了科洛鲍夫？列夫丘克感到科洛鲍夫的生命处在危险中，这时他撒腿就拼命地向回跑。

当他穿着自己结了冰的毡靴在无力地奔跑时，湖面上又响起了枪声，传来了喊叫声，可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赶到科洛鲍夫那里时，能做些什么，但是不管怎样，还是继续跑着。他有一支步枪，弹囊里有一百粒子弹，兜里还有两颗手榴弹，只希望赶到时科洛鲍夫还能活着。他的冲锋枪确乎沉默得太久了，令人可疑，机枪、步枪都在射击，可是冲锋枪却一直缄默不语。这种沉默是一种不幸的预兆，它在折磨着列夫丘克。尽管如此，他仍在跑着，也很可能是在向着自己的死亡奔跑，因为拯救科洛鲍夫的希望已经渺茫得很。

也许他还能赶在德国人的前面呢？

这种幸运的心理给了他以力量，使他跑得更快，而且射击很快也就停止了。有一两次他听到村边有谈话声，他想，德国人是刚往湖上去。假如他们是刚去，那么他可能还来得及……

但是列夫丘克弄错了，他们不是刚去，而是已经从湖上回来了。在那里他们代替狼，完成了自己的暴行。

当他看到不远处那堆芦苇时，一切就都明白了，当时他曾在那附近陷进水里，他把科洛鲍夫也是留在那里了。他认出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已被无数的人脚和狼足所

践踏，其中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斑斑的血迹。狼是一个不见了，科洛鲍夫也不见了。风从雪地上刮起来一绺一绺深色的兽毛。大概狼也遭了殃。但是狼倒无所谓。他们拖科洛鲍夫的躯体在雪地上留下的那道很宽的沟，向着村庄的方向伸去，从那里传来了由于距离远而听不太清的说笑声和那种习以为常的凶狠的骂人声。

列夫丘克勉强抑制着自己，没有哭出来。他在雪地上两脚交替着踏着步站了一会儿，就沿着湖面跑去……

14

几分钟以后，他清醒过来，坐了起来，又恢复了现实感。远方的、可能就是那个栈道那里的枪炮的轰鸣，使他又想起了周围的现实。他用两只手支在生满苔藓的草地上坐了一会儿，没有立刻睁开眼睛，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依然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当时正是黑夜。他的头，好象喝醉了一样，老是往下坠，他很想再倒在草地上，一直躺下去。他一边倾听着射击声，心中断定，战斗已经不在栈道那里，好象是转到科鲁柯夫斯克地区去了。就是说转到五一大队的头上去了，敌人也到了他们那里。

白天发生的一切象一片炽热的云雾在他的脑海里漂浮。但是要记起经历过的一切细节并了解其中的含义，看

来还需要时间。不过对他来说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他脱险了，在脱粒场里没有烧死，枪弹没有打着，他躲进树林里，现在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未因此而感到怎样高兴，在他的意识里，有一种不幸感，一种巨大的无可挽回的灾祸感，压倒了其他的一切情感，这使他内心感到疼痛。昨天晚上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当时他好象已经预感到了，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当时使他不安的是另外的事，而所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料到。的确，当时派他们去五一大队，那是平静而安全的地区，并不是叫他们去突围，叫他们去包围圈上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但是，看来最大的灾难往往恰恰是发生在人们最少料到的地方。

列夫丘克坐得更得劲一些，继续倾听着。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在天气晴朗的深夜，在杳无人迹的森林里才能这么静。诚然，他那富于警觉性的听力，能够分辨许多不大的、听不太清的声音，但是在几个月的游击战斗里，他已习惯于林中的生活，他知道，人的听觉夜间过于敏感，大部分林中的声音只是人的感觉，而真正可疑的声音，人们会立刻明确地感觉出来。风吹树梢发出的飒飒声，打破了林中忐忑的寂静。偶尔有干树枝掉在地上发出响声，和小鸟在树枝上跳动的声音，此外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倾听着远方的枪炮声，更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中，他想现在应该站起来，想法到五一大队去了。根据一切情况来看，只有夜里才能到达那里，白天是一定会被“讨伐者”们抓去的。

他摇晃了几下，站了起来，把巴拉贝伦手枪从前面推到了后屁股上去。肩膀肿胀发痛，大概应该换换绷带了，但是他想这件事明天再做。树林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撞在尖尖树枝或者树木上，他缩着脖子，伸着一只手。当然罗，这里树木稀疏、利落，松树底下几乎都没有矮生树。他在回想几个钟头以前来的那条路，应该出去再回到水洼去，再沿着林边向左拐。以后是什么地方，他记不太清了，但是他指望，根据射击的情况和星斗的位置能够判断方向。只希望别碰上德国人。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在黑暗的森林中，慢慢地走了好久，他象个瞎子一样，伸着手摸索着绕过树木，用脚在草地上试探着，绕过无数的树墩和一切可能遇到的木头和不能通过的树丛。他首先应该走出树林，他想树林就要快到头了，以后走的就能快一些。他始终还注意倾听尚未停息的枪声，但是他更关心的是路。他也没有忘记脱粒场里发生的事情。克拉娃怎样了，格里勃耶特的命运如何？这些问题在折磨着他。看来，格里勃耶特留在那里的可能性最大，他大概没有跑出来。但是克拉娃到哪里去了呢？她从脱粒场溜出来以后，就象钻进地里一样，他在哪里也没有看到她。

好象突然醒悟过来似的，他发现他不是向着枪响的方向走，他走的还是昨天来的那条路，枪响的地方早已留在他的左边了。但是他也不想改变方向。只是到现在他才明白，他正是应该到打谷场去。不先到打谷场去一趟，他是哪里也不能去的。

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列夫丘克感到万分焦急。在漆黑的夜里，他几乎在树林中跑了起来，不再注意树丛和树枝，向着他认为是脱粒场的那个方向奔跑。他重新体验着昨天所经历过的一切，内心火辣辣的，激动得浑身都颤抖起来。一点钟以前他认为是幸运的事儿，现在却变成了不幸。他确信，他不应该把格里勃耶特和克拉娃留在那里，也许当时他应该采取另外的行动。诚然，不管是当时和现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曾经竭尽一切努力想救出她，救出格里勃耶特，还有他自己。一种迟发的罪孽感很快地在他的意识里成长起来，一定是有的事他做得不太对，因为除他而外，大概谁也没能从那熊熊燃烧着的陷阱里逃出来，那里几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现在他首先应该到打谷场去一趟。有一种奇怪的感情驱使着他奔向那里，好象他还能改变那里的某种情况，做得比昨天做的更成功一些似的。当然，他也明白，现在什么都不行了，凡是还能做的事，大概德国人都已经干完了。可是这种奇怪的感情还是不可抗拒地驱使着他到那里去，就象驱使一个罪人到他犯罪的那个地方去一样。

他从灌木林里走了出来，这里正靠近他白天进去的那个地方。树林的喧响立刻平息，周围亮了起来，在宁静的大地的上空，是微微发白的夏季的天空，天空中有一条烟雾迷蒙的银河和稀疏的星辰。蝈蝈在草地无忧无虑地吱吱地叫着。前面发白的地方，就是黑麦地的地边，他几乎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打谷场应该就在这附近。

列夫丘克屏住呼吸，停了一会儿。但是看样子，警察们已经滚蛋了，象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暴行之后，恐怕是不会留在这里等他的。但是不管怎样，为了预防万一，他还是把那支巴拉贝伦手枪从皮套里悄悄地掏出来，用拇指顶着保险机，沿着林边走去。

他希望首先看到火光（打谷场不可能这么快就燃烧尽），但是前方是一片烟雾朦胧的田野，不管他怎样向那里凝视，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他有些诧异，心里想道，也许昨天离开麦地太远了？也许从林子里出来的地方不对。方向根本就搞错了？但是他记得，那里有条大路，他没有过这条路，就是说，不管怎样，打谷场和村庄就应该在这附近。

他这样判断着，增强了往前走的信心。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向前方凝视，不觉一下子掉进一个大坑里，几乎摔倒了。他从坑里一爬出来，就发现在灌木枝子的后面有一个微弱的火光。看来火光离得很远，因为它周围一点都不亮，它只是麦地上一个暗淡的发红的光点而已。列夫丘克静下来，甚至在灌木底下蹲了下来。不，附近好象一个人也没有，蝈蝈在平和地叫着，林子后面的射击声仍隐约可闻，但是射击声已经离得很远，它并不破坏这夜间的和谐的寂静。

他走走停停，小心翼翼地开始接近打谷场。他每走十步、十五步就要蹲下来，藏一会儿，向着地平线上发亮的地方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但是周围空旷而寂静，又过了一会儿，他从麦地里伸出头来一看，发现他已经突然出现在火灾场的跟前。一夜之间打谷场已经烧尽，

如今只剩下这黯淡的火灾场。

列夫丘克吃惊得停下来，好不容易才认出了他们的打谷场。脱粒场比昨天矮了一半，上半截全部烧毁，只剩下已被烧焦的下半部还留在那里，残存的部分，有不少地方，来风时还可以看到炭火。老远就可以闻到火灾场里的烟和烧东西时发出的那种令人窒息的臭味。他从黑麦地一出来，在黑暗中首先就看到了靠近这边的、带干燥室的一端，这里有更多的正在熄灭的烟火，来风时有的地方甚至还可以看到火苗的闪动，火星一直被吹到树叶已被烧光的那棵野苹果树上。

列夫丘克想到门那儿去。当时他把格里勃耶特就留在那里了，克拉娃也是从那儿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他不愿意从大路这面去，这条大路他有点不放心。于是他就悄悄地钻进黑麦地里，顺着麦地走，为了不弄出响声，他走路时脚抬得很高。从赤杨树丛到脱粒场这段路，比他昨天通过干燥室的墙缝向外监视时所感到的，看来要远得多。他在半路上停住，蹲下来，听了听，然后又站起来，并且尽量不把麦子弄得太响，从很远的地方绕过了干燥室。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还是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克拉娃，也许在这光线黯淡、被践踏过的麦地里能够发现她吧，但是克拉娃没在这里。可是话又说回来，克拉娃也不可能在这里。他想，不管是死的或者是活的，她一定是被弄到村子里去了。格里勃耶特也是如此。但是他要亲眼得到证实，他们的人这里一个也没有了，然后他就可以出发到五一大队去了。

从苹果树底下就可以看到他们昨天整个的院落。昨天他还在那里烧马铃薯，甚至在灰蒙蒙的草地上生过篝火的那个地方还可以看出黑色的痕迹。对面就是脱粒场的门。其中一扇已被烧坏，上面密密麻麻地有许多子弹洞，歪斜着挂在下面那个折页上；另一扇已经掉下来，扔在门的旁边。他发现那里有个好象人体似的东西，于是就从苹果树下跳出来。他尽量翘着脚，不出声响地跑到了门跟前。他蹲下来，有一种木炭和灰烬的气味很难闻，但是现在，还能受得住，不象昨天那么呛人了。烟火烤人，他把头扭过去，伸出左手去摸，摸到一个又湿又粘的东西，就赶忙把手缩回来。他第二次又伸手去摸，摸到了格里勃耶特的生满胡茬子、沾满了血迹的脸和烧坏了的衣服，这时他站了起来。火灾场难闻的臭味令人窒息。他喘了口气，又弯下腰，到他身子的旁边去摸，竭力想摸到车夫的步枪，但是没有摸到步枪，却摸到了他的羊皮帽。

他手里拿着这顶棉帽离开脱粒场已有十步远了，可是他的视线依然不能从地上那具发黑的尸体上离开。他们中间虽然没有什么深厚的友谊，但是他们在游击队里早认识。车夫的死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怜悯和愁思。在过去，他们大家一起去干各种冒险的事，可是现在格里勃耶特被打死了，躺在他的面前，而他列夫丘克却还活着。他想，也许当时应当先救出这个老头，然后自己再走。但是当时他们俩都想救克拉娃，克拉娃没有救了，他自己由于一个幸运的机会脱了险，而格里勃耶特却牺牲了。

但是他的帽子还是完好的，好象并没有烧着。这顶用一块老羊皮马马虎虎缝成的皮帽，无论是严冬或盛夏，从无替换，一直都为这位车夫服务。他特别关心自己曾一度被枪打过的脑袋，注意保护它，不让太阳晒着……现在列夫丘克生动地回忆起格里勃耶特被枪毙的那幅可怕的情景和他那令人惊奇的复活。那是在切尔诺列斯克，在寒冷的四月的一天晚上，列夫丘克和卫生员威尔赫维兹正在沼泽地上篝火旁边烤火。爱说话的威尔赫维兹讲述着，白天小伙子们是怎样从维谢尔基把被德国人打死的格里勃耶特拉回来的。他是在他自己那个空荡荡的家园的旁边被抓住的。不知是宪兵特意在那里等候的，还是偶然遇到的，不过这一次他们把他的家彻底地捣毁了。宪兵队长让他面向白桦树站着，用手枪在他的后脑勺上开了一枪。夜里侦察排的小伙子们发现了他那已经咽了气的身体就拉了回来，准备第二天和另一个被德国人枪毙的人一起埋葬在山岗上。这天夜里，他们坐在篝火旁都为这个老头儿的遭遇感到难过，这种遭遇即使在战争中来说，也是异常残酷的。他们唠了一会儿就谈起了别的事。他们光顾自己谈话了，隔着烟火，谁也没有注意这时篝火对面来了一个人，他冻得哆嗦着，搓着冻僵的双手，开始在篝火旁边坐下来烤火。

“在你们这儿烤烤火，他妈的，不然要冻僵了……”

“格里勃耶特！”威尔赫维兹惊愕得跳了起来，“你怎么？”

“我是说，要冻死啦……棉袄不知谁给拿走了……”

他们两个惊奇地凝视着他。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地伸出手来烤火，关于他自己死而复活的事连一句话都没说，他们也没敢再问他什么。第二天早晨，同他俩一样感到惊奇的巴依金给他做了检查。他在卫生所躺了两周，然后就留在那里当了车夫。头上的枪眼愈合了，疼倒不怎么疼了，只是从此就几乎完全不能入睡，而且要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头，从来不敢叫太阳晒着。

你看，他到底还是没有脱过，他这是第二次被枪毙了，这一次算是无可挽回地被打死了。

他在死者身旁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心里感到悲痛。他想，应该把这具已被烧坏的尸体从脱粒场里拖出来，葬到林子里去，留在这个火灾场里烧掉是不合适的，他这一生本来就够倒霉的了。

他一边注意倾听着深夜的寂静，一边把手枪放进枪袋里，扣好扣，又向门口走去。但是他刚向尸体俯下身去，附近什么地方就传来了狗的狂吠声，村子外面升起了照明弹。列夫丘克被这意外的情况吓了一跳，在这颗照明弹的无情的光亮之下，他缩成了一团，但他立刻就返回来，藏到了苹果树后面的阴影里。这颗照明弹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火光，在快要到达打谷场的时候，就坠落下来。它摔在地上，又跳了起来，然后很快地就在脱粒场的旁边熄灭了。它刚一灭，列夫丘克撒腿就往麦地里跑，他的心都好像停止了跳动，他一边跑一边想，他到底被发现了没有。但是暂时还没听到枪声，而第二颗照明弹已经完全是在另外的方向，是在大路

和树林的上空了。整个火灾场及其周围被它那不自然的无情的闪光示威似地照得通明。但是，列夫丘克已经有所准备，他往下一蹲就敏捷地藏到了麦地里。在这里就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照明弹他不怕，他怕德国人，特别是怕警犬。在那个烧毁的村庄里，那只警犬的凶恶的狂吠，他还记忆犹新，使他不寒而栗。

这颗照明弹也熄灭了，这时他就跳起来，顺着麦地向着赤杨树丛奔去。但是不知是什么东西惊扰了他，他感到慌乱，蹲下来，回头看了一下。什么地方好象有个声音，而且好象是婴儿受了委屈的哭声。他静下来，屏住气，倾听着。他吃惊地想，莫不是他在麦地里产生了幻觉，可是这时从不远处又传来了婴儿的微弱的哭声，比第一次听得更清楚。但是他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很明显，他正要被包围在麦地里，警犬很快就会出现。这时列夫丘克好象突然想起来似的，撒腿就朝赤杨树丛那个方向奔去。

要不是正在这时打来一梭子曳光弹，照亮了黑麦地的上空，拦住了他的去路，他大概已经跑进树林里。为了避开曳光弹，他不得不在麦地里的干燥的土地上再卧下来，倾听着不远处赤杨树丛里子弹头的爆炸声。这些爆炸声好象有意摹仿似的，可笑地重复着远方的有力的射击。现在他确信，他已经被发现，而且知道枪是从大路上打来的，因此又得按着昨天那条路走，即在麦地里绕个半圆形，奔向赤杨树丛。曳光弹一灭，他就跳了起来。在开跑之前，他先在麦地里拐了一个半圆形的弯。他微微俯下身子，倾听了一下，这

时他突然发现，离他不远，地上有个白色的东西，他又惊又喜，急忙奔过去，大概他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他把这个热呼呼的活团团抱了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沿着更大的圆弧跑去。他感到克拉娃也可能在这附近。但是这里没有，只有她的婴儿不知怎样落到了这里。迷惑不解的列夫丘克顺着麦地向赤杨树丛奔去。

“咳，坏蛋！哎，这些坏蛋！”他一边回过头去往后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听见警犬的狂吠声已经就要到跟前了。毫无疑问，它们已经嗅出了他，它们随时都能在这麦地里把他追上。但是幸运的是，黑呼呼的赤杨树丛就在眼前。他抱着小孩刚刚钻进这个救命的黑影里，后面就升起了一颗照明弹，长长的一梭子爆炸子弹噼噼啪啪地打在树枝上。照明弹的耀眼的闪光混合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阴影，从他的身后照射着。几颗曳光弹闪着光从他的头顶上穿过，子弹头的爆裂声向他袭来，树枝上被削下的木屑掉在他的身上。他心里惊慌地想，这样走不远，抱着婴儿逃跑是不可能的，这时他突然侧身扑倒在地上。但是现在后面有警犬在追，在这样的时刻，他不能把他扔掉。他不知道，一分钟以后，将会是什么情景，但是他用左肩分开树枝，用上衣的底襟遮着婴儿，不顾一切地钻进树林里。婴儿感到他身上的温暖，在潮湿的襁褓中安静了下来，只是有时轻轻地蹬动一下小腿。

黎明时，他正赶到一个没有人烟的沼泽地的边上，这是在一个稀疏的有许多土墩的赤杨树林里。

新的一天来临了。异域的晨曦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周围的灌木林、黑魑魑的弯曲的赤杨和脚下多草的沼泽都已现出了轮廓。这是个生地方。列夫丘克早已迷失了方向，正沿着一些变成了沼泽的小树林和树林残址兜圈子。他穿过一小块湿漉漉的草地，又藏进了茂密的赤杨树林里。有一片很密的云杉幼林，他没有进，从它旁边绕了过去。他不住地回头看，并且倾听，当然，就是不看也很明显，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警犬时高时低地吠了整整一夜，一直在跟随着他。在黑暗中，它们落后了一些，但是没有被甩掉，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追得更紧了。

他怀里抱着这个热呼呼的小肉体，感到很不习惯很不熟练。他盼望能早点遇到个村子，守林人的小屋，或者只是林中一个偶然遇见的行人也好，以便把婴儿托付给他。他自己不管怎样努力，是不能救出这个生命的。他没有这种可能性。而且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德国人他是摆脱不掉了。昨天他们是七个人，夜里又增加了。他们有机枪，有警犬，有照明弹。看样子，他们是企图干件罪恶的勾当，而且

他们是有力量这样干的。而他这个傻瓜还想从这里去五一大队呢，真算找对了地方！

他沿着一片长满赤杨的沼泽地的边缘疲倦地跑着，他决定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是绕过沼泽还是跳进水里。他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还可以找一个掩蔽的地方。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大情愿跳进冰凉的水里的。他想，沼泽地总会有边，他可以绕过去。但是根据一切情况判断，这片沼泽是很大的，它是从很远的地方延续下来的，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岸边，跑了近一小时，还没走到头。现在枪声在右边，但是后面和左面，也有零星的枪声。看样子，四面都有了战斗。他已经跑进了无人知晓的林中的死胡同，跑到了敌人正把他往那里追赶的地方。

婴儿在怀里越来越不安，开始蹬着脚乱动起来。但他被丝绸裹得很好，暂时还忍耐着没做声，可是列夫丘克非常担心，要是他突然哭起来可怎么办？难道他能够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吗！如果遇不到幸运的机会，他们俩很快就会被冲锋枪的扫射打死在这片灌木丛里！他们可能死于警犬，再不就是被活捉，给带到大路上，挂着下颏吊在电柱的脚钩上绞死，让他们活受罪，就象他们支队的联络员特洛菲姆在车尔奴士差曾经遭遇过的那样。

列夫丘克始终还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在德国人追上以前，他能遇到好心人，以便把婴儿交给他们，剩下他一个人，那就方便得多了。他用不着总躲藏，可以找个方便的地方，伺机向这些败类还击。当然，为此应该有机枪，至少得有冲

锋枪，但是手枪他打得也不错，他当侦察兵时学习过，只是怀里抱着婴儿他就不能这样干，因为没有把握，他不愿意白白拿自己的命运作试验。因此他始终是走着，跑着，穿过草丛，竭力想把沼泽地绕过去。

这片沼泽地实际上也真象是无边无际似的。从夜里开始，他遇到的净是些灌木丛、草地、柳丛和赤杨树丛，任何地方也没碰到一个村庄。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成功和耐力了。遗憾的是他的体力和条件都越来越差。他了解这一点，但是他很想保卫这个婴儿。他怀着一种还不十分理解的希望，来营救这人类生活的雏婴，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和他分开了。的确，这一路上托付给他的那些人，都一一相继地死去，只剩下这个谁也不知道、大概也是谁也不需要的婴儿了。扔掉他是最简单不过的，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责任。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列夫丘克才不能抛弃他。这个婴儿联系着他和他感到珍贵而且已经不在的那些人，譬如：克拉娃、格里勃耶特、基赫诺夫，甚至还有普拉东诺夫。此外，他可以说明列夫丘克遭受苦难的原因，可以为他的错误辩护。如果他不营救他，那么他为了生命而疯狂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什么呢？对个人的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因为他太清楚了，要想活过这次战争并不那么简单。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老弟！”他赞许地对婴儿说，还没有发现由于长时间的沉默，自己的嗓子已经变哑，“我们还是希望的……”

警犬的凶恶的狂吠声越来越高，隔着很远就给人听到

了。这也许更好。列夫丘克倾听着，它们如何渐渐接近他，心里感到很可惜，兜里连一撮烟叶也没剩，不能消除自己脚印的气味。他想，现在大概得跳进水里，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这里的岸坚硬而陡峭，长着一些白桦树，离水洼也比较远。他顺着原来的方向向前跑了五十来步，然后突然转回来。在这里，长着一些苔藓的水洼离岸比较近，他往旁边纵身一跳，并竭力不在草地留下痕迹，就钻进不远处一些长得很密的黑呼呼的柳丛里。开始时水并不深，还没没膝，以后就越来越深。他后悔没拿一根棍子来，但是有棍子他怎么使呢？在水洼里，在空旷的水面上，有一些长着柳丛和赤杨树丛的土墩，列夫丘克明白，这里水不太深，还不会淹死。

他怀里抱着婴儿，用左手抓住树枝，急急忙忙地从这个土墩走到那个土墩，越来越走进深水里。在离岸五十步远的地方，稀泥已经没膝，含有泥炭和泥土的浑浊的污水很快地就到大腿根儿。他想，可别再深了，不然婴儿怎么办呢？但是很明显，水洼逐渐加深，土墩在减少。在土墩和土墩之间，闪耀着一些空旷的黑色的水面，水面上漂浮着睡莲的掌状的叶子。列夫丘克知道，睡莲喜欢深水。他不到那里去，尽量靠近土墩，以便抓住那上面的苔藓或树枝。他很着急，但还得尽量悄悄地走，不要把水弄得太响，叫远处都听见。他不时地停下来，倾听着。有一次，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好象是吆喝声。他停下来，叉开双腿屏息站在那里，可是这时又什么都听不见了。看来，声音离得还很远，还不能传到

他的耳朵里，这就是说，他还有一点时间。当他站下倾听的时候，他的两腿深达膝盖陷进粘腻的淤泥里，他费很大的劲儿才把它们拔出来，先拔出一条来，然后再把另外一条拔出来。当他在水里走的时候，上衣的下摆给弄湿了，他想，不久衣服都要弄湿，到那时用什么东西包婴儿呢？

他勉强走到一个生满苔藓和白菖蒲的土墩跟前，靠在那上面，小心翼翼地把上衣脱下来，用它把婴儿包好。小孩蹬动蹬动小腿，可是没哭。上衣里还很暖和，婴儿就乖乖地在那里安静了下来。

“这样很好！你躺着吧！主要的是好好躺着不要哭！也许我们还能设法……”

他站在深达胯股的凉水里，向四面观察，看看下一步该往哪里去。要是附近能有一块干的苔藓地、小土岗或者小岛子该有多好，可以藏在那里，避开警犬，躲过追踪。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水洼越来越深，土墩越来越少。他在水中从一个土墩走向另一个土墩，不得不冒着越来越大的没顶的危险。他把裹着婴儿的小包举得越来越高，尽量用脚在水底下试探着，脚常常绊在灌木和水草的根子上，走起路来东倒西歪。有时失去平衡，几乎要摔倒。脚底下踩起来的浑浊的污水，很快地就在水面上扩散开了。这时天完全亮了，不知为什么，这里并没有雾。在这清晨的晴朗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散开的白云，四周非常静。就在这一片寂静中，他的听觉高度紧张，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被激怒了的犬吠声。

他想他们已经来到，就在水洼的跟前了，他惊慌地回头看了一下，使他感到吃惊的是，他怎么离岸才这么远。他不顾溅水声，急忙向最近的一个土墩奔去。有一个赤杨树杈从那个土墩上斜着伸出来，一根树枝正垂在水面上。也真倒霉，这个土墩很小，而且正靠近水最深的地方。他走到那时，全身都已湿透。甚至包着婴儿的上衣都沾上了水。而且这几步路他耽搁的时间太多了，他们已经来到跟前，也可能已经听到他在这里。为了应付最坏的情况，他把用上衣裹着的婴儿放在长着苔藓的土墩的边上，用一只手扶着他，而用另外一只手掏出了手枪。这里水深齐胸，他把脑袋藏在树枝后面等待着，他想，如果他们带着警犬走进水洼，那他一定先看见他们。

小孩千万可别哭。

的确是他先听见的，他还没看见人，就先听见动静了。从灌木丛中传来了当官的那种不清楚的、闷声闷气的吆喝声。岸上那颗赤杨的几条树枝动了一下。列夫丘克更深地沉进水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没有被灌木丛挡住的很窄的那一段岸边。他屏住呼吸，用拇指轻轻地推开手枪的保险机，这时他看见他们已经来到水洼与灌木丛中间这块不宽的岸边上。

最先从灌木丛里出来的是一条腰上带有浅白色斑点的深棕色的警犬，它一面用嗅觉灵敏的鼻子在地上嗅着，两只贼溜溜的眼睛左顾右盼，一面沿着他的踪迹向前紧追。牵狗的人穿着带斑点的侦察兵的服装，戴着大檐的棉帽，他分

开树丛，急急忙忙地跟在狗的后面。随后出现的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也用一条长带子牵着一只狗。他们刚一跑过，钻进灌木丛里，整个一群野兽就出现在岸边上：十个身穿同样的伪装服、手执冲锋枪、腰上带着背兜、水壶和望远镜的德国鬼子。他们在岸上拉成长长的一行，一面东张西望，一面沿着他的踪迹向前跑去，这些人随时都可能用冲锋枪向他射击。

“咳，坏蛋！哎，这些坏蛋！”他用已经冻得麻木的嘴唇小声地诅咒他们。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太糟了，如果他们不离开他的踪迹跑过去，那么他在这里是呆不住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给赤杨树丛挡住看不见了。他只听见树丛里树枝噼噼啪啪地响。他想，他的一切就决定于眼前这几秒钟了。他们是走过去还是返回来？但是不一会儿那里就传来了警犬的不知所措的尖叫声，也听到它的主人的严厉的吆喝声，还有用德语讲的一句什么话，声音不太高。他知道这是警犬失掉了线索。他齐肩沉进水里，头又稍稍向一侧歪了歪，以便完全隐蔽在土墩的后面。后来他回头向后面看了一眼，看见在很宽一条黑色的水面后面有一堆浓密的柳树丛，那里可能更安全。刹那间，他克服了自己心里现在要冒险到那里去的愿望。尽管这时去那里还有可能，但是他抑制住了自己，看来现在恐怕还是应该留在原地。很遗憾，由于时间不够，他离岸太近了。要是他早决定下水来，也可能就得救了。

不，他们没有过去，他们返回来了。

他看见，德国人还是按着原来那个顺序，一个接着一个沿着他的踪迹又从灌木丛里返了回来。他缩成一团，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他们。他的心好象都停止了跳动，他深怕他们突然停下来。要是他们停下来，警犬再向水洼里一摆头，那时他就一切全完了，就算彻底地交待了。

看样子，他们从他拐弯的那个地方跑过去了。毫无疑问，第一条狗是跑过去了，牵狗人也跟着跑过去了，其他的人跟在后边。这时他在靠近岸边的水草上，看出了自己的脚印，一点不错：几处被踩倒的水草和从水底踩起来、还没沉下去的浑水，看得还很显眼。他吓了一跳，上帝呀，这也太粗心大意了！而且离岸还这么近！他们千万可别发现，快跟着狗跑过去吧！由于冷和紧张，他全身都冻僵了，他监视着，看着德国人从附近小白桦树下跑过去：一个，两个，三个。还有三个人。最后的一个：一个笨手笨脚、脸面松弛、满脸是汗的胖子也跑过去了。列夫丘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也许，这一次也能躲过去……

他的两只脚深深地陷进淤泥里。为了把它们拔出来，他俯身靠近土墩，他的脸正好俯在婴儿身上。这时婴儿在上衣里边，正开始不安地乱动起来，好象是要把它踹掉，看看外界在干什么。列夫丘克把上衣的底襟稍微掀开一点：婴儿的小脸不满地抽皱了起来。他大概要哭，一想到这儿，他马上就害怕了。为了不叫他哭，他从土墩边上拔下一根白菖蒲，把小草根塞到他的嘴里——你吸吧！他果然也就咂着嘴吸着，静了下来。列夫丘克想，不知这能否持久，不过

总算把小家伙哄住了。

随后，他紧张得呆住了。可以听到，德国人就在不远的地方。他想，他们回来了，不过暂时还没有到：大概，他们正在努力，想要找到失掉的踪迹。这时他听到了他们的互骂声，不知是谁的响亮的招呼声以及人们对这声招呼的回答。人们的回答声显得这么近，就象坐在他的对面一样。列夫丘克又隐蔽起来。他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又警觉了起来。

趁着他们还没来到跟前，趁着他们还没发现他的脚印，他开始四外观察，想找个更好一点的掩蔽所。他禁不住那堆柳丛的诱惑，很想藏到后面，或者更远的地方去。他刚想到这里，突然看见对面有一个德国人：把栓在一起的两只靴子挎在脖子上，看来是按着他的脚印，光着脚走进水洼。另外一个人手里端着冲锋枪站在岸上，嘴里一边说着一些什么，好象在鼓励他的同志：

“Vorwärts, dort ist's nicht tief!”^①

“Hier ist eine Kluft,”^②光脚的那个人不满地唠叨着，一面犹豫地用脚在水里试探着。

列夫丘克又用拇指推开手枪的保险，把它探在赤杨树下面的一根枝子上。列夫丘克决定，不等这个德国人走过漂着浮萍的那块水面，就开枪把他打死。这个德国人是别想回去了。然后，岸上站的那个德国人一定要向他射击。也许他还能来得及放第二枪，把那个人也给打下来……

① 往前走，那儿不深（德语）。

② 这是个大坑（德语）。

好啦，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经受了多少恐惧和激动呵！可是这一切结束得又是多么简单而又愚笨。

象平常在绝望的时刻一样，他现在既不恐惧，更不惊慌，他的头脑开始清晰而精明，手也变得准确而有力。在这样的时刻他打得很准，是不会打不中的。这个德国人好象也感到了即将临近的死亡，他轮换着高高抬起他那两只裤腿挽在膝盖以上的苍白的瘦腿，不慌不忙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每当他弯腰时，他那两只靴子和用右手握着的冲锋枪就在他肚子的旁边动荡。他偶尔也从帽檐底下往前瞥几眼，但主要还是瞅着自己的脚下，以便确定下一步往哪儿迈。

“没关系，这样也许更好一些。来吧，你来吧，坏蛋！”

他就这样向前走着，正在给列夫丘克、同时看来也是给他自己带来死亡。

这个德国人来到了一堆枝叶蓬乱的鼠李跟前时，水深已经没膝。他用手抓住一根树枝，可是这时他脚底下一滑，就侧身倒在水里，他越挣扎着想站起来，就陷得越深，他一不小心手把帽子还碰掉了。帽子徐缓地漂着离开他，很快地就沉进水里。他把周围的水都搅混了，已经分不清路，于是就转回去，朝着岸上走去，还一边对他那个同志生气地说着一些什么。他那个同志站在岸上，哈哈大笑，简直把肚子都笑疼了。

这个德国人披挂着一身水藻，从水洼里走出来，浑身湿淋淋的。他一边继续不满地叨咕着，一边脱衣服。他把上

衣、裤子以及其他等等的东西都脱了个净光。他们两个把他的湿衣服拧了好一会儿。列夫丘克眼睛盯着他们，整个身子都冻僵了，冻得直打冷战。他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干完这些无聊的事，从这里滚蛋呢！这时德国人已经穿好了裤子，穿好了天蓝色的网状的汗衫，开始穿鞋了。他的那个同伴——一个年青的胸前挂着手电的长腿的上等兵，对着灌木丛喊了一句什么，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回答他。列夫丘克听到，在岸上的什么地方，有扳动枪机的响声。这又使他警觉起来——又将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次也没有久等。远处传来了一梭子回声很大的冲锋枪的射击声，枪弹吱吱地尖叫着急速地从水洼上空穿了过去。列夫丘克不明白，他们这是往哪儿打？这里除了他以外，好象一个人也没有。但是他们也没发现他呀！而且枪不是从这里打的，而是从离这儿不远，牵着警犬的那伙人跑去的那个地方打来的。也许那里发现了什么人，也许是发现了游击队？这两个德国人也向着枪响的地方跑去。后边这个人，一边跑，一边穿上衣，把冲锋枪从这只手换到那只手里。

列夫丘克决定再往水洼里边走走，他刚把小孩抱起来，从那里又打来一梭子子弹，正好打在他跟前，还溅了他一脸水。他又隐蔽起来。他俯身趴到土墩边上长着的苔藓里，把婴儿放在自己身子的下面。但是很快他就明白了，这是偶然打来的子弹，是往别处打的，根本不是打他。他又齐肩缩进水里，两眼紧盯着已经无人的岸边。

过了一会儿他才看见，那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岸上又排成狼群的队形，一边不慌不忙地绕着水洼走，一边用冲锋枪开始对它进行射击。

列夫丘克的情绪刚刚好一点，现在又低落了，真是祸不单行。他没有被狼吃掉，躲过了德国人，可是现在又遭到这样盲目地扫射。他悄悄地沉进浑浊的水中。在战争给士兵所准备的一切可能的命运里这不是最好的。如果他们把他和小孩一同打死那还好，万一只剩下婴儿……

大概枪声也惊扰了婴儿，他真的不安起来，在他的上衣里开始悄悄地哭起来。列夫丘克把他抱得更紧一些：要是他们听见了，可怎么办？特别是那些警犬。射击刚开始，这些狗就用各种各样的调门狂吠起来，由于过度热心，狂吠得都失了声，要是它们一听见，就会向水洼里扑来。但是，可以理解，十支冲锋枪的扫射声，首先是震聋了这些狗和射手本人，使他们听不见远处婴儿微弱的哭声。

列夫丘克失掉了先前的一切希望，忧郁地注视着那些密集枪弹的光痕，看它们如何正逐渐地接近他藏身的这个土墩。德国人毫不吝惜子弹，他们扫射水洼里的每一个土墩，每一块苔藓，每一棵小树。子弹在水洼中溅起无数的水花，水面激荡着沸腾了起来，水和泥混合在一起。树叶、菖蒲、细小的树枝飞扬起来，绿色的浮萍随同水柱一起也飞到了空中。被密集的枪弹射中的赤杨的树干，在它那黑色的树皮上到处呈现出白色的斑点。这次射击的火力之猛，除了四一年柯布林前线的激战以外，列夫丘克很久没有经历

了。在这里要想幸免于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拱着背，缩成一团，躲在土墩后面，尽量地沉进水里。遗憾的是，不可能把婴儿也放进水里。婴儿始终是浮在水面上，只盖着一层薄薄的苔藓。恐怕他要首先被打中。但是打死他的那梭子子弹，也不会饶过列夫丘克，因此他们就将同时丧命。

“咳，坏蛋，这些坏蛋！”

列夫丘克看到，胸前挂着手电的那个长腿的上等兵，又出现在岸上，还是在没有被什么遮住的那一段上。他从灌木丛里出来，把冲锋枪往肩上一靠，对着水洼就打了长长的一梭子。夹有曳光弹的十颗子弹使离岸最近那个土墩上的草和苔藓飞向空中。随后下一个土墩上赤杨树的树叶也给打飞了。子弹一直在向列夫丘克接近。怀里的婴儿好象也预感到了自己即将来临的死亡，就尽情地哭了起来，但是在冲锋枪的猛烈的射击声中，就连列夫丘克自己也听不太清。他注意观察曳光弹的闪光，以便及时地抓住最后的机会，并竭力要忍耐到那个时刻。现在再继续忍耐下去已经没有必要。

这时岸上已经有三个人了。第一个突然跑了过去。可是另外两个却同时端起冲锋枪疯狂射击起来，密集的枪弹象一阵风，从他藏身的那堆赤杨树丛旁边掠过。不知哪里的一个小鸟巢被子弹打下来掉到了水面上，空中飘浮着白色的绒毛，有几只小羽毛落到他的头上和土墩上。列夫丘克用一只手紧紧地按着婴儿，尽可能把他更低地塞进苔藓

里，另一只手用手枪对准了岸上。他决心要打岸上站着的那个德国人，那个人刚换了弹盘，正准备做新的射击。不错，对手枪来说，距离稍远一点，由于紧张和寒冷，他的手也不太好使了。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瞄好了准。这时他发现他们仿佛是在向空中射击，他们的枪弹都从他的头顶上飞过，打到远处去了，于是一个新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里。他悄悄地回头看了一下，他看见后边那堆柳丛有那么多多的叶子都飞到空中去了。不久以前他还想要到那里去呢！这时他才明白，德国人认为那里最可疑，所以才尽量地向那里射击。

列夫丘克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才水洼上空的一阵冲锋枪的轰鸣震聋了他的耳朵。他把怀里的婴儿抱得更紧一些，他几乎听不见他那微弱的哭声，只是感觉到他在他的手上无力地动弹着。千万可别憋闷死，列夫丘克心里这样想着，抽搐地咬紧了牙关。他冷得要命，在这样一动不动极端疲惫的状态下，几乎再也无力忍耐下去了。

但是很明显，射击声转到别处去了。大概这里的一切都已被他们扫射过了。在周围的菖蒲上，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新鲜的赤杨树枝，水面上浮着很厚一层树叶。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颗被子弹扫射断的白桦树的树头，仅仅连着一层薄薄的树皮，倒垂在水面上。

水洼的这面开始静了一些，德国人似乎已向右边转去，这时，他终于拿定了主意，要挪个地方。他拿起裹着婴儿的小包，用左手抱着他，右手拿着手枪，为了不溅起水声，就轻

轻地朝着被许多枪弹射击过的那堆柳丛走去。恐怕是不会对它进行第二次射击了。

这里还可以隐藏，尽管遭到射击以后，柳丛的枝叶显著地变稀了。水面上到处漂浮着柳树的叶子和水藻的白根。水藻和绿苔象植物的蔓一样挂在被打坏的柳枝上。他心里惊奇地想，既然有一种什么东西制止了他，当时没有叫他到这里来，那就是说幸运还没有离开他。如果那时他到这里来了，那么现在他一定已经流尽鲜血，倒在这里了。

“别出声，别出声，老弟。再安静一会儿，”他对婴儿说道。他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四外看了看，就在齐腰深的水中，侧着身向水洼里走去，他有时弯着腰，有时几乎是在游泳。他心想，如果这回不淹死，就能把他救出去。

16

大约过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树木和灌木丛都落在了后边，无底的深坑也已经走完。水面上的水草和苔藓开始增多。有的地方虽然水还很深，同先前一样，依然水波荡漾，脚下还有草墩，但是大概不会淹死了。射击声渐渐地转到了右边，在那里，冲锋枪的哒哒声和弹头发出的吱吱声仍在震撼着沼泽地，惊散着沼泽地上胆怯的小鸟。就是那些习惯接近人的喜鹊，也被吓傻，它们悄悄地飞过水面，离开这

个吓人的枪炮轰鸣的地方。

列夫丘克把婴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他跑着，跳着，在那诱人的不稳当的长着苔藓的草墩上摇晃着，有时跑了过去，有时还没等走过去，草墩就沉进水里。他不止一次地掉进齐腰深的含泥炭的稀泥中，有时掉在这边，有时又掉在那边，他急不可待地想挣扎出来，踩到什么硬的地方。湿漉漉的衣服粘在身上，使人讨厌。每走一步都有褐色的锈水溅到脸上。但是他已经暖和过来，不再冻得发抖。他唯一关心的是，可别马虎大意，把裹着小生命的小包掉在水里，对于自己他已经是无所谓了。最困难的阶段看来即将过去，沼泽地已经走完。前面山岗上一片苍翠的松林，这就说明已经来到岸上。可是在苍翠的岸上，是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呢？

他终于从水洼里走了出来。踏着泥炭地向着长满了岩须草的沙质的山岗走去。地下虽然还很湿，但已经是稳固的了。他的两只靴子里老是噗哧噗哧地响，踏在干地上还有些不习惯。他的样子一定很可怕：不仅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而且全身粘满了青苔，肩上和袖子上挂着丝状的水草，衣服上全是些浮萍以及其它绿色的东西。但是小孩看来并没太湿着，如果说他在他的上衣里不安地乱动并且在哭，那主要是由于饿。这个哭声在催促着他。沼泽地那面的枪声，已经不那么可怕，对他来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威胁力。现在驱赶着他的是新的问题。

他跑着。他为婴儿的生命担心，他不愿意耽误时间来

拧干衣服和休息。他登上山岗，穿过浓密的松林，来到一条狭窄但已经踏得很平的林间小道上。“既然有路，那么不定在哪儿就一定有村子。”他心里这样想道，感到松了一口气，“只是千万可别碰上德国人。”

他沿着小道疲倦地跑了大概有十分钟。由于他这一跑，婴儿渐渐地安静了下来，不知是睡着了，还只是由于晃荡的缘故，后来就完全不出声了。这时列夫丘克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他向林中察看，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把靴子好好穿穿。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这里没有德国人，他还不知道得走多远呢！靴子里有水，包脚布子也掉了，这样很容易把脚磨坏。

他看见大路旁边齐腰深的、丛生的鳞毛蕨，刚想要到那里去，就突然听到附近有说话声和马蹄声。他急忙离开大路，但是已经迟了，骑者们在马上已经发现了他。他猫着腰躲在一棵璎珞柏后面，紧张地等待着，希望他们走过去。但是他们没有过去，大道上的马蹄声突然中断，这时有人几乎就在他的头上，用命令的口气喊道：

“喂，出来！”

列夫丘克愤怒地骂起来：又碰上一些什么鬼东西？听声音，好象是我们的人，但是谁知道呢，也可能是德国人，或者警察。他没放下婴儿，就小心翼翼地把巴拉贝伦手枪从枪套里抽了出来。他在璎珞柏后面悄悄地弯下腰，想探头往大道上看一眼。这时他突然看见，他们已经来到了跟前。他们大概也看到了他。这是三个骑者，是游击队的打扮，谁有啥穿啥。他们正睁大眼睛盯着丛生的鳞毛蕨，把苏式

冲锋枪的枪口对着他。

“举起手来！”

不管怎说，他们还是很象游击队，虽然列夫丘克也并不能完全相信这点。他把小包放在地下，从容不迫地从树丛后面站起来，把拿着手枪的那只手藏到身后去。他这种慢慢腾腾的动作，显然使骑者们很不满意。其中一个穿着褪了色的旧制服、后脑勺上戴着库班帽的年轻的小伙子，猛然拨转马头对着鳞毛蕨丛。

“把手枪扔掉！举起手来！”

“好啦，”列夫丘克和解的说，“是自己人，用不着这样……”

“我们这就看看，你和谁是自己人！”

列夫丘克已经确信无疑，是遇上了游击队，但是他不愿扔掉手枪，因为他不清楚，是否还能领回来。所以他在拖延时间，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这时他们已从大道上走下来，不知不觉已经开始把他包围起来，也许，真得把手枪扔掉举起手来吗？

“你瞧，他是从水洼里出来的！”另一个尖下颏的青年猜测道。

“真的，是从水洼里出来的，是从对岸上来的。”第一个青年看他有点象自己人了，说着就从马鞍上跳了下来。

这时从侧面又有一个人骑着马走过来，这个人看样子比前两人年纪大些，宽肩膀，灰色的棉袄敞着怀，新刮过的脸上留着小黑胡，列夫丘克感到很面熟。这个人好象也在

回忆什么似的，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林中遇到的这位不寻常的人。

“等等！这不是英雄大队的吗？你姓——列夫丘克，对不对？”

“列夫丘克。”

“你还记得不，我们一起去破坏一个铁路的会让站？那辆轨道车扫射我们，打得多凶啊！”

列夫丘克一切都回忆了起来。这是去年冬天，在一个会让站上。当时他和这个留小胡子的人把一根枕木往铁轨上拖，好不让那辆沿途用机枪扫射的轨道车从道岔里开出来。这个留胡子的人那次在壕沟里还丢了一只毡靴，它掉在深雪里，他用光脚掌怎样也没摸索到。他们俩还差点没在那挺机枪的火力下倒在那里。

列夫丘克心安理得地把手枪放进枪袋里。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小伙子信任自己的同志，变得和善了起来，把冲锋枪背到了背后去。这个留小胡子的人对列夫丘克感到了兴趣，对他瞥了一眼问道：

“你怎么，是从水洼里出来？”

“是啊，”列夫丘克简单地回答，同时小心翼翼地草地上把婴儿抱了起来。

“这是什么？”

“这个吗？是个人。这里有没有妇女。他需要一个奶妈。他这么小，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什么了。”

小伙子们感到有些诧异，沉默了起来。他掀开上衣，给

他们看看婴儿的小脸蛋。

“噢，真的！你瞧！从哪儿弄来的？”

“说起来话长啦，小伙子们。要找一个女人。他要吃奶，不然就完蛋啦。”

“对，送到家属营去。家属营离这儿不远，”戴库班帽的那个青年，几乎是带着友好的口气说，说完就骑上了马，“库列士，你送去，然后追来。”

“不，”列夫丘克说道，“我应该自己去。这里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呢，你要明白……我应该自己去。很远吗？”

“看怎么走。走大路稍远一点。要是从小河穿过只要十分钟。”

他们从蕨丛里来到小路上，马在骑者们的身下，惊恐地打转，看样子他们是忙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在这里遇到了从水洼里出来的这位同志，是自己同志的一位朋友，把人家放在这里不管，也不太合适。

“好吧！”戴库班帽那个青年最后决定说。看样子他是小组的头。“库列士，你告诉他路，然后追来。我们在鲍尔基跟前等你。”

留小胡子的库列士调转过马头，列夫丘克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后面，沿着大路赶去。他一面快步走着，一面竭力想弄明白，他这次遇到的是什么队伍，不过可一定不是五一大队的。库列士不可能从五一大队到会让站去，因为五一大队当时是在明斯克附近，只是到了春天才来到这个地区。

“德国人打的是不是你？在水洼里？”库列士问，一面从

马鞍上望着他。

“是，是打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瞧你！那里是一片泥塘，哎呀呀！”

“是呵，我想这回得淹死了；可是你现在是在基辅大队吗？”列夫丘克谨慎地探问道。

“是基辅大队，”库列士高兴地回答道。“这些匪帮把我们也打得够呛！以前都很平静。可是从昨天就打过来了。你听，还在轰隆轰隆响！这是我们在反击。”

列夫丘克已经听到，就在他们现在去的这个方向，枪炮正在隆隆地响。响声虽然离得很远，但是很密，在树林上空引起了一连串的回声。

“喂，这小孩是你的吗？”库列士向他的小包点点头问。

“不，不是我的，”列夫丘克说，“是一个朋友的。”

“原来是这样，那有什么，明白啦……”

“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成了孤儿，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有这样的事情，”库列士叹息了一声，“现在这是常见的事儿。”

列夫丘克和库列士的枣红色的小马并排急急忙忙地走着，他的思想渐渐地离开了不久前他所经历过的一切。现在他大概已完全脱险，而且到底把这个婴儿也救了出来，这一点他现在几乎是确信无疑了。这种奇异经历的结局是真正值得高兴的，可是他太累了。毕竟是水洼对他发了善心，现在，当那么多可怕的事已经留在水洼彼岸的时候，他只是

浑身感到一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疲倦。他一面急忙走着不让马落下，一面焦急地望着前面：这个家属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到了那里他再也不走了，把小孩安置好，自己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去找个大夫看一看。他肩上的伤口沾湿了，老也没有好好地包扎一下。它有时胀呼呼的，有时刺痒，疼得难忍，好象是化脓了，万一要是感染了可怎么办？现在他更多的关心起自己的伤口来了。

“不远啦，”库列士说，“过了小河就到了。”

列夫丘克疲倦地叹了一口气，看了婴儿一眼，他正无忧无虑地睡在他的手上。小道从长着松树的山岗上朝着小河旁边的榛林向下伸去。这时他们看到，在小河对岸的草地上，好象要拦住他们的去路似的，零乱地跑出来一些全副武装的人。有一个人，老远地望见他们就挥起手来，库列士勒住了马。

“怎么回事儿？”

大路上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黑脸膛，目光严厉，身穿德国制服，手里拿着德国冲锋枪，胸前还挂着一个很大的德国望远镜。列夫丘克猜想，这一定是基辅大队的一名指挥员。

“库列士，站住！”指挥员喊了一声，把冲锋枪背到背后去，“这是什么人？”他用追究的目光瞥了列夫丘克一眼。

“他是英雄大队的，”库列士替他回答道，“有个婴儿要送到家属营去。”

“什么婴儿！”指挥员愤怒地叫喊起来，“入列！德国人

冲破了防线，听见了没有，发生了什么事？”

从榛林里涌出来十二三名游击队员，表情都很疲倦，大概是跑路跑多了，他们一面一个跟着一个犹豫不决地停下来，一面倾听着他们的指挥员和熟人库列士及英雄大队的这个陌生的游击队员之间这场突然发生的争论。

“怎么，带着小孩入列吗？”库列士吃惊地问。

“好吧，你把小孩送去！”指挥员很快地决定说，“你站到队里去！步枪呢？”

“没有步枪，”列夫丘克说，“手枪在这儿。”

“手枪也行，入列，跟我来！”

列夫丘克犹豫了片刻，他想说他负伤啦。但是指挥员及战士们脸上的激动的表情告诉他，最好还是听从指挥。这些人不好说话，他们也不听你的解释。这是一些稍不如意就动枪的人物。列夫丘克根据自己的经验，很了解这一点。

他把小孩递给了库列士。库列士从马上不很灵巧地、非常小心地把小孩接了过去。

“主要是找一个妇女，喂他奶吃，”列夫丘克提醒他说。

“会安排好的，你放心吧。”

黑脸膛的指挥员带着两道急躁的目光，登上了山岗，回过头来看了看。可是列夫丘克还站在那里，不知为什么，他生怕库列士会把小孩摔下来。库列士用踩歪了的鞋后跟刺了刺马，转了过来。

“唉，他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列夫丘克感到惊讶。

的确，也许他要永远地和他分开了，可是还没有给他起个名字。难道他想过这个吗？他甚至都没想过，以后他还需要有个名字。

“维克多！”他想起了普拉东诺夫的名字，就这么喊了一声。“告诉他们，他叫维克多，姓普拉东诺夫。如果……”

“明白啦！”

库列士沿着小路驰去，不久就拐过弯消失在榛树林里。可是穿着湿衣服冻得直发抖的列夫丘克，跟着黑脸膛的指挥员向前跑去。已经可以听到前方步枪的响声，第一批的枪弹唱歌似地划破了凌晨的天空……

17

一段时间以前，列夫丘克开始观察阳台，说不上怎的当时他没有立刻想到，而是在后来才猜到，门口上方第二个阳台就是他们的。的确，既然住宅是在平台的左边，那么窗子就是对着院子这面的，所以阳台也在这面。阳台上有一道很窄的镶玻璃的门，栏杆上悬挂着一些花盆。那里还有藤椅、小桌。房顶上有一根很粗的天线。他突然看见那里有一位穿着浅色罩衫的年轻的女人，悄悄地从屋里走了出来，用玻璃罐浇完花，向下看了一眼，又悄悄地回到屋里去，阳台的门也没有关。

列夫丘克继续坐在那里。他不能立刻理解她这次出现的意义，尽管他也知道，他是等到时候了。是啊，盼望多年的这次的会见，终于来到眼前。他就在那儿！一刻钟以前，列夫丘克就曾瞥见，有一对夫妇走进了门口，但是他只看见了那个男人的背影：个儿不高、尖肩膀，短袖汗衫的外面露着两条瘦长的胳膊，他没有注意他。在他的想象里普拉东诺夫是另外一种体形。他还是坐在那里，继续观察每一个不常来这里、偶然路过的行人。但是恐怕是到了应该起来的时候了。生活很少娇惯人，实现人的愿望，它有它自己的处世习惯。但是人却喜欢坚持己见，于是就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结束得很糟糕。

大概，在这音信断绝的三十年的时间里，列夫丘克所幻想的一切，只不过是儿童般的天真的开心，一切恐怕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他应该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游击队生活的历史对他来说意义太丰富了，他没有理由藐视它。而且后来他就一直不走运，没有立下任何功绩。被围结束时，他的一只胳膊被截去了，他取代了格里勃耶特在卫生所的位置——看马。在马跟前转游，能有什么功绩？他的全副精神都寄托在以前的功绩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从狼群里救出来、后来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的这个婴儿。自从库列士在大路上把他抱走以后，他一次也没有再见到他。每逢遇到适当的机会他都向人打听，可是一切都是徒劳。许许多多的坚强的、有名的、经受过考验的人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谁还会对一个婴儿感到兴趣呢！列夫丘克也没有

获得多少奖励。他打仗的时候，还不常奖励，后来常奖励了，可是他已经成了一个车夫，不打仗啦。因此这个婴儿——当今我们国家全权的公民维克多·普拉东诺夫，对他来说，就成了最大的表彰。

列夫丘克克服掉两条腿上突然沉重起来的感觉，慢腾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向着门口走去。很久以前他所经历过的那种可怕的生活情景，他已经盼了将近三十年的这次会见，他这平淡无奇、但是已经走向暮年的一生……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他非常激动。

他抑制着某种不愉快的、正逐渐减弱的内心的激动，慢慢地时走时停地沿着楼梯走上三楼。那扇熟悉的门依然紧紧地关着，但是这次他听到屋里有人，于是就按了按门铃。他等待着谁出来给他开门，可是他却听到了从房间里传来的很低的和善的声音：

“请进，请进！门没锁。”

他忘记脱帽，就拉动了门上的把手。